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以「新聞」媒體為中心(1870-1920)

The Imagination of Japanese People toward the Southern Otherness:

Focus on the “Shimbun” Media (1870-1920)

洪偉傑

Wei-Chieh Hung

指導教授：詹素娟 博士

Advisor: Su-Chuan Chan, Ph.D.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July, 2014

國立政治大學
博碩士論文全文上網授權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for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Full Text Upload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Bind with paper copy thesis/dissertation following the title page)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系所 _____ 組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取得 碩士學位之論文。

This form attests that the _____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s received a Master degree thesis/dissertation by the undersigned in the _____ semester of 102 academic year.

論文題目 (Title) : 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以「新聞」媒體為中心 (1870-1920)
(The Imagination of Japanese People toward the Southern Otherness: Focus on the "Shimbun" Media (1870-1920))

指導教授 (Supervisor) : 詹素娟

立書人同意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政治大學, 將上列論文全文資料以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收錄於資料庫, 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用戶進行線上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及列印。國立政治大學並得以再授權第三人進行上述之行為。

The undersigned grants non-exclusive and gratis authorization t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re-produce the above thesis/dissertation full text material via digitalization or any other way, and to store it in the database for users to access online search, browse, download, transmit and print via single-machine, the Internet, wireless Internet or other public method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s entitled to reauthorize a third party to perform the above actions.

論文全文上載網路公開之時間 (Time of Thesis/Dissertation Full Text Uploading for Internet Access) :
網際網路 (The Internet) ☒ 立即公開

● 立書人擔保本著作為立書人所創作之著作, 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 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The undersigned guarantees that this work is the original work of the undersigned, and is therefore eligible to grant various authorizations according to this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and does not infringe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f any third party.

● 依據96年9月22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決議, 畢業論文既經考試委員評定完成, 並已繳交至圖書館, 應視為本校之檔案, 不得再行抽換。關於授權事項亦採一經授權不得變更之原則辦理。

According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first Academic Affairs Meeting of the first semester on September 22nd, 2007, Once the thesis/dissertation is passed after the officiating examiner's evaluation and sent to the library, it will be considered as the library's record, thereby changing and replacing of the record is disallowed. For the matter of authorization, once the authorization is granted to the library, any further alteration is disallowed,

立書人: 洪偉傑

簽名 (Signature):

中華民國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Date of signature: _____ / _____ / _____ (dd/mm/yyyy)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洪偉傑

碩士論文

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以「新聞」媒體 為中心 (1870-1920)

經學位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陳澤志

顏杏如

陳孝娟

指導教授： 陳孝娟

所長： 薛化元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誌謝

本論文的完成，首先得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詹素娟老師。詹老師給予我最大的空間，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以和煦的笑容，迎接我每次的到訪深談，更以無比的耐心，包容我的怠懶拖稿。最終，能完成老師口中這本「人生中的第一件作品」，讓我又多認識了自己一點。或許，畢業後這本論文的任何一個專業知識，我終將悉數遺忘；但詹老師的迷人風采與待人處事之道，那份熱情中徐徐注入的溫婉，我會一直放在心裡暖著。

同時，我也感謝這本論文的兩位口試委員張隆志老師及顏杏如老師。張老師深化我對文中諸多專業知識的理解，更在一開始苦思研究架構、進退維谷之際，適時地給予我方向及諸般鼓勵；而本文企圖嘗試的跨地域研究視野，則是啟發自顏老師的專題討論課，來自各領域的同學彼此激盪意見的場面，令人印象深刻。能在兩位老師面前呈現研究成果，我感到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另外，也感謝中研院的林玉茹老師，將近三年的助理生涯，使我習得許多論文寫作所需的各項技能，而老師的親切與大方，更是不待言說。

從原先的選修歷史到跨界雙主修，退伍後甚至還念了碩士班，即使都要畢業了，這一路對我來說還是有點虛幻。但在虛幻化作現實的過程中，我要感謝服役時支持、體諒我帶職報考的單位長官及弟兄們，還有依山傍水的美麗北投，讓我幾乎忘記留守時準備考試的苦悶。感謝言妍引人入勝的文字與故事，某種程度啟發了我選擇投身臺灣史的懷抱。感謝政大臺史所的老師、學長姐及同學們，特別是文婷、虹薇、Mori、哲瑋、顧大哥等人的協助與陪伴，沒有你們各位，我的碩班生活無法如此順遂而多彩。

在撰寫論文的漫長過程，受到朋友及家人的幫助甚多。特別感謝祐德的心輔兼健康諮詢、天睿的英文潤稿，以及海外的范姜協尋研究文獻。同時，也要感謝父母，特別是長年耗損身心負擔家計的母親。求學歷程的我總在給你們希望後，又自私地讓你們失望，但終究你們還是願意支持我的任性。希望這本論文的完成，能帶給你們一些安慰。

四年前的此刻，獨自一人拿著報到單步入四維堂、蓋好章填完資料，再獨自一人靜靜離開。入學的過程竟是如此空洞、沉重，又充滿了不確定。雖說如此，當時的我根本無法想像，得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踏出那一步。

我衷心感謝那時的自己。

摘要

本論文探討十九世紀後期以降，日本人在帝國形成過程中，對南方地域異己的想像與描繪過程。自江戶末期以來，日本被迫面對西方列強的進逼，開啟了原先封閉的國門，更擴大了國人對海外異己的想像空間。明治開國後，日本開始逐步南進，陸續佔領太平洋海域各島嶼，並展開對南方地域族群、人文與自然地貌的認識、討論及分類，而在向外拓展的過程中，更是不斷地累積知識、形塑與重整南方異己論述。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則透過與原住民的接觸，成為深化這份異己論述的重要經驗，並於二十世紀初期逐漸定型為負面、劣等的族群刻板形象，強化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

本文即整理 1870 至 1920 年間日本人對南方異己的想像與知識建構過程，並以新聞報紙為主要分析史料，探討帝國在向南擴展勢力時，如何藉由大眾媒體，將臺灣及南洋地區的接觸經驗轉化成異己想像，定位文明與野蠻，進而從中確立自身族群的文明位階。

由於近代日本的新聞業發展，與帝國興起相輔相成，大眾媒體更對異己想像的形塑扮演了關鍵的傳播角色，因此成為本文的研究重點。結論則指出，在帝國權力的逐步箝制下，新聞媒體依舊展現一定程度的公共性，為形塑多元異己論述提供重要的開放平台。

關鍵字： 南方 種族 日本人 異己形象 大眾媒體 二元對立

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forging of Japanese impression toward the southern otherness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during 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t the end of Edo period, Japan was forced to confront the Western power, opened their country, and widened its imagination of people abroad. Since Meiji period, Japan started to occupy islands and islets in the Pacific Ocean. It was also the period for the Japanese people to start to acknowledge, discuss, sort, and pile up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thern natural and cultural scenery. By advancing to the further south, they continued to shape, reform the discourse of the southern othernes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olonizing Taiwan offered the Japanese people a chance to contact with the indigenous, which deepened the discourse of otherness, built discriminative ethnic stereotypes, and reassured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ry.

By pars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mainly Japanese Shimbun media, this thesis focuses on 1870s to 1920s, illustrates how the Japanese empire forged their impression of southern otherness, how it divided civilization and savagery by using the media-twisted southern imagination, and how it ranked its own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modern Japan was deeply in tandem with 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lso, mass medi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process of forming impression of otherness, which becomes the key point of research. In conclusion, despite the gradual control of the journalism by the government, mass media still showed its publicness and provided an open platform to develop multiple discourses of otherness.

Key Words: southern, race, the Japanese people, images of otherness, mass media, binary opposition.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趣旨.....	2
	第二節 研究回顧.....	4
	第三節 問題意識.....	12
	第四節 研究架構.....	19
第二章	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25
	第一節 認識黑白.....	26
	第二節 出兵臺灣.....	33
	第三節 前進南洋.....	43
	第四節 再見野蠻.....	52
第三章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65
	第一節 親友仇敵.....	66
	第二節 純真凶暴.....	76
	第三節 珍客行蹤.....	88
	第四節 進退兩難.....	111
第四章	帝國、大眾媒體與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125
	第一節 帝國之聲.....	126
	第二節 學術脈流.....	135
	第三節 立足異域.....	148
	第四節 他聲喧嘩.....	163
第五章	結論	171
	參考文獻	175

表次

表 3-3-1	近代日本舉辦之內地觀光行程表	109
表 4-1-1	明治前期主要新聞每日平均發行份數	130
表 4-1-2	明治初期的識字階層	131
表 4-3-1	殖民地臺灣與內地日本的新聞取締法令比較	153

圖次

圖 2-2-1	臺灣牡丹族歸順日本軍	37
圖 2-2-2	《東京日日新聞》報導中的オタイ畫像	38
圖 2-2-3	牡丹社少女穿上和服	39
圖 2-2-4	被帶回東京的オタイ	40
圖 2-2-5	「日報社臺灣記事石門口勝戰之圖」	42
圖 2-4-1	牡丹社蕃人的食人想像圖	58
圖 3-3-1	王弟桑米與隨從烏里斯的簽名	90
圖 3-3-2	人力車上的生蕃	94
圖 3-3-3	新橋停車場前的生蕃	95
圖 3-3-4	第四次蕃人內地觀光行程表	95
圖 3-3-5	生蕃素描	96
圖 3-3-6	第三次蕃人內地觀光之生蕃	97
圖 3-3-7	蕃婦肖像與服裝	99
圖 3-3-8	蕃人參觀代代木練兵場之聯合演習	100
圖 4-3-1	各報社義捐地址與注意事項	158
圖 4-3-2	討蕃易占	159
圖 4-3-3	討蕃軍畫報	160
圖 4-3-4	臺灣討蕃軍畫報	161
圖 4-3-5	臺灣討蕃彙報	162

第一章 緒論

是那日治時期殖民帝國的隔海，使我們成為國境之南？
還是中原王土四夷思想的離島，使我們成為南蠻之域？
什麼樣的島國想像，
讓我們無法排除「以南」的目光，
不僅自視，也允許他者之眼的重疊？
南國之島——臺灣。相對於中國大陸，以及有五十年統治歷史的日本而言，
臺灣都是他們領土的南方，炎熱，潮濕。
但是 90 年代的今天，臺灣自己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是侯孝賢導演 1996 年作品《南國再見，南國》（Goodbye South, Goodbye）的影片簡介。歷來無論是中國或是日本，都賦予了臺灣島上的地景及人群無窮的南方想像。「成為」（becoming）南方之國，就像是被各種權力想像化（imaginize）的過程。之所以被稱為「南國」，被呼為「南島」，從來都不是客觀的身為某地理方位的島嶼而已，而是不斷地被加入各種形塑、想像、印象，才得以讓人知悉、稱為某中心以外的「南國」。¹

歷經清代、日本、國府等殖民者的統治與意象投射，在漫長的被殖民歲月中逐漸發展出自我本土意識的九零年代臺灣，當不再成為他人的南方、他人的南國，而以自己為名之時，要如何重新去檢視自我形象？透過電影，侯孝賢呈現出一個脫離權力者詮釋、真實深沉的「南國」，也是一個「他想告別的南國」——幫派鬥毆、黑白勾結、賭商不分、酒光聲色、破敗與惡俗、失落與迷茫交織的混亂國度。在戰後幾十年的變遷與人群混融下，真實的臺灣面目，早已超越了殖民者眼中的「南國」情調可以概括而承載的意義。而當臺灣不再是各種國境「之南」，不再背負帝國之眼的注視，它仍有自己必須消化、捨棄、再塑的南國形象。對南國的再見，也是「成為」臺灣的開始。

而本文欲探討的，即是在這層南方自我形象建立之前，那個原先由殖民者——日本所形塑、投射的南方想像，特別是對南方人群的異己想像。

¹ 本段影評文字參考吳昱慧對《南國再見，南國》一片的網站介紹。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20 日。
網址：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665&&my_pro=5&&time=&&fdsn=348。

第一節 研究趣旨

本論文緣起於筆者感興趣的三個研究面向：「時間／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地域／臺灣與東南亞」，以及「主題／原住民族群史」。從時間向度分析，十九世紀是西方資本主義式的帝國向亞非地區入侵的時代，對入侵地區的人群而言，則是個在國際政局、社會經濟、價值觀皆不斷遭受挑戰而重塑的時代。時局及人心的動盪不安，更造就二十世紀幾次重大的國際衝突。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混亂與衝擊，對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歷史發展，具有決定性的象徵意義。

另外，從地域向度分析，要研究臺灣史，就不得不處理臺灣島與周邊地域的關係，特別是長期以來被忽略的東南亞地區。不只是傳統臺灣史研究主要關心的東北亞與東亞大陸地區，臺灣與亞洲大陸南方半島及太平洋島鏈地區也具有緊密的連結關係，因此彰顯這份關係，並賦予其價值是絕對必要的。

最後，為了呈現這份關係，在主題向度上，本研究選擇以原住民做為主要研究對象，藉以凸顯臺灣在人種上與南方地域人群的緊密連結。在獨立出臺灣與南方地域之間的關係後，便可將此區人群與北方大陸權力者（包括漢人、日本人等文明人群）一分為二，並觀察兩者的族群歷史互動，探討握有權力的文明書寫者，如何詮釋這群南方的野蠻人群。在三個面向的融合交織下，形成了本研究所關心的原始問題：十九世紀後期以降，在帝國的形成過程中，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海外的南方人群。

1868 年，開國後的日本與週邊國家積極接觸，也得以大幅開拓對周邊地域與人群的認識。除了西方的朝鮮半島與東亞大陸的中國，南洋地區成為日本人心中一個廣大而充滿未知的冒險地，蘊藏富饒的自然資源，等待有心人前往開發。² 開國不久，日本人便開始逐步向南拓展國土，從小笠原群島、沖繩、臺灣、南洋群島，一直到二次大戰時期的華南與東南亞地區，這種向南推進的慾望不斷膨脹，甚至延伸、擴大成二十世紀中葉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而十九世紀後期正是這種南進慾望的濫觴。因此，探尋南進慾望最初的表現形式與原始面貌，便顯得意義重大。

² 這裡所指的南洋地區，引用矢野暢的說法，包含了內南洋與外南洋。內南洋指的是太平洋諸島地區，外南洋則為現今的東南亞地區。而日本的南進，也因上述地域的不同，區分成兩條不同的南進路線。詳細敘述參見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千倉書房，2009），頁 174-175。本書為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與《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兩書的合訂再版本。

此外，對日本而言，十九世紀後期是一個需要不斷追求自我文明提升的時期。此時歐美等西方勢力早已進入亞洲地區，有關近代西方的種族分類知識不斷輸入，這對正在逐步追求近代化的日本來說，十分重要。不同於相對成熟的西方白人列強殖民勢力，一個正從前近代跨入近代的東方黃種人國家，也同步加入殖民者的行列。因此，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具備了雙面性，既要追趕西方加入列強之林，又必須確立與其他有色人群的優劣差異。

殖民帝國的成立與對外擴張，使日本有了直接面對南方有色人群的機會，透過實際統治與調查，更充實了對南方人群的異己論述。對日本人而言，確立對南方的異己想像，不只是為了統治需要才試圖增進對這群人的了解，更是為了建立我者與他者的差別，明確彼此的文明位階，以符合西方的單線式文明進化史觀。唯有如此，日本人才脫離有色人群的枷鎖，真正地加入西方帝國列強的陣容。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灣原住民成為日本帝國第一個殖民統轄的南方族群，更是日本人形塑南方野蠻人群想像的主要投射對象。不同於日本國內的異己描述，在族群交會的邊界地區，對異己的想像力道更為強烈，臺灣即為一個重要的範例。當日本殖民政府進入臺灣，並企圖統治所謂的「南方族群」後，與臺灣原住民的接觸、競合經驗，如何影響、改變或強化他們的南方異己論述？這是筆者希望透過此研究釐清的一點。此外，在統治臺灣之前，日本人早已接觸南洋各地的異己人群，這些同為南方的經驗也必須納入討論。

如前所言，一個族群如何定位自己，可以從如何描述「他者」看出；但如何向大眾散布這些異己形象，並進一步發揮影響力，就須仰賴大眾媒體了。而十九世紀後期，正是「新聞」這項大眾媒體開始在日本蓬勃發展的時期。³ 從外文報紙到日文報紙，錦繪畫報到日刊報紙，各類新聞媒體不斷演進，發揮了凝聚民族共同體的積極功能。因為，報紙不只是傳遞大眾知識的工具，也同時是權力展現的場域，其中官方御用報紙的政治意味最為濃厚，如殖民地臺灣的《臺灣日日新報》即為如此。要了解報紙的特殊性質，除了要釐清報紙發行的時空背景，也必須了解當時人的心態，理解他們究竟在自身群體傳遞了哪些資訊，以及為何是這些資訊。報紙的特殊性質，如何影響南方異己想像的傳播，是本研究著重分析的另一個重點。

整體而言，日本人對南方人群的異己想像，在 1920 年代逐漸定型，並且陸續

³ 日文的「新聞」一詞，也可稱作「新聞紙」，為 newspaper 之翻譯，即中文俗稱的報紙。

出現「酋長の娘」、「冒険ダン吉」等東方主義式的野蠻形象。這種刻板印象如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被形塑並流傳，是筆者認為可以好好探究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分析，展現日本人對他者及自身定位的複雜面貌，進而與臺灣史或東亞地域研究有所對話。

是以，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探討十九世紀後期日本帝國逐漸興起的過程中，南方異己形象如何被塑造，並透過殖民地臺灣的統治進一步被強化。同時，也探討日本人在形塑、散布異己形象時，新興的大眾媒體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第二節 研究回顧

一、南進思想研究

有關日本的南進思想研究，自二戰以來日本已出版許多描述戰前南進政策的書籍，但能將南進思想放回歷史過程脈絡化，並進一步提出檢討的人，首推矢野暢。1975 年出版的《南進の系譜》一書，主要討論日本「南進」一詞，如何由早先明治期的「南方干預」、大正期平和且實利取向的「南進論」，發展到後來成為昭和期帝國侵略的「國策」，並在戰後演變成以官方外交和大企業投資為主的政策。1979 年的《日本の南洋史觀》，則著重在日本人對「南洋」的看法，探討歷史過程中不同時期「南進」思想的特徵與功能。兩本論著最大的貢獻，便是為戰後的「南進」、「南方干預」等相關研究開闢出一條思想的路徑，並仔細分析其中的演變，而成為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研究論著。除了提出體系性分析之外，矢野暢整理了明治期以來的南進思想書籍、雜誌等相關史料；書中觸及的問題多具開創性，使後續有關日本與東南亞關係的研究、在地日本移民生活型態的研究等，都承繼或啟發自矢野的論著。⁴ 另外，矢野暢也是奠定戰後日本東南亞研究的主要貢獻者之一。

除了關心大陸東南亞地區的矢野暢，外國學者 Mark Peattie 則著重分析另一個「南洋」——南洋群島的日本人移民社會。⁵ Peattie 從明治二十年代的南洋熱開始，探討日本人在南洋群島的活動軌跡，以及在委任南洋群島後，當地移民社群的經

⁴ 較具代表性的有清水元、小島勝、後藤乾一等人。清水元分析明治中期以來南進論與日本人的經濟活動，小島勝著重分析東南亞日本移民社會的日本語教育狀況，後藤乾一提供蘭印地區的日本人移民社會研究概況。

⁵ Mark R. Peattie, *Nany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in Micronesia, 1885-194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マーク・ピーティ（Mark R. Peattie）著、淺野豊美訳，《植民地：帝国 50 年の興亡》（東京：読売新聞社，1996）。

濟、社會發展狀況，直至二戰結束。後續的日本研究者承繼了 Peattie 的研究方向，發展出不同的議題，例如淺野豐美便從國際外交的角度，分析日本委任南洋群島的內容意涵及統治方針。⁶

至於臺灣方面的南進研究，以往主要著重在總督府如何動用政治經濟力量，配合國家的南進政策，向華南及東南亞地區發展。⁷ 因此，此類研究往往以產業史或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切入，較少討論思想或文化層面。近年來受到川村湊、阮斐娜等文學研究者的影響，出現如邱雅芳對旅臺日人文學作品的研究，藉以從中理解日本人心中的所謂「他者」之形象，並整理出一套橫跨整個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完整的南方論述演變過程。⁸ 而同樣以在臺日人之文學作品為分析文本的，還有分析殖民地書寫與臺灣形象的楊智景。⁹ 另外，陳芷凡則分析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日本人對南方臺灣的認知歷程，內容涵蓋官方及民間紀聞、臺灣出兵報導、人類學者調查報告、文學作品等等，使用的史料廣泛，也積極與中國及西方的紀錄進行對話，展現不同層次、面向的論述。¹⁰

除了文學研究者，史學研究者也採用此種研究取徑，例如周湘雲即以椰子樹作為主要分析標的，探討其背後承載的熱帶想像，如何被日本統治者拿來與臺灣做連結，並運用科學理論與現代化都市意象接軌，建立起獨特的臺灣形象標籤。¹¹ 而顏杏如則從在臺日本人移民社群的角度出發，分析這群進入南方地域的日本人，如何形塑出在地的異文化體驗與獨特的時代心理。¹²

上述列舉的既有研究成果，其中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這與各研究者本身關心的重點有關。本研究希望能釐清在近代日本的南進論述之中，「臺灣」以及「臺

⁶ 淺野豐美編，《南洋群島と帝国・国際秩序》（東京：慈学社，2007）。

⁷ 此類研究方向以梁華璜、鍾淑敏等人為主要代表。

⁸ 川村湊分析描述樺太、南洋等地的日本文學，並分析特定文本所具備，類似東方主義式的野蠻想像。阮斐娜的研究，則涵蓋了日本南方包括臺灣等地的殖民地文學分析，探討帝國如何想像南方，進而想像南方所謂的「野蠻人」，並分析日本殖民前後不同時期，對野蠻人形象的描述內容差別。川村湊，《南洋・樺太の日本文学》（東京：筑摩書房，1994）；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臺北：麥田出版，2010）；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⁹ 楊智景，〈日本領有期の台湾表象考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植民地表象〉（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8）。

¹⁰ 陳芷凡，〈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臺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¹¹ 周湘雲，〈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¹² 顏杏如，〈殖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9）。

灣原住民」的地位為何。有關這個問題，矢野暢曾在《日本的南洋史觀》一書中，將臺灣與南洋群島兩個受日本統治的地區作為「南進思想的據點」。¹³ 矢野認為，領有臺灣，使日本有個南方基地，得以站穩腳步將目光望向更遠的南方，即所謂的「據點思想」。但矢野並未針對日本人與臺灣原住民的接觸進行討論，也未分析在臺灣的南方經驗如何、甚至是否影響了既有的南方論述。

後續如邱雅芳、陳芷凡等文學研究者，則因各自關心的議題不同，也未能完整地討論這個問題。邱雅芳透過在臺日人作家的臺灣人文地貌書寫，建立出一套產自臺灣的日本南方論述，並理出其定型成一種日本人「集體無意識」的過程。一來，邱氏分析的時間斷限是 1910 年代至二戰時期，重點在將論述歸結至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但本研究欲分析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南方論述的萌芽，在時間點上有所不同；再則，邱氏以「日本統治時期」的在臺日人作品為分析文本，但描述臺灣南方經驗的文本，實可上溯至還未實質統治前的 1870 年代，若要探索論述的原初形式，勢必得將研究時點前移；最後，邱氏的研究僅限臺灣，而本研究則試圖納入其他南方地區的異己經驗綜合討論。

陳芷凡的主要對話對象，是長期以來以「大陸漢人」之記載為主的臺灣異己形象描繪。對此，陳芷凡企圖以「海洋」視角切入，加入西方人與日本人的異己敘述史料，重塑並深化異己論述內容。但由於需兼顧三方論點與資料，且對話重點不在日本的思想脈絡本身，因此對日本方面的討論與分析就相對簡化。本研究企圖承繼陳氏提出之海洋視角，以日本人的論述為主體，將臺灣及原住民放回日本南方異己論述之中，分析統治者如何透過實際異己統治經驗，轉而深化既有論述內容，並進一步將之定型。除了藉此脫離既往以中國、漢人為主要的研究方向，也希望再次突顯臺灣在不同脈絡下，同樣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二、 種族知識與後殖民研究

從上述有關南進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除了關心南進思想的演變，並探討實際南進時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的發展外，也開始重視族群接觸的議題。由文學研究者所發起的南方異己想像研究，除了文本分析，實牽涉近代日本人對自身與南方原住民的種族知識建構過程，以及知識如何與帝國權力、殖民統治相互勾結，此即後殖民研究所要探討的重要議題。以下將回顧相關學者的研究，並

¹³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觀》，頁 251-266。

整理臺灣史既有的研究成果。

在日本，研究近代日本帝國內部異民族接觸議題的學者，以駒込武與小熊英二為代表。駒込武以帝國內部不同民族的文化統合為研究主題，分析臺灣、韓國與滿洲國等地的統治異族經驗，並進行跨地域對話。¹⁴ 值得注意的是，駒込在討論臺灣殖民統治時，不僅分析漢民族，也以吳鳳傳說為分析案例，將臺灣原住民納入討論，並劃出一條文明（日漢）與野蠻（原）的界線。小熊英二則企圖釐清「日本民族」如何形成，並從近代日本開國後逐步發展的種族知識開始談起，除標舉日本作為「有色」帝國的特殊性之外，也探討日本在這樣的知識架構下，逐漸領有各地異民族的統合過程。¹⁵ 兩位學者皆採取了跨地域的比較分析，以一種宏觀的視野檢視帝國內部日本人與異民族的統合過程。而本研究尚可延伸的，則是進一步擴大異民族的討論範圍，將以往較被忽略的臺灣原住民及南島族群等「黑色」人種納入討論，分析日本人對這群位居文明位階底層的人種，抱持了何種想像。

小熊英二從種族的角度出發，其論述帶著強烈的理論導向。為了強調日本「有色」帝國的特色，小熊遂採用神話、民俗學以及種族觀念等各式資料，用以印證其說法。而既牽涉到此類知識，就必須觸及日本人類學的發展脈絡，這部分的研究則以山路勝彥和坂野徹為代表。¹⁶ 兩位學者以近代日本人類學的發展作為切入點，分析人類學與帝國的共構關係、日本民族之形成過程，以及日本人的異民族想像。其中，山路勝彥更以臺灣原住民為主要探討對象，分析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無自主能力」、「純真無垢」等野蠻想像，如何落實、反映在日後的統治構想上。

除了人類學，美國學者 Robert Tierney 則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切入。*Tropics of Savagery* 一書將日本視為一個非西方的殖民帝國案例，在引進西方殖民相關知識

¹⁴ 駒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¹⁵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5）；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比較可惜的是，小熊在討論臺灣案例時，僅針對漢人與日本人的統合進行論述，對原住民的討論則付之闕如。

¹⁶ 山路勝彥、田中雅一編著，《植民地主義と人類学》（日本：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02）；山路勝彥，《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4）；山路勝彥，《日本の人類学——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學術調査の歴史》（日本：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11）；坂野徹，《帝国日本と人類学：1884-1952年》（東京：勁草書房，2005）。

時，對「野蠻」他者的想像，成為日本在形塑自身殖民論述時重要的陪襯對象。¹⁷隨著實際領有殖民地，日本也逐步操作這套「野蠻」論述，進而發展與西方帝國相異的殖民經驗。作者分析不同時期日本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其中對野蠻他者的描述，以釐清日本作為進步西方與落後有色人群的中介者，如何定位自身，確立出文明西方及野蠻他者的關係。與小熊英二相同，Tierney 同樣強調日本有色人種的身分，並認為日本因此發展出與西方帝國截然不同的殖民論述。另外，Tierney 分別採用了不同時期臺灣和南洋群島的經驗，並進行跨地域的比較，其研究主題、取徑與關注對象，皆與本研究直接相關。

但即便如此，Tierney 的研究仍有幾項尚待延伸之處。首先，Tierney 的研究時段設在日本殖民初期的臺灣、1920 至 30 年代崇尚原始社會的時期，及至二戰時期的南洋群島，Tierney 並未處理十九世紀後期的野蠻異己想像。因此，Tierney 忽略了日本在 1895 年統治臺灣前，早已有了進入臺灣及南洋群島的經驗，並逐步累積、強化既存的南方異己負面形象。這份南方異己想像，與日本實際統治臺灣後所產生的異己想像必須分開討論，方能彰顯南方異己論述的演變過程。另外，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是一個挑戰文野兩極對立的重層存在，也因此當時的日本人亟欲脫離野蠻身分，加入文明陣營，Tierney 並引用 Homi Bhabha 殖民模仿（colonial mimicry）的概念敘述之。但在模仿過程中，Tierney 一味地直指南方族群野蠻意象，卻未同等強調此時的日本在西方人眼中看來，也是一個未脫野蠻的族群。在描述日本人如何接觸、馴服南方野蠻族群的同時，也須加入在此關係之上、來自「西方文明」的視角，以突顯日本在文明與野蠻之間的矛盾。要真正展現日本的重層過渡性，就必須進入十九世紀後期，分析當時日本人的種族心態。

在回顧幾位學者對日本種族知識與後殖民的跨地域研究後，接著列舉以臺灣或臺灣原住民為探討場域對象，並處理相關議題的學者。首先，中村勝探討日本從臺灣出兵以來與原住民的接觸經驗，以及日治初期對原住民的理蕃政策，如何形塑出野蠻「他者」形象，在建立一套理蕃知識史之際，也批判日本當局所建立的原住民野蠻形象之「虛構性」；¹⁸ 松田京子以人類學知識建構與帝國博覽會為研究主題，分析帝國權力與人種展示之間的關係；¹⁹ 陳偉智分析日本領臺之初原住

¹⁷ Robert T. Tierney,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¹⁸ 中村勝，《台灣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清朝・日帝初期統治政策の研究》（東京：緑蔭書房，2003）；中村勝，《「愛国」と「他者」：台湾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 II》（東京：ヨベル，2006）。

¹⁹ 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田弘文館，2003）。

民知識論述與殖民主義的共構關係，近年則將此議題連結至西方近代自然史種族知識的建構；²⁰ 張隆志分析後藤新平、竹越與三郎等人的言論，背後存在著怎樣的種族知識脈絡背景，藉以剖析日本統治臺灣的知識建構與殖民論述內容；²¹ 而 Emma Jinhua Teng（鄧津華）則以清代中國旅遊文本與圖像為主要史料，分析來自大陸的權力者對臺灣番人的野蠻想像描寫。²² 除了以上的研究成果，在史料提供的部分，楊南郡整理領臺前與日治初期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的諸多異己調查記錄，並將之譯成中文，其中也包含了本研究欲採用的新聞媒體史料，楊氏的註解中也不乏許多獨到見解，對筆者幫助甚大。²³

另外，在異己接觸的幾項途徑之中，「內地觀光」的議題是值得注意的一項。在臺灣的案例中，鄭政誠與傅琪貽已有相關研究，但鄭政誠較著重討論霧社事件後的觀光，同時其關心的重點在原住民方對觀光的反應；而傅琪貽討論 1897 年臺灣原住民首次內地觀光的記載，並將此次觀光定調為「誘導原住民嚮往文明」。²⁴ 本研究將「日本方的反應」納入討論，強調內地觀光同時為原住民向內地日本國人「展示野蠻」的過程，也是日本人「展示文明」、證明自身文明高度的一次考驗。另外，日本學者千住一、今泉裕美子提供了南洋觀光團的研究案例，本論文也將一併納入討論。²⁵

在這些既往研究成果之上，筆者認為還可以發展的方向，就是拓展史料類型，另外則是進行跨地域比較。藉由分析大眾媒體史料的性質、媒體與帝國的關係，從中探討有關原住民的報導背後蘊含何種異己想像，這是本文欲發展的研究議題。

²⁰ 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陳偉智，〈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析〉，《臺灣史研究》16：4（2009.12），頁 1-35。

²¹ 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於國史館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臺北：國史館，2002），頁 1235-1259；張隆志，〈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臺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收於梅家玲主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 233-259。

²²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²³ 楊南郡譯註，《臺灣百年花火：清末民初臺灣探險踏查實錄》（臺北：玉山社，2002）。

²⁴ 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臺北：博揚文化，2006）；傅琪貽，〈誘導「嚮往文明」之旅：1897 年臺灣「蕃人內地觀光」〉，《文化越界》1：3（2010.3），頁 47-74。

²⁵ 千住一，〈「觀光」へのまなざし——日本統治下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観光団をめぐる〉，收錄於遠藤英樹、堀野正人編，《「観光のまなざし」の転回——越境する観光学》（東京：春風社，2004），頁 131-146；千住一，〈日本統治下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観光団の成立〉，《歴史評論》661 号（2005.5），頁 52-68；千住一，〈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観光団をめぐる「内的心情」〉，《日本植民地研究》25 号（2013.6），頁 40-53；今泉裕美子，〈日本の軍政期南洋群島統治（1914-1922）〉，《国際関係学研究》17 別冊（1990.3），頁 1-19。

同時，本文也將納入南洋群島等地的異己想像經驗，與臺灣相互比照，以擴大研究視野。

三、大眾媒體相關研究

本研究的一大特點在於史料類型上的不同，亦即以大眾媒體作為主要史料。因此，勢必得回顧日本與臺灣兩地的大眾媒體相關研究概況。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此類史料以報紙為最大宗，即日文所謂的「新聞」。新聞業在日本和臺灣如何誕生？報紙的性質跟功能為何？如何促成異己想像知識的傳遞？諸如此類的研究議題，在日本與臺灣皆已累積不少成果。

江戶時代末期，日本開始出現報紙，最初是由西洋人發行的英文報紙，隨後則有日文報紙的出現。明治開國後，文明開化之聲不絕於耳，新聞業益發蓬勃，日本最初的日刊報紙《橫濱每日新聞》遂於 1870 年正式發行。除此之外，1872 年始刊的《東京日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以及 1874 年的《讀賣新聞》也是此時期新聞報紙的代表。隨著民眾消費力逐漸提升，閱報者人數也直線成長，辦報的報社開始改變經營方針，轉為營利取向的商業報紙，1879 年創立、1889 年改制的《朝日新聞》即為其中的代表。

而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報紙史料，當然是 1898 年 5 月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為其前身《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的結合，是兩方政治勢力與總督府妥協之下的產物，自創報之初便帶有濃厚的官方宣傳立場，更是帝國日本展現殖民論述的重要場域。²⁶ 至於日治初期該報的主要讀者，則以具備日語閱讀能力的在臺日人為大宗。如此明確的讀者群，使報紙中的諸多資訊成為島內日本人互通有無的依據，更是這群在臺日人流通、傳遞知識的重要平台。在人數尚少的日治初期，報紙成為維繫在臺日人社會的重要力量，而這群在臺日人對臺灣、特別是廣大的未知山區及東臺灣的異己描述報導，如何與官方政策相連，即為本研究關注的主要內容。

有關媒體研究史的部分，在日本最早建立國內媒體史研究的首推小野秀雄，後續則有西田長壽、山本武利等學者，整理自明治期以降日本各地報紙、雜誌之

²⁶ 詳見鍾淑敏，〈館藏『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推廣組編，《慶祝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週年暨改隸中央二十週年紀念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頁 137-155。

發展概況。²⁷ 而土屋禮子則研究明治、大正期日本大眾報紙的形成過程，並處理不同類型的報紙研究。²⁸ 除了通論研究外，鈴木健二則著重於批判戰前大眾媒體與帝國的共謀關係，岩波講座出版的系列套書《帝国日本と学知》中也明示了這層關係，分析報紙、廣播、電影等各式大眾媒體，如何成為日本帝國宣傳其統治政策的工具。²⁹

而臺灣的日治時期媒體史研究，除了洪桂己、王天濱等人的新聞史通論整理外，較為深入的研究成果，則需建立在關鍵史料《臺灣日日新報》及其他報紙雜誌的發掘整理之上。³⁰ 就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例，90年代鍾淑敏等學者開始提倡該報之重要性後，已有許多研究採用報紙雜誌作為史料，大眾媒體資料遂成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史的重要史料來源。³¹ 至於針對媒體史及報紙性質的研究，則以李承機為代表。李承機企圖建立日治時期臺灣媒體史，除分析日治初期臺灣報業的興起，強調《臺灣日日新報》創報過程中官方勢力如何強勢進駐外，並論述1920年代臺灣漢人開始掌握媒體，自行創立報紙雜誌，並與官方媒體相互對抗之過程。³² 李氏的研究點出殖民地報紙的特殊性，許多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的後續研究，也均闡明該報的御用性質，並各自統合其他議題做進一步分析。³³

大眾媒體是本論文重要的一項分析要因，但媒體類型實在太過龐雜，即便是新聞報紙，也依發行時段、主題而有不同形式，因此本研究挑選日刊報紙(daily news)作為主要分析史料。日刊報紙的特點在於發行量大，刊載的多屬綜合型資訊，且為求取即時資訊，篇幅多半較雜誌報導小，更接受來自讀者的投書，具有經常性、

²⁷ 小野秀雄，《日本新聞發達史》（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1922）；西田長壽，《明治時代の新聞と雑誌》（東京：至文堂，1966）；山本武利，《新聞と民衆：日本型新聞の形成過程》（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73）；山本武利，《近代日本の新聞読者層》（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1）。

²⁸ 土屋禮子，《大眾紙の源流：明治期小新聞の研究》（京都：世界思想社，2002）。

²⁹ 鈴木健二，《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メディ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山本武利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4巻 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東京：岩波書店，2006）。

³⁰ 洪桂己，《臺灣報業史的研究》（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68）；賴秀峰，〈日據時代臺灣雜誌事業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臺北：亞太圖書，2002）。

³¹ 鍾淑敏，〈館藏『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頁137-155。

³²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

³³ 徐郁縈，〈日治前期臺灣漢文印刷報業研究（1895-1912）——以《臺灣日日新報》為觀察重點〉（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吳坤季，〈帝國符碼與殖民策略——《臺灣日日新報》圖像內容分析〉（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李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衛生論述（1898-1906）為主〉（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即時性、開放性等特質。也因此，日刊報紙成為一般日本大眾獲取資訊最主要的管道。當然，上層知識份子或許有其他獲取資訊的來源，例如雜誌、書籍等等，但對一般民眾而言，除了口耳相傳，最方便的知識來源就屬日刊報紙了，日刊報紙遂成為傳遞知識、形塑共同想像最合適的平台。

承繼以往臺灣史研究，本文同樣以日治時期重要的日刊報紙《臺灣日日新報》作為史料，但不同之處在於，筆者將納入同時期日本內地的報紙一併比較討論，這也是現行臺灣史較為缺乏的部分。以往臺灣史大多僅使用殖民地報紙，卻未留意內地報刊是否也有臺灣相關之紀錄。以五年理蕃戰爭為例，除了《臺灣日日新報》之外，日本內地報紙也均關注此事，並留下各式各樣的戰地異己報導。甚至在殖民臺灣之前，日本報紙早已有許多對臺灣或南洋之調查記載，這些產自內地的報導，對臺灣史研究來說也是重要的史料。陳萱即整理日本內地的報紙報導，以大眾媒體的角度重新檢視牡丹社事件之相關論述，豐富了原有的牡丹社事件研究成果。³⁴ 本研究也以近年甫建立全文電子資料庫的《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為主要分析史料，並揀選其中有關臺灣、南洋等地的異己想像報導。

透過不同時期、日本內地與臺灣兩地的媒體史料分析，筆者希望能從中看出日本人對南方人群的報導描述，是否會因時間或地域迥異而有所不同，而這些不同點的形成原因是什麼。重要的是，這些報紙誕生的時間點各自不同，性質與辦報環境也略有差異，是否會因此影響到報導異己論述內容，這些均是本研究希望關注的焦點。

第三節 問題意識

在概略回顧相關研究、並闡明本文欲延伸的研究方向後，以下分別就「種族與文明位階」、「帝國與大眾媒體」、「南方論述與臺灣」三項要因，進一步說明本文之問題意識，並試圖綜合以上要因，提出臺灣史與日本南方異己論述之間的連結關係，以及新聞媒體作為主要的分析史料，如何對既往日本殖民論述研究提供不同的嶄新視角。

³⁴ 陳萱，《明治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像の形成—新聞メディアによる 1874 年「台湾事件」の表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一、 分析要因

（一） 種族與文明位階

異己想像不僅是一種對未知他者的獵奇與探索，對我群而言，更是非常重要的自我定位依據。沒有他者，就無法認識自我，對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人來說，這樣的他者想像更是不可或缺。開國後的日本，開始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知，人民有更多認識外界事物的機會，這類異己知識自然成為熱門的討論話題。因此，為了滿足日本人民對外界的好奇心，世界各地的異己形象以各種形式不斷輸入，並透過不同媒介向人民散播，逐漸形成普遍且廣泛的共識。

然而，大量來自西洋的知識，也在物質與精神層面不斷衝擊日本，使日本人開始對自身的文化特性與文明位階感到不安。十九世紀後期是單線文明化進程流行的時代，許多知識分子透過眾多來自西洋的異己形象，強烈感受到自身國家的落後。在西方的種族優劣概念影響下，無法改變的「有色人種」身分，彷彿成為求取進步的日本人揮之不去的負面烙印。但也正在此時，日本「發現」了一群比自己低劣、尚未開化的人群——南方的黑色人種。這些住在南方熱帶地區、衣不蔽體、茹毛飲血的黑皮膚人群，處於單線文明進程中的絕對落後地位；他們的生活方式及外貌，也被貼上了野蠻未開的標籤，形塑成負面劣等的異己形象。

日本的後進性，使這樣一個比自身低劣的異己想像，更顯現獨特的意義。面對西方優越文明與人種的不安，使日本人更為重視對南方人群的負面想像，並在建構南方有色人群的野蠻低劣形象之際，得以從中脫離有色種族的烙印，強化自身的文明形象，使「文明」與「野蠻」產生辯證式的二分對立。

因此，研究負面想像的形成及傳播過程，對於理解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作為有色帝國的心態，是很重要的。但日本人真能順利地脫離種族身分的箝制，擁抱西方白種人的進步文明嗎？本研究在追溯南方異己想像的論述形成之際，也會著重呈現日本人的種族心態，探討這群身陷文明迷思的有色人種，如何掙扎、突圍，與迷失。

（二） 帝國與大眾媒體

然而，前述的異己形象，是如何傳播、散布，最終深植於每個日本人民的心中呢？十九世紀後期興起的新聞報紙，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報紙在十九世紀

中後期伴隨西方勢力傳入日本，成為一種新型的知識傳遞媒介。相較於以往的書籍，報紙傳遞的訊息更為迅速普及。每日出刊的報紙，使人民有機會接觸具時效性的資訊，透過圖像印刷或坊間口耳相傳，即使不識字的民眾也得以獲取新知。³⁵ 因此，報紙成為明治時期啟蒙社會大眾的重要工具。

在異己形象的傳遞方面，報紙更能突顯其特色與力量。由於篇幅受限，報紙傳遞的資訊多半屬於快速、片段式的描述；許多訊息往往受限於時效性，無法全面且精確地描述，因此容易造成一些扭曲、誤解；更甚者，後期開始追求驚奇賣點，許多報紙描述更是刻意的誇大。在這種情形之下，對異己形象的描述就更容易被刻板化，特別是在描述域外劣等人群。報紙的特殊性質，容易助長負面且刻板異己形象的產生，再加上報紙的廣泛流通性，這樣的想像不斷地對一般大眾散播，成為根深蒂固的負面異己論述。

大眾媒體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與帝國的共謀關係。³⁶ 明治時期的報紙在一開始，與政治的關係就非常濃厚。各報往往支持創報的政黨，成為口誅筆伐的政治工具。雖然後期出現如福澤諭吉等人，倡導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場，但報紙依舊無法全然與帝國脫離關係。³⁷ 這種共謀關係，在殖民地更為明顯，殖民地的官方報紙基本上就代表了官方立場，協助宣傳、鞏固官方政策，並打擊、非議反抗官方的聲音。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8 年 5 月創立了《臺灣日日新報》，從統御南方人群、製造異己想像的角度分析，殖民政府的官方意圖，在御用的《臺灣日日新報》上被如何呈現，就是一個值得觀察討論的實例。

但儘管如此，大眾媒體也絕非全然地受制於官方。媒體本身具備高度的公共性，因此得以容納多元的異己想像，進而造就出龐雜的南方論述。帝國權力如何與媒體公共性相互競爭，又如何影響了異己論述之形成？而若牽連上段的分析要因，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異己想像論述，是迎合前述種族文明框架下的二元對立觀，抑或是展現重層的論述內容？這些都是有待研究討論的議題。

³⁵ 錦繪新聞即是明治初期一種以圖像為主的報紙，往往將一些社會事件由繪師畫成圖像，讓人民得以了解近期發生的重大事件。另外，報紙篇幅較小，使一些新知易於散布，即便未能親眼閱讀報紙，也可透過口耳相傳獲得新資訊。

³⁶ 在岩波講座《帝國日本的學知 4》的序章中，即點出了大眾媒體與帝國權力的共謀關係，特別是在對外戰爭宣傳的部分，這也是全書的主要論據。山本武利，〈「帝国」を担いだメディア〉，收錄於山本武利等著，《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 4 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頁 2-22。

³⁷ 報紙雖然可以針砭時事，盡力維持公正立場，但在面對國家重大議題上，則常常與帝國立場一致，成為官方宣傳的工具，對外戰爭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無論是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抑或是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日本國內報紙多半為主戰派，非戰派的報紙一直都不是主流，在戰時更是銷聲匿跡。

（三）南方論述與臺灣

臺灣對日本南方人群異己想像的形塑，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對一般日本民眾而言，堪稱是首次的集體海外體驗。在興起不久的大眾媒體推波助瀾之下，有關臺灣戰地人事景物的報導內容，讓人民第一次體驗到「南方野蠻荒域」是怎樣的一番光景。許多從未出國的社會大眾，透過一系列臺灣戰地報導，得以窺見未能親臨體驗的廣大未知南方地域，而臺灣的蕃人與蕃地，更承載了一連串日本對南方的獵奇心態與負面印象，成為日後日本對南方異己形象的原型。

另外，臺灣也是日本帝國在海外的第一個殖民地，使日本從一個外部的觀看者，晉升為實際體驗的參與者。這對希望理解南方的好奇民眾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來自南方的訊息將更為豐富，也更為正確。日本對南方人群的異己知識，也在此時期開始逐步建立。除了人類學、民族學上的學術分類與人種體系建構，這些異己知識也透過各種媒介向一般大眾介紹、傳遞，進而深化南方人群的異己想像論述。

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歸入帝國統治的異民族，並不是只有臺灣漢人而已。島嶼中央以東的臺灣原住民，也成為官方必須管理的對象。因此，統治臺灣，統治臺灣的原住民，是一場帝國收編南方異己的展現過程。日本帝國對殖民地臺灣的統治，特別是統治初期理蕃政策的實施與推演，無論是戰爭討伐，或是撫育教化，都為日後帝國統御南方異己做了一次重要的示範。

二、 南方異己論述對臺灣史研究之意義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得知，在臺灣的異己經驗，對日本人形塑整套南方異己想像有很大的影響力。另外，探尋南方異己想像的內容及流變過程，對於理解日本統治臺灣原住民的思想脈絡與知識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既往的臺灣史研究中，卻較少關注此議題。以下提出兩個主要分析方向，除了期望補足臺灣史研究的缺漏，也作為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視角。

首先，是從殖民者的角度出發，探究殖民者的心態。受到後殖民理論影響，臺灣史研究開始反思殖民主義下的歷史詮釋，陳述、批判殖民者與知識權力的共構關係，並從被殖民者的角度重新詮釋殖民時期的歷史。以日治時期臺灣史來說，便是批判殖民者日本，批判日本帝國下的殖民統治。但這樣的研究取向，往往過

度著重理論的使用，而忽略了歷史脈絡，並再一次地複製「殖民者 v.s.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框架。

若回到十九世紀後期，仔細檢視所謂的殖民者日本，其實可以發現在臺灣史「殖民者日本 v.s.被殖民者臺灣」的對立關係之上，還存在著更大的「白人西方 v.s.有色東方」的對立框架，日本即首當其衝。在身為殖民者之前的日本，也同時以半殖民者的身分持續受西方白人控制，在臺灣史研究中長期被視為殖民者的日本，在心態上同樣被西方殖民，成為一個既優越、卻又劣等的曖昧存在。若無法突顯殖民者日本這樣的矛盾身分，並深入當時日本人的心態，就無法真正地釐清這種多重殖民的連鎖關係。當後殖民研究已開始注意日本帝國的特殊性時，臺灣史也應重新看待以往作為二元對立彼方的日本，探究在特殊歷史脈絡下的日本，如何模仿西方，再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文野對立框架，進而影響臺灣的殖民統治。

另外，則是拓大研究視野，進行跨地域、跨時段的討論分析。既往的臺灣史研究，多半採取單一島嶼、並以政權轉換作為分期的斷代史研究，近年則開始擴大分析的時空範圍，例如比較韓國的殖民經驗，或是從事跨期的連續研究等等，但這些嘗試似乎仍有不足之處。就跨地域來說，比起對北方的關注，日治時期對臺灣與東南亞、南洋群島的比較分析，仍較為缺乏。臺灣的東南亞研究，在近十幾年來有許多成果，但多半是以中國史與漢人史——即「華僑史」的角度出發，關注漢民族在東南亞各地政治、經濟活動的發展。³⁸ 若跳脫以往中國、漢人中心的思維，以南島原住民族群研究的角度出發，臺灣與整個東南亞、甚至太平洋南島地區的關係就變得極為緊密，特別是從日本種族知識分類的「黑色人種」來看，臺灣與南洋各地的族群實為一體。由此可見，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史研究，勢必得納入日本與其他南方原住民族群的接觸經驗，這也突顯日治時期臺灣史與南方各地綜合分析的重要與迫切性。

就跨時段而言，脫離既往政權斷代史的思維，在日本殖民臺灣之前，早已與臺灣建立連結，並與十九世紀後期日本在南方各地的進出活動有連帶關係，特別是南方異己想像的發展，實從明治開國之際就已開始醞釀。若依傳統斷代史思維，將十九世紀後期的歷史按殖民統治之有無進行切割，就容易忽略這層連續的論述發展脈絡。十九世紀後期對日本而言，是各式知識萌芽、撞擊、融合的重要過程，也是日後殖民相關論述成形的關鍵時期，是以臺灣史研究必須對日治時期之前的

³⁸ 臺灣的東南亞海外華人史研究，以王賡武、顏清煌、古鴻廷、陳鴻瑜為早期代表，近期則有李盈慧、吳龍雲、利亮時等學者。

日本近代史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方能釐清統治時期的殖民思維。

總而言之，殖民地臺灣對整套日本南方異己想像，絕對有其影響。但對日本內地而言，所謂「帝國之眼」的目光，一直以來都持續望向更遙遠的南方。統治臺灣異己人群的經驗，深化了日本人的南方異己論述，但整套論述並非從此定型，臺灣只是其中的一站。當 1915 年臺灣理蕃事業告一段落，日本委任南洋群島，並興起一陣「南洋熱」的同時，整套南方異己論述也走向了下一個階段。正如前面所述，南方人群異己想像是日本確立自我的一種他者意象，對南方人群的想像，並不會因收編臺灣原住民而從此停滯。南方必然、也必須在永不可及的遙遠異域，並持續乘載著優勢族群所加諸的負面他者形象。

臺灣原住民在日本南方異己論述形塑的過程中，曾經扮演重要的被投射者。本研究試圖指出這一點，並分析其內容及形塑過程為何，以標舉臺灣在整套日本南方異己論述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當異己想像不斷地向更遙遠的南方投射，也提醒筆者必須將臺灣放入廣大的南方異己論述脈絡中，與日本在其他南方地域的異己論述經驗相互比較。甚至，也能透過這個「日式」案例，與不同的統治者，即「中式」、「西式」的臺灣異己經驗進行對話。

三、新聞媒體史料對殖民論述研究之意義

在既往臺灣史研究日治時期殖民論述的相關議題時，主要採取以下三種史料。首先，是最被廣泛使用的公文書、官方檔案及學術調查報告。這類由總督府所遺留下來的龐大檔案資料，詳實記載了與統治臺灣有關的大小事務，成為日後歷史學者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史不可或缺的基礎史料。透過這類史料，自然可窺知日本如何發展其獨特的殖民論述。近十幾年來，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逐步深化，也拓展了不同的史料類型，為文學研究者所重視的日治時期文學作品、特別是臺灣人及在臺日人撰寫的小說，便成為另一類重要的分析文本。另外，跳脫原先以文字記載為主的史料類型，以圖像、繪畫為分析史料的圖像史研究，也成為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分析取向。

公文書、文學文本、以及圖像，是研究日治時期殖民論述的三大史料類型。與上述三大史料類型相關的，則是殖民論述的兩條研究取徑。第一條取徑以科學調查與知識分類為主，探討日本人如何運用各式科學知識，對臺灣這塊殖民地進行調查與分類，並建構出一套獨特的殖民論述。另外一條取徑，則是分析各類文本，探討日本人內心如何想像、投射出一個殖民地。有關文學文本及圖像史的殖

民論述研究，即多半採取這類途徑。

本論文所採取的，也是強調以想像、投射心態來建構殖民論述的這條途徑。但在史料類型上，本文跳脫以往三大史料類型，而選擇以新聞媒體作為主要分析史料。新聞史料相較於以往的史料，具有何種特色？新聞史料如何能補充既有研究的不足，並提供新的洞見？以下列舉新聞媒體史料的特色，並回應上述問題。

首先，新聞媒體史料最大的特點，在於其記載的資訊多屬「混真」性質。新聞報導當然以求真求實為原則標準，但由於追求報導的迅速，記載就往往顯得零碎、片段，甚至多有錯誤，而無法如公文書或調查報告那般，揭露正確而完整的資訊。再則，以異己想像報導來說，在十九世紀後期所記載的異己知識，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種族知識觀念。這樣的知識觀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自然破綻重重，但對當時的媒體人及閱報者來說，這些知識是「被視為正確」的。更甚者，為了加深異己描述的獵奇性，報導有時會刻意誇大既存的野蠻偏見，以滿足大眾對異域異己的好奇心。這類「刻意作假」的描述，也因無從求證其真實性而被保留下來，進一步深化對異己人群的負面印象。

新聞史料的另一項特點，則在其「自由開放」的性質。相較於公文書與調查報告，新聞報紙的流通對象是一般大眾，資訊的流通範圍也遠大於官方限定的公文書，這使得報導記載的資訊，無論在報導性質與流通範圍上，都反映出相對較高的大眾取向。而民眾不僅僅只是資訊的接受者，還能透過讀者投書的方式，成為資訊的提供者，雙向交流的特質，更讓新聞報紙成為知識產出的重要開放平台。在後續的章節中，也會針對此項特點進行深入介紹。

是以，新聞媒體史料具有獨特的混真性質，介於切實正確的公文書與憑空想像的文學文本之間。同時，新聞媒體也擁有自由開放的史料特性，能同時反映官方立場、社會輿論以及普羅大眾心態，這點也與傳統公文書與文學文本較為不同。新聞報紙不一定記載資訊正確的史料，但對本研究的重點「異己想像」而言，這樣的記載就顯得格外有意義。正因異己想像內容的重點不在追求「真正的」真實，而是「人們相信的」真實，因此能反映廣大日本我群民眾心態的新聞史料，成為研究異己想像可用且有效之史料。

這些是非不一、且不經意流露出的南方人群想像偏見，透過每日重覆性的短篇報導相互競合、累積，最後形塑出一套異己論述，深植在一般日本人民的心中。本論文即試圖利用新聞史料的特殊性質，以呈現南方異己論述的內容與建構過程，並希冀能對殖民論述研究提供不一樣的史料取徑，深化既有的研究成果。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文關注十九世紀以來日本人對南方人群的異己想像，以下將介紹研究範圍斷限及專有名詞的選擇與使用，最後則簡述本論文之章節架構。

一、 研究範圍

（一） 研究時段

首先，研究時間斷限如標題所示，從 1870 年至 1920 年，前後共約 50 年的時間。1870 年的日本剛步入明治時期，是西方勢力持續進逼的焦慮時代，是內地報紙百花齊放的時代，更是即將面臨第一場海外戰爭的時代。1874 年牡丹社事件，則是近代日本人與南方人群最早的接觸，也由於記者隨軍採訪，讓國內大眾得以透過《東京日日新聞》及其他報紙的報導，得知南方人群相關資訊，並形塑最初的南方野蠻形象。就南方異己論述的起源，以及日本與臺灣史的關聯而言，回顧這次事件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就近代日本人種族觀的建立，以及實際海外接觸經驗的角度來看，這是研究時間起始自 1870 年之緣由。

隨著南進熱潮的萌發，以及 1895 年獲得第一個南方殖民地臺灣，日本有了實質接觸、統治南方人群的機會。除了持續追蹤日本國內的報導外，1898 年《臺灣日日新報》正式發刊，異己報導始出現內地與殖民地媒體的重層差異。隨著統治的穩固、理蕃構想的定型及五年戰爭的推行，總督府於 1915 年初步確立對臺灣原住民的實質控制，並藉由征服、馴化原住民的政績，向西方宣示日本文明的進步，也迎向新的南方——南洋群島的委任統治。因此，對南方人群的描述與想像，大致於 1910 年代左右有個基本原型。而當時序進入 1920 年代之後，對既有異己想像的反思與多元辯證，則開始蓬勃發展，異己論述也走入下一個階段。除此之外，國際上對日本人的種族排斥風潮，在 1920 年代益發興盛，使日本人的種族及文明位階觀受到影響，原先一味追求單線提升的心態也出現變化。因此，本研究將斷限定在 1920 年，以探討在近代西方種族觀念的影響下，追求文明位階提升的日本人，其南方異己想像原型之形塑過程。

（二） 研究對象

研究的主要對象，必須分成「形塑異己想像的人群」及「被視為異己的人群」

兩個部分來討論。首先，本研究從日本人的角度出發，分析其南方異己想像論述，試著理解這群人如何看待南方異己，及如何認知他者。形塑異己想像的人群，自然是指這群居住在日本列島的日本人。但「誰是日本人」這樣的大哉問，早在近代以前即成為形塑大和民族的重要討論議題。³⁹ 就廣義的種族定義而言，只要是自視、或被他人（特別是西方人）視為日本人的人群，都可能接受這份南方異己論述，去想像身為他者的海外有色人群。⁴⁰ 本論文涉及明治期日本人種族概念的探討，在引進西方種族知識後，我群意識如何發展，將有更進一步之闡述。

此外，由於本文以大眾媒體作為研究中心，因此所謂「日本人」的異己想像，若要更精確地形容，毋寧說是「日本媒體人」的異己想像。而被納入想像共同體之日本人，則為居住在大城市周邊、有機會閱讀報紙，或是透過他人傳遞獲取異己資訊的一般閱聽者。⁴¹ 就族群內部差異而言，由於異己知識不若政治、經濟等硬性資訊，並非追求高度準確性的重要資訊，因此各類異己報導容易為庶民大眾所吸收、傳遞，也較不受限於階級、地域的差異，得以廣泛流通，因此在討論異己想像議題時，可將這群閱讀報導的日本人，視為一個同質性高的族群共同體。⁴²

至於是哪些人是被視為異己呢？本研究所指稱的異己，泛指所謂「黑皮膚」的南島原住民，即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因此，雖然南島民族內部差異頗大，各地狀況均有所不同，但若站在一般日本大眾的角度來看，細分各族群之差異並無太大意義。重點在於，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這些黑皮膚的原住民都是所謂的「劣等」民族，都被日本人烙上了未開、野蠻的標籤。在這種情形下，南島民族成為一種集體泛稱，共同承載了來自日本人的負面想像。因此，臺灣原住民、南

³⁹ 舉例來說，從西元三世紀開始，日本與中原歷代漢民族王朝的接觸，特別是受唐代天下體制影響，逐步確立出以天皇為中心之小天下，此過程可視為是一種日本自我意識的萌芽；此外，自十八世紀開始水戶學倡導恢復古代天皇制，也是促使日本民族形塑的重要原因。詳細可見甘懷真、藍弘岳等人之研究。

⁴⁰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近代日本民族的形塑絕非如此單純，而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統合過程，其牽涉的議題也非常多。僅以今日的日本領土來說，內國殖民地北海道的原住民，琉球處分後的沖繩，甚至是遠離關東地區的東北、四國、九州等地方社群，皆經歷程度不一的民族統合工程，才可能形塑出今日所謂「大和民族」的共同體想像。

⁴¹ 這裡所指的一般日本大眾，除了內地日本之外，還包括了1895年之後的在臺日本人。

⁴² 雖然異己報導的流通度與接受度高，容易形塑出普遍而廣泛的日本人異己想像論述，但嚴格來說，既然採用了大眾媒體史料，就代表這些報導所呈現的南方異己想像，其實是屬於「日本媒體人」的異己想像，而無法直接等同於「日本讀者」甚至是「全體日本人」的異己想像。媒體報導人的想法，與閱聽者的想法，還是存在著落差。而就目前可用的資料，要能真正反映廣大日本讀者群眾想法的史料，頂多只有部分讀者投書欄的報導可用，且也無法證明其代表性，但正文中也將使用這些資料，以呈現媒體人與閱聽者之間的資訊交流。有關本研究所使用媒體史料之代表性，在此特為說明。

洋群島島民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原住民，即為本研究所謂的「南方異己人群」。⁴³

除了確立出被視為異己的人群，也必須針對其他被排除的異己人群稍作說明。首先，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帝國南方的人群，因此在領有臺灣前，納入內國統治的北海道、樺太等地同樣「野蠻」的北方異己族群，本研究則捨之不論。此外，近代隨著日本國力上升，原先較為文明的漢人也逐漸被日本人視為劣等人群，也同時承受了諸多野蠻的負面形象。但一來，漢人與日本人同屬黃色人種，不若黑色人種在文明位階上來得絕對且不可逆；再則，近代中國經歷了一次文明位階的翻轉過程，對日本人的異己想像來說，其內涵更為複雜，因此本研究亦捨之不論。雖然如此，但傳統文明中國的異己書寫，同樣也會影響日本人的異己想像，後續章節將會述及。

最後，與其說是研究日本人對南方人群的異己想像，毋寧說是探討這群日本媒體人及閱報人的自我族群定位。如同前面所示，確立他者的過程，其實是為了確立我者。而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人，如何透過報紙的異己描述，讓這樣的想像深植於一般大眾心中，進而確立自身應有形象，此過程是值得探究的。描寫南方人群，是日本人形塑自我形象的一種定位方式。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這群尋求自我定位的日本人。

（三）研究地域

接下來，有關研究的地域範圍，也可分成日本閱報人群範圍以及異己人群的分布區域兩種來討論。能閱讀記載異己報導的報紙，勢必得在有發行報紙、以及擁有讀者群的地域。以本研究所關注的時段來說，就可以區分成內地日本與殖民地臺灣兩塊閱報群，分別代表了殖民母國以及殖民地日人社群。母國讀者群以一種相對抽離的姿態，去看待、想像位於遙遠南方的異域人群；但身處南方異域的在臺日人，卻身處異域，並為野蠻的異己人群所包圍。也因此，報紙發行地域的差異，可能產生質、量皆不同的異己報導。

而異己人群的分布範圍，亦即日本人所想像的「南方」異域的範圍，大致上

⁴³ 這裡必須撇除同在日本帝國南方沖繩的琉球人不談。琉球人在日本南方人群想像中的地位，並不與所謂的南島民族相同，因此本研究暫且不論，但琉球人的確承載了日本對南方人群的部分想像，例如臉部刺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在日後臺灣、南洋群島的統治，當地人也會將琉球人與來自內地的日本人做區隔。這部分的相關研究可見：朱惠足，〈做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臺灣之間〉，《文化研究》5（2007.10），頁49-86；富山一郎著、陳幸均譯，〈殖民主義與熱帶科學：「島民」差異的學術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2007.12），頁121-143。

可以明治期日人志賀重昂所提出的「南洋」一詞涵蓋之，即廣大大洋中的大小島嶼以及半島東南亞地區，那些居住著黑色人種的熱帶地域。日文「南洋」一詞包含了南洋群島及東南亞地區，甚至延伸至今日的紐、澳地區。以本研究所關心之時段來說，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約莫是整個明治時期，此時日本人所感興趣的「南洋」，以「內南洋」南洋群島為主，而「外南洋」東南亞地區，則在明治後期至大正初期逐漸受到重視，成為日後主要的南進發展目標。因此，依研究時間之斷限，本論文所舉的異己報導，也以偏向內南洋地區的人群為主。

即便為了研究需要，劃分出一個大致的南方人群及疆域範圍，但南方異域的邊界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帝國擴張向南推進。所謂「帝國之南門」，從一開始的沖繩、小笠原群島，到第一個南方殖民地臺灣，一次大戰後委任的南洋群島，一直延伸到二戰後期的昭南島（新加坡）。⁴⁴ 日本帝國不斷地推進疆域，原先被視為是南方異域的地區，也逐漸納入帝國內部，原先為「他者」的南方異己，更轉化為「我者」帝國臣民。

二、 名詞釋義

本文以繁體中文為主要寫作語言，因此在提及許多外國語彙時，將以臺灣熟悉的既存翻譯為主。惟本論文之主要描寫對象為十九、二十世紀的日本人，並以這群人的「我者」心態為研究立足點，因此在思考、描述他者的用詞上，均因時代及國籍上的不同而萌生差異。為了回歸時空脈絡、尊重當時我群描述他者之語彙用詞，並顧及分析敘述時的邏輯通順，本論文在第二、三、四章的正文，將替換部分涉及他者描述的重要語彙，以下一一說明之。

在描述臺灣原住民及南洋地區的原住民時，除了第四章第四節以原住民視角闡述異己知識而需翻轉用詞，其餘章節一律使用「蕃人」、「土人」、「島民」等詞。

「土人」一詞用來指稱在地原住民，在日本報紙描述臺灣、南洋各地時被普遍使用。⁴⁵ 而當日本殖民臺灣後，便以「蕃人」一詞特指臺灣原住民，以與南洋地區的土人及臺灣島上的漢人做區隔。⁴⁶ 至於「島民」一詞，則在一次大戰時期開始

⁴⁴ 「昭南島」一詞，是日本佔領新加坡島後新取的名稱，意指昭和時期在南方獲得之領土。這個名稱本身即暗示了濃厚的南方意涵。

⁴⁵ 不同的報紙在使用語彙時有各自的偏好，例如《朝日新聞》偏好使用「土人」一詞，但《讀賣新聞》則多半以「原住民」指稱之。

⁴⁶ 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報紙在描述臺灣漢人時，也常以「土人」、「土民」等詞指稱，而後則出現「本島人」一詞。

用來指稱南洋群島的原住民，並與「蕃人」一詞相同，成為日後指稱該地原住民時的族群分類名稱。

另外涉及他者的語彙，則是日本與其他國家的幾場重要戰爭名稱。以往站在漢人、中國的角度，會使用「牡丹社事件」、「甲午戰爭」等詞彙，在本論文則均照日本方面的翻譯，使用「臺灣出兵」、「日清戰爭」兩詞。而另一場日本與他者的重要戰爭「日俄戰爭」，本論文也一併採日本慣用的「日露戰爭」替換之，但在單純描述國家名稱時，則回歸「俄國」、「德國」等中文譯名，而不採用「ロ＝露国」、「独国」等詞。

三、 章節內容

除了必要的緒論與結論，本研究將按照時間先後與討論主題，分別以第二、三、四章進行論述。以下介紹各章節的架構安排。

第二章「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討論明治前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論述萌芽過程，以及受西方影響之下，日本如何形成獨特的種族優劣觀。另外，此時期也是日本大眾媒體與帝國誕生、茁壯的重要階段，因此論述重點會放在異己思想、大眾媒體與帝國三者之共生關係，企圖歸納出日本領有臺灣之前，對南方人群的原初異己形象內容。最後，也將分析其中的幾項野蠻形象，強調此時期日本人努力擺脫野蠻、卻未脫野蠻的曖昧心態。

第三章「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討論明治後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論述形塑過程，並以 1895 年後領有的殖民地臺灣為主要探討對象，分析日本領有臺灣之後新聞報紙對原住民的異己報導，包括南方異己論述野蠻標籤的內涵分析、內化成族群刻板形象的過程，以及對實際統治政策的影響，以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進行參照與對話。另外，也以內地觀光為例，分析日本人如何透過與異己的實際接觸經驗，確立兩極化的異己論述，並藉此呈現日本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種族心態。

第四章「帝國、大眾媒體與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則將論述重點放回大眾媒體本身，探討此時期日本新聞媒體的公共性如何與帝國權力相互拉扯。本章將從知識傳遞過程中的不同角度切入，突顯大眾媒體與帝國之間的糾葛，並檢視在不同的時間點，這兩股力量相互消長的狀況，如何影響南方異己論述的建立。

第二章 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本章探討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人如何看待與自身不同的南方、特別是南洋地區的有色人群。為討論這樣的議題，就必須對十九世紀後期盛行的種族觀念有所介紹，特別是日本作為一個企圖跨越西方與東方如此兩極隔閡的先驅者，說明日本當時如何吸納、轉化來自西方的種族觀念，自然極其必要。而日本人如何將這樣的觀念運用到南洋土人身上，即為第一節關心的重點。

再者，本文亦必須介紹相關的史實，並詮釋其中的意義。對本研究來說，此時的日本有兩件重要史實需要討論，一是明治 7 年（1874）的臺灣出兵事件，另一則是明治二十年代南進思潮的勃發。前者代表了剛踏出國門、首次接觸南方有色人群（臺灣蕃人）的日本，藉此機會如何初步建立了對南方「野蠻」人群的印象；後者則闡述明治二十年代日本萌發的南進思潮，使相關的旅遊紀行、新聞報導、出版書物等得以陸續介紹給社會大眾，並確立日本人對南洋土人的族群印象。以上有關史實事件與相關思想的論述，將分別在第二、三節處理。

最後，第四節則仔細分析日本人的南洋土人印象。在龐雜紛亂的敘述中，本節挑選幾項具代表性的族群標誌，指出日本人利用這些標誌，定位西方人、南洋土人與自己的文明位階。另外，也希望透過本節檢討潛藏其中的矛盾與偏見，賦予其時代意義。

第一節 認識黑白

「白色？還是黑色？」直到今日，這樣的問題依然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不得不面對的挑戰。由外貌、膚色差異衍伸出來的種族觀念，深深的主導、改變了近代世界的歷史。本節討論十九世紀西方的種族主義觀念，如何影響日本這個追求文明開化的「有色」東方國家。在種族分類的互斥、二分概念下，日本人必須不斷面對「黑色 v.s. 白色」的糾葛與掙扎，在試圖破除西方概念下種族的「黑色」負面印象的同時，日本人也企圖切割自身與其他有色人種的相關性，強調彼此的差異，進而將同樣的負面印象加諸在這群土人身上。以下分別就白色、黑色的角度切入，剖析當時日本身處其間的獨特心態。

一、 認識白色

十九世紀後半是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對日本而言更是如此。明治維新是日本人從未經歷過的一場社會革命，來自先進西方各國的壓力，使日本從長期鎖國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正式踏入國際社會，並開始頻繁接觸西方文明。在這樣的接觸之下，日本人逐漸意識到「我們」，與那些西方的「他們」不同。這種認知差異深深縈繞在日本人心中，更在日後成為主導日本帝國發展動向的思緒源頭。因此，分析這種差異感，成為研究近代日本史的重要課題。

如前所述，差異感的萌發，肇因於西方勢力的入侵。在幕府體制崩解後，西方各國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權、關稅優惠等種種特權，新成立的日本明治政府，面對列強不得不承受相對不平等的關係，此亦說明日本做為一個半殖民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並不高。而明治政府意識到自身的落後，因此以「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為基本政策，首要工作便是吸收西方先進國家的文明經驗，不斷引進新知，企圖躋身文明國家之列。這樣的心態，使日本在面對西方各國時，普遍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¹ 這種自我東方化的傾向，在開國前後，直到 1895 年日清戰爭勝利之前，特別明顯。²

¹ 因應明治政府的政策，當時會前往日本的西洋人，多半是外交官、傳教士、學者、技術人員等菁英份子；而一些在海外遊歷，並回國撰寫文章的日本人，會選擇參觀的地方也多半為該國首善之區，因此會出現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並不意外。見南博著、邱淑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臺北：立緒文化，2003），頁 27。這裡要注意的，是日本人對西方的片面性認識：十九世紀後期的西方國家，內部依舊是混雜且非均質的，中產階級之外的勞工、貧民階級，其生活不一定比當時的日本庶民來得優越。

² 至於西方人對日本人的看法，當然包含了許多負面歧視，但柯能認為並非全然劃一地劣等。西方

為了解消這種揮之不去的劣等感，當時的日本知識份子有不同的聲音。一派力行歐化主義，例如當時的外交官森有禮，便曾提出廢棄日語，改用羅馬拼音及英語的說法；³ 而曾擔任外交部長的井上馨，更於 1883 年創辦了鹿鳴館，做為與西方人平等交往的場所；另外，也於 1887 年提出條約修正論，呼籲日本人必須改變，變得與歐洲人一樣，才能解除不平等條約的箝制。⁴ 而另一派則強調日本文化的優點，例如創辦《日本人》雜誌的志賀重昂，便強調保存國粹，維護大和民族傳統特質的重要性；⁵ 加藤弘之也批評一味模仿歐洲的行為，主張漸進式的西洋開化，並強調日本人絕非劣等人種，與歐洲人同為上等人。⁶ 這些思想都企圖維護、突顯日本文化的固有特質，提升日本人的文明位階，是日後國粹主義的前身。⁷

但是，無論歐化主義或是國粹主義，都無法真正消除人種差異所導致的不平等現象。有色人種與白色人種之間，像是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即便後來日本成功吸收西方殖民帝國的統治經驗，成為亞洲第一個近代殖民國家，但在國際間仍被視為是一個「有色帝國」，依然得承受來自白人帝國的種種歧視。⁸ 正因雙方差異僅用不精確的肉眼、感覺即可分辨，進而被合理化，使這種遭受歧視的不平之感得以遍及廣大群眾，而每一位「有色」的日本人，都無法從中逃脫。整個日本民族自近代以來，共同承受人種歧視帶來的心理壓力，也因此發展出與西方殖民帝國截然不同的「有色帝國」思維。如小熊英二所敘述，像日本這樣的有色帝國，「正宛如一條寄生蟲，寄身在二元思維的『歐洲 v.s. 亞洲』、『加害者 v.s. 受害者』、

人在批評日本「混亂」的同時，也對日本畫藝術、藝妓文化深深著迷。因此，本文所指的劣等感，主要是來自於日本上層知識分子自我感覺，而非日、西雙方均存在的普遍觀感。這樣的多元論說法，就與薩依德《東方主義》一書的二元論點有很大的不同。詳細敘述見柯能 (Victor G. Kiernan) 著、陳正國譯，《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臺北：麥田出版，2001），頁 14-16、257-270。

³ 即森有禮所提出之「英語採用論」。相關討論參見中村敬，〈船橋洋一、志賀直哉、そして森有禮：西洋の大言語と皇国言語の狭間で〉，《成城文芸》170（東京：成城大学文芸学部，2000），頁 17-22。森有禮的文章則參見大久保利謙編，《森有禮全集》第 3 卷（東京：宣文堂書店，1972）。

⁴ 有關井上馨的鹿鳴館外交及條約改正論，參見井上清，《條約改正：明治の民族問題》（東京：岩波新書，1955）。

⁵ 志賀重昂，〈「日本人」が懷抱する處の旨義を告白す〉，《日本人》2 號（1884.4）。本文收錄於松本三之介編、志賀重昂等著，《明治文学全集 37 政教社文学集》（東京：筑摩書房，1980），頁 99-106。

⁶ 加藤弘之，〈天地万物皆歸吾有〉，收錄於大久保利謙、田畑忍監修，《加藤弘之文書》（京都：同朋舍，1990），頁 90-101。

⁷ 順帶一提，歐化主義跟國粹主義有著先後差異，一開始以歐化主義為主，1880 年代以後國粹主義的聲音開始膨脹，此後逐漸進入日本民族論的時代。見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頁 31-32。

⁸ Robert T. Tierney,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pp. 18-20.

『有色 v.s. 帝國』夾縫間。」⁹

族群認同研究認為，一個族群之所以能夠形成，除了強調共源的群體認同之外，透過衝突對立的過程，逐漸界定與自身相對的「他者」，也是一種形塑認同的重要方式。¹⁰ 在此可以發現，日本人在接觸西方人的過程中，會先產生差異認知，更重要的是在認知差異的同時，體會到自我群體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即所謂「不平等認知」。當族群成員意識到這些不平等待遇，被歸因到不能任意改變的身分、亦即「種族」身分時，屬於弱勢者的族群意識便開始萌芽。¹¹

因此，除了外在環境背景，西方「白色人種」的外貌體質即成為日本人萌生劣等感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九世紀後期流行文明單一進化論，人種差異成為解釋各地文明程度不一的主流說法，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提及西方人，也多半從人種角度解釋西方人優勢之因，或也針對此點提出嚴正反駁。¹² 其中，對人種問題格外重視的人類學者，例如日本東京人類學會的會長坪井正五郎，便強烈地意識到歐美各國對日本人的種族歧視。坪井〈矮短身材之黃色皮膚真的可恥嗎〉一文，認為皮膚顏色與身高一樣，和智力的優劣並無關係，因此他對西方人歧視日本人的膚色、身高提出抗議。¹³ 正因為人種差異具有強烈的說服力，使得日本人類學者或多或少都有否認先天人種優劣說的傾向，因為若是採取此說，就等於承認日本有色人種先天條件就不及歐美白色人種，日本將永遠處於劣等位置。¹⁴

諷刺的是，在自我信心喊話、否認先天人種優劣說的同時，日本人卻又不斷地將有色人種視為劣等人種，這點在日本討論自身民族起源時特別明顯，其中與黑色人種有關的便是南方起源說。一直以來，南方起源說在日本民族起源的討論

⁹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頁 664。

¹⁰ 有關族群認同的相關討論，可見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2003），頁 9-20。

¹¹ 雖說「族群」概念發展的時間相當晚近，並不適合套用在十九世紀後期，尚為西方「種族主義式」的人群分類概念所分類的日本人身上，但遭受歧視所產生的不平等認知，卻也同樣形塑了日本人的自我認同。為了強調此種劣等感的重要性，本文在此借用這套觀念。這些族群意識誕生的階段論述及用語，可見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Myths of Ethnic Descent,"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Vol. 7(1984), pp. 95-130.

¹² 例如福澤諭吉的門生，企業家高橋義雄，於 1884 年出版《日本人種改良論》一書，其中屢屢提及西方優勢人種在身高、體重、頭顱等方面均優於日本人，甚至主張日本人與西方人通婚，以改良日本劣勢人種。見高橋義雄，《日本人種改良論》（東京：石川半次郎出版，1884）。

¹³ 坪井正五郎，〈矮短身材之黃色皮膚真的可恥嗎〉，《日本主義》1 号（1897），頁 66。

¹⁴ 例如後來受到優生學說的影響，而開展殖民政策論的清野謙次等人，也抱持著相同的立場。見小熊英二著、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經典研讀會黃阿有等譯，《日本人的國境界——從沖繩、愛奴、臺灣、朝鮮的殖民地統治到回歸運動》（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11），頁 72。

中便占了一定地位，主張日本民族來自於南方馬來系人種。德國學者貝爾茲、日本學者三宅米吉、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即從考古學、神話學等角度分析日本民族南來的可能性。但無論是南方起源說或是其他人種起源說，都脫離不了視南方人種為野蠻、未開化劣等人種的印象，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曾引起激烈討論的內地雜居論爭。

內地雜居論爭源自幕末以來和外國人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為外國人特設的治外法權居留地。當不平等條約逐步解除，居留地制度的撤廢與否，激化了外國人是否能於日本國內混住的問題。¹⁵ 1880 年代，此問題引發朝野激烈論爭，其中持反對態度的井上哲次郎，即受日本南方起源說影響，以「劣等人種無法與白色人種競爭」的理由，反對外國人與日本人雜居。井上認為，南方人種是劣等的，而日本人的祖先來自南方，因此帶有劣等人種的基因。從優等人種必然同化劣等人種的觀點來看，身為劣等人種的日本人只有被歐美人種同化的命運。因此，在歐美優等人種的威脅下，為求日本劣等人種的生存，必須保持民族的純淨與同質性。¹⁶ 此外，相似的概念也可見於贊成方田口卯吉的說法之中。田口認為，日本人種並非起源於南方，而是源自大陸的匈奴人種的一支，即所謂的「亞利安」白色人種。因此，日本人不需貶低自我為劣等黃色人種，更不需要擔心與外國人雜居會造成民族滅絕。¹⁷ 這樣的說法背後，實帶著強烈的南方劣等意識。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當時的日本人在討論自身民族起源時，無論自身人種來源為何，皆認定南方人群是劣等的有色人群，日本人種就是因為這些南方人種劣等基因的影響，而無法與西方白色人種對抗。「南方」對日本而言，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後，就這樣本質化的乘載了「劣等野蠻」的意象。¹⁸ 這樣的意象進而與當地的有色人種結合，使得「南方：有色：野蠻」的概念得以成形，更成為日後南進思想論述的前提。

¹⁵ 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頁 33-48。

¹⁶ 有關井上哲次郎的說法，可見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頁 39-48。

¹⁷ 田口卯吉，〈日本人種の研究〉，收錄於鼎軒田口卯吉全集刊行會編，《鼎軒田口卯吉全集》第 2 卷（東京：吉田弘文館，1927），頁 501-514。這裡值得留意的一點是：田口是南進論者，卻否定日本南方起源說。

¹⁸ 矢野暢稱這種現象為日本的「四角症狀」。日本對東南西北四方的想像均有所不同，而南方，自明治開國以來就被定型為一個野蠻未開的非文明世界。十九世紀後期日本與西方列強接觸後，為了確立並提升自我文明位階，必須強化南方的未開形象。詳見矢野暢，〈あとがき〉，《東南アジアと日本》（東京：弘文堂，1991），頁 326。

二、 認識黑色

無法解消的劣等感，固然使日本持續承受來自西方白色人種的壓力，但在學習西方文明，模仿西方帝國殖民論述的過程中，日本也同時吸收了西方帝國面對、統治劣等民族的殖民心態，並將這種心態同步投射至鄰近的亞洲各國。¹⁹ 更重要的，是將歧視的眼光投射到更為劣等的有色人種身上。開國後的日本重新「發現」了南洋，而南洋地區的黑色人種，成為解消這種自卑感的另一種重要途徑。但在近代開國之前，在接受西方傳入的種族分類概念之前，日本國內對有色人群即存在著一些既定印象，以下將簡述近代以前日本人種族觀念的演變過程。

雖然自 1633 年豐臣秀吉時代開始，日本便進入鎖國體制，但在此之前，日本人民對廣大的南方地區早有認識。在鎖國之前，日本商船即與馬尼拉有頻繁貿易，大約在室町時代至江戶時代初期，則將暹羅、呂宋、爪哇等貿易要地統稱「南蠻」，而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與貿易據點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傳來的文化、物品亦被冠上「南蠻」之名。²⁰ 鎖國之後建立的朱印船制度，也使日本與南方持續有所接觸聯繫。

對一般日本庶民而言，來自南蠻的物品，多半是一些昂貴的染料、香料、藥材，或是鹿皮、鯊魚皮、象牙、犀牛角等珍奇貨品。這些一般人無法獲得的商品，使「南蠻」二字乘載了「物產豐富」之既定印象。²¹ 而來自南蠻地區的南蠻人，則呈現繽紛雜亂的形象，這些人包含在地土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白色人種，同時也包含十六世紀黑奴制盛行後隨船服侍的非洲黑人。²² 西方歐洲白人對勞動力的需求，使地緣相近的非洲成為提供低廉勞力成本之首選地，造就了幾個世紀以來的黑奴貿易。²³ 而奴隸制度的盛行，使世界各地對黑色人種產生種族歧視，這些俗稱「黑坊」的黑人在日本人眼裡，即成為次於白人、專做低階勞力工作的人群，並開始對這些黑皮膚的人群產生負面的族群印象。²⁴

¹⁹ Robert T. Tierney,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pp.16-18.

²⁰ 陳芷凡，《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臺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頁 202-203。

²¹ 神谷忠孝，〈南洋神話の形成〉，收錄於矢野暢編，《東南アジアと日本》，頁 30。

²² John G. Russell, "The Other Other: The black presence in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in M. Weiner edited, *Japan's Minorities: The Illusion of Homogeneity*, 2nd Edition (London: T&F Book, 2008), p. 85.

²³ 這是千里達歷史學者 Eric Williams 的重要論點：奴隸制度並不是種族歧視的結果；相反地，種族歧視是奴隸制度所造成的。非洲黑人並不是因為被視為低等人種才被奴役，而是為了白人為了糖業貿易所需，而將奴隸制度合理化。見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New York: Perigee Books, 1980), pp. 7-20.

²⁴ Gary Leupp 研究中古時期日本人的非洲黑人族群印象，並舉出奴隸制度影響了日本人觀看黑色

原先，傳統的日本人並未將皮膚黝黑與否和文明程度劃上等號。皮膚顏色對日本人來說，是出身高低的象徵，白皮膚代表出身高貴的貴族，而黑皮膚則與農夫、漁夫等階級劃上等號。另外，傳統日本人對族群的概念，主要分成三國（中國、日本、天竺），以及文明之外的野蠻人。天竺國人的膚色較黑，但並未等同其文明優劣程度，源自印度的佛教即為一例，在製作來自天竺的佛教僧侶畫像時，也多半著以金色或黑色。²⁵ 這種概念直至十六世紀，才受西方影響逐漸改觀，膚色成為評判人群能力高低的標準。到了十八世紀，對「黑坊」的負面描述更是越來越多。當時的日本人認為，由於這些有色人群來自南方炎熱地帶，才造成其鬚髮及黑皮膚的外貌。²⁶ 其中，非洲黑人及馬來人被形塑成低下的「黑色」人種，發展出佛教的印度人則因其皮膚「較偏黃色」，而被從中分隔出來。²⁷

到了開國前的十九世紀中期，這種因皮膚深淺所衍伸出的族群優劣感更為強烈，其中培里的黑船來航可為其中代表。1854年3月，培里再度返回日本橫濱，以求獲得幕府同意通商條約，在晚宴後培里舉辦了一場「minstrel show」，由白人水手扮成黑人並演唱黑人歌曲，其中不乏許多嘲弄、戲謔的演出，在日本觀眾群獲得了極大迴響。²⁸ 除了此類展演，當時與培里隨行的美國黑人護衛均體型高大且持槍護衛，這種排場不只向日本人展示美國強盛的國力，更營造出一種「黑奴僕服侍、保護白主人」的形象。²⁹ 另外，當時前往美國的日本使節及隨行人員，也目睹、吸收了許多美國白人對待有色人種的觀念，例如覺得黑人「作為人類相對較為低下，且非常愚笨」，或在敘述美國法律時提到「法律分割黑人權利，白人可雇用黑人作為奴僕。白人毫無疑問的較為聰明，而黑人愚笨。因此兩者不允許相互結合」等語。³⁰ 美國國內盛行的種族主義，影響日本人看待有色人群的眼光。

人種的角度，使「黑皮膚」逐漸成為一種負面的族群標誌。見 Gary P. Leupp, "Images of Black People in Late Mediaeval and Early Modern Japan: Race Theory and Colour Consciousness, 1543-1900," *Japan Forum* 7:1(Spring 1995).

²⁵ Gary P. Leupp, "Images of Black People in Late Mediaeval and Early Modern Japan: Race Theory and Colour Consciousness, 1543-1900," pp.1-4.

²⁶ 會有這樣的想像，與當時代表西方知識的蘭學有關。事實上，說出這段話的大槻玄澤，本身就是個蘭學家。見 Grant K. Goodman, "A Translation of Otsuki Gentaku's Ransetsu Benwaku(蘭說弁惑)," *Occasional Papers on Japan* 3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2), p. 84.

²⁷ 森島中良，《紅毛雜話》，收錄於早川純三郎編輯，《文明源流叢書》第1卷（東京都：國書刊行會，1913），頁474。

²⁸ Foster Rhea Dulles, *Yankees and Samurai. America's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Japan: 1791-190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p. 76-77.

²⁹ William Heine,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by Frederic Trautmann, *With Perry to Japan: A Memoir by William Hein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 73.

³⁰ 以上敘述分別來自使節團內不同人員的記載，詳細內容參見 Masao Miyoshi, *As We Saw Them: The First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18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諷刺的是，這些造訪美國的日本人，發現美國白人不只歧視黑人，也同時歧視與自己相近的黃種中國人。³¹ 而這就與前段所述，面對西方人的劣等感有連帶關係。

上述的族群接觸，抑或是對種族問題的諸多討論，多半僅侷限高階知識份子、外交使節，以及從事海外貿易的日本商人，一般日本大眾其實很少有機會接觸黑色人群，更無法體會同為有色人種的自身族群，在西方人眼中被如何評價。³² 而近代新聞的出現，成為傳播、散布此類種族知識的重要媒介，更使日本民眾容易形塑出集體族群意識。

十九世紀後期，當種族主義仍主宰著世界人群分類之時，體質或文化特徵是區分人群、形塑認同所使用的工具，而如何區分不同人群的體質與文化特徵，在判定標準上也具備高度的主觀性。相較於優勢人群，擁有族群危機的人群更會刻意地使用這些工具。³³ 這也是日本人之所以如此在意膚色、且日後以相同方式區分南洋有色人群的原因。

從本節的敘述可發現，隨著時間演變，「顏色」對日本人而言變得益發重要。透過與西方白人的接觸，以及非洲黑人鮮明的奴隸形象，使得日本人越來越注重人種與文明優劣程度之間的關係。在十九世紀中期，日本人踏入以西方為首的世界體系之後，也無法自外於以種族膚色排定優劣順序的族群位階。與非洲黑人一樣，在南洋地區的馬來人，或是將要被日本人「發現」的南島民族，都在這樣的體系中位處下層。在感受來自西方白人的壓力視線之時，日本人正是挾帶了同樣的眼光，朝著廣袤而未知的南方前進。下一節要討論的，就是首次帶給日本人強烈「野蠻」衝擊的臺灣。

pp. 59-63.

³¹ 此時在美國的中國海外移工數量，遠較尚處鎖國階段的日本人多。但隨著日後移往美國的日本移民數量增加，歧視黃種人的「黃禍」一詞也開始同時指涉日本人。Masao Miyoshi, *As We Saw Them: The First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1860)*, p.58.

³² 本段所謂的日本大眾，是指居於日本國內，沒有海外移住經驗的日本人。事實上，在開國之前即移居東南亞地區的少數日本人，或者是偶然漂流海外的日本漂流民，也有許多對不同族群的接觸經驗。而開國之後陸續移居海外各地的日本移民，與不同族群互動，其豐富的族群經驗，也成為日本移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³³ 王明珂，《華夏邊緣》（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32-35。

第二節 出兵臺灣

明治 7 年（1874）的臺灣出兵事件，對剛剛走出封閉大門，一切尚在學步摸索的日本來說，實為一次過於早熟的對外戰役。無論是戰事情報掌握、近代軍隊的編制管理、或是外交折衝手段，都不若同時期的西方列強來得熟練且迅速。但對努力追求提升、邁向文明彼端的日本來說，這場近代以來首次深入海外「野蠻」異域的戰爭，卻是一次寶貴的異己接觸與文野對照經驗。因此，出兵臺灣不僅是一次對外政治侵略行動，從這次事件中汲取的原住民異己觀，更影響日後對內統治臺灣的理蕃政策。³⁴ 而此次經驗所萌生的異己形象，則在日後明治二十年代海外拓殖風潮大盛之時，成為日本人想像南洋異己人群的原型。以下將分析臺灣出兵事件中來自不同國家的媒體人對戰地異己人群的報導，以呈現重層的觀看視角；同時釐清當時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位處南方臺灣的野蠻人群，以及自己。

一、紀錄異己：戰爭與日本新聞的萌芽

臺灣出兵是日本進入明治期後所面對的第一場海外戰爭，也是甫萌芽的近代日本大眾媒體第一次參與的戰地事務報導。歐洲於十八世紀開始出現新聞，並於十九世紀後期隨著西力東漸傳入日本，因此對日本而言，新聞的誕生是西方力量入侵的一種展現。³⁵ 在西方新聞傳入前的日本，若想獲得海外相關消息，就必須仰賴荷蘭人提供的「和蘭風說書」，且這些資訊全都僅限幕府上層人士才得以閱讀。一般民間存在類似新聞的瓦版，內容則多半記載地震、火災等重大災害消息。³⁶ 江戶末期，外國人居留地始發行由西方人開辦的新聞，並以 1861 年 5 月英國人 A. W. Hansard 設立的《ザ・ナガサキ・シッピングリスト・アンド・アドバタイザー》（The Nagasaki Shippinglist and Advertizer）作為創始。

³⁴ 山路勝彦認為，這次的臺灣出兵事件，讓日本政府確立了「蕃人無主論」的概念。這群蕃人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有效統治，但同時也否定蕃人有成立政治實體、自我統治的能力，因此是一群「無主的野蠻人」。這種概念在實際統治臺灣後，轉變成了具法律意義的實質條文，更是日後一連串同化政策背後的主要思維來源。相關討論參見山路勝彦，《台灣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頁 40-54。

³⁵ 特別是荷蘭，對近代日本大眾媒體的發展影響甚大。除了自風說書以來的傳統外，幕府末期的《官板バタヒヤ新聞》也由荷屬印尼的政府提供。日本雜誌的興起，更受到荷蘭傳入的雜誌影響。柳河春三於 1867 年 10 月創辦的第一本日文雜誌《西洋雜誌》，「雜誌」一詞即翻譯自荷蘭語 *magazijn*。見山本文雄，《日本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史》（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1970），頁 8-9。

³⁶ 除了西方因通商需要、以傳遞海外新知為目的之新聞紙外，也必須注意日本既有的、結合政治抵抗理念為目的之瓦版新聞傳統。見山本武利，〈草創期のジャーナリスト群像〉，收錄於田中浩編，《近代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スト》（東京：御茶ノ水書房，1987），頁 3-4。

對日本統治者而言，由外國人主導海內外重要消息的傳播，自然不是一件好事。面對西力入侵的壓力，幕府也需透過外國翻譯報紙了解時事新知。1862 年，由幕臣翻譯荷屬印尼政府所發行的荷蘭語新聞，並以《官板バタヒヤ新聞》之名刊行，但只限幕府內部流通。³⁷ 除了西方人的外語新聞與幕府的翻譯新聞，一些民間的知識份子如岸田吟香、福澤諭吉等人也參與其間，這群人即為最早的一批記者。明治初年出現各類形式的新聞，而首次由日本人發行、並報導日本在地消息的日語新聞，即以 1868 年 4 月由柳河春三創辦的《中外新聞》作為嚆矢。³⁸ 而近代日本最早發行的日刊新聞（daily news）為 1871 年 1 月於橫濱發行的《橫濱每日新聞》，首都東京最早的日刊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則於 1872 年 5 月發行。由此可見，日本大眾媒體的萌芽，與國家內部的政治體制轉換同步並行。

媒體掌握戰爭動向、動員國民，並導引各國輿論，這些都是近代戰爭很重要的一部份。³⁹ 對此時期的日本而言，雖然新聞的發展才剛起步，但從《東京日日新聞》派遣岸田吟香作為首位海外戰地記者這點來看，當時的日本媒體人已能了解新聞對戰爭的重要性。⁴⁰ 即便如此，在十九世紀後期的國際資訊網絡中，日本仍然是一個初學新手，對許多海內外資訊的掌握尚不及西方媒體，而此次臺灣出兵事件也有諸如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這類的西方媒體人參與其中。⁴¹

³⁷ 《官板バタヒヤ新聞》是根據荷屬印尼政府發行的《ヤバッシェ・グーラント》（Javasche Courant），依上面的國別記載分別抄錄並翻譯而成，並於 1862 年 1 月起，前後一共發行 23 卷。另外，翻譯新聞的來源並不僅限於西方殖民地，例如《官版中外新報》便是分別譯自中國寧波的新聞。有關《官板バタヒヤ新聞》的研究，可見小野秀雄，《日本新聞發達史》（東京：五月書房，1982[1922]）。

³⁸ 柳河春三所創辦的《中外新聞》，其實是身為舊幕臣的柳河，為了支持幕府所創辦的佐幕派新聞，是以帶著強烈的政治意識。有關《中外新聞》發行之敘述，可見佐佐木隆，《日本の近代 14 メディアと権力》（東京：中央公論，1999），頁 32-39。

³⁹ 土屋礼子，〈明治七年台湾出兵の報道について——『東京日日新聞』を中心に〉，收錄於明治維新史學會編，《明治維新史研究 8 明治維新と文化》（東京：吉田弘文館，2005），頁 211。

⁴⁰ 岸田吟香，1833 年出生，是幕末至明治初期有名的新聞記者。岸田曾與「新聞之父」濱田彥藏學習英語，並擔任外語翻譯新聞「海外新聞」的編輯，1873 年成為《東京日日新聞》的主筆記者，更親身前赴臺灣採訪戰地消息。岸田吟香瞭解戰地隨軍記者對戰爭的重要性。他對歐洲克里米亞戰爭時，戰地記者就地取材，蒐集資訊的活躍印象深刻。參見岸田吟香，〈東京日日新聞緣起〉，《東京日日新聞》，1898 年 6 月 15 日掲載；杉浦正，《岸田吟香——資料から見たその一生》（東京：汲古書院，1996），第三章；個人略傳參見宮武外骨、西田長壽編，《明治新聞雜誌關係者略伝》（東京：三陽社，1985），頁 58。

⁴¹ 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美國人，曾擔任《紐約論壇報》（N.Y. Tribune）記者，最初以該報特約記者身分到日本，後轉任《紐約先鋒報》（N.Y. Herald），並於 1874 年 5 月至 7 月初跟隨日軍到恆春採訪新聞，是當時唯一隨軍來臺的西方記者，也發了不少獨家新聞。豪士與日本關係密切，也同情日本的國際處境，自稱「比日本人還愛日本」，素有「日本豪士」（Japan House）之稱。有關豪士生平，可見 James L. Huffman, *A Yankee in Meiji Japan: The Crusading Journalist Edward H. Hous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更有趣的是，不同國家記者所撰寫的戰地報導與記錄，展現了「文明 v.s. 野蠻」在多重層次上的對立關係。日本作為一個朝著文明邁進的國家，既是觀察者，也同樣的被西方國家所觀察。

二、 初遇野蠻：臺灣出兵報導中的蕃人

明治 4 年 (1871) 11 月，54 位琉球宮古島民在臺灣南部遭蕃人殺害，開啟日、清兩國的外交談判。在得知清國對蕃地歸屬問題的消極態度後，日本國內便開始醞釀出兵征臺之聲，而 1874 年 2 月，為了轉移征韓論的政壇騷動，始將征臺意圖化為現實。⁴² 因應日本政府的行動，國內新聞也開始報導此次出兵，但最早掌握出兵訊息並將之報導出來的媒體，是西洋人在橫濱創辦的英文報紙《ジャパン・ガゼット》(Japan Gazette)。⁴³ 外文報紙持續追蹤掌握最新訊息，而日本人創辦的日文新聞對相關訊息的掌握則較為遲鈍，甚至《東京日日新聞》上對臺灣出兵的首次記載，都是由讀者投書抗議「為何不報導政府出兵臺灣這等大事」，才於次日刊載出兵報導。⁴⁴ 由此可看出，當時的日本新聞尚在未成熟的階段，本國政府出兵這等重要事件，卻是由居留外國人所創辦的外文新聞先行掌握消息，自身人民則一概不知。

除了資訊掌握的不足，政府對本國記者的消極態度也是一大主因。當美國《紐約先鋒報》(The New York Herald) 向日本政府提出隨行要求時，日本官方回應「將極盡所能地予以協助」，但當《東京日日新聞》的記者岸田吟香以戰地記者的身分，向政府申請隨軍同行時，官方卻以「戰鬥貴在密謀」為由拒絕，使岸田只能以通譯人員的身分來台，並趁機搜集新聞。⁴⁵ 由此可見當時政府對西洋人及本國人有著雙重標準。

在岸田吟香隨軍出發前，《東京日日新聞》即翻譯外國新聞對臺灣蕃人的記載，例如 1874 年 4 月 9 日的「海外新聞」欄，出現「這群人會食人肉，懲罰擁有如此

⁴² 陳萱曾指出日本學者多同意此說，但也有像毛利敏彥等學者，對出兵以消解士族不滿的說法存疑。除此之外，當時的日本新聞如《橫濱日日新聞》即有士族投書發表評論，其中的確有將出兵行為解釋成消解士族不滿的看法。見陳萱，《明治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像の形成—新聞メディアによる 1874 年「台湾事件」の表象—》，頁 82-83。

⁴³ 土屋礼子，〈明治七年台湾出兵の報道について——『東京日日新聞』を中心に〉，頁 214-215。

⁴⁴ 讀者的〈投書〉刊於 1874 年 4 月 6 日的《東京日日新聞》。而東京日日新聞對臺灣出兵事件的首次報導，則於次日以「西鄉陸軍大輔被任命為生蕃事務總督，與谷陸軍少將、赤松海軍大丞一同派遣臺灣，計於十二日發航，二十二左右抵達」等幾行訊息帶過。見田中梓都美，〈牡丹社事件を契機とする日本人の台湾認識の変化〉，《史泉》114 (2011.7)，頁 16。

⁴⁵ 陳芷凡，《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臺灣原住民記述研究 (1858-1912)》，頁 234-236。

行為的種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的記載。⁴⁶ 在解釋為何出兵時，也反覆強調「這群在支那領土以外的人民，曾虐殺日本人」的說法，強化這群蕃人不屬清國管轄的印象。⁴⁷ 由此可看出，在日軍尚未登錄臺灣之前，日本國內新聞已有臺灣蕃人「食人肉、不屬清國管轄」的初步印象；而這樣的印象，實承繼於當時西方人對臺灣蕃人的理解。⁴⁸

在這樣的初步印象之下，岸田吟香於 4 月 13 日至 7 月 30 日在《東京日日新聞》刊載共 27 回的《臺灣信報》。⁴⁹ 在尚未登臺前，滯留長崎的岸田對臺灣蕃人蕃地「野蠻」，特別是「食人」的負面想像非常強烈：

（臺灣）東部海岸皆為土蕃巢窟，一共有二十八個部落，各有酋長。其中一半為牡丹人種，個性兇猛不似人類，喜好相互鬥爭，會屠殺敗者，取其肉食之，先前琉球人即於此處遭害。自北邊支那國界至東邊海岸，其間盡為高山，而無平地，林木鬱蒼，而無通行之路，生蕃穴居其中。古來此地曠無人跡，是以人種物產未詳，大抵與我國蝦夷人相近。⁵⁰

岸田心目中的臺灣蕃地，是個林木茂盛，有食人蕃族居住的化外之地。對蕃人的諸多負面想像，直至登臺實際與蕃人接觸後，仍沒有太大轉變。⁵¹ 除了「食人」的駭人印象，在岸田的報導中，屢屢用「醜類」、「智淺」、「暴惡」、「如猿」等語指涉蕃人，強化蕃人的野蠻形象。而當記錄傳回國內，透過繪師製成錦繪新聞後，使民眾更容易接受此等形象。繪師落合方幾根據岸田的報導，畫出想像中

⁴⁶ 〈海外新聞〉，《東京日日新聞》，1874 年 4 月 9 日。根據陳萱的說法，這也是日本新聞最早出現對臺灣蕃人「食人」想像的記載。陳萱，《明治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像の形成—新聞メディアによる 1874 年「台湾事件」の表象—》，頁 100-101。

⁴⁷ 〈海外新聞〉，《東京日日新聞》，1874 年 4 月 16 日。

⁴⁸ 田中梓都美，〈牡丹社事件を契機とする日本人の台湾認識の変化〉，頁 17。

⁴⁹ 實際上岸田在臺灣的時間，只有 5 月 22 日至 6 月 20 日短短的一個月，其後便因病回國療養。雖然時間不長，也無法完整記錄戰事的前因後果，但這是日本人首次自己掌握來自戰地的第一手情報，破除了先前由政府高官和外國媒體人壟斷情報的狀態；同時，透過文字及錦繪新聞，使日本民眾有機會概略了解整個事件，也提供了寶貴的海外異地異己經驗，讓人民細細玩味。對剛剛擁有近代新聞、開國還不到十年的日本人而言，這次的海外報導是非常重要的資訊。臺灣信報原文可見：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編，〈資料編：台湾信報〉，《西鄉都督と樺山總督》（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頁 1-48。

⁵⁰ 岸田吟香，〈台湾信報〉，《東京日日新聞》，1874 年 5 月 15 日。

⁵¹ 不只是岸田，當時隨軍同行的譯官水野遵，在行經牡丹社附近的蕃社，看到一個臭氣沖天的甕時，也不自覺的認為「裡頭泡了看似人頭的腐敗東西」，連結了食人想像。山路勝彦，〈「野蠻人」の表象、あるいは植民地主義の起源：明治 7 年の台湾出兵をめぐる諸問題〉，《台湾原住民研究》11（2007），頁 156。

的石門之役，其中不僅強化勝利的日軍威猛形象，也醜化牡丹社民，形塑出一種謝罪求饒的敗者姿態，正宛如桃太郎故事一般，呈現征服者退治諸鬼的印象。⁵²



圖 2-2-1 臺灣牡丹族歸順日本軍

圖片來源：千葉市美術館編，《文明開化の錦絵新聞——東京日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全作品》（東京：図書刊行会，2008），頁 36。

圖片附註：《東京日日新聞》第 752 號。發行年月：1874 年 10 月／元記事：1874 年 7 月 25 日。

無論是錦繪新聞，或是岸田的文字新聞，都呈現出「文明」制裁「野蠻」的二元對立形象。岸田除了不斷強化蕃人的野蠻，也同時強調日本作為「文明」開化國，深入蕃地制裁「野蠻」蕃人的合理性。這樣的意象，從オタイ（臺灣姑娘之意）的事件中更能進一步突顯。6 月 3 日，當日軍行經爾乃社時，擒獲一名蕃人少女，而後被取名為オタイ，岸田當時記載這名少女的外貌舉止：

⁵² 山路勝彦認為，繪師透過桃太郎的故事形象，套用至石門之役的日軍和牡丹社民身上，並將日軍制伏的「野蠻人」轉化成鬼一般的形象。山路勝彦，〈「野蠻人」の表象、あるいは植民地主義の起源：明治 7 年の台湾出兵をめぐる諸問題〉，頁 149。

被帶來的這名十二歲少女，膚色黝黑，圓臉，眼眶有些凹陷，眉眼之間距離甚近，低鼻，嘴與常人一般無異，此顏於我大日本國尚稱不佳。……無論是臉或手，都甚少清洗，且赤腳步行於砂石之上，雙腳強健得有如貓爪一般。⁵³

除了最初相見的這番敘述，後來岸田也形容爾乃少女「體型甚小如猿，感覺患有眼疾，並跛足，全然不識當地土人語言」，⁵⁴ 而後更有一些形容此女「愚魯至極，宛如仔豬一般」的輕蔑用語。⁵⁵ 在此可以發現，岸田在仔細描述蕃人外觀之際，同時也不斷地向讀者傳達主觀的負面印象。⁵⁶



圖 2-2-2 《東京日日新聞》報導中的オタイ畫像

圖片來源：〈台灣信報〉，《東京日日新聞》，1874 年 6 月 29 日。

有趣的是，當時日軍賜與爾乃少女日本式的白色浴衣，並為其換上，這個「化野蠻為文明」舉動本身，除了帶有強烈的文明開化意涵，更讓在場日軍想起故鄉的日本少女，萌發一種奇妙的親近感。⁵⁷ 若是仔細留意，可以發現為其換上外衣的日軍，表情是柔和且面帶微笑的，與前幅擊退生蕃的表情完全不同。後來爾乃少女被帶回日本加以調教，讓她「受化於皇國風俗」、習「識字裁縫之學」。雖然五個月後，這名少女就因為適應不良被送回部落，但在當時日本畫家的畫像之中，他的容貌與一般日本少女幾無差異。⁵⁸ 對文明的日本而言，人民希望這名來自蕃

⁵³ 〈台灣信報〉，《東京日日新聞》，1874 年 6 月 25 日。

⁵⁴ 〈台灣信報〉，《東京日日新聞》，1874 年 6 月 26 日。

⁵⁵ 〈台灣信報〉，《東京日日新聞》，1874 年 6 月 29 日。

⁵⁶ 雖然岸田不停的強化蕃人的野蠻形象，但這並不代表同時期的日本人都是如此想法。譬如明治 6 年即前往臺灣偵查情報的福島九成，就舉出蕃人並非全都「獸心鬼性」之輩，許多是遭受了清國人的侵掠，才導致今日的野蠻暴行。福島九成，〈清国台湾事情の儀〉，1873 年 8 月，收錄於牧原憲夫編，《明治建白書集成》第 3 卷（東京：筑摩書房，1986），頁 198。

⁵⁷ 〈台灣信報〉，《東京日日新聞》，1874 年 6 月 26 日。

⁵⁸ 同樣的敘述也出現在水野遵的相關記載內，見大路會編，《大路水野遵先生》（臺北：大路會事

社的少女能被成功開化，因此無論是文字敘述或是畫像，都乘載了文明國度的殷切期待。⁵⁹



圖 2-2-3 牡丹社少女穿上和服

圖片來源：千葉市美術館編，《文明開化の錦絵新聞——東京日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全作品》，頁 33。

圖片附註：《東京日日新聞》第 813 號。發行年月：1874 年 10 月／元記事：1874 年 10 月 2 日。

務所，1930），頁 31。

⁵⁹ 日本為何會如此重視教化此蕃女，土屋禮子認為是為了證明清國無法教化的人民，日本有能力教化成功。亦即在文明開化的能力上，日本有勝過清國的能力。土屋禮子，〈明治七年台灣出兵の報道について——『東京日日新聞』を中心に〉，頁 227-228。



圖 2-2-4 被帶回東京のオタイ

圖片來源：村井靜馬編輯、鮮齋永濯畫，《明治太平記》9 編下卷（東京：東京書林延壽堂，1876），頁 14-15。

《東京日日新聞》所報導的臺灣出兵事件，大部分都以珍說奇話的態度介紹臺灣原住民的風土習俗。從出兵後《東京日日新聞》發行情提升 1.5 倍、總發行份數突破一萬五千份這點看來，這次蕃地報導確實引起了日本民眾的興趣。而「食人族」、「野蠻如豬犬」之類的負面想像，就這樣充斥於明治初期的日本新聞，成為描繪南方異己人群的普遍象徵。⁶⁰ 這些針對海外民族的報導及描述，具備某種人類學意義上的種族知識，透過媒體新聞的散布進一步強化；而「南方=野蠻」的概念，也延續至日後明治二十年代的南方海外探險風潮，成為旅人描述當地風土民情時的基礎意象。⁶¹

⁶⁰ 這類報導對人民的影響，可從戰爭結束後的讀者投書欄中看出。有些讀者投書表示「那些生蕃人殺害我們的琉球人兄弟，斷其頭食其肉，其殘暴令人不忍卒睹」，顯示當時相信這類食人傳說的日本人不在少數。見〈投書欄〉，《朝野新聞》，1875 年 5 月 12 日。

⁶¹ 山路勝彦，《日本の人類学——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學術調査の歴史》，頁 6-9。

除了強化「南方=野蠻」的概念，對邁向文明開化之路的日本人來說，「文明開化」的日本人懲戒「文明未開」的臺灣蕃人，成為征臺軍成員的共識，更進一步透過媒體新聞對國內民眾散佈此種觀念。⁶² 從這點來看，這些對臺灣原住民的風土習俗記載，與其說是反映日本人對南方異域的好奇與理解，事實上更反映出大和民族面對西洋文明時，基於劣等意識而衍生出的一種具體反動心態。⁶³

三、文明未滿：西方記者眼中的日本人

オタイ事件突顯了日本身為文明開化國家的自信，同時也展露了亟欲教化蕃人、證明自身能力的心態。諷刺的是，看在同時期的西方人眼裡，日本人和蕃人一樣，都是不夠文明的野蠻人。當時與日軍同赴戰地的《紐約先鋒報》駐日本特約記者豪士，就點出征臺軍隊不日不西，軍紀鬆散的缺點。⁶⁴ 豪士發現，這些日軍仍秉持著幕府武士階級的舊傳統，不願從事挖掘戰壕等卑賤奴僕作的苦工，因此需派遣雙倍人力聘用苦力從事工程，這與西式精實戰力的要求完全相反。⁶⁵ 除此之外，即使西鄉都督三令五申，但傳統薩摩藩士兵將屍身馘首以求軍功的陋習仍未能全數革除。如下圖所示，在石門之役時，豪士也目睹了扛著敵人首級向同伴炫耀軍功的日本軍人，並以「遺憾」二字評論這類野蠻行為。⁶⁶

⁶² 但《郵便報知新聞》於明治8年5月24日的社論，卻對日本政府花費鉅資，出兵臺灣懲戒野蠻人的行為感到不滿。這並不代表《郵便報知新聞》不認同「文明懲戒野蠻」的觀點，該報批評的理由，是日本政府只敢教訓野蠻人，卻縱容同時期滯留日本的英國人之亂暴橫行，因而批判政府膽怯懦弱。透過此篇社論可以了解，當時日本國內新聞的輿論是多元的，屢屢出現批判政府之聲，這也是明治期新聞的特色。史料內文見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博揚文化，2006），頁133。

⁶³ 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頁133-134。

⁶⁴ 豪士的記載與同時期日軍隨行將領、人員的報導有明顯出入。日軍方面的記載多半強調自身軍隊的訓練有素，但豪士卻不以為然。此部分討論參見陳芷凡，《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臺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頁234-238。

⁶⁵ 本段譯文採用陳正三之翻譯。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原著、陳正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臺北：臺灣書房，2008），頁68-72。

⁶⁶ 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原著、陳正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頁120-122。



圖 2-2-5 「日報社台灣記事石門口勝戰之図」

圖片來源：千葉市美術館編，《文明開化の錦絵新聞——東京日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全作品》，頁40-41。

圖片附註：《東京日日新聞》。發行年月：1874 年 10 月／元記事：不明。

豪士的紀錄，清楚呈現出一群仍未完全脫離野蠻遺風的日本軍人；而此時西方眼中的日本，是一個不夠「文明」的國家。當日軍和臺灣蕃人這兩群「野蠻」人相會時，更可看出豪士介於其中、描述兩群人之間的文化衝擊：

熱騰騰的大鍋水煮開了，負責調理的（熟蕃）婦女正想將食物丟入烹煮，幾位搞不清楚狀況、愛好洗澡的低階軍官情不自禁的寬衣解帶，下體只著一條「渾兜西」（褌），在目瞪口呆的村人面前，公然享受泡澡的樂趣，彌亞家族對日本軍官當眾赤身裸體，深感突兀、震驚，立刻派一名翻譯，要求正準備洗澡的軍官停止這種會引起全村半數婦女厭惡的舉止。從彌亞深深不以為然的表情，可看出射寮人與漢人有很強的種族關連性。據說一般漢人從搖籃到墳墓一生中，從不曾好好的泡過澡；但日本人則不然，一天內如未泡個熱水澡或冷水浴，則會渾身不舒服。

日本軍官把彌亞的抗議視為一種展示權威的無知舉動。事實上，十個男性成年村民中有九個，只在腰上圍著六吋長的布；女人的大腿則有大部分裸露在外。我們的翻譯詹漢生嘲弄彌亞的抗議行為：「原來他的嘴巴除了能用來咀嚼檳榔外，也具有其他功能。」很遺憾有人把這位射寮頭人之子的抱

怨，只視為權威的展示，因為我在彌亞嚴肅的表情底層，看出潛藏的真誠。

最後，日本軍官終於放棄泡澡的衝動，村婦得以不受干擾的繼續煮食。⁶⁷

豪士的紀錄中，諸如此類的族群互動與文化衝擊隨處可見。日本軍人與臺灣蕃人對泡澡、裸體的觀感各異，且雙方都表露出視對方為「野蠻」人群的厭惡態度，豪士則從旁敘述兩群人各自的文化習俗，形成了這幅文明觀看者的重層圖像。這兩群人就這樣在文明與野蠻的標尺間上下擺盪，而豪士這個西方人則站在「文明」的至高端點，俯瞰著這兩群同樣不夠文明的「野蠻」人。

即便如此，豪士對其筆下的日本人，仍充滿著同情。在其集結《紐約先鋒報》中的臺灣出兵記載、最後出版《征臺記事》一書中的末章，豪士以「東方小太陽的困境」為標題，傳神地呈現日本的境遇。⁶⁸ 文中稱許日本此次「基於人道立場」的遠征行動，是一場不輸任何先進國家所能完成的「光榮任務」。一來再次宣示，這次制裁蕃人的行為是符合文明國家所期待的行為；另一方面，則突顯出日本在國際社會中尚不為各國所信任。豪士提及，當前西方列強認為日本仍是一個長不大的「玩具國家」，不但不看好日本有能力處理海外紛爭，甚至還會處處掣肘。身為西方人的豪士，則強力抨擊這些高傲的西方文明國家。當前日本的困境，在其介於近代與前近代、文明與野蠻、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雙重性。而出兵臺灣的行為，也使這個矛盾的日本再一次地為西方各國所審視。

透過這次臺灣出兵事件，日本向西方展現出統御臺灣蕃人、晉升文明之流的意圖，也向國人初次介紹了海外野蠻異域的面貌，使南方異己人群的野蠻形象得以植入一般民眾心中。這份意圖與形象，也在明治二十年代逐漸發酵，於一波南進拓殖的思潮爆發之際，再次展露其姿態。

第三節 前進南洋

雖說臺灣出兵是近代日本首次的海外出兵行動，但在事件發生的當下，日本對「南方」，抑或是「南洋」這樣的地理概念，依然非常模糊。當時的日本，尚未明確意識到「出兵臺灣」，對日後龐大的「南進論」思想體系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這是一次行動先於意識、早熟的海外進出經驗。當時序進入明治二十年代，日本

⁶⁷ 愛德華·豪士 (Edward H. House) 原著、陳正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頁 64-65。

⁶⁸ 愛德華·豪士 (Edward H. House) 原著、陳正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頁 205-254。

內部終於迸發出一波猛烈的「南進」思想潮流，至此「南洋」之於近代日本，終於有其獨特且明確的意涵，日後無論是探險、貿易、移民或是委任統治，地理範圍「南洋」與思想「南進論」得以結合，並牽動著近代日本的歷史發展。對日本人而言，這是一個屬於「發現」的時代，南方已注定被打開。以下將概述南進思想萌發的背景、契機、代表性人物，以及這種思想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一、小笠原群島：南進拓殖想像的源頭

自明治開國之初，日本的對外關係即不斷圍繞著「膨脹」二字打轉。明治天皇曾以「開拓萬里波濤，宣揚四方國威，獲取天下富源」等語示以國民，因此日後許多海外發展言論，都會提及這道維新詔令。⁶⁹ 這說明了近代日本自一開始，就已意識到走出國門的重要性。事實上，面對新的國際局勢，急欲脫離半殖民國家身份的日本，也勢必得「脫亞入歐」，走入國際，接觸海外新事物。因此「膨脹」二字，或可將之理解成「走出國門，向外發展」。當時的日本不能不加快前進的腳步。⁷⁰

既然要向外發展，就得面對要朝大陸、還是海洋發展的選擇。⁷¹ 而朝向海洋、朝向南方的這條路，在明治二十年代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而造就明治二十年代南進思潮的原因，首先當然與西方列強的壓力有關。⁷² 和西方各國、特別是同為海洋島國英國的交會經驗，使日本發現「控制海洋」對近代帝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這促使日本建立現代海軍，並發展遠洋航海練習制度，1875 年「筑波」艦便首次航行夏威夷。⁷³ 另外，1885 年德國占領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隔年 1886 年發生日本人海外船難事件，讓日本不斷意識到控制太平洋諸島的重要性，甚至出動國家力量，保護這些海外的日本國民。⁷⁴ 透過這些大小不一的遠洋航海行程，許多官方、甚至民間人士得以搭船出海遊歷南洋諸島，更因此寫下許多遊記，而

⁶⁹ 日本宮內廳編，《明治天皇紀 第一》（東京：吉川弘文館，1967），頁 651。

⁷⁰ 除了積極的一面，也不能忘了：面對具有絕對政經、文化優勢的西方列強，日本同時會發展出防衛、消極的一面。這種防衛思想就像地下潛流，在積極進取的日本背後默默流竄，更在日後發展出亞洲連帶防衛意識，以及聯合東方被壓迫民族，共同對付西方的大亞洲主義。若與第一節有色人種的議題相互參照，更可看出其中的關連性。

⁷¹ 即所謂「北進論」與「南進論」的論爭。但在明治初期，這樣的爭論尚未明確成形，這是由於當時日本國力尚弱。等到明治三十年代，即日清戰爭之際，才出現南進、北進的對立意識。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觀》，頁 206-213。

⁷² Mark R. Peattie, *Nany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in Micronesia, 1885-1945*, pp. 2-3.

⁷³ 池田清，《日本の海軍》上卷（東京：学研 M 文庫，2002），頁 75。

⁷⁴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觀》，頁 180。

這些記錄對明治期南進論的發展至關重要。

明治期的日本之所以對南洋諸島有興趣，也和國內人口壓力有關。江戶末期社會經濟問題漸趨嚴重，從農村流出的失業人口不斷攀升，成為明治政府亟待解決的一項社會經濟問題。而當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更在日本國內造成一陣恐慌，因此出現了開拓北海道，紓解人口壓力的內國殖民論。⁷⁵ 而在明治二十年代，內國殖民論逐漸轉為海外殖民論，日本政府開始鼓勵人民移往美國、墨西哥、巴西、夏威夷等地，而南洋諸島也同樣成為想像中可行的移民目標。除了人口的壓力，進入明治期的日本，一直承擔舊士族階級殘存的過剩能量，以及士族授產的問題，此時在海外移住風潮，恰好可以消解這些能量，讓這些舊時代的武士開拓海外蠻荒地，進而宣揚國威。

以上幾點，使日本對南方廣大的海域及島嶼產生興趣，但喚起國人開始重視南方島嶼的契機，是明治 8 年（1875）公布的小笠原諸島領有宣言。重新回收小笠原諸島，刺激日本民眾對這個遙遠南方的小國土產生諸多好奇與想像，更是開啟明治二十年代南進論風潮的嚆矢。

小笠原諸島早在 1670 年即被日本人發現，但當時的德川幕府並未認真看待這個遙遠的蕞爾小島。當時也有一些有識之士，受到荷蘭殖民論的刺激，曾向幕府建議殖民該島，1785 年林子平《三国通覽図説》即附上了小笠原島的詳細地圖，並重申該島的重要性，但幕府依舊未採取行動。此時期已有西方人移居該島，也引發日後回收小笠原島的問題。直到開國前夕，幕府才真正意識到控制這個太平洋中繼站島嶼的重要性，並採取相關行動。⁷⁶ 進入明治時期，民間人士依然不斷鼓吹政府回收小笠原島，但直到 1875 年解決北方樺太問題之後，政府才重新派遣回收船前往小笠原島，並於 1880 年將該島劃歸東京府管轄。

這個在遙遠南海的小島，在日本官員及文化人之間興起了一陣討論熱潮。無論是發展捕鯨業、果樹業、林業，還是紡織業，小笠原島一夕之間成為各種南方產業的實驗場。日本人要如何利用這個位居南方的新領土？南洋小島可以發展怎

⁷⁵ 為了解決人口壓力，有識之士引進西方的移殖民思想，認為應設法將人口移至地廣人稀的未開發地區，而當時在日本國內最符合這項條件的地區，便是北海道（蝦夷地），是以有內國殖民論之稱。諸如福澤諭吉、田口卯吉、德富蘇峰與陸羯南等人，均提出各自的移殖民論點。見林呈蓉，〈近代初期日本的移殖民論與移殖民活動〉，《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47 期（1997.12），頁 259-287。

⁷⁶ 幕府曾於 1862 年自八丈島招募男女各 15 名移住者移往小笠原島，只是後來與外國關係漸趨緊張，為避免與島上的外國人衝突，這些移住者便撤退回國。小松和彥，〈橫渡南洋の壯士，森小弁〉，收錄於篠原徹編，《近代日本の他者像と自画像》（東京：柏書房，2001），頁 199。

樣的產業？除了小笠原諸島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無人島嶼？諸如此類的討論層出不窮。1887年，搜尋小笠原群島以南的無人島熱潮方興未艾，《讀賣新聞》即出現這些評論：

明治九日前自南洋巡航回國，途中經過三宅島、八丈島、鳥島、小笠原父母島以及硫磺島等地。三宅八丈兩島於數百年前已入我國版圖，島民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其中八丈島每年人口增加的數量顯著。島民純樸質直，有著太古之風。……由於運輸不便，島民熱切希望能築港，因此今日本島事業發展的首要工作即是築港……。小笠原島作為南洋中的一座孤島，國人移住的時間尚短，可振興的事業很多，對於未來經營南洋更是絕對不容忽視。⁷⁷

搜尋小笠原島以南的無人島熱潮，這幾日在報紙上盛行。但這些島嶼是否真能永久移住呢？認為現今國內有股憂鬱症，而外地移住是治療這種疾病的良藥。不僅可以開發財源，還可為日後南洋諸島及澳洲，南美間貿易開啟通道。因此，經營南洋的策略，在此提出以下三點：一、有志之輩相互團結，無論景氣好壞均共度；二、募集資金，可找華族有勢力者、學術研究者以及商人團體共同出資；三、派遣官用船開辦定期渡航，以節省交通往來費用。⁷⁸

因應小笠原島及南方各島陸續發現，日本對這些小島抱持著很深的期待。不僅希望能藉此聯絡澳洲、南美各地，進而開啟雙方貿易，如何振興島內事業也成為熱門話題。在有識之士的鼓吹，以及新聞報導推波助瀾之下，前進南方宛如一帖解決國內問題的良藥，小笠原諸島的開拓事業就是一切的起點。人們對遙遠的南洋，充滿了積極樂觀的想像。

大久保利通曾於1880年建成的「開拓小笠原之碑」上，留下「甲斐伊豆之山，蜿蜒起伏至此方盡，為我日本國之南門」這段話。⁷⁹對日本而言，小笠原群島是「帝國的南門」，是日本與廣袤南方接軌的一道大門，對日本的南洋發展事業是非

⁷⁷ 〈三宅島、八丈島、小笠原、鳥島、硫磺島などを巡察の明治九が帰港〉，《読売新聞》，1887年11月19日，朝刊，第2版。

⁷⁸ 〈(社説)南洋策初步〉，《読売新聞》，1887年11月22日，朝刊，第1版。

⁷⁹ 小松和彦，〈横渡南洋の壯士，森小舟〉，收錄於篠原徹編，《近代日本の他者像と自画像》，頁200。

常重要的。這樣的概念並不陌生，1879 年的琉球處分，以及 1895 年領有臺灣，都使沖繩與臺灣依序乘載了「帝國南門」的想像，而這樣的概念最早即投射在小笠原群島。無論是島上發展的投資事業，或是官方移入該島的移民，都可從中看出究竟日本看待南方，以及這套觀念在日後如何運用至其他的南方帝國新領土。

二、浪漫化南洋：明治中期的南進熱潮

回收小笠原群島，固然是明治期南進思想萌芽的重要契機，但若少了有識之士的推動，這種龐大而空泛的想法是無法順利成形的。在明治初期看出東南亞以及太平洋諸島的重要性，並極力鼓吹政府南進的人士，首推榎本武揚。榎本在 1867 年即已南下馬六甲及印尼等地遊歷，在日後更屢次強調建立現代海軍，以及和南洋各地建立貿易的重要性；更曾為了解決國內人口問題，鼓吹政府開拓新幾內亞，並買下北婆羅洲；在馬里亞那群島尚未被德國占領之前，榎本更曾建議搶先占領該地；不僅如此，為了熟悉南方的地理、經濟、自然環境等情報，榎本更於 1879 年設立了東京地學協會，收集並翻譯西方調查報告。身為維新政府官員，榎本在明治初期即以自身力量為南進思想背書，鼓勵國內人民向南拓展。

對榎本武揚這樣的政府官員來說，他們心目中的南洋，就像一片廣大未墾的荒地，擁有極高的商業價值，更可解決國內的人口問題。不過，這樣的想像不僅沒有實際的調查資料可支持，更未詳細考慮移入該地後的一切配套措施。這種浪漫天真的樂觀想法，是明治期南進思想的主要特徵，更支撐了而後一切的海外拓殖與冒險行動。以先前提及的搜尋小笠原島以南無人島計畫為例，透過這些思想家登高一呼，使得人民對南洋拓殖充滿了信心，對無人島充滿了好奇與渴望。⁸⁰ 此後更有許多記者、作家、商人陸續搭乘海軍艦艇或購買船隻出海，並將所見所聞刊於新聞或於日後出書，志賀重昂便是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

搭乘海軍的遠洋練習艦，是民間人士得以遊歷南洋的重要途徑之一。1886 年，年僅 23 歲的志賀重昂獲得海軍特別許可，以「專門實地研究」為由登上筑波艦，在 10 個月的航行期間遊歷了大洋洲各群島、澳洲、紐西蘭等地，回國後即寫成《南洋時事》一書，吸引世人對南洋諸島的目光。⁸¹ 這本著作之所以重要，是由於該

⁸⁰ 〈無人島発見計画に府庁から保護金 大阪の住民が小笠原島で漁舟雇い南洋へ〉，《読売新聞》，1888 年 1 月 17 日，朝刊，第 1 版。

⁸¹ 本次出航之舉也刊登在 1886 年 1 月 3 日的《東京橫濱每日新聞》上。見豬瀨直樹，〈志賀重昂與日本風景論〉，收錄於志賀富士男、山崎安治、豬瀨直樹編，《日本風景論解題》（東京：飯塚書房，1979），頁 70。

書首次將「南洋」視為獨立的一個地理概念，並與東洋、西洋等概念相互對應：

南洋是什麼呢。世人至今未曾稍稍留意這個問題。余輩在此首次將南洋二字於諸君面前提出，是為了引起各界注意。位於南洋的新事物與新話題，將在此還其原來之面目。⁸²

在明治 20 年以前的日本人南方紀行作品，並未如此明確定義南洋的敘述，因此本書的出現，實可稱作明治期南進論思想的重要開端。⁸³ 另外，志賀在自序中提及寫作本書的原因，是由於「目擊了薩摩亞滅國的狀況」，對西方列強侵略南洋有色人種的慘況，而對自身國家產生危機意識，才驅使他寫下這本書。⁸⁴ 因此，除了單純的遊歷紀錄，志賀也同樣感受到來自西方的壓力，這點也是明治期南進論者的共同意識。

當然，除了民間人士遊歷之外，官方人員也時有機會南下，只是理由不僅僅是四處遊歷罷了。1884 年，根據一艘英國帆船 Ada 號帶回日本的消息，有幾位日本籍船員在馬紹爾群島遭到該地土人殺害，為了查明真相，鈴木經勳與後藤象二郎的兒子後藤猛太郎兩人，被政府派遣至馬紹爾群島進行調查。鈴木在經歷 4 個月的航行旅程，並成功獲得該地酋長的道歉後，將調查報告回覆外務省，且於 1893 年出版《馬紹爾群島探檢始末》一書。⁸⁵ 日後基於本身的探險興趣，鈴木又出航南洋兩次，並分別出版了《南洋巡航記》與《南洋風土誌》等書籍。⁸⁶ 鈴木詳細且忠實地記載了當時南洋各島的地勢風土與文化民情，有時也在文字旁加附手繪插圖，在日本的人類學與田野調查尚未建立完備的時代，鈴木的記載成為日後南洋研究者的重要參考資料。對當時的民眾而言，這些記載也成為認識南洋各島嶼的依據。⁸⁷

⁸² 志賀重昂，《南洋時事》（東京：丸善商社，1887），頁 105。

⁸³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頁 184-185。

⁸⁴ 志賀重昂，《南洋時事》，頁 3。

⁸⁵ Mark Peattie 詳細的分析了此次調查事件，並認為當時鈴木交給外務省的調查報告，內容有諸多矛盾之處。Peattie 認為，這次的調查重點可能不在事件本身，而是日本政府為了調查南洋群島的相關情報，所安排的一次旅程。Mark R. Peattie, *Nany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in Micronesia, 1885-1945*, pp.9-14.

⁸⁶ 《南洋風土誌》曾於 1883 年 8 月至翌年 4 月，在《大日本教育新聞》連載。當時的南洋遊記，在出書之前，有時會先透過新聞的連載讓民眾閱讀，而非直接出書。像田口卯吉的航海遊記，在《東京經濟雜誌》、《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都可看見連載或不定期的報導紀錄。

⁸⁷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頁 194。

會出海前往南洋的日本人，不只是為了遊歷，其實更是為了尋找龐大的商業利益，這類的南進論者以田口卯吉為代表。身為政治官員、記者以及經濟學者，田口很早就提倡自由貿易的重要性，由於看中南洋貿易背後潛藏的龐大商機，田口運用其東京府市會議員的身分，挪用東京士族授產金成立了南洋商會，並購買「天祐」丸帆船，預備出海南洋。此時的田口對南洋貿易相當執著，更曾於出航前在《東京經濟雜誌》發表了著名的〈南洋經略論〉，內文不斷強調海洋殖民、海洋貿易的重要。⁸⁸ 即使公款私用的行為引發輿論強烈批評，但田口還是一意孤行，於 1890 年 5 月出航。歷經 8 個月的航行後，田口雖然成功在西班牙控制的波納佩（Ponape）島設置了日本商店，但整體的收穫依舊不如預期。⁸⁹ 僅管如此，田口這次出航所留下的遊歷紀錄，在《東京經濟雜誌》刊登的文章就多達 60 篇以上，如此龐大且深入的南洋紀錄，正好說明了明治二十年代南進論思想的蓬勃盛況。

對南洋有興趣的日本人，前進南洋的理由各自不一，而南進論者對南洋的想像，當然也有一些差異。除了像上述的田口卯吉，追求平和的自由貿易之外，也有如菅沼真風、稻垣滿次郎等充滿領土擴張欲的南進論者。以菅沼於 1888 年寫下的《新日本的圖南之夢》為例，書中將日本的興亡成敗，取決於海外領土的擴張成功與否。菅沼以一種煽情的訴求方式，強調要恢復國權，就必須擴張海軍，占領南洋諸島，並在該地設置農業移民等等。⁹⁰ 而稻垣則在著作《東方策》中提倡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認為對內必須振興工商業，對外則需要開拓東南亞各地市場，特別是航路、港灣等海上事業的發展，藉以提升日本在東方的霸權。⁹¹ 以上兩位的思想均強調國際情勢的險惡，側重南進論中軍事、外交的層面，並已帶有日後大亞洲主義的些許氣息。

這些日本旅人們沒有國家的強大奧援，多半也非學術專業，而是憑藉著一股「海外雄飛」的信念前往南洋。這樣的信念，和同時期西方世界前往亞非地區、甚至極地的許多冒險家一樣，都將海外探險當成一種探索未知世界的挑戰。⁹² 當然，上述所談的明治期南進論者，諸位思想都各有其著重之處。但整體而言，這

⁸⁸ 田口卯吉，〈南洋經略論〉，《東京經濟雜誌》第 21 卷第 513 号（1890.3），頁 351-353。

⁸⁹ 事實上，日後田口卯吉再也不提南洋投資一事，而是轉向亞洲大陸發展，儼然變成一位北進大陸論者。不只是田口，上述提及的這些人也並非都是從一而終的南進論者。留意每個提倡者思想脈絡的轉變固然重要，但這些人都恰好在明治 20 年代發表南進言論，特殊的時代氛圍如何影響了這些人的想法，並進一步轉化為言論，也是值得留意的重點。

⁹⁰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觀〉，頁 198。

⁹¹ 稻垣滿次郎，《東方策》（活世界社，哲學書院，1891），頁 332。

⁹² 山路勝彦，《日本の人類学——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學術調査の歴史》，頁 15-16。

些人均各自從不同角度發現了「南方」、「海洋」的價值所在。從實際利益的角度來看，南洋被認為有著豐富的物產資源，還有無數潛藏其中的無人小島，更是進行海外貿易、建立遠洋航線的絕佳場所；而從精神心態的角度來看，這些南進論者不斷強調，日本擁有控制南洋地區的最佳條件，日本人有使命去開發這個後進地域，為了國家著想，日本不該再繼續拖延下去，應該馬上採取行動。⁹³ 而這些殷殷催促的聲浪，都將南洋過度的理想化、浪漫化，在幾位滿懷期待的冒險家筆下，物產豐饒、希望無窮的南洋宛如一顆未經琢磨的寶石，在日本民眾面前閃閃發亮。⁹⁴

三、 對抗意識：北進論與西方勢力

為何明治期的南進論會有這樣的現象？除了對南洋相關知識的一知半解，所導致的誇大不實敘述之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分析點，是濃厚的「對抗」意識。矢野暢曾分析明治期南進論的思想特徵，認為此時期的南進論者反官方、反中央的意識很強，是一種源自民間的在野思想。更甚者，矢野用了「傍系思想」一詞形容明治期的南進論思想，明確標示出南進論的非主流特徵，認為朝向亞洲大陸的「北進論」才是當時的主流思想。⁹⁵ 因此，南進思想是對當時北進論主流思想的一種反動，之所以被形容為在野思想，也可看出當時官方的主要心力，其實是投注在北進論身上。由於要對抗前進北方，前進大陸的思想，因此南進論者無不強調南方、海洋的重要性，更因此刻意突顯、甚至誇大南方資源的豐富與未開性，這也是為何南進論者對南洋貿易、物產有著浪漫憧憬的原因。⁹⁶

而南進論需要對抗的另一個目標，即是凌駕在日本之上，揮之不去的優勢他者——西方。在第一節時已分析過日本對西方列強的劣勢感，這種心態使得日本在追求自我進步之時，還必須不斷的面對來自西方的挑戰。但對一個尚未發展成熟的帝國而言，要如何向西方證明自身的能力？此時逐漸發酵的南方開拓議題使日本人發現，模仿西洋人控制南洋、掌握貿易航線、甚至占領無人島，就是一種

⁹³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頁 43-44。

⁹⁴ 明治二十年代南進思想作品的浪漫傾向，以政治小說最具代表性。這些南進政治小說所吸引的閱讀對象，多半是對未來抱有憧憬的明治青年們。見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頁 180-181。

⁹⁵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頁 211-213。

⁹⁶ 有關強調海洋的重要性，事實上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就否定了日本與大陸的連帶關係，而強調追隨歐美等國的海上國際秩序，突顯日本作為海洋國家的角色。有關福澤脫亞論的分析，見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東京：創文社，1977）。

證明自身能力的好機會。也因此，明治期南進論者在強調日本適合前進南洋的同時，多半都會提及日本的後進性，之所以「後進」，即是與早已控制南洋地區的西方列強相較之下的結果。而這種「日本人最適合開拓南洋」的想法，是基於地理位置接近、人種相近等條件形塑而成。在日後，這種「一體性」的想法也轉化成與該地有色人種相互結合，共同抵抗西洋殖民帝國的概念。⁹⁷ 因此，無論是走平和進出貿易的路線，或是增強軍備占領小島，都是日本為了向西方展現國力，而作出程度不一的反應。⁹⁸

志賀重昂在 1890 年的《日本人》雜誌曾留下這樣的一段話，內容忠實的呈現出上述的對抗意識：

每年二月十一日的紀元節（神武天皇即位日），以及四月三日的神武天皇祭（神武天皇忌日），為了撫慰祖先在天之靈，我們必須一寸一土，如儀式一般不斷擴張日本帝國的版圖。我國軍艦在這些日子，必須前往那些尚無人占領的島嶼，占領它，插上我國的旭日旗。若非島嶼，即便是礁石也行。有些人會說這樣的行為宛如兒戲。但絕非如此。此舉不但可以累積我國海軍的實際航海經驗，更能以此種遠征之氣魄，振奮如今鬱悶不樂的大和民族。因此，絕對要繼續實行下去。⁹⁹

明治二十年代萌發的這股南進熱潮，事實上也在回應該時代人民的需求。在文明開化的路上不斷加速追趕，後頭是被蠶食鯨吞的其他亞非國家，還要面對前方虎視眈眈的西方列強，這股由不實幻想與浪漫情懷交織成的開拓南洋聲浪，對當時鬱悶不樂的日本人來說，就像是一種自我鼓勵，鼓舞了所有對未來感到不安的日本民眾。只要帶著滿腔的熱血與希望，日本勢必能前進南洋，邁向未來。這些受到激勵的日本人，就這樣陸續進入南洋、發掘南洋，也記錄著南洋。

⁹⁷ 清水元，〈明治中期の「南進論」と「環太平洋」構想の原型（I）：志賀重昂『南洋時事』をめぐって〉，《アジア経済》32：9（1991），頁 4。

⁹⁸ 其中思想家、實業家多半提倡平和進出，經濟貿易的路線，而文學家則展現出攻擊姿態，在作品中屢次展現出與歐美對抗的戰爭意識。神谷忠孝，〈「南洋」神話の形成〉，頁 55。

⁹⁹ 志賀重昂，〈四月三日〉，《日本人》第 44 号（1890），轉引自岩井忠熊，〈志賀重昂論（上）〉，《立命館文学》第 186 号（1960），頁 1325；Kenneth B. Pyle, *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 Pro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59.

第四節 再見野蠻

明治二十年代，在南進論的熱潮下，紀錄南洋人文風情的遊記有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並透過新聞、書物、圖冊等方式，介紹給日本國內的一般民眾。這些帶著浪漫、冒險、獵奇想像的敘述，不僅滿足了民眾對未知南洋的好奇心，更讓這塊遙遠的海外異域，自此烙上了野蠻未開的形象。為了區分出「我者」與「他者」，更為了定義、劃分何謂野蠻，遂出現了許許多多標示何謂野蠻的族群標籤。以下介紹在這些南洋敘述中，被日本旅人不斷覆述、應用的三項族群印象，並試著藉由這三項象徵南洋土人的族群標籤，探討此時期的日本如何看待、理解什麼是野蠻。同時，也分析日本人在詮釋，賦予這些標籤負面形象的同時，也試圖與之劃分，以向西方彰顯自身的文明。

一、裸體

前往南洋的旅人，除了記錄南洋各地的風景、氣候、物產之外，對當地土人更是格外留意，並將他們觀察到的現象逐一記錄下來。其中，旅人對土人的外觀體態特別感興趣，尤其是那些與自身族群全然迥異的身體特徵。除了黝黑的膚色之外，諸如裸體、赤足、捲髮等等，都是這些旅行紀錄中一再出現的族群標誌。除了人種上的生理特徵，這些旅人在觀察土人的外貌時，多半會注意、描述其「裸體」的各式姿態。裸體，成為一種標示他者族群野蠻未開的負面象徵。但矛盾的是，對剛踏入文明開化之路的日本而言，西方人也將裸體視為日本人的族群象徵之一。

裸體之於西方，其象徵的意涵有二：第一，多半是淫亂的象徵；第二，則標示了與自身全然不同的生活文化。¹⁰⁰ 在幕府末期，許多外國人踏上日本國土，看到日本人的裸體習俗、特別是男女混浴毫不羞赧的態度，大都感到驚駭莫名，認為此舉無異是一種淫蕩的行為。¹⁰¹ 當外國人以自身文化的價值觀，捕捉日本文化的姿態時，很容易就會擷取與自身文化相異的部分，並化約到全體日本人身上。當時的外國人甚至認為「日本人沒有羞恥心」、「在外國人面前毫無道德感」，以一種文化中心主義的態度，批判日本的裸體混浴習慣。¹⁰²

¹⁰⁰ 今西一，《近代日本の差別と性文化——文明開化と民衆世界》（東京：雄山閣，1998）。

¹⁰¹ 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著，土屋喬雄、玉城肇譯，《ペリリ提督 日本遠征記（四）》（東京：岩波文庫，1955[1912]）。

¹⁰² エメ・アンベール（Aimé Humbert）著，高橋邦太郎譯，《新異国叢書 15 アンベール幕末日

雖然如此，但西方人對日本人裸體的評價，並非只有譴責。有一派的西方人將日本人的裸體習俗，對比成古代希臘人，一方面自溺於西方文化早已喪失的優秀傳統，一方面則高度理想化與自身相異的他國文化。¹⁰³ 但這樣的想像，依舊是以自身文化為中心，以一種東方主義式的視線，將自身想像投射至異文化的行為。

由於感受到外來者強烈的批判目光，在 1872 年日本政府即以「對外國人來說非常粗鄙」為由，以外國人最常出沒的橫濱為首，陸續在各地頒布裸體禁止令。¹⁰⁴ 同年頒布的警察處罰令《違式誑違條例》，也明令禁止民眾在公共場合裸體。¹⁰⁵ 但此舉背後，其實不只反映出西方人對裸體的價值觀，其中也融入了日本上層階級原先即有的、對下層人民裸體行為不滿的價值觀。為了要文明開化，日本對於裸體的羞恥心逐漸加重，這種現象又以原先即排斥公眾裸體的上層階級為甚，因此透過裸體禁止令，日本逐漸將這種裸體的負面「族群」印象，轉化成下層階級專有、帶有「階級」意味的負面印象。到了明治三十年代，裸體禁止令再次頒布時，如今指涉的對象已經是一般的日本貧民。¹⁰⁶ 換言之，為了附和西方價值標準，為了進入文明之列，日本人將西方的裸體觀進一步內化，並將下層民眾自日本人之中差別化、外部化。明治初年西方人眼中「愛裸體的日本人」，到了明治三十年代，轉變成了「愛裸體的日本下層貧民」。

原先「裸體」所指涉的強烈族群式負面印象，在日本人自行內化後，轉變成一種階級式的負面印象。除此之外，日本人也透過明治二十年代的海外拓殖風潮，重新「發現」了一群「喜愛裸體」的南洋土人。這些土人的裸體形象，便透過大眾新聞、旅行書物以及文學小說等方式不斷被複製、被評價：

據說在南洋熱帶群島棲息的土人，有裸體的習俗。根據實際目擊的田口氏等一行人說，當地男性會以樹皮製成禪，女性則以椰子樹皮遮掩陰部，這是他們身上唯一的裝飾品。¹⁰⁷

本國繪（下）》（東京：雄松堂書店，1970）。

¹⁰³ 丹尾安典，〈「極東ギリシア」の裸体像〉，收錄於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編，《人の〈かたち〉人の〈からだ〉 東アジア美術の視座》（東京：平凡社，1994）。

¹⁰⁴ 相關敘述見：小木新造，〈解説（一）〉，收錄於小木新造、熊倉功夫、上野千鶴子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23 風俗・性》（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3-7。

¹⁰⁵ 《違式規違條例》的詳細法條內容，參見土屋喬雄監修、荒木昌保編，《新聞が語る明治史（第一分冊・明治元年—明治二十五年）》（東京：原書房，1976），頁 131-133。

¹⁰⁶ 中山昭彦，《裸体画、裸体、日本人—明治期〈裸体画論争〉第一幕—》，收錄於金子明雄等人編著，《ディスクリールの帝国——明治 30 年代の文化研究》（東京：新曜社，2000），頁 31-39。

¹⁰⁷ 〈南洋の原住民は男女とも木の皮の禪〉，《読売新聞》，1890 年 12 月 14 日，朝刊，第 3 版。

土人體格健壯，膚色黝黑，毛髮沉重捲曲，耳朵細小，眼眶深邃，鼻子像玩具竈一般，嘴巴橫咧有如犬；手腳有如猿猴般細長，全身宛如龍鱗般的厚皮四處竄長，那是罹患皮膚病的土人。大體而言，這些土人舉止與猿猴並無兩異，全身僅用禪遮住陰部，但裸體赤腳為常態。不論小孩還是大人，常常裸身四處行走，怡然自得，真是無法想像此等驚人的醜態。¹⁰⁸

此地的雕刻術甚為發達……其模樣多描述戰爭、漁業、舞蹈、外國船等景象，但其中最多的還是男女全身裸體像。雕刻技術雖頗為巧妙，卻是非常淫穢，令人厭惡。¹⁰⁹

這些裸體形象轉化至南洋土人身上，無形之中除了教育日本民眾「裸體即為野蠻」的概念，也提醒了日本民眾「現在的自己與他們不同」，現在的日本人，要學習作一個文明人。於是，曾在 1874 年出兵臺灣時，在蕃人面前脫光衣物公然泡澡的日本軍人，如今不復存在；而這些被重新發現的南洋土人，和下層日本貧民一起，成為日本仿效文明的過程中，那些名為「野蠻」的對照組。

二、怠惰

上段的敘述重點是南洋土人的外貌體態，但除此之外，前往南洋的旅人們也會紀錄土人的精神心智，因此像殘暴、淫亂、道德淪喪等負面描述也比比皆是。其中，有關土人「怠惰」、「不思工作」的敘述更是隨處可見。而這樣的心性特徵，也成為形容南洋土人時極為普遍的一種族群標誌。明治二十年代，日本新聞對南洋當地的描述報導逐漸變多，例如《東京日日新聞》就曾刊載遠洋航海船員在大溪地的見聞錄，除了記錄該島居民純樸和善，以及宛如樂園一般的生活景象之外，也特別提及該島土人的怠惰心性：

本島遊惰之民甚多，往往男女成群坐在路邊，招呼路過的人一起喝酒，起初是一人、二人，後來逐漸聚集成數十人，日夜均歡暢飲酒，一點禮義之心都沒有。¹¹⁰

（島民）全部都非常怠惰……即使工作中也銜著長長的煙管，來回徘徊。

¹⁰⁸ 〈軍艦「比叻」乘組員の南洋通信〉，《読売新聞》，1892 年 1 月 8 日，朝刊，第 2 版。

¹⁰⁹ 有賀文八，〈南洋叢話（7）〉，《読売新聞》，1892 年 11 月 9 日，別刷，第 1 版。

¹¹⁰ 〈タヒチ島見聞録〉，《東京朝日新聞》，1888 年 7 月 20 日，第 4 版。

由於本島土民衣食不缺，也不追求強飲飽食，因此非常快樂。¹¹¹

這類有關南洋怠惰島民的敘述，並非只有日本人如此。在十八、十九世紀，西方的殖民者陸續進入大洋洲、東南亞各地，並實際統治這些土人之後，有關土人怠惰成性的記載便越來越多。無論是英國人對馬來人的記載、西班牙人對菲律賓人的記載，或是荷蘭人對印尼土人的記載，都認為這些土人「缺乏勤勉之心」、「不喜承擔責任」，甚至認為這群土人的核心特質，就是懶惰。¹¹² 除了西方人的記載，長期在此地活動的中國移民，特別是十九世紀後半期開放海外移民之後，大量移居東南亞的華人，也認為這群馬來土人怠惰成性，因此無法與「天性」勤勉、有儲蓄、節儉概念的華人競爭。

像「怠惰」這樣的族群標誌，往往僅限於描述居住於南方熱帶地區的土人。土人怠惰的形象，有時會與樂觀天性、與世無爭等樂園憧憬想像連結，有時則與物產豐富、糧食不缺等自然環境條件並存，這類想像演變到後來，就成為所謂的「自然環境決定論」：由於熱帶地區氣候炎熱，物產豐富，一來土人不需擔心食物來源匱乏，二來天氣炎熱，容易心生懶散，因此土人不喜工作、容易怠惰、同時也沒有儲蓄觀念。明治四十年代，南進論者竹越與三郎的名作《南國記》，其中一篇〈為何馬來人是劣等的〉之敘述，即引用此種自然環境決定論的概念：

在熱帶地區，上天以無私的恩惠供給此地豐富的食物來源。……人們不需掛心於食、衣、住等生活需求，因此也沒有努力工作的必要。由於氣候極端炎熱，只能懶惰度日，因此在必要的範圍之外，土人在思考事物、推理、研究等精神上的氣力便極度缺乏。¹¹³

這種看似有科學根據的概念，在十九世紀後期特別流行。其實氣候決定人種外貌、性格差異的說法，在更早以前就已存在，無限延伸自然環境決定論，更出現一些過度誇大的幻想敘述，例如「熱帶地區較接近陽光，導致此地土人皮膚黝

¹¹¹ 〈夕ヒチ島見聞録〉，《東京朝日新聞》，1888年7月21日，第4版。

¹¹² 有關這些西方殖民國家對當地土人的詳細記載內容，可見 Syed Hussein Alatas,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77), pp. 43-70.

¹¹³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東京：二酉社，1910），頁359-360。

黑」等不實說法。¹¹⁴ 有了科學根據為這類說法背書，讓「熱帶：黑色：怠惰」的等式得以建立，不僅使得原先不帶價值判斷的氣候、顏色差異被套上優劣區別，更使得南洋土人從外貌到心智，都乘載了擺脫不掉的族群標誌。演變到後來，連土人本身都將此種概念內化，相信是氣候因素導致自身劣勢。

即便時至今日，仍然有許多人接受自然環境決定論的概念，但仔細分析此種概念開始流行的時間點，恰好是十八世紀，資本主義逐漸發展的年代。有研究者從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切入，檢討土人的怠惰觀，發現在十八世紀之前，西方商人依舊仰賴此地繁榮的土著商人階級，因此並未出現土人怠惰的敘述；十八世紀以降，在荷蘭殖民東南亞各群島之後，土人怠惰觀才逐步發展。¹¹⁵ 首先，由於資本主義蓬勃發展，西方人認為只有優秀的歐洲人最適合開發東方的天然富源，因此會刻意貶低土人的能力，將他們沒有開發富源的技術，歸因於先天心智上的缺陷；再則，此時期的西方資本家逐步消滅在地土著商人階級，控制剩下未抵抗的土人，除了扼殺了土著社會的流動性，也因為殖民支配使得土人喪失獲取額外利潤的動機；最後，成為原料供應地的東南亞地區，在社會技術與科學發展上呈現停滯狀態，更因此強化了土著社會的停滯性格。¹¹⁶

總的說來，十八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改變、影響了土著社會形態，使得原先不存在的土人怠惰觀逐漸成為定說，更在自然環境決定論的推波助瀾之下深深影響了普羅大眾。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同樣接受了自然環境決定論，以及「怠惰的南洋土人」的族群印象，並一再於大眾新聞及書刊中複製此說。從南洋土人的怠惰觀念，可以檢討自近代以來，包括中國、日本、東南亞等有色人種，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概念的同時，也將西方給予的各式族群標誌自我移植，如同晶片一般深深嵌入體內，並一代一代的流傳至今。像「熱帶地區接近太陽，因此皮膚黝黑」這類有關人種差異的敘述，在今日看來是毫無根據；但自然環境決定論影響下，使東南亞地區原住民容易心生怠惰的觀念，又該如何評價？檢視十九世紀後期日本對南洋土人的族群印象，其實也應自我反省，這類看似擁有

¹¹⁴ 森島中良，《紅毛雜話》（1787），收錄於早川純三郎編輯，《文明源流叢書》第一卷（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有關森島對南洋土人的敘述，可見山路勝彥，《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頁 35-36。

¹¹⁵ 對自然環境決定論提出強烈質疑的學者，首推 Syed Hussein Alatas。研究論著可見 Syed Hussein Alatas,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77)。

¹¹⁶ 平戸幹夫，〈怠惰なマレー人の虚像と実像〉，《海外事情》第 27 卷 3 月号（1979），頁 38-46。

「科學」根據的觀念，是否在今日仍持續網羅著普羅大眾。

三、食人

殺害人類，並且食用人肉的行為，自古以來皆被視為是一種極度反社會、反道德的行為。有食人行為的人種，也因此被視為是非「我」族類，與文明的我者呈現極端的野蠻對比姿態。基於對異域的未知與恐懼，被貼上「食人人種」標籤的族群，多半是那些身處非文明世界的族群，以歐洲為中心，隨著時代演進逐漸向外推展。不只是南洋、東南亞地區的有色人種，加勒比海和巴西土人、南非與印度南部的原住民，都陸續隨著西方殖民者的腳步，被位處文明中心的歐洲貼上食人標籤。

日本自十六世紀以來，便持續接受西方對世界各地的知識，當時西方對巴西食人族的描述，即已傳入日本。¹¹⁷ 在十九世紀更受到西方影響，吸收這一套西方人對野蠻他者的概念。明治 7 年的臺灣出兵事件，當時留下來有關臺灣蕃人的諸多野蠻形象，食人風俗便是其中被刻意突顯的野蠻形象之一：

宇內有一種嗜食人肉的人群，被稱為「cannibal」。此人群多半住在海上群島，臺灣的生蕃便是其中之一。若有外國船隻翻覆，船上人員漂流至此島，這批人就會殺害他們並食之，琉球人也是受害者。又此種人群只要相互爭鬥，必會將敵人殺害並食其肉，充當糧食。實在是極為兇惡。¹¹⁸

此外，諸如《東京日日新聞》中的「侵擾日本船難民並盡食之」¹¹⁹、《郵便報知新聞》中的「生蕃人襲擊我軍，並大啖我等之肉」¹²⁰、《橫濱每日新聞》中的「令支那苦惱不已的該島食肉蠻族」¹²¹等描述，當時日本的大眾新聞，頻繁地擷取中國對臺灣蕃人的殘暴描述，以及西方對野蠻他者的食人幻想，綜合成一幅華麗且駭人的蕃人想像。¹²² 在出兵事件後，一些讀者的投書及後續報導，更持續著對臺

¹¹⁷ Robert Eskildsen, "Telling Diffidences: The Imaginary of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pp. 92-98.

¹¹⁸ 《朝野新聞》，1875 年 4 月 24 日。

¹¹⁹ 〈海外新聞〉，《東京日日新聞》，1874 年 4 月 9 日。

¹²⁰ 〈外国新報〉，《郵便報知新聞》，1874 年 6 月 2 日。

¹²¹ 〈外国雜聞〉，《橫濱每日新聞》，1874 年 6 月 8 日。

¹²² 舉例來說，新聞會介紹清代臺灣對生蕃、熟蕃的分類概念，並強調生蕃的野蠻未馴。見《郵便報知新聞》，1874 年 4 月 16 日。

灣蕃人的食人想像。¹²³ 尤其受到戰爭影響，使得當時新聞對臺灣蕃人的描述，都偏向貶抑批判的角度，也刻意強化野蠻未開的負面意象。¹²⁴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若回到第二節的描述，可以發現當時的日本人較在乎食人印象背後隱含的野蠻性，而非領有臺灣後，對蕃人馘首習俗的強調。¹²⁵ 當時的日本軍人依舊保有獵首以求軍功的習俗，因此在標示臺灣蕃人的野蠻形象時，並不會刻意突顯獵首的野蠻性，而是將一種來自西方的食人野蠻想像，套用於蕃人身上，以期與這些蕃人作出文明優劣區隔。¹²⁶



圖 2-4-1 牡丹社蕃人的食人想像圖

圖片來源：村井靜馬編輯、鮮齋永濯畫，《明治太平記》8 編下卷（東京：東京書林延壽堂，1876），頁 4-5。

日本人對南洋「食人」人種的想像，在明治二十年代南洋探險熱潮興起，日本旅人在記述南洋各地的土人風俗時，此印象也在遊記中不斷地被複製、傳頌。在 1884 年應明治政府之要求造訪馬歇爾群島的鈴木經勳，即在出發前描述他的不安：

¹²³ 例如《橫濱每日新聞》的論說欄中有讀者投書，以臺灣蕃人食人肉為例，批判國內道德時局敗壞的亂象。〈論說〉，《橫濱每日新聞》，1874 年 12 月 1 日。

¹²⁴ 相關敘述見陳萱《明治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像の形成—新聞メディアによる 1874 年「台湾事件」の表象—》，頁 99-113。

¹²⁵ George Taylor, "Formosa: Characteristic Traits of the Island and Its Aboriginal Inhabitants," in Glen Dudbridge, ed., *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in the 1880s* (Taipei, 1999[1889]), pp. 154-155; Frank M. Lebar, *Ethnic Groups of Insular Southeast Asia*, 2 vols (New Haven, Conn., 1972-75), 2: 133.

¹²⁶ 相對地，看在同時期的西方人眼裡，同樣會獵首的臺灣蕃人與日本軍人，都是屬於野蠻的民族。詳情可見第二節之敘述。

南洋群島的土蕃原本即與獸類無異，又嗜食人肉，有這樣殘忍狂暴的人種，這次的探險是否能順利，還在未定之數。只能將這條命交付於天，獻出自己的身體了。¹²⁷

有趣的是，鈴木到了南洋，其實並未實際目睹食人景象，但在描述當地土人時，除了敘述土人偷竊、不潔、道德淪喪等諸多負面惡習，鈴木還是不忘加上「至今此地土人的食人風俗尚未完全消除」的敘述。¹²⁸ 除了鈴木，一些遊歷南洋各地的旅人，在提及該地的食人風俗時，大部分都是聽其他船隻轉述，或是由當地土人告知有此種風俗：

野中萬助的南洋貿易船「湊川丸」，昨日 21 日載了雜貨 30 餘噸在橫濱港靠岸。在南洋新愛爾蘭島停泊時發生了一件事，據說滯留當地的三名日本人，為了做生意前往土人的村落，卻遭到土人的殺害，並被食盡。¹²⁹

以兇猛剝悍聞名的新不列顛島土人，由於現在吸收了外人的智識，接受耶穌信教，稍微能辨別是非善惡及利害關係。愛惜身體、累積財富，且濫殺他人、飲其血嗜其肉的愚暴行為也不再出現。但這些狡猾的土人，實際上對拋棄這些習俗還是感到不滿，在他們的觀念裡依舊只想滿足慾望，跟關島的土人有著天壤之別。傳說距離這裡四五里以外，山的另一頭近水之處，新愛爾蘭島的土人依舊崇尚戰鬥，視殺敵食其肉為一種無上的快樂，許多停泊該地的商人均遭其毒手，這真是可怕的人種。¹³⁰

這些留下紀錄的人們，都未曾實際造訪食人種族出沒的新愛爾蘭島，也不曾親眼目睹，但都會刻意的紀錄該地食人風俗，並透過本國新聞刊登，大肆散布這些食人傳聞。

「食人」風俗是否真正存在，歷來的研究者多有爭辯。當然這樣的風俗，的確實際存在於某些土著部落，但後殖民研究者認為，這樣的傳言大多未經實際確認，就逕自在西方各式作品中被廣泛複製、誇大且流傳，因此食人風俗是殖民者

¹²⁷ 鈴木經勲，《南洋探檢實記》（東京：平凡社，1980[1892]），頁 13。

¹²⁸ 鈴木經勲，《南洋探檢實記》，頁 88。

¹²⁹ 〈南洋の原住民ら、行商の日本人を殺し肉を食う〉，《読売新聞》，1894 年 5 月 27 日，朝刊，第 3 版。

¹³⁰ 〈軍艦「比叡」乗組員の南洋通信〉，《読売新聞》，1892 年 1 月 8 日，朝刊，第 2 版。

對被殖民者的一種野蠻指控，是一種標準的東方主義式汙名化想像。¹³¹ 遠自希臘時期，歐洲即存在著食人傳說，到了中古時期，此種傳說與活人獻祭的意念結合，被稱為「Anthropophagy」。¹³² 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興起了新一波的現代食人想像，現今常用的「Cannibal」一詞即出自哥倫布。¹³³ 此時的歐洲人有更多機會接觸海外異境，但隨之而來的，對陌生他者的不安與恐懼也逐步萌生，食人風俗成為這些歐洲人對陌生他者最強烈且深刻的區隔標準。這樣的食人想像就隨著西方殖民者的腳步，各自套用在新大陸、東南亞、大洋洲等地的土人身上，成為各地甚囂塵上的駭人傳言。

近來的後殖民研究，除了分析食人想像背後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優劣概念之外，也以人類學的觀點，從在地人的角度分析食人傳說的散布。以居於北蘇門答臘的沿岸土人為例，對西方殖民者散布內陸土人嗜食人肉的傳聞，不僅可以獨占與外國人交易內陸商品的權利，還能保護自己不受外來者入侵威脅。在這群「在地中介者」刻意散布之下，食人風俗更被一再強調。意即，在地土人的能動性，促使他們對自我族群先行「異化」，以便讓外來的西方人接受此種族群想像。¹³⁴ 因此，新聞提及新愛爾蘭島的食人種族傳說，消息來源除了先前在此地活動的西方探險者之外，其實更有可能是自新不列顛島當地土人聽來的消息。在地土人同樣可能利用外界對自身族群的野蠻想像概念，以應付這些不請自來的外地人，甚至在各方列強競逐之下，從中牟取利益。¹³⁵

行文至此可以發現，對日本人或是西方人而言，這些探險者的重點並不在於實際目睹土人的食人習俗，而是這樣的流言跟想像，如何被一再地覆誦並流傳，不僅滿足旅人對異域野蠻人種的幻想，也加強了我者與他者的區別。而這樣的區別，對身處文明與野蠻夾縫之間的日本人而言格外重要。相較於同時期中國或西

¹³¹ 此說代表可見：Arens Williams, *The Man-Eating Myth: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phag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¹³² Gananath Obeyesekere, *Cannibal Talk: The Man-Eating Myth and Human Sacrifice in the South Se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3-9.

¹³³ 此一詞彙來自於千里達地區 Arawaks 人對 Caribs 人的蔑稱。哥倫布則將此詞轉譯。見 Frank Lestringant, *Cannibals: The Discovery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Cannibal from Columbus to Jules Verne*, trans., Rosemary Mor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16.

¹³⁴ 弘末雅士，〈近代植民地主義と「食人」——北スマトラを舞台に〉，收錄於栗本英世、井野瀬久美惠編《植民地経験：人類学と歴史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京都：人文書院，1999），頁 289-304。

¹³⁵ 舉例來說，鈴木經勳等人在馬歇爾群島調查當地土人虐殺日本人事件時，這些土人刻意讓這些日本人留下「貧窮原始」的野蠻印象，但當時馬歇爾群島的各部落，早已受西方各國所控制，甚至靠著遠洋中繼貿易致富。這些南洋土人利用了日本人的野蠻未開幻想，規避掉部分責任，鈴木等人也天真地、帶著期待中的南洋「野蠻」印象回國交差。Mark R. Peattie, *Nany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in Micronesia, 1885-1945*, p. 12.

洋對南洋土人的記載，日本的大眾新聞更為誇大其中的野蠻成分，以便突顯日本與這些野蠻他者的文化優劣差異。¹³⁶ 唯有不斷地強調土人的野蠻習俗，才能突顯日本身為文明國一員的正當性，讓日本得以躋入文明之林。在這種傾向之下，這群南洋土人再一次的被食人想像、不潔、心性殘暴等負面描述汙名化，以便符合暨西方白人之後，新一批的「有色」殖民者——日本人心中的文明優劣位階。

弔詭的是，就在同一時期的日本，這些誇大他者「食人」野蠻形象的日本人，也出現食人風俗的證據。1877年由美國學者摩斯發掘的大森貝塚，開啟了日本人追尋自身民族起源的討論，而貝塚中發現的大量破碎人骨，更使得學者懷疑日本人祖先存在著食人風俗。西方學者開啟了日本人類學研究，卻從中發現了日本人祖先的野蠻風俗，這讓許多日本學者感到相當不安。與坪井同為當時人類學會成員之一的白石光太郎，就曾表示「大森貝塚發掘了日本人祖先有食人風俗的證據。令人驚嘆之餘，也激發吾人調查自身祖先是否真有食人風俗之意向。日後是傾注所有心血調查遺址之時代」。¹³⁷ 而後日本本土人類學者的發跡，除了要從西洋學者手中奪回研究自身民族起源的主導權外，也與確認大和民族祖先是否有野蠻食人風俗有關。¹³⁸

食人風俗背後蘊含的野蠻想像是如此強烈，令人難以接受，以至於當時的日本學者要極力取回研究自身民族的專利，也要為自身民族破除如此不堪的野蠻標誌。這對努力追求文明提升、追求淨化的日本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從食人風俗的討論中可以發現，這群汲汲營營的日本人，是如何將象徵野蠻的「食人」標誌極力排除，同時加之於另一群劣等他者身上。這也顯現了明治初期的日本，如何在文明與野蠻的兩極標準中不斷游移，希冀能突破重圍，晉身文明之列。

本節闡述明治二十年代，日本旅人前往南洋，並紀錄在南洋的所見所聞時，分別為南洋土人貼上的三項族群標誌。同時，以解構的視角再一次「看見」這些負面族群標誌，就可從中窺得這些標誌的產出過程、日本人如何設法與這些野蠻形象切割，及其背後西方、資本中心主義的知識結構。這也是本節所希望關注的重要議題。

¹³⁶ Robert Eskildsen, "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7, No. 2 (April 2002), pp. 399-402.

¹³⁷ 白井光太郎，〈モース先生と其の講演〉，《人類學雜誌》第41卷第2号（1926.2），頁57。

¹³⁸ 這裡必須強調，摩斯本人並未說出「日本人的祖先有食人風俗」這樣的肯定句，這可能只是白井對摩斯的誤解。但也因為這樣的發言，使得白井背後「反抗西洋文明主導權」的企圖更加彰顯。見坂野徹，《帝國日本と人類學：1884-1952年》，頁84-85。

「裸體」，生動地描繪出日本在脫離西方人眼中的野蠻形象之時，如何分化、轉移原先屬於日本人的負面族群標誌；「怠惰」，企圖反省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後，隨之而生的嶄新價值觀和殖民利益需求，如何製造出一項新的負面族群標誌，並透過「科學」的自然環境決定論定說，深深嵌入這群熱帶有色人種的先天性格中；「食人」，則突顯了日本在追求文明開化的同時，刻意挪用西方對野蠻的想像與概念，並套用在這群被重新發現的南洋土人身上，確立他者進而定位自我。這是一個發現、定義、「再現」野蠻的過程。而努力邁向文明的日本，也要和過去那個西方人眼中野蠻的自己說聲「再見」。

本章分析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人對南方有色人群的異己想像。第一節分析種族主義影響下日本人的矛盾心態，第二、第三節則分別闡述兩個不同時期的海外進出事件與風潮，最後一節則著重分析這些族群想像的內容。以下將列出三項在本章主要關心討論的脈絡，以便作結。

首先，是此時期日本人獨特的矛盾心態。迎來嶄新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既有著身處價值觀迅速轉變的時代，也依舊朝氣蓬勃的活力，卻也不免必須承受來自西方文明如同機槍掃射般的歧視眼光。來自西方，特別是人種歧視的壓力，宛如甸在心中的一塊大石，驅使著日本人在描述南洋土人之際，也如同西方人曾做過的那般，不斷地運用各式族群想像與標誌，區隔這些有色的低劣他者。帶著許多對外界的不確定與防衛心態，日本就這樣跌跌撞撞的渡過後半個世紀。想了解此時期日本人的心態，就不能忽略其身處前近代與近代、東方與西方、白色與黑色之間的重層矛盾身分。

第二，就是縈繞在這段時期，揮之不去的種族主義概念。當時的種族差異概念，並不是一種「種族化」（racialization）概念下的連續光譜，而是一種互斥、二分、非黑即白的種族分類。族群間的差異透過本質化、自然化的過程，不僅簡化了群體內部的歧異，更放大了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界線鴻溝。¹³⁹ 另外，諸如食人、裸體、怠惰等簡化、甚至汙名化他者的偏見，都是一種建立在看似科學的客觀條件下，所衍伸出來的「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過程。而這樣的概念，透過大眾新聞等傳播媒介持續再製、強化種族的階層分類，更影響了日後實際統治臺灣、南洋時的官方政策與態度。

¹³⁹ 本段概念擷取自藍佩嘉，〈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瀏覽日期：2013年8月26日，文章網址：<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08/26/lanpeichia/>。

最後，就是上段稍微提及的，傳播媒介特別是大眾新聞的力量。隨著西方文明的入侵，日本也出現了近代新聞。無論是傳遞海外資訊，或是凝聚國內民眾意識，大眾新聞都深深參與其中。雖然此時期日本的新聞發展仍舊零散且不成熟，但已能從中看出新聞的重要性，這種現象在明治三十年代日清、四十年代日露戰爭時，更能清楚突顯。大眾新聞不僅是建立、塑造日本人心態的重要力量，更是傳遞種族偏見等資訊的重要媒介，在之後的章節也將針對大眾新聞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帶著這些對南方有色人群的族群印象，日本將要面臨的，是實際統治這群南方人群的挑戰。明治 28 年（1895），日本正式領有臺灣，那些在日本旅人筆下位處遙遠南方、「蒙昧未開」的臺灣蕃人，就遍布在這塊島嶼的中央及東部——充滿瘴癘之氣的蓊鬱深山、溫暖潮濕的海灣、湍流與耕地交錯的狹長原野之中。

第三章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往昔日本人在戰場，也有蒐集首級的習俗，但如今已斷然改之，此乃順應天理人道之結果。汝等與我日本人有共同之祖先，觀察現今汝等之容貌、體格、膚色，皆與吾等如此相似。若汝等也能順應天理人道，刻苦勉勵，則汝等現今所居之山場，也將與吾等內地一樣繁榮。¹

上述的這段話，很精準地道出了日本人對南方異己的複雜想像，也帶出本章欲分析的三個主題。首先，日本人認為這群臺灣蕃人和自己擁有共同祖先。人種上的親近想像，使日本在臺灣首度統治南方有色人群時，對臺灣蕃人抱持著一份特殊感情，並影響了理蕃政策的推行。再則，日本人認為這群蕃人之所以野蠻，是因為仍保留著獵首習俗。獵首習俗成為這群異己的野蠻象徵，總督府自統治臺灣開始，就一直試圖理解蕃人獵首的原因。隨著理蕃政策的推行，作為族群野蠻象徵的獵首，也逐漸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負面標記。最後，此段言論出自 1897 年臺灣蕃人首度內地觀光，立見總督代理對蕃人的行前演講。內地觀光作為日本人與蕃人近距離接觸的一項管道，是日本人理解南方異己的重要方式。若從日本人、日本媒體的角度來看待此事，又該如何理解？本章將處理上述三項議題。

再則，歷來對日本人與臺灣蕃人的研究，多半是以殖民統治的角度切入，將日本人視為優勢的殖民者，臺灣蕃人則為劣勢的被統治者，分析總督府的理蕃政策。但若回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將日本放回當時的世界體系脈絡，卻可發現身為有色人種的日本，不斷地受到西方白色人種的歧視與壓迫。在帝國內部身為優勢殖民者的日本，在世界人種位階之中，卻仍被歸入野蠻未開的有色人群之列。本章也將探討這樣諷刺的位階扭轉，在進入一次大戰期日本爆發大正期南進拓殖風潮之後，如何牽引著日本人的集體心態轉變。

¹ 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1897），頁 22。

第一節 親友仇敵

1895 年，日本獲得海外第一個殖民地——臺灣，這也是日本在打贏日清戰爭、向世界各國證明自身文明化成果之際，緊接下來的另一個任務：如何向西方列強一樣，成功的統治殖民地。日本人沉溺在戰爭勝利的欣喜中，卻也深刻地意識到，邁向文明之路的挑戰，從現在才真正開始。

臺灣在日本政府的眼中，是躋身文明之列的標誌、充滿豐富資源的寶島，當然也是新科帝國的沉重負擔；但對一般的日本人而言，臺灣在他們眼中，除了是國姓爺鄭成功所在之處，就是一個有兇殘土蕃居住的蠻夷之島。² 鄭成功因其日本血統，使日本民眾對其事蹟格外留意；而二十幾年前的臺灣出兵事件，在新聞、畫報與口耳相傳的宣傳之下，成為型塑日本國人對當時臺灣普遍印象的重要源流。也因為臺灣出兵事件，使得臺灣為「蕃人盤據的蕃地」想像特別強烈，無形中壓縮了同為臺灣居民的漢民族在一般日本人心中的印象，也因此更強化了臺灣「野蠻未開」的形象。³

會有這種印象的，不是只有日本。臺灣，特別是西部平原以東的廣大山岳地帶，對當時的世界各國而言，是一個充滿著未知與危險的熱帶蠻荒之地。這樣的印象，與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各國對「黑暗」異域的冒險拓殖風潮相互結合，也與同時期日本國內的南進熱潮互為呼應。⁴ 此時期日本開始翻譯西方冒險家的探險遊記，這些作品也鼓舞了明治期日本的南進拓殖熱潮。舉例來說，十九世紀末英國的探險家史坦利（Henry M. Stanley）於 1874 年溯剛果河而上，深入非洲大陸，至 1877 年才沿著剛果河西出太平洋，並於歸來後寫成《穿越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一書。當初的出發隊伍共 356 人，僅 114 名生還歸來。在十九世紀後期，此類書籍即透過各種翻譯版本，向全世界散布這股探險熱潮，伊能嘉矩、鳥居龍藏都曾於造訪臺灣蕃地之際，一邊冒著蠻煙瘴雨的危險，一邊翻閱史坦利的遊記，感受同為冒險者的興奮與不安。⁵

² 有關日本近代對鄭成功形象的相關描述記載，參見高致華，〈日本人的觀點から見た鄭成功のイメージ〉，《中日文化》21 期（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2002），頁 245-258；陳芷凡，《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臺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頁 215-221。

³ 森丑之助就曾自述其幼年時，即聽聞臺灣是個「有鬼魅一般可怕的生蕃居住的熱帶島國」。見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2000），頁 31。

⁴ 這裡使用「黑暗」二字，語出十九世紀末英國的探險家史坦利（Henry M. Stanley）。在探險熱潮方興未艾的時代，「黑暗」二字遂指稱未知的異域。日本領臺初期來臺的三位人類學者，也都曾將臺灣山地叫作「黑暗蕃地」，此即受到史坦利著作的影響。

⁵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上）：伊能嘉矩的臺灣田野探勘》（臺北：遠流出版，

除了冒險遊記，此時期的日本也大量翻譯西方的冒險小說與探險遊記，例如《魯賓遜漂流記》（1857年翻譯）、《十五少年漂流記》（1896年翻譯）等等。⁶ 受這些翻譯小說所吸引的讀者，多半是對未來抱持憧憬的青少年，書中對異域的驚險描述，更鼓舞著年輕的日本讀者勇於出海，朝向未知的地域前進。⁷ 冒險小說的風行，也引發國內作家競相模仿創作，並紛紛在新聞刊登連載，例如末廣鐵腸的《南洋大波瀾》、矢野龍溪的《浮城物語》等等均是。對於南方未知地域的想像，成為同時期日本政治小說的精神寄託所在，許多冒險故事均以臺灣及南洋各地為想像舞台。⁸ 而在現代旅行尚未普及的明治時期，對不曾踏出國土的日本人來說，閱讀冒險小說更是想像世界的一種方式。⁹ 當臺灣成為帝國實際統治的南方島嶼，自然乘載了這些對海外、特別是對南方充滿好奇的讀者諸多想像，也使得國內民眾對海外雄飛的慾望，有了一個可行的出口得以付諸實踐。

當時日本的來臺人員諸如行政官員、軍人與人類學者，同樣受到這波思潮影響。在領臺前曾造訪蕃地的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及民政長官水野遵，領臺後首批深入山區的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陸軍中尉長野義虎、人類學者森丑之助、鳥居龍藏以及伊能嘉矩，這些來臺人士帶著對異域的恐懼與好奇之際，也懷著滿腔熱血與抱負，毅然地走入未知的「黑暗」蕃地。伊能嘉矩在其長文〈回想餘筆〉中，就曾提及自己一邊翻閱史坦利《穿越黑暗大陸》一書，一邊幻想著「蕃地探險是男兒畢生的一大快事。」¹⁰ 鳥居龍藏甚至表示，「做為一個男子漢，在日本列島以外有這麼大的舞台活躍。假如侷促於區區一鄉里，沒有發展自己的抱負而虛度青春的時光，我倒為我故鄉阿波國悲嘆！」¹¹ 而森丑之助自述其少年時，思及渡臺

1996），頁 11；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出版，1996），頁 240。

⁶ 日文譯名分別為《魯敏遜漂流行紀略》及《十五少年》。相關敘述見山路勝彥，《台灣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頁 86-87。

⁷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無論是小說中的主人公，或是受這些作品影響而實際出海的讀者，清一色都是男性。若從性別的角度切入分析，以少年為主角的冒險作品，也呼應了此時期海外探索的慾望與行動，被認為是一種專屬於男性的權利。

⁸ 比較有名的有 1887 年小宮山天香的《冒險企業：聯島大王》、同一年久松義典的《南溟偉跡》、1890 年矢野龍溪的《浮城物語》、1891 年末廣鐵腸的《南海大波瀾》及《風雨將盡》等等。這些小說或以開拓南洋荒島、或以獨立革命打擊西方作為主題，其目的多半是為了抒發對國內政治的關心或不滿情緒，因而稱作政治小說。這類小說與前一章所述鈴木經勳等人的作品不同，這些政治小說作者多半未曾造訪南洋，只是以南洋作為故事舞台，而鈴木等人的遊記則是實際造訪南洋後所著。話雖如此，這兩類作品都反映了當時日本人對南洋未知異域的好奇與想像。見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頁 36-37。

⁹ 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頁 7。

¹⁰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上）：伊能嘉矩的臺灣田野探勘》，頁 11。

¹¹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頁 135。

一事，「心內突然湧起一種無法以言詞形容的感覺。既然臺灣變成我國的新領土，有很多日本人會前往，那麼，我們這些少年們也很想去。」¹² 由此可見，對異域的冒險憧憬，影響這批渡臺人員甚深。在解讀這些初期渡臺人員的心境時，不能忽略當時前往海外冒險的熱潮，如何召喚著這些明治期青少年的雄心壯志。¹³

當然，除卻心境上的因素，殖民者為何會積極前往殖民地，也與殖民統治之實際功效有關。當時西方各國在擴張殖民勢力的同時，均派遣學者先行前往擬殖民地區或新殖民地，進行學術調查，以方便未來的殖民統治。因此，戮力於師法西方的日本，也在新領臺灣之際，派遣東京帝大學者前往臺灣進行調查。¹⁴ 亦即，在日本人眼中，前往帝國所轄的殖民地進行學術調查，成為展現文明水準的重要手段。總而言之，這些人對地形、族群、交通、動植物等資訊的紀錄與擷取，不但加強殖民政府對蕃地的控制能力，更同時滿足自身征服未知野蠻異域的慾望。

這波來自文明者對未知野蠻的想像，在十九世紀後期世界性的冒險熱潮之下，化作一個個進入異域的冒險者，深入非洲、大洋洲甚至極地，直搗野蠻的最深處，並透過後來產出的諸多調查報告、旅行遊記以及小說等等，滿足文明對野蠻的好奇心，並得以逐步收編野蠻。無論是西方列強或日本，都同樣展現了這樣的帝國欲望。只是，日本作為與西方不同的殖民者，自有其一套特殊的方式來描繪、理解，並處理野蠻。以下將從日本人對臺灣蕃人的「親近」想像為主軸，探討日本統治臺灣的最初幾年，是如何看待臺灣蕃人。

一、我們是朋友：漢蕃分化與族群性格想像

日本人對臺灣蕃人的想像，受到既往對南方異域的印象以及特殊歷史事件影響，一直以來都刻意突顯蕃人凶暴而嗜血的性格。但在此同時，日本人的臺灣蕃人形象也同時夾雜了另一種互斥而矛盾的情緒，亦即兩者之間的「親近」想像。¹⁵ 也就是說，日本人認為臺灣蕃人與自己有一定程度的親密關係，不僅不是敵人，

¹²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 557。

¹³ 除了世界性的海外冒險熱潮，這批明治期的青少年也受到正在發展中的國粹主義影響。不難發現，這些人出海的原因，多半是為了榮耀家鄉，甚至是榮耀祖國（天皇）。而國粹主義的萌芽，又與對西方的競爭意識有關。無論是明治二十年鼓吹國人前往南洋的南進論者，或是這批率先進入蕃地從事學術調查的人類學者，心中總有個「白皮膚的」假想敵。

¹⁴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收錄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26。

¹⁵ 阮斐娜以「接近的相似性」一詞描述親近想像，認為日本日後對南洋地區的統治，也運用了這套親近概念，正當化日本在南洋的存在感與領導權。見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頁 61。

甚至還可以相互合作。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矛盾現象？這種親近想像內容為何，又是如何形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析切入點，可從日本人對臺灣漢、蕃兩大族群的性格想像談起。而族群性格的形塑，與日本人領臺前對臺灣漢蕃衝突的觀察與理解，以及領臺後的混亂情勢有很大的關係。

有關臺灣的漢蕃衝突問題，日本在領臺之前早有認識，國內也曾透過來自中國的外電報導，刊載有關開山撫番的新聞。¹⁶ 除了翻譯新聞，一些領臺前即造訪臺灣的日本人，例如水野遵、上野專一等人，更留下許多漢蕃衝突的實地探訪紀錄。¹⁷ 十九世紀後期，清政府勢力開始積極深入臺灣蕃地，企圖將後山納入帝國之有效管轄範圍內。此舉激化了漢蕃原有的衝突局面，更造成此後近山地區大小戰爭不斷。觀察到這點的當然不只限於日本人，根據同時期遊歷蕃地的西方人士記載，蕃人對進入蕃地的外國人多半較為友善，不似對待漢人那般水火不容。¹⁸ 而日本人與西方人一樣，在當時同被蕃人歸為外國人，因此在蕃地也相對安全，這樣的狀況直至領臺初期尚且如此。即便因臺灣出兵事件，對臺灣蕃人凶暴印象深刻的日本人，也將凶暴性情歸因於與漢人間的衝突，而非族群之天性。¹⁹

漢蕃兩大族群的衝突，成為十九世紀後期外國人理解臺灣的共識，連帶也影響了外國人對兩大族群的性格描述。這群在蕃地的外國人，都特別著重描述蕃人的友善與純真，更刻意將這種敘述與漢人的狡猾與骯髒相互映照。²⁰ 面對在異域的雙重他者「漢人」與「蕃人」，這些外國人透過對他者「漢人」的負面性格描述，

¹⁶ 〈臺灣生蕃の猖獗〉，《読売新聞》，1886年12月12日，朝刊，第1版。此新聞翻譯自同年11月28日上海申報之報導，顯現當時日本對臺灣生蕃的理解，有一部分須仰賴鄰國提供之情報。

¹⁷ 水野遵曾留下一個漢蕃衝突的故事。水野遵一行人曾被一位蕃婦攔下，哀求這些外國人去解救被漢人擄去的三位兒子。後來看見被壓在囚籠內的三名入質，老婦哀聲懇求漢人，漢人卻以此要脅蕃人給予土地。水野遵的記載，讓人深刻地感受他同情蕃人的立場。楊南郡譯註，《臺灣百年花火：清末民初臺灣探險踏察實錄》，頁12-17。至於有關領臺以前造訪臺灣的日本人之相關研究，可見岡部三智雄，《日本治臺前來臺日人之研究（1874-189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¹⁸ 相關的記載參見費德廉（Douglas L. Fix）著、羅效德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2006）。在此必須提醒，當時進入蕃地的外國人職業與入山目的，會影響其對蕃人的描述。例如，傳教士入山的目的是為了傳教，自然就不會刻意突顯蕃人的邪惡。但綜觀此時期西方人對蕃人的描述，相較於同時期處於敵對關係的漢人所留下的史料，就多了份平和與客觀，這點倒是無庸置疑。

¹⁹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呈請設立撫墾署〉，《理蕃誌稿》第一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1918]），頁9。

²⁰ 根據簡于鈞的分析，當時西方人筆下的臺灣島民可以分成以下三種：混亂骯髒無須多提的漢人、友善純樸的平埔番，以及神祕未知令人恐懼的生番。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對原住民正面與負面的描述，有明顯的歸屬族群。不過，就領臺前造訪臺灣的日本人所留下的紀錄來看，似乎就沒有這種明顯的分化。簡于鈞，〈重訪接觸帶：從西方旅人視野再見十九世紀臺灣（1860-188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23-46。

來突顯另一個他者「蕃人」的美化形象。而為何會出現「貶漢褒蕃」的現象，除了源自十九世紀西方人對中國長期累積的落後形象，也與這群文明人對「高貴的野蠻人」之原始憧憬有關。²¹ 但即便如此，對那些未能實地造訪蕃地的人們而言，蕃人野蠻殘暴的形象依舊強烈，與同樣落後野蠻的漢人形象相互拉扯，形成一種龐雜而紛亂的異地異己描述。

「貶漢褒蕃」的族群性格描述，在日本實際統治臺灣後，因為各地漢人土匪集團的反抗行動而進一步加深。原先預設必須優先處理對蕃地蕃人之政策，卻因遭遇意料之外的漢人抗日行動，而不得不暫緩處理。²² 為了專心處理漢人的反抗，日本政府對於蕃地的蕃人態度就較為緩和，甚至營造出蕃人歡迎日本人取代殘暴漢人統治臺灣的氣氛。領臺初期的內地新聞常可看見這樣的記載：

前日有生蕃酋長五人前往臺北府，會見近衛師團長宮殿下。……生蕃酋長跪拜叩首，曰皇師來臺，敝族極度欣喜不勝言語。清人皆頑冥之徒，敝族願提供二千同志作為皇軍先鋒。……蕃族五人哽咽含淚仰頭曰，從來生蕃皆被清人視為夷狄，而如今清人撤退，厭惡清人暴行的我軍，願受王化之光被，跟隨皇軍速速攻打之。²³

蕃人對支那人的厭惡感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是經長時間累積，而於今日達到頂點。蕃人認為他們之所以極端厭惡支那人的原因為：第一、世代傳下的仇敵；第二、掠奪土地的仇敵；第三、人種上的仇敵；第四、受狡猾的支那人長期欺侮。上述四大事由深入蕃人的腦內，是以蕃人與支那人之間的鬥爭不斷。但蒙昧無知的蕃人無法控制一時的情感衝動，因此容易遭受狡猾的支那人欺騙感情。經營撫墾的支那政府貪官污吏，與狡猾的通事相互勾結，更加深了蕃人對支那人的厭惡感。去年我軍將清兵擊退，蕃人從山中出來毆打支那人，一出鬱悶以久的怨氣，並向新來的我等日本人申訴不平，並道若日本人沒有來此地，他們的不平無處申訴，最終很可能就此滅絕。²⁴

²¹ 在此暫不繼續闡述「高貴的野蠻人」想像與臺灣蕃人之間的關係，留待下節補述。

²²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琉球ノ中城灣ニ於ケル樺山總督ノ諭旨中蕃人制馭ノ要旨〉，《理蕃誌稿》第一卷（東京：青史社，1989[1918]），頁1。

²³ 〈臺灣の生蕃乞作我軍之先鋒〉，《読売新聞》，1895年9月15日，朝刊，第2版。

²⁴ 〈蕃人の支那人に対する感情〉，《読売新聞》，1897年2月28日，朝刊，第2版。

當然，這樣的現象並非領臺之後才憑空產生，而是延續自領臺之前對漢蕃關係的觀察，加以實際領臺狀況相互融合而成。早期總督府的施政方針偏向綏撫為主，其「對生蕃懷柔，對漢人嚴懲」的心理背景，除了因應來臺後的特殊局勢，也受到這些官員在領臺前的蕃地踏查經驗影響，而對這群「受漢人欺凌」、「純樸友善」的蕃人多所寬容。²⁵ 至於日本殖民政府想像中的蕃人，則成為歡迎日本人取代漢人暴虐統治，等待日本人解救其悲慘困境的族群。也因為這樣的想像，使總督府初期採取的綏撫政策有其正當性。²⁶ 透過這些敘述，殖民政府塑造日本人與蕃人之間的友善關係，以強化統治臺灣的合理性。同時，這套親近想像也能宣傳、美化內地民眾對臺灣統治的期待。而領臺前即存在的「貶漢褒蕃」概念，則被日本挪用，轉為領臺初期「聯蕃制漢」的企圖。

日本在日清戰爭勝利之後，在東亞的地位大為翻轉，取代清國成為該地區的文明優勢霸主。這樣的結果不僅影響了西方人對日本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也改變了日本人對自身的看法。日本人作為文明優勢的統治者，統治臺灣這塊殖民地上的雙重劣勢者「漢人」與「蕃人」，可以依據其政治考量，操弄對他者的正面或負面描述。²⁷ 而在統治初期，即透過加強與蕃人的親近關係，拉攏蕃人並打擊漢人。

二、 我們是親人：「共祖同種」的血緣想像

上述說明殖民者日本的政治考量，使其加強與蕃人的親近關係，但除此之外，日本人對蕃人的親近想像，還包含了一種源自血緣、種族上的親近感。明治期的日本人受到西方帶來的近代種族知識影響，開始對自身種族的起源感到好奇。這份好奇感，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求取知識。受到白種西方人的種族優劣觀念影響，更轉化成一種不安與急迫感，急於確立日本自身種族的文明位階。其中，「南方起源說」在諸般人種起源學說中有其一定的影響力。²⁸

²⁵ 這裡指的官員，是牡丹社事件時曾造訪臺灣的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及民政長官水野遵。根據這兩人所留下的資料可以發現，當時他們與臺灣蕃人的接觸經驗，多半優於漢人。楊南郡點出這些官員於領臺前踏訪蕃地經驗之重要性，這些經驗影響日治初期的綏撫主義甚深。見楊南郡譯註，《臺灣百年花火：清末日初臺灣探險踏察實錄》，頁 7-45。

²⁶ 領臺初期的新聞曾出現這樣的評論：這些對日本人一點敵意也沒有的蕃人，只要採取綏撫政策即可，不須大加討伐。〈蕃地に対する方針〉，《読売新聞》，1895 年 10 月 28 日，朝刊，第 2 版。

²⁷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日本國內仍有許多地方，人民的生活狀況與臺灣漢人相同甚至更糟。打贏日清戰爭使日本人強烈意識到自身的提升，這使得日本必須加速國內的文明化速度，排除一切野蠻、落後的成分。在描述落後的臺灣漢人他者之際，日本也必須面對：國內的我者，同樣存在著落後。

²⁸ 南方起源說的發端，最早可追溯至明治時期自西方聘雇來的學者，而於 1884 年德國學者貝爾茲《日本人的身體特性》（Die körperlichen Eigenschaften der Japaner）一書發表後廣為人知。此後

如其名稱所述，南方起源說主張日本民族來自南方的馬來系人種。1884 年德國學者貝爾茲從人體測量、觀察與頭蓋骨研究中，提出日本民族是由艾努系、北方蒙古系與南方蒙古系等三系混合而成。其中日本社會階層較低的人群，混入南方蒙古系（為現今馬來系）人種的成分較多。²⁹ 除了體質人類學的研究，貝爾茲也從日本史書《古事記》中記載、日本大和王朝由南向北驅逐外族（即神武東征）的記錄相符。此後的日本學者承繼這樣的想法，從各研究領域找尋南方起源說的證據。例如坪井正五郎發現九州地區發掘的許多古代銅劍，與馬來人使用的鐵劍形狀有諸多類似之處，這證明除了大和民族之外，周邊的許多民族多半來自南方，雙方共同混合成現在的日本民族；³⁰ 三宅米吉透過《日本書紀》與《風土記》等記載，認為書中提及的「隼人」即為馬來人種；³¹ 高山樗牛更擷取這些史書中的神話成分，認為其與南島神話中的諸多要素相通，因而推斷日本民族起源於南太平洋。³²

事實上，有關種族的起源眾說紛紜，基本上並未達成單一起源的定論，而傾向日本人是混合民族，身上同時擁有北方大陸的蒙古系人種與南方馬來系人種之血統。³³ 但也由於自身種族的曖昧與混雜，加上明治維新時期對自身種族的劣勢不安感，使得像南方起源說這般具備一定科學證據、卻也同時頗受質疑的學說，有其發展、散佈的空間。³⁴ 另外也可以發現，當時無論是歐洲或日本的學者，除了將人種起源想像訴諸於近代科學的體質人類學、考古學，也傾向採信史書記載的神武東征神話。這不僅反映了十九世紀後期作為一般常識的優勝劣敗、人種交替思想，也說明了作為「文明」展現的史實記載之可信度。³⁵ 總而言之，受到南

諸如三宅來吉、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便各自從神話學、語言學、考古學等角度，主張日本人祖先來自南方。相關討論與內容見河西晃祐，《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大東亜共栄圏」への歴史的展開》（東京：法政大学出版，2012），頁 229-242。

²⁹ 貝爾茲（Erwin von Baelz）著，池田次郎譯，〈日本人の起源とその人種学的要素〉（Abstammung des japanischen Volkes und ethnographischen Elemente），收錄於池田次郎、大野晉編，《論集 日本文化の起源 日本人種論・言語学》第 5 卷（東京：平凡社，1973）。

³⁰ 坪井正五郎，〈パリ一通信〉，《東京人類学会雑誌》5：48（1900.3），頁 145-152。

³¹ 三宅米吉，《日本史学提要：氣候・人種・古物》（普及舍，1886），頁 65-72。

³² 高山樗牛〈古事記神代卷の神話及歴史〉《樗牛全集》第 3 卷（東京：博文館，1905），頁 433-439。

³³ 此說最早由明治政府聘雇來的德國學者鄧尼茲於 1875 年提出，而於 1884 年德國學者貝爾茲《日本人的身體特性》一書發表後廣為人知。坂野徹，《帝国日本と人類学：1884-1952 年》，頁 81。

³⁴ 南方起源說的萌芽，源自於 1880 年代的明治維新時期。當時日本對西方白色人種有強烈的不安感，而南方起源說更加深了日本人為劣勢人種的想法。而後日清、日露戰爭接連戰勝，日本人的自信心大增之後，對種族起源的不安感慢慢消退，也使得南方起源說的討論熱度逐漸沉潛，直至 1930 年代才再次勃興。後述共祖同種的想像，也在此時被大加運用。

³⁵ 坂野徹，《帝国日本と人類学：1884-1952 年》，頁 82-84。

方起源說的影響，包括臺灣蕃人在內，在廣大南方居住的黑色人種，成為日本人想像、追溯自身起源的依據。

由於日本人對臺灣蕃人存在一種曖昧的種族起源想像，因此在接觸蕃人、理解蕃人時，時不時會出現「我們有著共同的祖先」這樣的聲音。有趣的是，臺灣蕃人內部傳說支持這種共祖說法，為共祖想像提供了另一個論證基礎。森丑之助與鳥居龍藏曾採集到馬那邦社與阿里山蕃的起源傳說，都認為自己與日本人有著共同的祖先。³⁶ 當然，這樣的說法並未被人類學者採信。在人類學者實地調查後，除發表於學術期刊，也曾投稿內地新聞，公開否認了日本人與臺灣蕃人的血緣關係。³⁷ 但這種共祖同種的謬說，確實透過他們的調查紀錄流傳至日本內地，甚至被一再地複述。³⁸ 之所以能被日本人所相信並散佈，與他們內心對南方起源的懷想有關。

有關「共祖論」的想像，在日本統治琉球、朝鮮等地時，都被統治當局拿來合理化日本統治該地的正當性。這也意味著「種族」這樣的近代科學知識，成為連結兩個不同人群之間最有力的一項工具。但在統治臺灣蕃人時，相較於統治臺灣「同文同種」的漢人，共祖論就相對無法被大肆運用，畢竟這樣的說法從未受到學術證實，南方起源說也並非當時日本民族起源討論的主流。也因此，為了達成與蕃人的親近想像，就必須透過其他方式。例如，在描述蕃人性格時，其「尚武」精神就常與日本中古時代直率、正直的武士精神相提並論，藉由強調兩者精神氣質的相近，以加強日本人與蕃人的親近關係。³⁹

總而言之，日本人透過「共祖同種」的想像，藉以達成與臺灣蕃人的親近關係。這種立基於血緣及種族上的親近感，在此時期雖為非主流，甚至多有錯誤，但這樣的概念於 1910 年代大正期南方進出時再度發酵，到了 1930 年代甚至成為日本南進政策中被高度宣傳、運用的思想。⁴⁰ 與南方黑色人種的共祖想像，固然

³⁶ 生蕃起源傳說的紀錄見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 297、361。

³⁷ 〈台灣原住民と日本人は同種族に非ず 人類學者鳥居龍藏の調査結果〉，《読売新聞》，1897 年 1 月 27 日，朝刊，第 4 版。

³⁸ 新渡戶稻造於 1912 年以英文出版的《日本國族》(The Japanese Nation) 一書中，也曾引用了這樣的說法。他寫道：「那些馬來部落比中國人更像日本人，他們自己也說日本人是他們的親戚，中國人是他們的敵人。」由此可看出，即便是未經學術證實的謬說，仍有被流傳散佈的空間，甚至透過學者記載，將這種說法流傳到西方世界。Nitobe Inazo, *The Japanese Nation: Its Land, Its People, and Its Lif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2), pp. 249-251.

³⁹ 傅琪貽，〈論近代日本的「國家認同」：以臺灣「高砂族」的認同為例〉，收於黃自進主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政治社會特徵》(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中心，2008)，頁 100。

⁴⁰ 河西晃祐，《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大東亜共栄圏」への歴史的展開》，頁 243-248。

使當時急欲擺脫劣等成分、站上文明優勢位階的日本人感到挫折，卻也因此使其在描述南洋熱帶地區時，得以同時運用地域相近與相同種族的概念，宣稱自己統治該地的正當性。⁴¹ 而這種共祖同種的想像，也成為日本與西方各國在統治殖民地時最大的不同之處，更在時間的醞釀之下，逐漸被吸納、昇華成日後聯合有色人種對抗西方，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論述的一環。

三、從親友變成仇敵

為了因應統治臺灣初期的島內情勢，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塑造「親近」想像，聯合蕃人以打壓漢人。當然，這樣的想像必須建立在「蕃人不會殺害日本人」的前提之上。但隨著探查行動逐步深入蕃地，日本人遭害的情形也越來越多，使這種親近想像不攻自破。1897 年為了臺灣縱貫鐵道興建計畫而進入蕃地調查的深堀安一郎大尉，一行人全數遭難的不幸消息，就被內地及臺灣新聞大肆報導，更加深民眾對蕃人原先就存在的凶暴印象。⁴² 對蕃人的親近想像，就隨著理蕃政策的轉向而漸行沉寂。不過，隨著平地局勢逐步穩定，當局理蕃方針轉變之後，這套親近概念也被統治當局扭轉，成為日本人聯合漢人以打壓蕃人的局面。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吳鳳傳說。

吳鳳傳說是十九世紀後期流傳於臺灣漢人民間的故事，漢人通事吳鳳為了阻止原住民獵取人頭盡行獻祭，而犧牲自己，最終使原住民放棄出草習慣。⁴³ 這個故事在五年理蕃時期被總督府拿來刻意運用，除了於 1914 年編入《公學校讀本》之外，日本內地使用的《國定國語讀本》也編入吳鳳傳說，成為一般大眾所熟知的原住民故事。⁴⁴ 除此之外，總督府也在五年理蕃計畫推行之際，舉辦了吳鳳安座祭典，藉宗教儀式公開表揚吳鳳事蹟。⁴⁵ 經日本當局改編後的吳鳳傳說，與原

⁴¹ 此說於大正期南方進出時已被拿來宣傳。相關討論見清水元，〈大正初期における「南進論」の一考察—そのアジア主義的変容をめぐって〉，《アジア研究》30：1（1983.4），頁 48-52。

⁴² 〈深堀大尉一行の悲惨〉，《東京朝日新聞》，1897 年 8 月 6 日，第 3 版；〈台灣縱貫鐵道の探検中、蛮族に襲われた深堀大尉一行の最期〉，《読売新聞》，1897 年 9 月 15 日，朝刊，第 3 版。有關深堀大尉此次遇難的事件敘述，可見陳文添，〈深堀大尉探險遇難事件〉，《臺灣文獻》44 別冊（2013.3），頁 35-46。

⁴³ 有關吳鳳傳說的版本，經過駒込武的研究考證，一共有六個版本，每個版本都略有不同。而最早出現的官方版本，應是 1912 年由嘉義廳長中田直久所寫的《殺身取義・吳鳳》。詳細考證內容見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頁 166-185。另外，荊子馨分析了這些版本在納入殖民政府脈絡中，被挪用、刪節、修飾與濃縮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c）過程。見荊子馨（Leo T. S. Ching）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 210-213。

⁴⁴ 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頁 18-19。

⁴⁵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舉行吳鳳安座祭典〉，《理蕃誌稿》第二卷上（南投：臺灣省

先臺灣漢人流傳的版本不同，刻意強化了臺灣蕃人嗜血野蠻的形象，並神格化吳鳳作為文明力量的象徵。在當局的刻意宣傳下，日本人從「前近代」移植了漢人吳鳳的事蹟，將其納入「近代」西方為主的文明對抗蒙昧野蠻的一環。⁴⁶ 這種改寫文本的策略，是為了突顯日本殖民教化啟蒙任務的正當性，也是為了強化臺灣漢人對蕃人既存的長期敵意與偏見，並讚揚清政府教化蕃人的功績，以拉近日人漢人之間的親近感，共同對抗蕃人。⁴⁷

為了配合五年理蕃時期的政策，透過當局的刻意宣傳，日本統治者營造出一幅與漢人相互合作的畫面，與前述那些「狡猾骯髒」的漢人聯手對抗「擁有共同祖先」的蕃人。這說明了「親近」概念的模糊與曖昧性：因應日本不同時期的統治需要，而刻意操弄「漢」「蕃」這兩群被統治者。在誇大蕃人野蠻、殘酷的形象之餘，日本人忽略先前對蕃人那份基於種族的親近感，轉為強調日本人與漢人共享的文化及道德價值。⁴⁸ 在日治初期被視為文明劣勢的漢人，則透過吳鳳所象徵的優勢教化力量，轉而與日本人共同盤據了代表「文明」的至高點，而將蕃人打入名為「野蠻」的無窮深淵。⁴⁹

本節分析日本在統治臺灣初期對島內漢、蕃雙重他者的族群想像，並著重於描述蕃人部分。相較於漢人，日本人對蕃人的想像，更夾雜了相互矛盾的歷史記憶，以及追求自身祖先起源的特殊投射情緒。即使這套「親近」概念曖昧、模糊，也從未經過學術主流所證實，但在一般大眾對未知南方的臆測影響下，仍有散佈流傳的空間。而領臺前對臺灣蕃人的理解，不僅影響了統治初期對蕃綏撫政策的確立，更使得總督府有操弄族群對立的空間，合理化自身殖民統治，並進一步向內地宣傳。總督府更能利用這種曖昧性質，因應不同時期的需要，將和善的「親友」轉化為野蠻的「仇敵」。

文獻委員會，1997[1921])，頁 348-349。

⁴⁶ 在此須注意：原先為前近代漢文明之下的傳說事蹟，被納入近代西方文明之中，共同對抗野蠻。而居中進行操弄的，是橫跨前近代儒家文化圈與近代西方科學式文明的日本。日本因著這樣的雙面曖昧性，得以順利操作、結合不同地區的「文明」，並與永遠處於黑暗對立面的不變「野蠻」。

⁴⁷ 這樣的說法可見：荊子馨 (Leo T. S. Ching) 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頁 209-217；阮斐娜 (Faye Yuan Kleeman) 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頁 51；Robert T. Tierney,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pp. 51.

⁴⁸ Robert T. Tierney,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p. 53.

⁴⁹ 在此必須強調，即便如此，日本人仍然沒有放棄對臺灣蕃人的種族親近想像。新渡戶稻造在《日本國族》(The Japanese Nation) 一書中，刻意強調蕃人獵首獻祭的野蠻描述，但也不否認日本人與蕃人之間的親近性。相關分析見荊子馨 (Leo T. S. Ching) 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頁 215-216。

第二節 純真凶暴

上一節所分析的親近想像，在日本領臺的最初幾年被大肆宣傳，隨後就因日蕃之間的衝突加深，在輿論中逐漸沉寂。與這種親近想像相連，日本人對臺灣蕃人的另一種想像——「純真無垢」，也出現於領臺之初的各式文本，其中尤以人類學家的調查紀錄為最。對野蠻人純真無垢的正面想像，與「凶暴嗜血」的負面形象互為表裡，都是文明社會對原始部落的重要想像，一種對黑暗未知異域人群的恐懼與嚮往。而這兩種看似矛盾、實為一體的概念，對日本統治臺灣的理蕃政策影響甚大，更幫助內地民眾確立臺灣的蕃人形象。在初踏入二十世紀的此時，確立他者野蠻形象的過程，對正在膨脹茁壯的日本帝國而言，更是至關重要。因此，在進入對蕃人凶暴想像的主要討論之前，也必須將純真想像稍作闡述，分析日本人如何詮釋、套用純真想像於臺灣蕃人身上，以及這套概念如何因應理蕃政策的推行，而隨之演變、轉化。

一、「純真無垢」與蕃人想像

純真無垢的野蠻想像，可追溯至十八世紀中期在西歐社會萌芽的浪漫主義。當時的知識分子反思啟蒙以來的工業文明發展，轉而嚮往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社會。而西方各國在地理大發現後接觸的原始土著部落，就成為浪漫主義者心中「人類的自然狀態」的最佳範本。盧梭所提出的「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s)，就是一種立基於對自身文明的檢討，產生出的原始社會美好幻想。⁵⁰ 換言之，當一個社會的文明進程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開始反思自身文明發展時，一種對原始社會的浪漫原初想像便會應運而生。「高貴的野蠻人」想像，與其說是實際接觸原始土著後才萌發，倒不如說是對自我文明的反省，一種自發性的他者投射。對原初主義的迷戀，與自身的認同危機有關：一方面必須明確區分自我與他者的界線，一方面又想要體驗另一種異於現代主體的可能性。⁵¹

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仍是一個在努力追趕西方文明的前近代國家，因此類似於高貴野蠻人的想像，大約要到大正年間，社會文明進程達到一定成熟階段後，

⁵⁰ 有關「高貴的野蠻人」想像，最有名的例子當屬《風中奇緣》的女主角寶嘉康蒂(Pocahontas)。寶嘉康蒂的故事經由英國殖民政府的建構與美化，進而被後世不斷流傳。有關建構過程可見 Peter Hulme, *Colonial Encounters: 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 1492-1797*(New York: Routledge, 1986), pp. 137-173.

⁵¹ Marianna Torgovnick, *Gone Primitive: Savage Intellects, Modern L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 157.

才開始蓬勃發展。⁵² 但在統治臺灣之初，這種對野蠻社會的浪漫想像，也同時出現在描述蕃人的文本中，與歷代中國文人歌頌上古社會遺民淳美風俗的書寫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森丑之助對蘭嶼雅美族的記載，便將這群蕃人描述為「與世無爭」的和平之民。⁵³ 伊能嘉矩則將這群「天真爛漫」的紅頭嶼土人，與「悠然幸福、天真爛漫」的新幾內亞巴布亞人互為類比。⁵⁴ 朝日新聞更以「人間仙境紅頭嶼」為標題，介紹蘭嶼的風土民情：

本島土人的生活非常單純無邪，多半圓滿無事，鮮少發生紛擾。從來未曾聽聞有類似酋長身份的統御者出現，是因為他們的社會不需仲裁，是謂無為而治，有上古人民之風。⁵⁵

此外，雅美族相較於臺灣本島的其他蕃人，並無馘首的風俗，因此除了本就對原始社會抱持善意的人類學家，總督府於統治最初幾年留下的官方紀錄，也強調這群純真蕃人的正面形象。⁵⁶ 這點可與第一節所述的親近想像相互連結。

對原初社會純真無垢的敘述，散見於中國歷代的方志及文本記載之中。基於對上古社會的美好懷古想像，這群「保有太古遺風」的原始人群，成為中國文人諷刺當今社會、追求簡樸生活的理想期望。而日本對南方人群的描寫，也常常出現「保有古風」的讚美，這說明日本人描繪異己人群時，除了近代自西方傳入的種族概念，也受到傳統中國的影響，描述野蠻人群純真無垢的書寫觀點，即是如此。因此，這些文人對野蠻人群的描寫，便出現「文化低落修辭」和「原始主義修辭」兩種對立而矛盾的觀點。⁵⁷

⁵² 諸如佐藤春夫《霧社》、大鹿卓《野蠻人》等等，都可視為是知識分子反思自身文明的嘗試。相關研究可見荊子馨、阮斐娜、邱雅芳等人的討論。

⁵³ 除了雅美族，森丑之助也稱阿美族為愛好和平的族群。森丑之助還認為，特別是與「宛如海賊」的漢人相比，更能突顯蕃人的純樸，這點可與上一節的主題相互呼應。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 583-588。

⁵⁴ 以上形容詞為伊能嘉矩轉錄德國人之記載，並將此類比為他「剛剛實地目睹的紅頭嶼土人」。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上）：伊能嘉矩的臺灣田野探勘》，頁 336。

⁵⁵ 〈人間仙境紅頭嶼（5）人情風俗〉，《東京朝日新聞》，1898 年 6 月 14 日，朝刊，第 3 版。

⁵⁶ 1898 年，前總督府技師成田安輝曾向乃木希典總督提出撫育紅頭嶼住民的意見，其中提及：「這一千餘住民樸直溫順，且對日本人頗為友好，必須教導此等可愛人民開化進入文明之域。」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附錄二 紅頭嶼處理沿革〉，《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208-209。

⁵⁷ 此為 Emma Teng 的研究用語。文化低落修辭，係指以種族為差異標誌，而再現文人筆下番文化較漢文化低落的書寫觀點；原始主義修辭，則類似於西方「高貴的野蠻人」敘述，將番人簡單純樸的生活，當作文人心中期望的生活理想。詳細敘述見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延續「純真無垢」想像的另一層描述，是將這群蕃人比喻為天真無邪的「小孩」。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描述源自於近代以來日本社會對小孩的概念，並與日本官方理蕃方針討論或蕃情調查報告相互結合，強調小孩「蒙昧無知」、「無行為能力」的特質，成為決定政府理蕃走向的重要族群形象表徵。⁵⁸ 而伊能嘉矩在描述這群蕃人時，也認為蕃人猶如嬰兒，不能如成人食用肉類般直接餵食這群嬰兒，對這群蕃人強加文明國的諸般標準。⁵⁹ 這種想法與後藤新平的生物學統治理念不謀而合，都是立基於種族智識能力的優劣高低，而產生的差別待遇。⁶⁰ 簡言之，小孩的蒙昧形象，被拿來比喻為蕃人先天上的不足，作為總督府官員推行政策時的理論依據。同時，藉由強調小孩無行為能力，一方面確立了日本人優於臺灣蕃人的族群位階，另一方面也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統治，讓相對於小孩、具備自主行為能力的「成人」日本，對其進行管控與教化。

對日本而言，蕃人的小孩形象又往往與天皇成對出現，成為「天皇麾下的赤子」。在初期總督府推行撫育蕃人的工作時，除了將蕃人比喻為小孩之外，多半都會將撫育工作訴諸天皇，強調其一視同仁的美德，能增進蕃社臣民的幸福，提升其生活水準。⁶¹ 綏撫主義的理蕃政策，被視為天皇的恩德，諄諄化育這群宛如小孩的蕃人，並冀望其成為對天皇忠心耿耿的赤子。日本在近代逐漸形成以天皇為中心的恩德觀，並運用這套恩德觀看待周邊異族，並逐步成為天皇支配下的赤子臣民。而當這群赤子被認為期待「沐浴皇恩」之時，也同時被日本人他者化、劣等化。⁶²

總而言之，小孩概念是一套包含了不同向度的綜合概念。透過這套概念中用來象徵小孩的不同特質，可以配合不同時期理蕃政策的需求，分別合理化政府理蕃政策。前期以綏撫為主的理蕃政策，正好可以反映作為「成人」的日本人，必

⁵⁸ 近代日本對小孩的觀念，多半認為其缺乏理性、與禽獸相近。江戶時期的日本人曾對蝦夷人留下「天性愚昧欲念頗深，甚為卑劣缺乏理性，宛如小孩」的描述。松田傳十郎（1799-1822），〈北夷談〉，收錄於寺沢一、和田敏明、黑田秀俊編，《北方未公開古文書集成》第一卷（東京：叢文社，1979），頁123。而山路勝彥認為，小孩「未熟魯鈍」的觀念，不只套用在未開族群身上，成為形塑日後日本政府對蝦夷人的普遍看法，更成為殖民政府支配臺灣時，正當化其統治理念的虛構思想。山路勝彥《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頁94-96。

⁵⁹ 伊能嘉矩，〈台湾に於ける土着の分類及び其の現在通有する開花発生の度〉，《蕃情研究会誌》第1號（1898），頁13。

⁶⁰ 有關後藤新平的生物學政治原則及理念，參見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錄於國史館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頁1237-1241。

⁶¹ 〈林圯埔撫墾署處理事務要項〉，《理蕃誌稿》第一卷，頁92。

⁶² 中村勝將這套天皇恩德觀，用以解釋理蕃初期的綏撫主義，並強調在這套恩德觀之下，如何對他者異族產生劣等觀念。中村勝，《台灣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清朝・日帝初期統治政策の研究》，頁394。

須管理、操縱「無行為能力」的蕃人；⁶³ 後期以討伐為主的理蕃政策，則放大了小孩「脫序、不乖」的形象，給予總督府討伐蕃人的理由；等到五年理蕃政策告一段落，又開始強調小孩的無能力特質，以便順利推行教化、同化蕃社的政策。不變的是，這群宛如小孩의蕃人，在生物學式種族主義的概念下，都是劣於日本人的種族，都是必須讓已經是「成人」的日本人帶領，毫無自主發展的可能。而管控這群小孩，對日本人而言，也再次證明了自己是「文明」的成人。

二、從食人到獵首：族群標誌的除魅與再造

日本人的蕃人想像，除了純真無垢的小孩形象之外，最令一般大眾印象深刻的，不外乎是野蠻、嗜血、凶暴等負面形象，而其中的代表，就是獵首。如同食人一般，涉及奪取他人生命的行為，衝擊性是最為強烈的，因此蕃人的獵首習俗，成為日本人描述臺灣蕃人時，最常使用的族群表徵。其背後所挾帶的野蠻、恐怖、神秘等意象，甚至進一步擴大為象徵殖民地臺灣的符號。⁶⁴ 不過，獵首作為描述臺灣蕃人的重要象徵，要等到日本實際統治臺灣之後才逐漸形成，在日本領有臺灣之前，獵首習俗並未被日本人刻意突顯。⁶⁵ 此時期被新聞、畫報等大眾媒體不斷複述的，是食人想像。也就是說，日本人在理解臺灣蕃人的野蠻凶暴形象時，歷經了一次「從食人到獵首」的轉換過程。

食人想像的出現，源自於西方社會對未開部落的幻想。這在前一章已稍作闡述。而自近代以來學習、接受西方種族觀念的日本，也同樣承接了這份幻想，對廣大的南洋地域套上可怕の食人想像。這樣的想像，曾在明治 7 年臺灣出兵時被運用，當時留下的新聞畫報，指稱牡丹社土蕃擁有食人風俗。在轉錄清政府開山撫番的新聞時，也記載當地出現蕃人報復支那政府，殺害官員並食其肉的風聞。⁶⁶ 不過這些記載，都沒有實際目睹蕃人食人的紀錄，多半只停留在口耳傳聞階段。⁶⁷

⁶³ 早期的總督府官吏常用「操縱蕃人」一詞，表示政府當局用巧計隨意指使蕃人作出合乎政策動向的事情，猶如人在操作機器一般。當局認為當時的蕃人智能不高，容易用攏絡手段改變其群眾心理，所以「操縱」是當年理蕃當局慣用的手法。「操縱」一詞也反映了日本當局對蕃人「無行為能力」的態度。見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 437。

⁶⁴ 楊智景，〈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原住民書寫〉，《原住民族文獻》第 5 期（2012.5），頁 26。

⁶⁵ Robert Eskildsen, "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p. 402.

⁶⁶ 〈海外雜聞〉，《読売新聞》，1878 年 5 月 18 日，朝刊，第 3 版。

⁶⁷ 反之，被親眼目睹有明確食人風俗的，反倒是漢人。西方人紀錄近山地區的漢人部落有「食蕃肉」的風俗，希望藉由食用蕃人的肉，獲得和蕃人一樣的勇猛與氣力，而不受蕃人殺害。日本人統治臺灣時，也注意到此風俗。有關總督府對漢人食蕃肉的記載及相關討論，見王學新、龍仕騰，〈「殺番賞」之研究——以竹苗地區為例〉，收錄於林金田主編，《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

即便如此，這種極端的野蠻行徑，還是能成功引起民眾的恐懼心理，也滿足人們對未知的南方野蠻異域的好奇心態。在當時的觀念下，食人風俗是一種強烈的負面未開族群象徵，其重點並不在於食人風俗的真假，而是風俗背後標舉的「反文明、非人」傾向，成功區隔出我者與他者的差異。因此，在尚未實際統治臺灣之前，日本人運用一套未經證實的食人想像，來描述未開野蠻的臺灣蕃人部落，也透過食人想像，進一步區隔、定義自我與南方的野蠻人群。

日本實際統治臺灣之後，人類學家運用近代科學方法及實地田野調查，基於客觀事實記錄了臺灣蕃人部落及其風俗，獵首就在嚴謹的學術調查過程之中被擷取，成為代表臺灣蕃人的特殊風俗。同時，他們也逐一分析先前謠傳的蕃人食人風俗傳聞，並予以否認。伊能嘉矩即分析清代文獻及西方人對蕃人食人的記載，並推斷現今臺灣蕃人的食人風俗早已不復存在。⁶⁸ 透過官方的調查與人類學者的紀錄，食人想像逐漸破除，進而消聲匿跡。日後取而代之的，是同樣象徵凶暴行為的獵首風俗。

這些人類學者所紀錄的知識，透過新聞或報告散佈給民眾與官員，成為領臺初期日本人理解蕃情的重要依據。獵首作為臺灣蕃人實際存在的傳統風俗，同樣具有凶暴、嗜血的特質，並透過新聞轉譯過程，強化民眾對獵首的凶暴、野蠻印象。舉例來說，在報導蕃地蕃社景象時，最常複述的野蠻場景，就是放置敵人首級的頭骨架。即便是對獵首行為抱持中立態度的人類學家，在描述擺滿首級的頭骨架時，都不免表達了內心的恐懼。⁶⁹ 同樣的，日後新聞轉譯頭骨架的場景描述，以及人類學者所拍下的頭骨架圖片，讓身處野蠻蕃地現場的那份恐懼感，也同時被再現。獵首也被想像為原始部落野蠻、凶暴形象的展現。

總而言之，從食人到獵首的轉換過程，特別仰賴人類學家的調查紀錄，以及大眾新聞的傳播。獵首習俗就這樣承載了原先食人風俗所背負的諸多負面想像，並透過大眾新聞的傳播，散佈給急需蕃情知識的官員，以及未能造訪蕃地的一般

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241-288。

⁶⁸ 伊能嘉矩分析尹士儗《臺灣志略》及稅關人員 G. Taylor〈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的蕃人食人記載，最後歸納出這些傳聞，多半是虛妄之談，或是早已不復存在的久遠風俗，藉以強調現在的蕃人完全沒有食人風俗之痕跡。見伊能嘉矩，〈台湾に於ける食人の風習〉，《東京人類学会雜誌》13 卷第 148 號（1898.7），頁 394-396；伊能嘉矩，〈台湾の DIARAMOCK〉，《東京人類学会雜誌》23 卷第 269 號（1908.8），頁 424-426。

⁶⁹ 森丑之助曾有一次夜晚偷取頭骨的經驗。當時他描述「白天是勇猛過人、力能降伏鬼神的蕃人，夜晚時鼾睡於數百個猙獰的髑髏下」的場景，宛如古人所謂「夜景悽愴，鬼哭啾啾」之情景。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 283-284。

民眾。⁷⁰ 獵首風俗的知識建立與傳遞，仰賴著這一層層的消息轉譯過程。

從食人到獵首的轉換過程，代表原先日本人對未知部落的食人想像，透過近代學術調查，歷經了一次除魅化的工程，並另而再造一個以獵首為代表的野蠻想像。有學術調查背書的族群習俗，其力量較先前的食人傳說風俗更為強大且不可推翻；而日後國家力量開始深入蕃地，族群間的衝突與交戰日益頻繁，獵首作為與文明國家對抗、凶暴的蕃人象徵，更透過戰地新聞描述日蕃交戰的慘烈與傷亡狀況，一再地被覆述轉載，最終成為了一項難以去除的族群標誌。獵首習俗經過無數次複述、再製的過程，吸納了來自文明所給予的眾多負面、劣等象徵，已逐漸脫離原先維持部落社會文化組織運作的社會性意義，成為近代殖民國家統治之下被複述、想像，甚至拿來操作的一種工具標籤。

三、 如何看待獵首：族群標誌的本質化

「蕃人為何會有獵首習俗？」這個問題，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成為所有日本人心中揮之不去的疑惑。特別是當總督府想將統治力伸入蕃地，瞄準山區資源利益的時候，伴隨而來的戰爭與不斷攀升的統治成本，更使得獵首成為殖民地亟待解決之一大問題。對蕃人獵首原因的理解與詮釋，對日本人想像這群殖民地的野蠻種族甚為重要，也是日後定義獵首作為蕃人族群標誌的重要依據，更影響了總督府理蕃政策的轉變與推行。

在幾次深入蕃地的調查之後，總督府開始理解蕃人為何獵首的原因。舉凡當時的官方檔案，或是一般民眾也能閱讀的大眾新聞，幾乎都可看到許多解釋蕃人為何獵首的記載。朝日新聞曾轉錄刊載臺灣蕃通對生蕃獵首之因的說法：

根據當地某位生蕃通的說法，蕃人獵首的理由有以下兩項：第一、獵取前山附近的蕃人首級，蕃語稱為「シュソー」，多半作為祭祀的供品，或是需解決內部紛爭時，習慣以成功獲得首級作為判定勝負的依據。第二、蕃語稱為「マガ、一」，詞語意義不明，但當小孩啼哭、或不服父母管教時，只要對其說出「マガ、一」一詞，小孩會欣然停止啼哭，並聽從父母的話。

⁷⁰ 在此強調，親臨蕃地的人類學者雖記載獵首習俗，但並不表示他們會將這種風俗直接套上凶暴、嗜血等負面敘述。例如鳥居龍藏的調查報告中，就從未出現描述臺灣蕃人這類負面詞彙。這點與後來官方報告或大眾新聞的描述有很大的差別，必須特別注意。有關人類學者的紀錄之性質，見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頁 52。

推測此蕃語應與他們長期遭受支那人迫害，心中滿腔復仇意念有關。⁷¹

同此篇報導所述，當時日本人認為蕃人之所以獵首的原因，大致可以粗分為兩大項：第一，是族群間的憎惡仇恨。蕃人獵首的對象多半是漢人或敵對種族等外來族群，族群間長期的對立與衝突，成為最初日本人理解蕃人為何獵首的原因；第二，則是宗教意義上的迷信。經由人類學者的調查，日本人發現蕃人會為了成年禮、驅瘟、求偶等儀式舉行獵首，另外也認為唯有成功獵到首級的蕃人，才能證明其勇猛。這類獵首的原因，被日本人解釋為迷信，是未開社會中的落後習俗。因此，配合初期以綏撫為主的理蕃政策，總督府以「轉移蕃人心性」作為解決獵首惡習的主要方法，亦即透過文明力量，破除蕃人社會的迷信，並成功教化蕃人成為良民。而針對族群之間的衝突，此時的理蕃方針也一再強調要友善對待蕃人，不要重蹈漢人的覆轍。

但要扭轉蕃人獵首的傳統習俗，可沒那麼簡單。與中央官員的綏撫方針相異，實際接觸蕃人蕃地事務的各地撫墾署官員，都一再建議中央官員對蕃人採取強硬態度。⁷² 由新竹縣苗栗辨務署長鳥居和邦上呈總督府的意見書中可發現，蕃人的凶暴形象，在這些要求懲戒蕃人的報告中，也被特別放大。

臺灣歸於日本統治後，政府將守備蕃地之隘勇全部解散，各墾戶雖然自置隘丁，但蕃人日趨猖獗，其部落附近之既墾地悉被蹂躪，以致良民不能安心耕作田園及製造樟腦。換言之，良民似無沐浴政府保護之恩澤。

當今之撫育方法似無效果，撫墾署對蕃人給予酒、肉、色絲、玻璃珠、色布等獎勵就業生產，並勸誡不可殺人，但未聞有人聽從，反而殺害漢人、甚至日本人之案件逐漸增加。據聞憲兵懲戒凶暴蕃人亦有持劍對抗者，憲兵說不聽命令時要派兵隊問罪，他們卻說未戰之前難定輸贏，若戰敗則甘願服從命令，可謂傲慢無禮至極。在此情況下，難免令人懷疑當局之愛撫是否反而助長他們之凶暴。⁷³

⁷¹ 〈生蕃奇談〉，《東京朝日新聞》，1897年10月12日，朝刊，第7版。

⁷² 藤井志津枝在研究日治初期的理蕃政策時，也認為最初幾年中央總督府的綏撫方針，與地方撫墾署官員之間存在著落差與衝突。藤井並認為，地方機關之所以希望積極懲罰蕃人，與當地樟腦業者的要求、即對山區資源利益的迫切性有關。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臺北：文英堂，1998），頁40-61。

⁷³ 〈治蕃私擬意見書〉，《理蕃誌稿》第一卷，頁188-189。為忠實呈現原史料，本段翻譯將書中「原住民」及「山地」之詞，悉數改為貼近原意之「蕃人」及「蕃地」。以下引用史料亦此。至於註

這些地方官員多半認為，族群衝突的說法，在日蕃衝突漸趨嚴重後，已被認為是無效的。而中央採取的撫育方法，更可能增長蕃人的凶暴。力主強硬態度的撫墾署官員認為，蕃人獵首的習俗，實為一種先天性行為，即使耗費再多心力綏撫，終究無法使其改變。1897年，當時的內務部長杉村濤，即提出以下看法：

（獵首）對蕃人而言，是一種先天習性，一切吉凶禍福皆歸於斬得人頭之多少，且以扞禦漢人侵占土地為目的，馴致斬得漢人首級誇示勇武之風，逐漸形成此種積習。……素來蕃人的眼中只有同族不知他族，而以斬得他族之首級，用以誇示其豪勇或作為禍福占卜之用。因此，若要以疏於懈怠，或過失殺傷等罪名處罰蕃人，無疑是濫用法律。⁷⁴

大湖撫墾署長梶山清利更提出以下看法：

蕃人的殺人馘首風習，為祖先之生存競爭方法，由於沿襲已久，如今幾乎成為第二天性……雖然甚多人主張矯正此種惡習，但實屬不容易之事。……漢人土匪知道罪惡，殺人時可處重刑，而蕃人本無犯罪之觀念，因此殺人時只能視為瘋癲或白癡所為。⁷⁵

這些實際接觸蕃人、處理蕃人事務的地方官員多半認為，蕃人的獵首習俗是根深蒂固的族群天性。這與統治之初認為蕃人基於族群衝突而馘首的單純觀點不同，地方官員將獵首從宗教迷信，進而訴諸為固有的族群本性。⁷⁶

會有這種觀念，與當時社會達爾文式的種族觀有很大的關係。眾所皆知，後藤新平在統治臺灣時，標舉著生物學式的殖民統治原則，認為不能將文明社會的制度強加於未開文明的社會，就像比目魚眼無法突然變成鯛魚眼一般。⁷⁷ 另同前

釋引用部分，若涉及以上語詞，則一律引用日文版（1989 青史本）之原文標題。

⁷⁴ 〈蕃人ノ凶行ニ對スル懲戒処分方〉，《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56。

⁷⁵ 〈蕃人ノ凶行ニ對スル懲戒処分方〉，《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56。

⁷⁶ 森丑之助於 1913 年《臺灣時報》上刊登的文章也提及，蕃人馘首多半是因種種的迷信所引起，並認為馘首具有一種「神聖的威力」，能左右族群心理。但森氏認為正是因為如此，蕃人無法理解總督府革除馘首習俗的意思，也不甘承受外來的干預。因此，與當時正熾的官方討伐行為不同，森丑之助呼籲研究蕃性的必要，以減低雙方人命犧牲。同樣認定馘首為族群天性，森氏的建議與官方的反應卻呈現完全不同之兩極作法。森丑之助，〈台灣蕃族に就て〉，《臺灣時報》第 47、48 號，1913 年 8 月。

⁷⁷ 信夫清三郎，《後藤新平：科學的政治家の生涯》（東京：博文館，1941），頁 133-134。

段所述，伊能嘉矩也將臺灣蕃人視為嬰兒，認為不能太快對其進行文明教化。⁷⁸ 因此，這群被視為未開文明的蕃人，無法馬上適應文明社會的規則，而獵首習俗為一種本質化的先天族群心性，文明社會無法以過速的教化工作，改正此項習俗。⁷⁹

社會達爾文式的種族觀，將蕃人視為較為劣等的族群，無法擁有與文明社會一樣的學習能力。另外，單線式的進化論，也將這群蕃人視為進化程度低的一群原始人種，不宜對其套用文明國家的標準。這種觀念影響了官方如何確立蕃人獵首的法律刑責問題，以及如何看待獵首習俗。⁸⁰ 更甚者，日本內地在討論革除蕃人獵首行為的時候，也曾提出「蕃人是自滅種族」的說法，認為在優勝劣敗的法則下，蕃人會被文明社會自然淘汰，因此無須擔心獵首問題。⁸¹ 日後廢除撫墾署，改以警察行政體制管理蕃人蕃地的政策，更是這種觀念的強化展現：既然獵首行為是一種本質化、無法輕易改變、兇惡的族群天性，那就只能透過優勢的文明力量，直接討伐這群不服帝國管教的頑劣蕃人。在持地六三郎著名的意見書中，也明確展現出這樣的概念。⁸²

本質化的獵首習俗，使獵首成為一種無法輕易去除的負面族群象徵，蕃人更無法輕易擺脫這樣的兇暴形象。獵首風俗的有無，成為判別蕃人文明程度高低的標準，例如尚存獵首風俗的泰雅族，就被總督府視為開化程度最低的臺灣蕃人。⁸³ 對北部「兇蕃」的諸多負面印象，其核心象徵即為獵首風俗，北部的泰雅族在臺灣各地的蕃族中，也成為承載最多日本人負面想像的一群人。另外，獵首被視為是不服帝國政府統治的兇惡反抗象徵，必須透過帝國的近代軍事力，例如隘勇線、通電鐵絲網、武器大砲等等，對其展開強力討伐。當有人質疑是否真需要動用武力討伐蕃人時，無法改變的獵首習俗，更成為官方用以說服大眾的有效藉口。⁸⁴ 當獵首被本質化且無限放大，也正式宣告蕃人被帝國歸為野蠻的一方，與文明呈現兩極互斥的對立狀態，無法扭轉。

⁷⁸ 山路勝彦，《台灣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頁 96。

⁷⁹ Robert T. Tierney,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p. 48.

⁸⁰ 在優勝劣敗及單線進化論的種族觀下，進化程度低的蕃人，被認為無法適用文明社會的法律標準。中村勝，《台灣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清朝・日帝初期統治政策の研究》，頁 452。

⁸¹ 〈眾議院議員質詢山地政策與內務大臣之答覆〉，《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562。

⁸² 持地六三郎在提及蕃地政策時，先確立蕃人在文明開化程度上之落後，接著提出以「先威後撫」的方法對待蕃人。他認為，基於雙方天生的差異，若以文明人之方法對待蕃人，是無法奏效的。因此只有先以武力征服蕃人，才能談後續的綏撫工作。〈持地參事官ノ蕃地問題ニ関スル意見〉，《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202。

⁸³ 中村勝，《台灣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清朝・日帝初期統治政策の研究》，頁 472。

⁸⁴ 安井勝次，〈蕃人於國法上之地位〉，《臺灣慣習記事》第 7 卷第 1 號（1907.1），收錄於《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745。

由初期以綏撫為主的政策，轉為後期以討伐為主的理蕃政策，獵首風俗的性質在其中經過了一次轉換，從「蕃俗蠻性容易轉移」的單純理想，轉變為一種無法被輕易改變的族群天性。五年理蕃戰爭時期的官方論述，更將討伐兇惡蕃人的行為，訴諸為一次「文明對抗野蠻」的使命任務。新渡戶稻造於 1912 年在美國發表以日本理蕃政策為主題的演講，即將獵首習俗放大至蕃人社會生活各層面，強化蕃人野蠻的形象，藉以與文明的日本和西方各國之間，劃出一條明確分界線。⁸⁵另外，也將臺灣蕃人與西方各國殖民地的原住民相比，企圖塑造日本和西方各國為同一文明陣線之感。⁸⁶

大正初期的日本，運用優勝劣敗的概念來合理化討蕃行為，也正說明了其民族旺盛的自信心，早已與明治初期臺灣出兵時大不相同。以討伐為主的理蕃政策，強化了文明與野蠻的兩極對立狀態，與不可扭轉的絕對僵化關係。但也正因為如此，日本得以藉由討伐蕃人，成功建立出文明與野蠻的兩極對立姿態，使日本得以向西方世界宣告其為一個代表文明的國家，與西方為同一陣線，而不再是一個前近代的東方落後國家。

四、 獵首作為劣等標籤：族群標誌的建構與遺忘

經歷了上述的轉換過程，日本人普遍將「獵首」作為想像臺灣蕃人最主要的凶暴象徵。但獵首風俗對日本人而言，並不是一項前所未聞的奇風異俗。事實上，在前近代的日本社會，也存在著獵取敵人首級作為軍功的習俗。在日本學者進入臺灣蕃地，觀察蕃人所獵取的頭顱時，也會將這種習俗與前近代日本的「首實見」習俗相互對照。⁸⁷ 這樣的概念並不是一種源遠古老的習俗，如前一章所載，明治 7 年日本出兵臺灣時，隨軍的西方記者豪士就曾描述日本軍隊爭相收集蕃人頭顱作為軍功的行為。⁸⁸ 不只是西方記者，內地錦繪新聞的畫師也自然地將這種行為繪製下來，作成新聞發送給一般大眾。可見當時的日本人，並不認為獵首是一種野蠻的習俗，甚至和臺灣蕃人相同，將獵首視為勇氣與榮耀的展現。

⁸⁵ 在此還是必須強調，同時期的日本人類學者並未如官方一般，將蕃人的獵首行為化約至所有社會生活上。另有關新渡戶稻造對獵首習俗的討論，可見荊子馨（Leo T. S. Ching）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頁 214-217。

⁸⁶ Robert T. Tierney,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p. 49.

⁸⁷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頁 312。首實見是一種日本古代習俗，戰爭中戰勝的一方，將戰敗的敵首收集在大木桶內，在主將面前一個一個拿出來作識別的工作。

⁸⁸ 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原著、陳正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頁 121-122。

但經過二十多年，實際統治臺灣之後，獵首行為在日本人心中，卻已不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凶暴的野蠻象徵。在這二十多年之中，日本人對野蠻行為的定義，經歷了一次再建構的過程。這自然與西方文明標準的引進有很大關係。日本舊有的諸多習俗，在西方的文明之眼凝視下，都成為野蠻未開的象徵。從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訂定的〈風俗條例〉中，可以看出當時急速推行文明化的明治維新政府，如何重新定義哪一些風俗屬於野蠻、應該被禁止的惡習。⁸⁹ 諸如笞刑、隨地便溺、公眾裸體、男女混浴等行為，都在新的文明標準之下，成為待革除的野蠻象徵。⁹⁰ 在西方記者的眼中，獵首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使得獵首原先象徵的勇猛、榮耀等正面意義，被日本人再次建構成野蠻、凶暴的負面象徵，並在日本社會之中逐步銷聲匿跡。到了統治臺灣之時，蕃人承接了日本給予的獵首負面象徵，並透過大眾宣傳，強化獵首行為的野蠻與凶暴，進一步幫助日本社會逐步達成淨化、提升。

由此可知，來自西方的文明標準，深深影響了此時期日本對國內風俗的再造。從中油然而生的焦慮與不安，更使得日本亟欲擺脫野蠻風俗。舉例來說，前述提及的食人風俗，也曾成為阻礙日本人追求文明過程的絆腳石。前面曾提及明治 4 年大森貝塚的挖掘，不只是開啟日本人對自身祖先的研究，遺址中發現的人骨殘骸，也曾引發國內學者的議論與恐懼，擔心自身祖先是否也有野蠻的食人風俗。⁹¹ 在當時的觀念下，食人風俗是一種強烈的負面未開族群標誌，這更引發了日本人的擔憂。也因為發現大森貝塚的是西方學者，因此日本隨之萌芽的人類學研究，某種程度上也帶有與西方學者較量的意味。因為不甘於被西方學者發掘自身祖先可能存在的野蠻風俗，也為了奪回自身民族的研究權利，明治時期的人類學者懷著這份不安與敵對感，為破除西方人對其套上的野蠻日本人形象，開啟了人類學研究。⁹²

日本做為一個追求文明化的近代國家，必須接受西方文明標準，並對國內展

⁸⁹ 1872 年 11 月頒布的《違式註違條例》，即明文禁止於公共場合從事上述的諸項不雅行為。相關條例內容見下中弘編，《日本史大事典》第 1 卷（東京：平凡社，1992），頁 388。

⁹⁰ 像笞刑這樣的風俗，其實許多源自於中國。從這點也可以看出，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過程時，將本來同樣引用自「文明」中國的刑罰手法，轉而視為一種「野蠻」風俗，並服膺另一個「文明」西方的標準。

⁹¹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曾有學者針對日本的食人風俗進行深入考察，並收集日本有關食人的神話、史書記載及各地傳聞，以分析這種食人習俗之因。寺石正路，〈食人風習ニ就テ述ブ〉，《東京人類學會雜誌》4 卷第 43 號（1888.12），頁 78-91；寺石正路，〈食人風習論補遺〉，《東京人類學會雜誌》8 卷第 28 號（1893.1），頁 127-130。

⁹² 坂野徹，《帝國日本と人類學：1884-1952 年》，頁 84。

開各類風俗的淨化與再塑。像獵首這般不為西方文明社會所認可的習俗，日本必須擺脫這些被視為野蠻未開的風俗，才能向西方社會證明自身文明開化的成功。因此，日本轉換原先獵首所代表的正面意義，並透過殖民統治，將再建構的負面族群象徵轉換、套用至臺灣蕃人身上，並強化獵首行為的野蠻形象。至於自身原先也曾存在的獵首風俗，則逐漸被社會所淡忘。⁹³ 至此，日本順利從前近代的諸多野蠻風俗中逃脫，搖身一變成為西方認可下的近代文明國家。這是日本在追求文明提升的過程中，一次集體性的失憶。

五、 未完成的異己想像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基於與英國的結盟關係，日本也加入了這場戰爭，並於同年 10 月派遣海軍前往太平洋，占領德屬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群島。⁹⁴ 這些小島也在 1919 年 5 月經國際聯盟正式委任日本政府託管。⁹⁵ 因此，一群黑皮膚的南洋島民，在大正初期新加入日本帝國的行列，並在內地引發一波南洋熱潮。有關南洋群島的未開資源、戰略潛力，特別是對當地人種風土的介紹，再次喚醒內地日本民眾的對遙遠南方的注意力，當時的熱銷雜誌《實業之日本》，甚至為了這股南洋熱，特地出版《南洋號專刊》。⁹⁶

在日本人心中，這群南洋島民已不似明治期那般神祕而危險。內地新聞在介紹這群南洋珍客時，都刻意強調他們天真、純樸的友善形象，與當初領有臺灣時對蕃人的介紹大不相同。⁹⁷ 會造成這樣的差異，即與臺灣蕃人根深柢固的凶暴形象有關。即便明治二十年代也曾發生日本人在南洋遭島民殺害的事件，但與會獵首、且剛與總督府結束大規模理蕃戰爭的臺灣蕃人相比，堪稱無血占領的南洋群島，其島民天真爛漫的正面形象更形突顯。⁹⁸ 至此，這群「純真無垢」的南洋島

⁹³ 這些舊俗之所以會被日本社會淡忘，與日本從未進行系統性的舊慣調查有很大的關係。現今的日本人無法透過類似臺灣漢人、蕃人社會的舊慣調查，追溯自己舊有的風俗，因此許多舊俗就這樣被後世所遺忘。

⁹⁴ 有關日本宣戰的經緯過程，可見我部政明，〈日本のミクロネシア占領と南進(一)〉，《法學研究》55 卷 7 号（1982.7），頁 876-895。

⁹⁵ 是為「C 式委任統治地域」。外交決策過程可見：今泉裕美子，〈南洋群島委任統治政策の形成〉，收錄於大江志乃夫編，《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4》（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 51-81。

⁹⁶ 見春季增刊南洋號《實業之日本》18：7（1915.3）。

⁹⁷ 舉例來說，1915 年 8 月舉辦第一回南洋觀光團，當時的各大新聞均報導這群遠道而來的南洋島民。見河西晃祐，〈南洋協會と大正期「南進」の展開〉，《紀尾井史學》18 号（1998.12），頁 41。與觀光有關的議題，將於下一節詳述。

⁹⁸ Robert T. Tierney,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pp. 9-11.

民被收編至日本帝國麾下，成為國人想像南方野蠻異域的新投射對象。在此也可發現，隨著時間推進，無論是純真無垢，抑或是凶暴嗜血的原始形象，在地域、程度上也跟著轉變，但始終停駐在這群南方的異己身上。

日本人對南方異己的想像，並不隨著殖民地臺灣理蕃計畫的結束而停止。隨著日本帝國擴張自身勢力，廣大的南方異域成為日本人套用、操弄族群標誌的投射區域。而臺灣和南洋群島的原住民，也雙雙納入日本人的異己想像體系之中，參與、影響了近代日本帝國的形塑。經歷過幾次國際戰爭的勝利，與國家對自身社會的整肅與淨化，大正年間的日本已不若明治時期那樣的不安與自卑。五年理蕃計畫的結束，更帶給了統治者日本信心。如今的日本，帶著更高的自信，將帝國之眼望向未知的南方，找尋著下一批等待被馴服的南方野蠻人。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仍未完成。

第三節 珍客行蹤

前兩節討論臺灣蕃人在日本人心中的族群形象，並探討當族群形象成為一種卸不掉的標誌後，如何配合不同時期官方的政策需求，轉變、強化其負面野蠻特質，最終促成文明與野蠻的兩極對立之姿。另外，新聞媒體不斷地再生產這些族群標誌，並散布給內地未曾實際接觸蕃人的日本民眾，使他們得以形塑對遙遠南方蕃人的野蠻形象。

然而，內地民眾想像認識南方異己的途徑，並非只能透過新聞上的文字、圖像而已，透過博覽會的舉辦，帝國周邊的不同種族得以齊聚一堂，以實體形式與日本群眾面對面接觸，帶來的文化衝擊與異己想像也更為強烈。⁹⁹ 另外，邀請遠在臺灣、南洋群島等南方異域的在地土人、蕃人前往內地觀光，也是一種能實際接觸蕃人的途徑。內地觀光團的成立，使民眾得以感受「野蠻人身處文明世界」的對立衝突，其蘊藏的娛樂話題性更是不言可喻。各大新聞往往以連載方式，時刻更新觀光團的行蹤旅程，並記錄其間發生的諸多新奇小事。而野蠻與文明不斷撞擊、迸出火花的過程，不僅轉變了這些「南方珍客」對世界的理解，對日本人而言，更是一種認識自我文明、感受自身優越性的集體經驗。

本節將以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前，至 1914 年五年理蕃事業告一段落，期間的幾次大型內地觀光作為主軸，並以日本人為主要探討對象，透過大眾媒體的新

⁹⁹ 有關博覽會的研究，可見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田弘文館，2003）；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05）。

聞報導，分析民眾在實際面對異己時的心理感受。對日本人而言，在不同時期遠道而來的南方珍客，其遊歷日本的所見所聞，分別代表了怎樣的意義？而當南方來的異己，造訪一個正在蓬勃壯大的新興亞洲帝國，他們又是如何幫助這群日本人理解自我？以下將先簡介各時期前往日本的觀光團行程性質，並分析內地新聞如何報導、日本人如何想像這群南方珍客，最後將內地觀光放入近代日本帝國形成的脈絡之中，解釋其所代表之意義。

一、 各次內地觀光之介紹

（一） 1893 年南洋王弟參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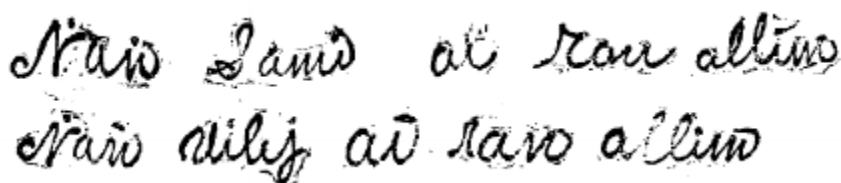
自明治期以來，日本重新打開國門，海外各地的人群陸續前往日本，其中尤以西洋人為大宗。但位於南洋地區的土人，多半無法主動造訪日本，必須倚賴其他國家的力量，才得以離開自身家鄉。另外，這些土人並無近代的觀光概念，因此若是離鄉出海造訪他國，也多半是被動的「受邀」，甚至是以奴役販賣的形式進入他國。在日本殖民臺灣、得以實際邀請臺灣蕃人至內地觀光之前，曾有一次接待南洋土人遊歷日本的經驗，此次經驗更因土人的王族身分，使國內大眾格外重視此事，以下將透過當時的新聞報導概述其過程。

1893 年 5 月，位於南洋的日本商會負責人小美田利義邀請特拉克島（Truk Island，今楚克島）的王弟桑米（Sami）及其隨從烏里斯（Uilij）兩人至日本參訪。一行人搭乘商會的第一天祐丸號，於 22 日上午抵達橫濱，並於其後展開東京的參訪行程。¹⁰⁰ 這兩位南洋珍客特地造訪日本，引起東京民眾一陣騷動，新聞記者特地安排了王弟桑米的專訪。

記者首先描述王弟及隨從的衣著服飾、以及外貌年齡，另外也提及桑米在特拉克島的勇猛事蹟，以及王弟通曉一些英、日語，甚至會以羅馬字書寫等等。在詢問王弟為何要造訪日本時，桑米表示殖民該島的德國商人想壟斷該島貿易，排除當地的日本商人，因此不斷詆毀日本，不但說日本是個貧弱的小國家，甚至沒有保護該島土人的軍事能力。不過桑米也表示，他們與日本商人長期貿易，雙方早已建立互信關係，但因為想親眼看看日本，以戳破德國商人的不實謊言，因此

¹⁰⁰ 〈南洋貿易会社の商船が南洋群島の王弟乗せて横浜に入港 積み荷はコブラと鼈甲〉，《読売新聞》，1893 年 5 月 23 日，朝刊，第 2 版。

才請小美田氏安排此次參訪行程。¹⁰¹ 另外，王弟希望回國後能帶一些日本文物回去，讓當地社會也學習日本維新。¹⁰²



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Japanese calligraphy. The text is written in two lines. The first line reads 'New Land at Tan allino' and the second line reads 'New Niliy at Tan allino'. The handwriting is fluid and cursive, typical of the Meiji era.

圖 3-3-1 王弟桑米與隨從烏里斯的簽名

圖片來源：《読売新聞》，1893 年 6 月 2 日，朝刊，第 2 版。

除了專訪王弟，記者也連日追蹤報導這群珍客在東京的參訪行程。舉凡王弟參觀銀座、歌舞伎町等遊廓場所，與有識之士的聚餐會面、或是兵工廠、造船所等軍事設施，新聞都會詳細提及王弟二人在各景點的一言一行。另外，王弟一行的飲食、起居等瑣事，特別是因與日本風俗不同而鬧出的大小風波，也都成為娛樂話題並刊登在新聞上。在一個多月的參訪行程後，王弟二人於 6 月 26 日下午搭火車前往橫濱，並於 27 日搭船返回故鄉特拉克島，結束了前後共 37 天的日本首都之旅。¹⁰³

王弟桑米的參訪行程之所以特別，是因為這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有王族身分的南洋土人前往日本，無論是外交地位或是族群身分，都很容易成為大眾討論的話題。日本人也格外重視此事，從報社記者特地專訪，及有力人士的邀約聚餐可得知這一點。但這次的參訪，並非日本政府主動邀請，而是由民間的日本商會發起，因此這不是一次正式的國際外交。¹⁰⁴ 這說明南洋王族之所以能夠前來日本，背後實牽涉了南洋在地商人團體的經濟利益，這點又可與前一章提及的明治二十年代南洋拓殖熱潮相互呼應。王弟桑米等人的來訪，也成為日本殖民臺灣之前，一次與南方土著在內地接觸的寶貴體驗。

¹⁰¹ 〈トラック王弟一行の談話〉，《東京朝日新聞》，1893 年 5 月 30 日，朝刊，第 2 版。

¹⁰² 〈南洋トラック島王弟サンミ主従を麻布の寓居に訪う〉，《読売新聞》，1893 年 6 月 2 日，朝刊，第 2 版。

¹⁰³ 〈南国の珍客サンミ一行が「天祐丸」に乗り帰国へ〉，《読売新聞》，1893 年 6 月 28 日，朝刊，第 3 版。

¹⁰⁴ 事實上，桑米的王族身分，在桑米一行人回國後也受到質疑。讀賣新聞根據特拉克島在地日本人的投信，揭發桑米等人其實只是日本會社所雇用的在地土人，並非特拉克島的王族。〈「サンミは王弟ではなく、日本の会社の雇い人」／トラック島の邦人から手紙〉，《読売新聞》，1893 年 11 月 25 日，朝刊，第 1 版。

（二）1897 年臺灣蕃人內地觀光

1895 年日本殖民臺灣，帝國也首度統治了這些位於南方的有色異己族群。撇開殖民政府對蕃地的統治不談，這件事對內地日本而言，代表好奇的民眾有機會實際接觸帝國內部的這群南島土人。因此早在官方舉辦內地觀光團之前，1896 年底就發生三名澤利先族（ツアリセン）蕃人被日本人誘拐，至東京供人觀賞並收費的事件。¹⁰⁵ 這件事說明了臺灣蕃人對內地民眾而言有巨大的吸引力，使其甘冒風險誘拐蕃人到內地，滿足大眾的好奇慾望。而內地於同年 12 月 5、6 日，也出現報導這三名蕃人供人觀賞時，民眾爭相圍觀，看蕃人唱歌跳舞、投鏢作樂的新聞，這是近代日本新聞首次刊登「殖民地臺灣蕃人出現於內地」的報導紀錄。¹⁰⁶ 在討論日本對臺理蕃政策的同時，也必須注意領臺之初，這股內地民眾對臺灣蕃人的強烈窺視慾望。

隨著乃木希典總督上任，總督府對臺灣蕃人的誘導懷柔政策內容方顯清晰，其中建議「勸誘蕃人參觀臺北或日本內地文物」一項，實際體現即為 1897 年試辦的蕃人內地觀光。¹⁰⁷ 1896 年 6 月，總督府接受陸軍步兵中尉長野義虎之建議，向各縣廳發出照會，「勸誘轄內蕃社各頭目以上使其上京，並使其視察內地狀況，以為化育之手段」。後因經費問題，僅挑選了約 10 名親日蕃社頭目及有力者前往日本。¹⁰⁸ 一行人於 8 月 1 日由各撫墾署官員帶往臺北，並在翻譯、日人通事、民政局技師及軍醫等人的陪同下，於 3 日下午自基隆港搭船前往日本觀光。¹⁰⁹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觀光所挑選的蕃社頭目，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其親日傾向，或是溫和的態度。這些頭目有的曾幫助日軍攻打漢人，有的則以和平處理部落事端著稱。¹¹⁰ 亦即這群人之所以雀屏中選，是因為他們是總督府眼中「可

¹⁰⁵ 〈蕃人ノ誘拐二対スル処分〉，《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32。日治時期的澤利先族即為今日之魯凱族，源自於魯凱語的 Kacalrisiane 自稱，在清代也被漢人音譯為「傀儡」番。此族群稱呼一直沿用至 1935 年，才由移川子之藏改名為魯凱族。

¹⁰⁶ 〈生蕃見物〉，《読売新聞》，1896 年 12 月 5 日，朝刊，第 3 版；〈台灣土人の見世物〉，《読売新聞》，1896 年 12 月 6 日，朝刊，第 3 版。在此必須注意，新聞在提及蕃人內地觀光時，多半以「生蕃」一詞統稱蕃人，以與漢化程度較高的熟蕃區隔，強調其野蠻未開的原始形象。但為了行文一致，本節仍以「蕃人」指稱這群赴日觀光的生蕃。

¹⁰⁷ 臺灣總督府民政本部蕃務本署，《理蕃概要》（1913.5），頁 51。

¹⁰⁸ 參與此行之各頭目履歷，可見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7-14。

¹⁰⁹ 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26。

¹¹⁰ 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5。另傅琪貽指出，此次蕃人內地觀光之規劃，實與乃木希典的「三段警備制」，及長野義虎提出的「義勇蕃隊」構想有關。為了厚植在臺軍事力量，以求早日消滅漢人抗日勢力，必須盡可能攏絡生蕃，使蕃人化為輔佐日軍、維護山區治安之軍事組織。見傅琪貽，〈誘導「嚮往文明」之旅：1897 年臺灣「蕃人內地觀光」〉，《文化越界》，

成功教化綏撫」的一群蕃人。此次由官方首度舉辦的內地觀光，帶著強烈的綏撫教化意圖。

另外，對日本官方而言，這也是第一次由他們主辦，邀請臺灣蕃人前往內地觀光。因此，有關蕃人水土適應、飲食限制、風土民情等旅行須注意事項，官員們也在行前特地告知隨行人員。特別是官員一再強調，此次內地觀光之目的，是要塑造蕃人對日本的良好印象，因此隨行人員必須像「教導貴族子弟的家庭教師」一般，保持一貫的親切與極大的耐心來伺候蕃人。¹¹¹ 另外，也不能讓蕃人感受到日本人歧視、辱罵、拘束、嘈雜等不良印象，日本內地與蕃人風俗相牴觸的文化，例如女人服侍在側的風俗，也必須禁止。¹¹² 簡而言之，此次內地觀光行程的重點在於厚植蕃人親日情結，因此日本人必須盡力表現得友善且「文明」，極力屏除自身不雅的「野蠻」行為，也不能讓蕃人感受被日本人歧視。換言之，在籠絡蕃人的政策需求之外，這也是一次日本人展現自身文明的機會。

臺灣蕃人一行於 8 月 6 日抵達日本長崎，並沿瀨戶內海航行，於 9 日抵達神戶港。10 日從神戶搭火車前往東京，並於 11 日正式入京。在首都停留 10 天之後，於 21 日離開東京前往橫須賀、大阪，最後於 28 日下午自長崎搭船返回基隆港，結束其在內地的 23 天行程。與前次王弟來訪相同，新聞均報導臺灣蕃人觀光團首次入京的消息，也同行跟隨、紀錄旅程中與蕃人相關的大小事件。¹¹³ 此次行程包括接受乃木總督在帝國飯店接見、岸田吟香在上野公園接待、參觀皇居前二重橋、上野博物館和淺草，以及參觀當時東亞最大的紡織工廠鐘紡等項目，另外也包含了參觀練兵場、砲兵工廠等軍事設施。另外，在蕃人回臺灣之後，新聞也刊登了他們對此次觀光行程的感想，內容多半是稱讚、羨慕日本之言。¹¹⁴

若根據隨行的民政局技師藤根吉春於行後留下的《蕃人觀光日誌》中可得知，蕃人們對這次的內地觀光之旅其實多有不滿，原先安排的天數行程也因蕃人歸心似箭，而刪減為 23 天。¹¹⁵ 從後來蕃社頭目們急著回鄉的反應可得知，總督府的

頁 50-52。

¹¹¹ 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20。

¹¹² 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19。

¹¹³ 讀賣新聞於 8 月 18 日朝刊的第 3 版，即以大篇幅報導蕃人此次內地觀光。包括其出發前的狀況、參訪內地的理由、蕃人之間的相處、各蕃社的特質差異，甚至連深夜嬉鬧喝酒的事情也悉數報導。見《読売新聞》，1897 年 8 月 18 日，朝刊，第 3 版。

¹¹⁴ 〈回台後の觀光生蕃人〉，《読売新聞》，1897 年 9 月 27 日，朝刊，第 2 版。

¹¹⁵ 臺灣蕃人於 8 月 16 日表達強烈的返臺意願，並稱病不肯進行當日行程，因此自 17 日開始，日本官方改變後來的行程，並集中以參訪軍事設施為主。由此可知，軍事設施是日本官方希望蕃人參觀的主要部分，目的是為了體現日本身為軍事強國的實力。見傅琪貽，〈誘導「嚮往文明」

攏絡生蕃手段似乎失敗了，之後也因經費問題無法持續舉辦，但蕃人的確已受到日本近代文明的衝擊。¹¹⁶ 更重要的是，內地民眾也藉由此次機會，得以親眼窺見帝國新統治的臺灣蕃人舉止面貌。作為殖民母國日本人與殖民地臺灣蕃人在內地的首次接觸，此次的內地觀光行程的確有其特殊意義。

（三）1911-1912 年四次蕃人內地觀光

隨著總督府對蕃人蕃地政策逐漸轉趨嚴厲，初期以綏撫、培植親日勢力的對蕃人態度也逐漸淡化，並轉為以威壓為主的理蕃政策。不過以內地觀光來綏撫教化蕃人的想法，依舊出現在總督府官員的討論中。五年理蕃事業開啟之時，主其事的蕃務本署長大津麟平即曾提出讓以宗教薰陶蕃人，或舉辦內地觀光讓蕃人得知日本軍隊的強大，使其產生恐懼並放棄抵抗等建議，但都被佐久間佐馬太總督斥為是遙遠的空想計畫，無法收立竿見影之效。¹¹⁷ 但當 1910 年第二期五年理蕃計畫開啟，在鑑於前期理蕃失敗的錯誤經驗，外加獲得天皇支持、以及經費充裕的狀況下，內地觀光的政策方成為可能。¹¹⁸

1911 年 4 月，相隔十餘年的內地觀光再次開啟，本年適逢「京都本派本願寺宗祖大師六百六十五回忌法會」，總督府乃議定舉辦，並將之定為第一回蕃人內地觀光。¹¹⁹ 此回招募對象為泰雅、鄒、排灣與阿美各族之頭目，但最後僅募得 10 名蕃社頭目成行。一行人於 4 月 1 日自基隆港出發，至京都本願寺、大阪練兵場、砲兵工廠、大阪城、天王寺、枝光製鐵所、小倉製紙廠等地觀光，並於 21 日返臺，結束前後約三個禮拜的行程。¹²⁰

同年 8 月，由於前次觀光之宣傳成效頗佳，總督府迅即再次舉辦第二回內地

之旅：1897 年臺灣「蕃人內地觀光」》，頁 59。

¹¹⁶ 頭目們急著回鄉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發覺日本當局違背當初答應前往日本的條件，即與天皇見面，以及向日本索取槍枝作為伴手禮。雙方的折衝過程，在《蕃人觀光日誌》中也有明確的紀錄。傅琪貽認為，這群蕃社頭目將自己定位為外交交涉人員，是替族人考察、確定日本人與日本國的文化特質，是以接見日本最高政治首領天皇並不為過；而槍枝是維繫部落社會生存的重要工具，因此日本當局不斷推託此事，讓蕃社頭目對日本官員失去信心，因而決定盡快返鄉。有關蕃人想法的相關分析，見傅琪貽，〈誘導「嚮往文明」之旅：1897 年臺灣「蕃人內地觀光」〉，頁 69-72。

¹¹⁷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臺灣之計策》，頁 261。

¹¹⁸ 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頁 43。

¹¹⁹ 此指五年理蕃事業下第一回的內地觀光，日後官方檔案在描述觀光行程時也以此次為首，並悉數編號。鄭政誠並將 1897 年的內地觀光視為總督府「試辦」的內地觀光。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頁 46。

¹²⁰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第一回內地觀光蕃人ノ歸台〉，《理蕃誌稿》第二卷（東京：青史社，1989[1921]），頁 195-198。

觀光。此回招募的對象包含全臺高山族，最後共募得 43 名蕃人，依然是以各社頭目、巡查捕、雇員、教員為主。與上次不同的是，此次參與名額多有限制，較上次募不到人的狀況有所不同，顯現蕃人對前往內地觀光一事越來越熱衷。一行人於 8 月 15 日由基隆港出發，並於 19 日抵達神戶港後，展開為期一個月馬不停蹄的參訪行程，包括神戶、大阪、京都、名古屋、東京、岡山、廣島等地，參觀設施則有寺廟神社、軍事設施、動物園、博物館、學校、產業公司與工廠等等。¹²¹ 本次觀光團於 9 月 20 日離開日本，並於 23 日抵達臺灣，結束參訪行程。

由於此次參訪內地的蕃人數目較多，行程天數與範圍也較上次廣，因此相關的新聞報導也較上次為多，因此可以從中看出與明治期蕃人觀光新聞呈現方式的不同之處。進入大正時期的新聞，與 1897 年時的蕃人參訪新聞相比，可發現此時的新聞已開始刊登蕃人參訪的相關照片，包括蕃人臉上的刺青，身上的服飾，或是參觀練兵場時臉上的表情等等，都能一覽無遺。新聞刊登現場相片，使民眾即使未能親臨現場，也能實際感受蕃人的存在。



圖 3-3-2 人力車上的生蕃

圖片來源：《東京朝日新聞》，1911 年 8 月 30 日，朝刊，第 5 版。

¹²¹ 〈蕃人ノ内地観光（第二回）〉，《理蕃誌稿》第二卷，頁 251-253。



圖 3-3-3 新橋停車場前的生蕃

圖片來源：《東京朝日新聞》，1911 年 8 月 30 日，朝刊，第 5 版。

除了相片，有時記者也刊登現場素描，提供了另一種呈現蕃人面貌的方式。因應大眾社會時代的來臨，使媒體新聞的角色更為重要，民眾越來越有能力，也越來越有興趣追求娛樂與獵奇資訊，使此時期的蕃人內地觀光更受重視。因此，不僅回顧式報導，此時期的新聞也會提前刊登預定觀光日程表，以供想親臨現場的民眾按「表」索驥。¹²²

生蕃觀光日程	
主催に係る同島北蕃各社の生蕃五十名 より成る内地視察團の一行は十月一日基隆出帆の大坂商船會社汽船等戸丸に便乗し門司に向ひたるが来る四日同港上陸後の觀光日程左の如し	
△四日門司着△五日神戶上陸、京都着△六日京都滞在（妙心寺、本願寺參觀）△七日伏見第十六師團・大津疏水工事視察△八日京都發東京着△九日滞在（近衛師團參觀）△十日同（砲兵工廠板橋小銃製造所參觀）△十一日同（世田谷谷砲兵聯隊參觀）△十二日折廻博覽會參觀上野動物園博物館參觀△十三日同淺草公園其他觀覽△十四日同赤羽工兵廠參觀△十五日休息△十六日東京出發名古屋着△十七日名古屋第三師團參觀△十八日名古屋發大阪着△十九日大阪第四師團砲兵工廠參觀△廿一日大阪發廣島着△廿二日廣島第五師團・重砲兵聯隊參觀△廿三日吳鎮守府參觀△廿四日廣島發門司着△廿五日小倉第十二師團參觀△廿六日枝光製鐵所參觀△廿七日休息△廿八日門司乘船△廿九日基隆歸途	衛一行中には十數名の生蕃婦人を同道する筈にて右は蕃務本署に於て從來の効果を鑑み特に一行に加へたるものなり尙ほ同總督府よりは警部飯島幹太郎氏以下數名の蕃務署巡查隨行する由

圖 3-3-4 第四次蕃人內地觀光行程表

圖片來源：《読売新聞》，1912 年 10 月 10 日，朝刊，第 3 版。

¹²² 1912 年的第三、四回蕃人內地觀光，新聞都曾刊登該次內地觀光的日程表。〈生蕃觀光團 来廿九日上京すべし〉，《東京朝日新聞》，1912 年 4 月 20 日，朝刊，第 5 版；〈生蕃觀光日程〉，《読売新聞》，1912 年 10 月 3 日，朝刊，第 3 版。



圖 3-3-5 生蕃素描

圖片來源：《読売新聞》，1912 年 10 月 3 日，朝刊，第 3 版。

由於此次蕃人參訪的地點遍及日本各地，因此以東京在地新聞為主的讀賣、朝日等報社對蕃人觀光的記載，也以蕃人停留東京的幾天、即 8 月 28 日至 9 月 6 日為主。¹²³ 從蕃人新聞的集中報導可發現，此時期的新聞採訪範圍具有很高的地域性，脫離採訪範圍以外的地區新聞，就不易獲得即時訊息。新聞呈現性質的轉變，正說明了時代的變遷與侷限。

據本次返臺的蕃人表示，實際目擊日本內地之雄大，歸社後多感到悸動魂飛，茫然自失，官方認為對感化蕃人言行助益頗大。¹²⁴ 有鑒於此，總督府於翌年（1912 年）4 月再次舉辦內地觀光，並以泰雅族各社頭目、副頭目及勢力者為主要召集對象，最後一共募集 53 名。內地新聞也提前報導此事，並強調基於上次觀光成果的優良，本次觀光招募對象將以「南投以北的兇蕃泰雅族」為主。¹²⁵ 從新聞的敘述可知，此次舉辦觀光的主要感化對象，是被喻為「兇蕃」的泰雅族蕃人，因此在行程安排上也與前次觀光有所不同，多以軍事設施為主。而新聞描述特地強調兇蕃，也向大眾預示、強調此次觀光蕃人的野蠻未開性質。

¹²³ 以東京朝日新聞為例，與第二次內地觀光有關的新聞，第一篇是 8 月 22 日來自大阪的蕃人觀光報導，接下來從 8 月 30 日至蕃人離開東京的 9 月 6 日，每天都有二至三則報導蕃人觀光的新聞，之後直至 9 月 24 日，才出現一則報導蕃人們離開日本後，在船上交換內地觀光心得的新聞。

¹²⁴ 臺北州警務部編，〈蕃人內地觀光〉，《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下編（1）》（臺北：臺北州警務部編印，1924），頁 220。

¹²⁵ 〈生蕃觀光團 來廿九日上京すべし〉，《東京朝日新聞》，1912 年 4 月 20 日，朝刊，第 5 版。



圖 3-3-6 第三次蕃人內地觀光之生蕃

圖片來源：《讀賣新聞》，1912 年 4 月 30 日，朝刊，第 3 版。

第三回內地觀光團於 4 月 23 日自基隆出發，於 27 日抵達神戶，並於 29 日抵達首都東京。¹²⁶ 在東京參觀砲兵工廠、帝國大學、近衛師團、士官學校、赤羽工兵隊及橫須賀港等景點後，於 5 月 8 日離京前往名古屋、奈良、京都、大阪等地，參觀各地師團及軍事工廠、寺廟等景點，最後於 5 月 24 日搭船離開日本，於 27 日返抵基隆港。若根據新聞刊登的蕃人觀光行程表可以發現，此次參訪行程絕大部分都是軍事相關的設施，各大城市的師團、武器工廠以及橫須賀、吳鎮守府等軍事海港，都被排入此次觀光參訪的行程之內。此與上一次蕃人內地觀光的性質已有明顯不同。

本次內地觀光還有一項與前幾次觀光非常不同之處，那就是首度有蕃人婦女隨團擔任翻譯，此名婦女即為泰雅族傳奇女性ヤジュツ・ベラヤ。之所以為傳奇，在於他是日本人的妻子，且當時就讀於艋舺公學校，是一名識字的蕃人女性。¹²⁷ 因

¹²⁶ 《理蕃誌稿》第二卷收錄的〈蕃人內地觀光（第三回）〉中，記載本次觀光團於 4 月 30 日自基隆出發。但根據內地新聞 26 日刊載的蕃人觀光行程，蕃人觀光團於 23 日即已從基隆出發，26 日已抵達日本；而於 30 日，新聞更刊登生蕃入京的照片，因此理蕃誌稿所載之出發日期應為訛誤。〈生蕃觀光日割〉，《東京朝日新聞》，1912 年 4 月 26 日，朝刊，第 5 版。

¹²⁷ ヤジュツ・ベラヤ為頭目之女，生於 1885 年，15 歲時與當地樟腦會社的藥劑師中野忠藏結婚，後來也進入艋舺公學校就學，此次擔任翻譯的他正值 27 歲。ヤジュツ・ベラヤ後來畢業後，還擔任蕃務本署的僱員，並從事蕃語調查工作，也負責教授蕃地警察泰雅族語，後於 1933 年病歿。見伊凡諾幹，〈近代教育與'tayal'【msbtunux】初探——殖民主義、近代化與民族的動態〉，收於莊萬壽、林修澈、鄭瑞明、陳獻明編輯，《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等發行，1998），頁 159。

應本次觀光均為泰雅族蕃人，因此由通曉日語的他擔任隨團翻譯，也趁著此次參訪機會與內地的丈夫相聚。這個故事對報社來說，簡直是不可多得的一則娛樂新聞，因此報紙逕以「美婦ベラヤ之戀」、「美麗的戀愛故事」為題，大肆宣傳日本男性與蕃女的浪漫物語。¹²⁸

報導內容從日本人中野忠藏入蕃地採藥開始講起，當中野遭蕃人捕捉性命垂危之際，ベラヤ勇敢挺身而出解救中野，兩人因此相戀並結為連理。但後來由於中野生病，必須回京都療養，因此ベラヤ與丈夫只能相隔兩地。而藉由此次內地觀光的機會，終於得以跟丈夫相聚。¹²⁹ 由於此則故事具有足夠的衝擊性與新聞價值，報導刻意美化、誇大兩人如膠似漆的深厚情感。除卻故事本身不談，本次觀光是首度有蕃人女性隨團參訪，因此新聞對蕃女的樣貌、服飾、體態均多所關注，顯示了日本人對女性異己的好奇想像，蕃女也成為日本描寫臺灣蕃人蕃地時，時常圍繞、詮釋的話題對象。¹³⁰

ヤジュツ・ベラヤ的隨團參訪引發了內地高度關注，因此總督府在同年 10 月再度安排第四回蕃人內地觀光時，便首度開放蕃人女性加入。最後總督府選出男性 39 名、女性 4 名，一共 43 名蕃人，組成第四回蕃人觀光團，並於 10 月 1 日自基隆港出發。除了蕃女加入觀光團之外，本次之所以舉辦內地觀光，也與同年 9 月新竹廳轄內發生的太田山事件有關，招募對象均以發動事件的泰雅族為主。¹³¹ 總督府也曾表示，之所以僅讓泰雅族觀光，是因太田山事件後，彼等可能還有企圖不軌之心，因此必須加以威脅，使其有所警惕。¹³² 因此可以想見，本次的觀光行程之重點參訪行程，仍多以軍事設施為主。

一行人於 10 月 4 日抵達日本，先在京都停留，參觀本願寺等景點，隨後前往首都東京，參觀近衛師團、砲兵工廠等軍事設施，也順道參觀了上野博物館、動物園、淺草公園等地。16 日離開東京後，先後至名古屋、大阪、廣島、小倉等地

¹²⁸ 〈美しき恋物語〉，《東京朝日新聞》，1912 年 4 月 30 日，朝刊，第 5 版。

¹²⁹ 〈美婦ベリヤの恋〉，《読売新聞》，1912 年 4 月 30 日，朝刊，第 3 版。

¹³⁰ 女性與異己想像的關係，與薩依德《東方主義》一書中所提及的概念可相互呼應。見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志宏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文化，1999），頁 307。

¹³¹ 太田山事件指 1912 年 9 月發生於新竹廳樹杞林（今竹東）支廳內的泰雅族那芝（ナジ）與馬利克灣（マリコワン）群，因日本人五年理蕃事業中隘勇線推進使其居地減少，因而襲擊日人的反抗事件。族人於 9 月 11 日向李嶼山隘勇線駐警發動攻擊，並攻陷山下的太田山砲台，後來日軍增援部隊到達才平息該次攻擊。14 日颱風來襲，馬利克灣群又趁機攻佔分遣所，17 日更大舉攻入太田山至八五山一帶，總督府於 10 月 1 日終平定此事。此事件造成日軍戰死 36 名，受傷 17 名，槍砲彈藥被奪甚多，損失慘重。此事件遂使日方於翌年進行該二族群之征討。見〈新竹廳轄內太田山事件〉，《理蕃誌稿》第二卷上，頁 300-305。

¹³² 〈蕃人內地觀光（第四回）〉，《理蕃誌稿》第二卷，頁 331-335。

的軍事師團參訪，並於 28 日離開日本，31 日返回基隆。¹³³ 如前所述，此次觀光團中的四名蕃婦被新聞大肆報導，10 月 9 日的讀賣新聞更以「蠻地之花」比喻這群蕃婦，刊載有關蕃人女性的大篇幅文章。¹³⁴ 報導不僅詳細記載了四名蕃婦的姓名、外貌及服飾特徵，也刊登照片，還特別以「刺青美人的睡顏」為標題，描述這群「來自臺灣蕃地最兇惡種族泰雅族」的女性「慵懶入眠」時臉上醒目的刺青，為閱報讀者製造一種感官上的衝突對立。¹³⁵ 這群蕃人女性成功製造了新聞話題，也成為本次內地觀光團的一大特色。



圖 3-3-7 蕃婦肖像與服裝

圖片來源：《読売新聞》，1912 年 10 月 9 日，朝刊，第 3 版。

另外不可忽略的，就是此次觀光行程意味濃厚的軍事威壓意圖。從上一次針對泰雅族的內地觀光開始，參訪行程就多以軍事景點為主，而新聞也著重報導蕃人見到壯盛的日本軍隊陣容，及設備精良的武器製造工廠後，驚訝讚嘆的反應。¹³⁶ 另外，新聞也記載蕃女在看到日本女性於工廠工作的狀況時，發出「日本連女性都能製作鐵砲」的感嘆，甚至出現「還是早日歸順日本」的聲音。¹³⁷ 蕃人的驚訝讚嘆，除了是一種自然反應外，也正是日本官方所要的反應。而內地民眾透過這些報導的描述，也能與蕃人一同感受文明與野蠻二者相互撞擊下，那股強勁的後座力道。透過幾次的觀光行程，讓蕃人和日本人都能體會雙方文明的懸殊差異。

¹³³ 〈生蕃觀光日程〉，《読売新聞》，1912 年 10 月 3 日，朝刊，第 3 版。

¹³⁴ 〈蠻地の花〉，《読売新聞》，1912 年 10 月 9 日，朝刊，第 3 版。

¹³⁵ 〈刺青美人の寝顔〉，《読売新聞》，1912 年 10 月 9 日，朝刊，第 3 版。

¹³⁶ 舉例來說，第四次內地觀光安排蕃人參觀軍機飛行，當蕃人們看到頭頂上呼嘯而過的飛機時，都不禁驚嘆大叫。〈生蕃の飛行見物〉，《読売新聞》，1912 年 10 月 15 日，朝刊，第 3 版。

¹³⁷ 〈蕃女の感嘆〉，《東京朝日新聞》，1912 年 10 月 11 日，朝刊，第 4 版。



る觀を習演合聯の隊聯兵騎び及隊聯四衛近に場兵練木々代團蕃生

圖 3-3-8 蕃人參觀代代木練兵場之聯合演習

圖片來源：《讀賣新聞》，1912 年 10 月 11 日，朝刊，第 3 版。

在第四回蕃人內地觀光後，總督府即暫時收回此種綏撫手段，並轉為全力討伐專心攻打蕃人。另外，時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內地也無暇處理蕃人觀光事宜。直至五年理蕃事業與一次大戰告一段落，總督府才於 1918 年 4 月再次舉辦第五回蕃人內地觀光。¹³⁸ 內地觀光的性質也開始產生轉變，從五年理蕃時期的「威嚇」性質轉為以「啟發」為主的懷柔性質。¹³⁹ 但對內地的日本民眾而言，蕃人觀光造成的話題與娛樂性，以及對蕃人無窮的好奇心與獵奇想像，卻是不會輕易改變的。

二、 內地觀光之意義論述：發現、展示、劃分（3Ds）

觀光，是我者與他者之間的面對面接觸，也是文明與野蠻的碰撞交會。舉辦內地觀光，使多數無法親臨異域感受異文化的我者，得以在自家地盤近距離觀看一群野蠻異己：觀看他們與眾不同的外貌，觀看他們身處異地時的諸般好奇反應，更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觀看這群未開的野蠻人，如何面對優勢而強大的文明。在試圖貼近、理解近代日本不斷改造自我、追求文明的集體心態時，可從這

¹³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各種族蕃人觀光內地（第五次）〉，《理蕃誌稿》第三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1932]），頁 376-377。

¹³⁹ 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頁 61。

幾次的內地觀光行程中，窺見日本人面對野蠻異己時，態度及想法經歷了怎樣的轉變。當日本帝國望向南方異己人群的視線產生變化，也代表著原先被西方人視為野蠻的日本，又往文明那端靠近了一步。以下將論述此種帝國視線的三個轉變過程（3Ds），包括發現（Discover）、展示（Display）與劃分（Divide），並分別闡述其意義。

（一）「發現」野蠻（Discover savagery）

人們對異己的好奇心，是永無止盡的。從南洋王弟的來訪開始，每當有南方珍客造訪日本時，都聚集了許多好奇的民眾圍觀。新聞媒體捕捉民眾的獵奇心態，異己內地觀光因此具備了極高的新聞價值。而民眾圍觀的熱鬧場景，往往與這群珍客一起，成為記者報導呈現的對象：

29 日上午 7 時 20 分，從下關出發的列車在月台一停靠好，花了 5 錢購買月臺入場券的好奇觀眾們即齊聲大喊「來了來了！」大家騷亂著爭相攀抓車窗，但還看不見生蕃們的頭。終於，在隨行警部與巡查們的指揮下，53 名蕃人終於出現了！蕃人紅色的外衣下裹著同色系的披巾，垂掛在胸至腰間，從大腿到膝間則是黑褐色的素布，背上則揹著裝有桐油紙、菸草、火柴及蕃刀的網袋。蕃人們眼睛骨碌碌的看著相互推擠吵鬧的觀眾，茫然的站在原地。¹⁴⁰

舉凡每一次的內地觀光，都可以看到日本民眾爭相圍睹南方珍客的盛況，其間造成的混亂與嘈雜，甚至還成為當局要求隨行人員須格外留意之事項。¹⁴¹ 民眾想看的，自然是這群遠道而來的南方異己，生得是何等模樣。透過外觀鉅細靡遺的描述，使未能親臨現場的民眾，也能感受南方異己的特殊之處。大正期開始刊登現場相片，更使閱報民眾也能與現場圍觀的民眾一樣，獲得視覺上的直接衝擊。

另外，新聞在報導這群異己時，除了體格外貌與衣著服飾，諸如身分背景，以至於種族分類等專業知識，都會一同介紹。新聞會介紹王弟桑米故鄉特拉克島

¹⁴⁰ 〈生蕃觀光團の入京〉，《東京朝日新聞》，1912 年 4 月 30 日，朝刊，第 5 版。

¹⁴¹ 1897 年舉辦蕃人內地觀光前，林杞埔撫墾署市川雇曾列舉蕃人旅行的注意事項，其中一項就要求隨行人員注意「若在蕃人休息時，周圍聚集嘈雜群眾，必須立即喝斥其離開，勿讓蕃人遭民眾群集團觀。」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16。

的地理位置及風土民情，也會針對臺灣南、北蕃的性情差異進行概述。¹⁴² 有關這群南方珍客的一切知識，無論是否精確，都在此時彰顯其新聞價值，化作新聞報導內容，成為民眾認識這群異己的參考依據。唯有獲得的異己資訊夠多，體認這群人「與我們不同」的感覺才會夠強烈。

在感受雙方差異的同時，南方珍客的言行舉止，更進一步使日本民眾感受這群人「野蠻未開」的形象。王弟桑米在參訪東京時引發了一連串趣事，譬如當王弟第一次看到馬匹時，以為馬是會咬人的猛獸；準備豪華的房間供王弟休憩時，王弟卻寧可睡在髒亂的馬槽糧草堆旁，並認為這裡才是最舒適的房間；吃了好幾天豐盛的西洋料理與和式料理，問其最喜歡哪一樣食物時，王弟卻鍾愛蕃薯。¹⁴³ 王弟基於自身文化及知識，試圖理解日本這個新奇的異世界，但內地報導卻將此類文化衝擊以「南島人的嗜好真是非常奇妙」一語作結，以一種娛樂的眼光看待之。

諸如以上的敘述，不斷地出現在歷次內地觀光的新聞之中。日本民眾也在這一則則「奇妙」的報導中，逐漸去認識何謂「異己」。在這些南方異己面臨文化衝擊，展示自身既有價值觀的同時，日本人則以自身角度，將南洋珍客的反應歸類為一種奇妙的、「不正常」的行徑。¹⁴⁴ 與「正常」的我者不同，這群南方異己嶄露的所思所想，被當時正在定義文明、追求文明的日本套上價值評斷，而成為一種不文明的「野蠻」行為。從接觸南方異己、到認識南方異己，最終日本人也從這群南方異己身上，「發現」了何謂野蠻。

（二）「展示」文明（Display civilization）

在接觸南方異己，進而發現野蠻的同時，對日本人而言同樣重要的，是何謂文明的問題。什麼是文明？日本有怎樣的文明？對此時期的日本而言，最重要的是向全世界展現、證明自身擁有文明，對西方列強如此，對南方異己更是如此。那麼，當時的日本有什麼代表「文明」的事物，值得讓這群南洋珍客參觀？透過日本安排的內地觀光行程，我們可以發現日本人如何定義自身擁有的文明，並向野蠻「展示」文明。而定義、揀選文明的過程，透過內地觀光新聞的報導，使日本人也再一次的認識、形塑了自我。

¹⁴² 〈トラック島の位置〉，《東京朝日新聞》，1893年5月30日，朝刊，第2版；〈觀光の生蕃人〉，《読売新聞》，1897年8月18日，朝刊，第3版。

¹⁴³ 〈南洋の珍客厩と薩摩芋を愛す〉，《読売新聞》，1893年6月10日，朝刊，第1版。

¹⁴⁴ 在新聞娛樂化這些行徑、賦予其趣味價值的同時，也讓這些與我者不同的反應不再只是「不同」，而產生了價值判斷的意味。

總督府於 1897 年安排臺灣蕃人內地觀光時，曾列舉出五項安排參觀的重點：一、交通的便利，二、農村與農耕的發達，三、商業地的繁榮，四、工廠規模及大量生產物資，五、為數眾多的精良軍隊。¹⁴⁵ 為了讓臺灣蕃人感受內地文物的進步與繁榮，以收綏撫蕃人之效，總督府官員認為以上五項最能體現日本的近代化。就事後的報告來看，蕃人確實對便捷的火車、一望無際的稻田、繁榮的東京市容、生產眾多兵器的工廠以及軍容盛大的兵隊印象深刻，且多有讚嘆之聲。日後安排行程時，多半會將能展現上述項目的景點排入。

參訪過程中，觀光客對文明器物的讚嘆，也往往化作新聞報導的內容，將這份對文明力量的嚮往心態，進一步傳遞給所有閱報的日本民眾。例如，1897 年參訪日本的觀光團返臺後，新聞特地刊登了這些蕃人回臺後對內地的感想，包括「日本屋與臺灣屋之美醜，宛如雲泥之別」、「日本人跟蕃人一樣愛種樹，臺灣只會砍」、「日本米比臺灣米好吃」、「日本火車也應該在臺灣建設」等語。¹⁴⁶ 來自野蠻的讚許之言，除幫助日本民眾認識自身擁有的文明為何，也提升了日本人的文明自信心。不過，這份自信心並非一開始即有，而是經過一段累積的過程。十九世紀末的日本，與二十世紀初自信提升的日本，透過內地觀光展示自我文明的過程與心態也有所不同。

1893 年王弟來訪時，即便王弟所屬的特拉克島不能等同於近代意義上的國家，但日本人依然將其視為非比尋常的南洋土人代表，並煞有介事的招待王弟一行人。當時的社論曾呼籲大眾重視此事：

南洋的客人來訪，但大眾似乎未曾認真留意此事。雖然對方只是個針頭大的蠻島貴族，不足為談，但依舊是王族，我輩應以文明國人之禮節對待他們。此外若以南洋貿易為志向，彼輩將會是我未來的良友。……若透過交流革除彼等蠻風，漸次引進我國風俗，並影響週邊島嶼人民，我輩對南洋之貿易輸出將會是今日的好幾倍之多。是以有志於南洋貿易，不能因為其為蠻人，就懈怠與其締交，應以厚意待之，雙方之往來關係將是打開南洋貿易之鑰匙，我輩不可懷疑。¹⁴⁷

¹⁴⁵ 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21-22。

¹⁴⁶ 報導會將這些稱讚日本的言論用黑點在旁標示，代表報社「希望讀者特別留意」這些重點。見〈歸台後的觀光生蕃人〉，《読売新聞》，1897 年 9 月 27 日，朝刊，第 2 版；〈歸台後的觀光蕃酋〉，《東京朝日新聞》，1897 年 9 月 28 日，朝刊，第 7 版。

¹⁴⁷ 〈南洋のお客を如何にすべき〉，《読売新聞》，1893 年 6 月 4 日，朝刊，第 2 版。

從上述的文字看來，會呼籲以高規格招待王弟，與背後潛藏的龐大南洋貿易利益有關。另外，此時新聞也提醒日本人要以文明國人自居，並企圖革除南洋土人的蠻風。也就是說，不只是在西洋人面前要展現文明，即便是對待南方的野蠻人，也不能忘記身為文明國的禮節。此番言論清楚地展現了此時日本人亟欲投身文明，並與野蠻區隔的心態。

1897 年的蕃人內地觀光，前往內地的南方異己，已是帝國統治下的一員，因此日本人是以前統治者教化臣民的角度俯瞰臺灣蕃人，不再是先前面對王弟時的對等姿態。即便如此，此時的日本仍處在一個洗刷野蠻、戮力文明的過程，因此在安排內地觀光景點時，也只集中於當時最能展現文明力量的首都東京。即便如此，在蕃人參訪的過程中，還是有令日本人侷促困窘的現象產生。例如蕃人曾聽聞日清戰爭期間運送龐大軍糧的情形，便要求日方打開倉庫確認軍糧的多寡，幸虧當時遇到滿載米糧返航的小船經過，才未被揭穿倉庫空殼的實情。¹⁴⁸ 此外，新聞也刊登蕃人搭乘人力車在市中心巡遊，經過下層社會人民（應指賤民）身邊時，遭其惡言怒罵的窘況。¹⁴⁹ 這些事件均顯示了，當時的日本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文明國家，還無法穩定的對南方異己展示文明。

1911 年以降，為配合五年理蕃計畫而舉辦的四次蕃人內地觀光，則已可看見日本身為統治者及文明國的熟練與威壓氣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軍事武力。歷經日清、日露戰爭的接連得勝，軍艦、槍砲、師團等軍事相關器物，成為展現日本文明力量的最佳證明。蕃人們在見識到現場實彈射擊、部隊操練的盛況時，往往驚慌失措四處竄逃，毫不掩飾對近代軍事武力的恐懼。¹⁵⁰ 蕃人回臺後的反應，更體現了對雙方實力懸殊的感嘆：

飯島警部提及今年（1912）春天返回蕃社的生蕃觀光隊，曾發表了感想如下：一開始觀光團回到蕃社時提及內地，其他蕃人都認為他們是被日本人收買了，不相信觀光團員所說的事蹟，但後來都漸漸的相信。蕃人驚訝內地的日本人數目是如此之多，蕃社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此外砲兵工廠一日可製造幾千挺的鐵砲、幾千萬發的彈藥，而且不是人工作的，是機器製作的，人只需要在一旁看著。觀光團蕃人們說，如今在蕃地殺一個日本人，

¹⁴⁸ 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30-31。

¹⁴⁹ 〈付添官吏の心配〉，《東京朝日新聞》，1897 年 8 月 14 日，朝刊，第 1 版。

¹⁵⁰ 新聞在提及蕃人參觀軍事設施的過程時，一定都會描述蕃人的恐懼、震懾反應。類似敘述可見：〈生蕃の兵營見物〉，《東京朝日新聞》，1911 年 9 月 1 日，朝刊，第 5 版。

奪走一挺鐵砲，根本無法拿完日本人所有鐵砲。日本的蕃社（兵營）非常大，裡頭有無數軍隊，若是他們全部都來的話，我們將宛如山豬般被獵捕殆盡。根本無法抵抗呀。你們看著辦吧，我們已經打從內心放棄抵抗了。¹⁵¹

這些懼怕日本強大軍事力、打從內心放棄抵抗的臣服情緒，不僅是策劃理蕃的統治者所需要的反應，更是欲證明自身文明力的日本所需要的反應。

透過他者的反應，可以幫助日本我者塑造自我形象，從明治中期到大正初期，一次次的內地觀光，都是考驗日本展現文明實力的比賽擂台。這群黑皮膚的南方異己，正宛如一面大型試衣鏡。日本對其每一次的文明炫示，其實也反饋到自身，讓國內民眾看清自我的成長茁壯。展示文明不只對外，更同時對內。

（三）劃分野蠻與文明（Divide savagery & civilization）

在發現南方異己的野蠻、以及展示自我的文明後，日本我者與南方異己的差異就越趨明顯。而近代日本所要做的，就是加大這兩者間的差距，讓日本越來越脫離野蠻，越來越靠近文明。以來訪日本的南方異己作為標的，越是強化這群異己的野蠻、甚至負面形象，就越能反映日本的相對文明、優越。因此，新聞對這群客人觀光時一言一行的描述，從娛樂話題逐漸轉為具歧視意味的嘲諷。在五年理蕃時期討伐為主的政策下，對蕃人的負面描述最為強烈，在內地觀光時的記載更是如此。

舉例來說，1911 年 9 月，第二回蕃人內地觀光時，曾出現一則描述蕃人喜愛生飲牛血的報導。當觀光團一行人經過一間屠牛場時，一位名為ユーミン的蕃人突然進入，赤腳站在鮮血淋漓的石板上，跟屠夫討論宰殺牛豚的事情。除此之外，當ユーミン看到刀口汨汨流出的鮮血時，竟詢問屠夫為何要浪費這些血，還告知蕃人都將鹽放入生血中佐味，直接生飲。像這樣直接將血放掉，實在太可惜了。¹⁵² 生飲鮮血所象徵的野蠻意味，以及對宰殺牲畜的格外好奇，都一再地彰顯蕃人的嗜血、殘暴等野蠻負面特質。

1912 年 10 月，第四回蕃人內地觀光時，新聞甚至出現一篇以〈誰才是貓狗〉為題的報導，內容提及蕃人的生理學觀察：

¹⁵¹ 〈心から諦めた〉，《東京朝日新聞》，1912 年 10 月 9 日，朝刊，第 5 版。

¹⁵² 〈牛の血を欲しがる〉，《東京朝日新聞》，1911 年 9 月 4 日，朝刊，第 5 版。

生蕃的生理學觀察

記者跟隨目前停留在東京的生蕃隊，並觀察到以下幾則趣事：

1. 生蕃們到內地看見四處都群聚著小孩，說：「內地的小孩數目比大人還多，蕃人的小孩即使順利出生也多半天折，看來內地人跟貓狗一樣，能一次生三到四個小孩呢。」

前述是蕃人對內地人的生理學觀察，但仔細觀察蕃人，發現其中一位蕃女步行時露出痛苦之色，細問才知是婦人每月的生理現象所致。蕃地的習慣通常如貓狗一般，直接就地解決月事，但此次遠道而來，無法比照處理。之後即請人教導該婦如何處理月事。

2. 前幾日生蕃參訪騎兵團練兵，看見馬匹會聽從號令，大驚並道：「馬能通曉人類的話嗎？」臺灣蕃地不產馬匹，因此生蕃們看到馬術表演，才產生此等疑慮。此時一旁的巡查揶揄著：「馬生為野獸，都能夠聽懂人類的話了，你們明明就是人類，卻無法聽懂人話呢。」¹⁵³

雖然看似是觀光行程的一般趣事記錄，但本篇新聞以〈誰才是貓狗〉為題，透露出報社記者對此篇報導內容的立場。不僅將蕃婦就地處理月事的習慣喻為貓狗，甚至以「馬聽得懂人話」一語反諷蕃人蒙昧而難馴。諸如此類的歧視報導，不時地出現在後期描述蕃人內地觀光的新聞中。而這些負面描述，都一再地劃分了文明與野蠻，並拉大兩者距離，呈現兩極對立之姿。

綜上所述，透過舉辦內地觀光，近代日本歷經了一次「發現野蠻」、「展示文明」，最終「劃分野蠻與文明」的過程。南洋土人和臺灣蕃人，作為日本人共同的南方異己，不僅幫助近代日本發現野蠻，形塑、確立並展現文明，更在日本文明逐步成熟之際，成為被文明日本劃分、承受汙名的負面他者。

三、 1915 年南洋土人內地觀光

1914 年 10 月，日本佔領德屬的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並立即於隔年 7 月舉辦第一回南洋土人內地觀光團。若將此次觀光與 1897 年新領臺灣時舉辦的蕃人內地觀光做比較，可發現兩次觀光之舉辦目的，都是為了培植在地土著親日感情，方便日本對其進行統治。¹⁵⁴ 因此，日本利用南洋群島既有的酋長制，第一回內地觀光

¹⁵³ 〈何方が犬猫か〉，《東京朝日新聞》，1912 年 10 月 13 日，朝刊，第 5 版。

¹⁵⁴ 今泉裕美子研究軍政期（1914 年 10 月至 1922 年成立南洋廳）的觀光團，即指出此時期舉辦觀

團的招募對象，即以六大民政區（賽班、帛琉、雅浦、特拉克、波納佩、賈盧特）的各島酋長，或具有名望的在地人為主，共挑選出 22 名男性。¹⁵⁵ 一行人於 7 月初左右出發，於 28 日抵達橫濱港，展開共 18 日的內地觀光行程。

行程內容與先前的蕃人內地觀光大同小異，均包含了軍事設施、天皇宮城遙拜，以及與近代文明相關之設施景點。千住一曾分析這些觀光行程景點之意義：軍事設施的參訪，展現日本的優越性；宮城遙拜的安排，代表對日本統治的認同與順服；近代文明設施的參訪，則讓南洋土人體驗近代日本的新生活樣式。此三點也是日本舉辦觀光團、希望南洋土人體認的重點目的。¹⁵⁶

新佔領區的南洋島民要造訪日本，媒體新聞當然不會錯過這個訊息。東京朝日新聞在 7 月初時，即報導了南洋觀光團即將訪日的新聞，也一再宣傳此次的參訪將有助與未來日本對當地的統治，因此我國將盡力招待，將文明之智識注入當地。¹⁵⁷ 而當 28 日觀光團正式抵達日本後，全國各地新聞也記載此次觀光行程。¹⁵⁸ 對日本民眾而言，這是暨臺灣蕃人之後，新一批加入的帝國南方成員，因此行程中不時可以看見圍觀好奇的人群。¹⁵⁹ 與先前的蕃人內地觀光相同，民眾也可從新聞提前公布的行程表中，得知觀光團的行程，並提早到現場守株待兔。¹⁶⁰ 民眾的狂熱，及新聞對資訊的掌握，正宣示了近代日本大眾傳播社會的形成。¹⁶¹

光團，主要是為了培植在地酋長的親日感情，以方便防備隊的統治。見今泉裕美子，〈日本の軍政期南洋群島統治（1914-1922）〉，頁 9-11。另外，除了今泉的研究，Mark Peattie 與河西晃祐也曾論及第一回南洋內地觀光團，可供參考。河西晃祐，〈南洋協會と大正期「南進」の展開〉，《紀尾井史學》18（1998.12），頁 41；Mark R. Peattie, *Nany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in Micronesia, 1885-1945*, pp. 109-111.

¹⁵⁵ 第一回內地觀光團選拔之相關引用資料及分析，可見千住一，〈軍政期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觀光團の実態とその展開：占領開始から民政部設置まで〉，《太平洋学会誌》92（2003.10），頁 18-19。

¹⁵⁶ 千住一，〈「観光」へのまなざし——日本統治下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觀光團をめぐる〉，頁 131-146。

¹⁵⁷ 〈南洋新占領地から土人の觀光團が〉，《東京朝日新聞》，1915 年 7 月 3 日，朝刊，第 5 版；〈南洋の珍客來 觀光土人の顔触〉，《東京朝日新聞》，1915 年 7 月 14 日，朝刊，第 5 版。

¹⁵⁸ 根據千住一的研究，一共有《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毎日新聞》、《国民新聞》、《時事新報》、《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読売新聞》、《中央新聞》、《やまと新聞》等九大報。千住一並收集了各報的記載，匯集成行程表，見千住一，〈日本統治下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觀光團の成立〉，頁 60。

¹⁵⁹ 《中央新聞》報導在 8 月 1 日觀光團即將搭乘火車進入東京時，一群欲迎接珍客的市民很早就守在東京車站，等待觀光團的到來。《中央新聞》，1915 年 8 月 2 日，朝刊，第 3 版。

¹⁶⁰ 《やまと新聞》即公布了 8 月 1 日蕃人預定抵達東京的列車班次時間，為上午 10 時 30 分。精確的時間日程，使民眾更能掌握觀光團動向。見《やまと新聞》，1915 年 8 月 1 日，夕刊，第 4 版。

¹⁶¹ 千住一，〈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觀光團をめぐる「内的心情」〉，頁 45。

至此可以發現，內地觀光宛如一部劇本，每當有新的一批南方異己加入，日本都比照近乎相同的模式，將這群南方珍客帶往日本，參觀能展現文明的諸多景點，讓蒙昧未開的南方異己接受文明力量的洗滌。1897 年時的臺灣蕃人如此，1915 年的南洋土人也是如此。當然，隨著時代的不同，日本的文明力量存在著落差，景點安排也有所不同，但冀望從這群異己身上獲得自信的渴望心態，卻是不變的。透過內地觀光，日本不斷地與這群南方異己產生撞擊，從迸裂的火花中，試圖找尋自我的形影。

表 3-3-1 近代日本舉辦之內地觀光行程表

抵達 內地時間	離開 內地時間	參觀族群	參觀地點	參觀 團員 人數	內地 滯留 天數	備註
1893.5.22	1893.6.27	特拉克島土 人	橫濱、東京、 橫須賀	2	37	由日本商會邀請， 參觀地以東京為主
1897.8.6	1897.8.28	泰雅、布農、 排灣、鄒族	長崎、神戶、 名古屋、大 阪、東京、橫 須賀	10	23	由總督府官方首度 舉辦
1911.4.4	1911.4.18	泰雅、排灣、 阿美族	神戶、京都、 大阪、小倉、 枝光、東京	10	15	第二期五年理蕃計 畫中首度招募
1911.8.19	1911.9.20	全臺各地高 山族(雅美族 除外)	神戶、大阪、 京都、名古屋、 東京、橫 須賀、岡山、 廣島、小倉、	43	33	
1912.4.26	1912.5.28	泰雅族	神戶、橫須 賀、東京、名 古屋、京都、 奈良、大阪、 廣島、枝光	53	33	
1912.10.5	1912.10.28	泰雅族	近衛、伏見、 名古屋、大 阪、廣島、 吳、小倉各師 團及東京砲 兵工廠	50	24	太田山事件後，欲 威脅警惕泰雅族而 舉辦
1915.7.28	1915.8.14	密克羅尼西 亞六大地域 島民	橫須賀、東 京、日光、橫 濱、鎌倉	22	18	海軍防備隊舉辦， 以各島首長、親族 及相關人士為主

資料來源：根據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表 1-1，頁 55-56；

千住一，〈日本統治下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觀光団の成立〉，表 3，頁 60；藤根吉春編，

《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3-6；以及《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新聞史料整理而成。

第四節 進退兩難

二十世紀初，致力於促進美國有色人種權益的非裔美國學者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曾為其所處的時代困境，提出一個精銳的觀察：「二十世紀的難題，是膚色差別的問題。也就是皮膚白皙的人種，與那些位處亞、非、美洲諸大陸及海島上的皮膚黝黑人種，兩者之間的問題。」¹⁶² 的確，自十九世紀八零年代開始，帝國列強爭相劃分亞非地區的殖民地，並設立重重規範限制當地住民的權利；因應中國移民大批向海外發展，而興起「黃禍論」的恐慌；以至於一次大戰後，民族自決原則所引發的一系列動盪，若仔細探究原因，不難發現這些現象都與「人種」有關。膚色外貌作為最容易判別人群差異的標準，其引發的衝擊聯想與強大的排他性，深深左右著二十世紀的國際局勢。¹⁶³

以有色人種之姿崛起的新興帝國日本，從一開始就無法自外於人種議題的紛爭。自明治開國以來，日本即不斷承受著來自西方白色人種的壓力，但也企圖提升文明，向西方證明自身能力。這也是自第二章開始，即不斷複述的日本人集體心態。但無論物質文明如何精進，身為有色人種的「原罪」，終究是無法消除的。進入二十世紀，基於人種偏見而深化的東西對立衝突，日本宛如身處「黑」、「白」兩色互斥的邊界上。該繼續前進，還是後退？不斷追求提升，卻又深陷顏色迷思的日本，真的兩難。

本節將闡述世紀之交的日本，在開始感受自我文明提升、建立信心之際，又該如何面臨益發激化的國際種族衝突局面。作為帝國殖民者的日本，統治臺灣的成功，成為向列強展現自身文明實力的證明，更本質化麾下南方有色人群的劣等族群形象，將其劃分於帝國文明位階的底層；但到了國際間，作為有色人種的日本，又得面對白色人種連番投射而來的歧視眼光。本節即試圖呈現國內、外兩層種族對立關係中，日本人集體心態的諷刺與落差。同時，也希望透過分析去理解：當問題終究還是得回到「黑」、「白」人種的優劣差異時，始終擺盪其間的日本，該如何做選擇。

¹⁶² W. E. B. Du Bois, as cited in United Nations, Centre Against Apartheid, *International Tribute to William E. B. Du Boi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ed.), pp. 418-419.

¹⁶³ ポール・ゴードン・ロレーン (Paul Gordon Lauren) 著、大蔵雄之助譯，《国家と人種偏見》(東京：TBS ブリタニカ，1995)，頁 13-15。原書名：Paul Gordon Lauren, *Power and Prejudice: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8).

一、 追趕白色：前進文明的自信

西元 1905 年，日本史學評論及政治家，也是重要的南進論者竹越與三郎，於出版《臺灣統治志》一書的開頭，留下了這段非常重要，也常為後世研究者所引用的文字：

白種人很久以來就相信：拓殖尚未開化的疆土並為其帶來文明的恩澤，是他們所要擔負的責任。現在日本國民正從極東的海洋崛起，希望分擔白種人的大任。不知我國民果真是否具有完成黃種人的承擔之才幹？臺灣統治的成敗，可說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試金石。¹⁶⁴

這段文字點出了當時日本模仿歐美帝國，亟欲成為東洋新霸權的強烈企圖。對西方人而言，佔領未開化的地區，救贖落後的人種，是身為文明人的責任。而臺灣是日本第一個獲得的殖民地，無論國內或國外，日本政府都承受了極大的輿論壓力。臺灣統治的問題，成為試煉日本帝國是否具備殖民才幹的試金石。竹越撰寫這本書的目的，除了要向世人證明臺灣統治的成功，同時也要向西方宣示，歷經明治維新的日本，已具備發展帝國主義的條件。¹⁶⁵ 從日後國內新聞轉錄西方對此書的評價來看，其發言也多半站在肯定臺灣的立場。¹⁶⁶ 透過報導國外回流的評價，也能再一次地向國內人民宣傳殖民政府統治的成效。

竹越出版《臺灣統治志》的這一年，恰好正值日露戰爭爆發。當日本獲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後，無論對國內民眾，或是對國外列強，都是一次巨大的衝擊。十年前得勝的日清戰爭，在西方人眼中看來，只是一場東方有色人種之間的戰爭；但當身為有色人種的日本，在日露戰爭打贏白種人為主的ロシア帝國（俄國）後，儼然向世界證明了有色人種的正式崛起。而對國內日本民眾來說，打贏了與白種人的這場戰爭，更是令全國歡騰不已，彷彿為日本人的民族自信注入了一劑強心針。無論是對內的殖民地統治政績展現，抑或是對外的國際戰爭勝利，1905 年的日本，沉浸在樂觀的氣氛之下，也衝擊了以白種人為主的文明帝國之林。

¹⁶⁴ 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に題す〉，《台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頁 1。本段參照邱雅芳之中文翻譯，見邱雅芳，〈南方的光與熱——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的臺灣書寫與南進論述〉，《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6 期（2008.4），頁 196-197。

¹⁶⁵ 邱雅芳，〈南方的光與熱——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的臺灣書寫與南進論述〉，頁 197。

¹⁶⁶ 〈雜報 臺灣統治批評〉（一）、（三），《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14、16 日。

二十世紀初，是日本人逐步累積自信心的時代。脫離明治初期西方列強的環伺，與國內政局動盪的陣痛期，步入明治後期的日本，維新事業的成果逐步展現。而在殖民地臺灣，由後藤新平主導的諸般政策，更使原先被視為帝國一大負擔的臺灣成功轉型。不過此時的日本，仍須面對國內的財政問題。隨著對外戰爭的勝利，海外發展膨脹的聲浪益發壯大，但無論是陸、海軍的國防擴張計畫，或是對朝鮮、滿州等地的新領土經營，對當時倚靠外債為主的日本經濟而言，都是過大的負擔。¹⁶⁷ 在大正初年有關「北進」、「南進」的討論，即是以國防拓殖為主的北進論者，和開發南方富源振興經濟的南進論者之間的爭辯。¹⁶⁸ 在逐步累積帝國自信心態的此時，若無足夠的經濟實力，依舊是無法與西方並駕齊驅的。

而這樣的情況，直至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一轉先前的窘困，日本經濟突然迎來一片興旺繁榮。由於歐洲為主要戰場，控制南洋地區的這些殖民宗主國遂斷絕貿易，造成了東南亞市場的真空狀態，也帶給日本一次絕好的卡位機會。另外，1914年10月，日本佔領了德國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殖民地，再次喚起了日本民眾對南洋地區的關注。經濟的好轉，加上南方新領土的獲得，使得大正年間再次爆發了一場南進拓殖風潮。與明治期懷著浪漫幻想的南進思潮不同，大正期日本的南方進出，挾帶著眾多會社的龐大資本，帶著經營貿易賺取利益的實際想法，更抱持著與歐美帝國較量的自信心態。一個二十世紀新興的東方文明大國，就這樣汲汲營營的前往熱帶南洋富源之地。

二、 遠離黑色：自卑與位階強化

明治維新以來，國內文明實力不斷增長，外加殖民地臺灣的統治也漸入軌道，日本逐步累積對大和民族的自信心。對外戰爭，特別是對俄國的勝利，更是讓國內瀰漫著一片樂觀氣息。但也正因為打贏了俄國這個西方大國，正式躋身世界「一等」文明國之列。在自負之餘，日本也開始對這個迅速膨脹的國家感到不安，更對自己的真正實力產生懷疑。¹⁶⁹ 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的這段期間，日本一方面感

¹⁶⁷ 以外債依存為主的日本財政方針，在1907年紐約經濟恐慌後，面臨了極大挑戰。當時的日本必須面對日露戰後的經營費、與美國海軍對抗的國防擴張費，還有與韓國併合後的開發費用。除了這些短期開銷外，在生產原料須依賴海外導致貿易入超，而外債利息又不斷增加的狀況下，日本財政實在無法負擔戰後勃發的海外發展開銷。見清水元，〈大正初期における「南進論」の一考察——そのアジア主義的変容をめぐって——〉，頁1-3。

¹⁶⁸ 最具代表性的刊物，就是1913年11月發行的《太陽》「南進乎北進乎」臨時增刊號。這本雜誌列舉了南進論與北進論在觀點上的分歧，並試圖探討日本的未來。

¹⁶⁹ 對時代的不安與懷疑，多半顯露於大眾取向的文本身上。曾村保信的研究指出，1915年的《やまと新聞》曾刊登了一篇夏目漱石的訪談，其中即提及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是一個「懷疑與

受因科技文明提升所帶來的自信，但也開始對這份過速的發展產生省思：日本是否真的具備了身為一等國的實力？內田嘉吉於 1914 年的《國民海外發展策》中就曾表示：

如今我日本帝國作為世界的一等國，是否伴隨著與之相稱的實力，有識之士實深深擔憂，是以切勿過分樂觀。現今的日本正處於最為艱困的階段，政治、經濟以致社會等各方面，均與世界上最優秀的國家與民族相互競爭角逐，處於非常不容易之情勢，日後境遇會如何變化，實關乎一國之存亡興廢，國人必須深深引以為憂。¹⁷⁰

內田並認為，日本模仿泰西文化的時日尚淺，國家財富仍較為貧弱，在資質與實力上均不足於世界上的一等國。同時，日本不僅得處理中國問題，與各國工商業的競爭，還得面臨「人種上的競爭」。¹⁷¹ 內田顯然認為，人種議題是日本與西方競爭時，不可迴避的一點。因此，內田告誡當時過於樂觀的日本人民，面對國家興盛，「與其享受盛名，不如視之為困難；與其感到光榮，不如稱之為自覺。」¹⁷² 夾雜著懷疑與不安的樂觀自信，成為此時期日本複雜的集體心理。

如內田所揭示的，日本之所以會浮現這層不安，除了對自身文明實力程度的質疑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日本人無法改變的「有色人種」身分。無論文明再怎麼發達進步，對外戰爭與對內統治再怎麼無往不利，在一個受人種主義與社會達爾文思想所籠罩的時代，不僅是位居優勢的西方白色人種，日本人更難從這樣的人種迷思中擺脫。因此，在自身文明力量逐漸成長，逐漸趕上西方腳步的此時，日本對自身的有色人種身分就更加在意，也更加自卑。若是回到前面竹越所宣示的那句話，顯然日本對自己的「黃種」身分是極端自覺的。日本作為第一個由有色人種所建立的近代文明國家，身為領頭羊的人種衝擊與優劣意識，也格外鮮明。

自信喪失的時代」。另外，分析此時期流行歌的見田宗介，也以社會心理史的角度，指稱此時期的流行歌多以「憤恨」與「嫉妒」為主題，反映此時期民眾混雜的悲觀情緒。見曾村保信，〈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外交論的背景〉，收錄於同著，《近代史研究——中国と日本》（東京：小峯書店，1977），頁 202；見田宗介，《近代日本の心情の歴史》（東京：講談社，1978），頁 23。

¹⁷⁰ 內田嘉吉，《國民海外發展策》（拓殖新報社，1914），頁 1。

¹⁷¹ 內田嘉吉，《國民海外發展策》，頁 2-3。這裡的中國問題，是指辛亥革命後中國的一連串動亂。

¹⁷² 內田嘉吉，《國民海外發展策》，頁 2。

要解消這份自卑情緒，就必須對其他更為劣勢的有色人種展現文明實力，加深雙方差異，以提升日本的文明位階。新加入日本帝國不久的臺灣蕃人，恰實地承接了這份任務。在前兩節中已述及，從日本領臺至五年理蕃事業告一段落的二十年間，日本不僅擴大了對臺灣蕃人的實質統治力，更在討伐理蕃期間強化了蕃人族群的劣等形象，將其本質化為一種無法改變的野蠻天性。臺灣蕃人成為帝國文明位階的底層，而成功收編他們、統御他們的日本人，則藉此證明其與西方白種人一般，具備統治有色人群的能力。透過殖民統治，日本人不斷向西方人展示，即便同為有色人種，但他們與這些劣等的南方有色人群，是不一樣的。

日本人對南方有色人群的分化，進而歧視，也隨著大正初期的新一波南進思潮，進一步向南推進至南洋土人身上。竹越與三郎在 1910 年出版的《南國記》，是一本向日本大眾介紹廣大南方風土民情的暢銷遊記，再次喚醒了民眾對南方的興趣。同時，竹越於《南國記》的其中一章〈為何馬來人為劣等人群〉裡，就透露了對馬來人種的看法，也清楚展現了對南方土人的人種偏見與歧視。

竹越認為，馬來人之所以在南洋地區過著類似奴隸的生活，是因為他們混入了劣等的黑色人種（ネグロ），同時由於居住於熱帶，有著取之不盡的自然資源，使其心生慵懶，不愛勞動。這兩種從體質與居住環境所得出的觀察報告，使竹越總結了馬來人的盲目傾向：按照動物本能，順從慾望的生活方式，使其無法進一步發展理性思維與人文精神。有馬來人血統的臺灣蕃人，也是如此。¹⁷³

如竹越所論述的，先天血統因素，與後天環境因素，造就了馬來人無法改變的低劣特質。鼓吹南進論的竹越，運用了當時堪稱「科學」的人種優劣觀與環境決定論，將南方有色人群打入無法扭轉的文明位階底層，也進而合理化日本南進、統治當地人群的正當性。透過竹越對馬來人種的評價，可以很清楚地發現，日本人企圖劃分與南方有色人群的文明位階差異。當南方有色人群的劣等因素，被歸因於血緣與居住環境這類不可輕易扭轉的因素時，同為有色人種，但混入北方大陸血統、位居溫帶地區的日本，宛如從有色人群的枷鎖中暫時解放，搖身一變成為與西方白色人種站在同一位階的文明統治者。同時，原本遊走於東西兩端的日本，也將文明與野蠻重新定義，將自身放入文明的一端，並極力拉開自身與野蠻的差異。但也因此，文明與野蠻的兩極對立之姿又更形強化。

¹⁷³ 陳芷凡，《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臺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頁 275；原史料參見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 358-359。

三、 白色歧視：無法實現的平等

十九世紀發展出來的人種概念，其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強調黑、白人種之間的不平等。¹⁷⁴ 日本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以有色人種之姿奮力崛起，並企圖打破這層不平等關係。當日本大刀闊斧的充實國力，並企圖扭轉自身有色人種的低劣形象時，十九世紀後期社會達爾文思想的流行，轉化了西方對人種不平等的概念，也使得汲汲營營的日本處境更為艱困。

社會達爾文思想中「自然淘汰」、「適者生存」的說法，為人種概念提供了新的活力，此時期所談論的人種不平等概念，轉化為異人種之間的對立與競爭。各方面皆優秀的白種人，必定能淘汰劣等的黃色、黑色人種，成為統御世界的最適種族。因此，西方各國無不倡導人種的純血、人種鬥爭的必然性，以及非洲土人與猶太人的低劣。¹⁷⁵ 而此種概念，恰好與方興未艾的新帝國主義相互結合，導致了 1880 年代列強瓜分非洲的局面。白人對黑人的壓迫，激化了雙方的對立，使得人種競爭的思想到了二十世紀初，已進一步轉化成種族隔離與排除的實際明文法條。¹⁷⁶

除了白人對海外黑人地區的掠奪，白人對自身國內的黑人移民，也得進一步排除。南非於 1897 年通過移民限制法，澳洲與紐西蘭也於 1896 年確立了有色人種限制法。¹⁷⁷ 不僅如此，澳洲更在 1899 年訂立了海外移民限制，並於 1901 年提出有名的「白澳主義」原則。而加拿大與美國，原先即將大量移入的中國移民以「黃禍」稱之，更在之後將日系移民納入，1907 年加州訂立的排日土地法案即為一例。¹⁷⁸ 這些在明治二十年代海外拓殖思潮大興時，舉家遷入北美洲、紐澳等地的日系移民，開始承受白人種族歧視的不平等待遇，更於二次大戰時，承受了國家的極度苛求與壓迫。

¹⁷⁴ ポール・ゴードン・ロレーン（Paul Gordon Lauren）著、大蔵雄之助譯，《国家と人種偏見》，頁 79。

¹⁷⁵ 有關十九世紀後期提出人種競爭思想的諸位歐美學者，可見ポール・ゴードン・ロレーン（Paul Gordon Lauren）著、大蔵雄之助譯，《国家と人種偏見》，頁 80-82。

¹⁷⁶ 最具代表性的，應是歐洲對猶太人的反猶主義。不僅如此，當時西方對有色人種的態度極其負面，例如美國基於優生學而提倡的反「血統劣化」行動，以及 3K 黨對黑人的攻擊行為等等。本節一開始引述其言論的 W.E.B. Du Bois，即在 1905 年成立「全國黑人地位向上協會」（NAACP），對抗白人的歧視行動。

¹⁷⁷ 當時的報紙《Sydney Daily Telegraph》曾高聲宣導與「宛如惡性傳染病」的亞非有色人種通婚之危險性。ポール・ゴードン・ロレーン（Paul Gordon Lauren）著、大蔵雄之助譯，《国家と人種偏見》，頁 90。

¹⁷⁸ 有關各國對國內有色人種移民的立法限制，見ポール・ゴードン・ロレーン（Paul Gordon Lauren）著、大蔵雄之助譯，《国家と人種偏見》，頁 90-94。

綜觀此時期歐美各國人士對亞非有色人群的言論，多半都著重呈現有色人種的低劣、醜陋與邪惡，並將國內有色移民的增加，視為種族存亡的一大危機。但越是對黑色人種排斥，越是運用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就越能展現白色人種對不斷移入自身國土的大批黑色人種，存在著多深的恐懼。可想而知，身為有色人種的日本，竟然能在 1905 年戰勝俄國，這件事對西方世界的衝擊有多大。對白種人而言，日本的勝利，正宣示了一場世界性的人種戰爭即將爆發。¹⁷⁹ 白種人擔心，日露戰爭將「數千萬有色人種的心中，逐漸發酵的無意識概念現實化、明確化，亞非人民抱持了歡欣與希望，而不敗的白人神話，也將落入泥塵。」¹⁸⁰ 白種人如此恐懼日本的崛起，不僅加深了西方各國對新興日本帝國的懷疑，更催生了一連串反日、排日的情緒。

如此看來，日本人要求與西方人平起平坐的願望，是無法實現了。一次大戰結束後，作為戰勝國的日本，因應民族自決的風潮，國內輿論也興起一陣「廢除海外人種差別待遇」的聲浪。對戮力追求西化，已然身為近代國家的日本而言，對日本移民的人種差別待遇，實是一種污辱，日本外務省也不斷倡導國際對等原則。此外，當時的首相大隈重信也曾發表演說，針對美國在境內迫害有色人種的事實提出抗議，並倡導東西文明調和的必要性，要求白種人停止迫害有色人種。¹⁸¹ 而國內的新聞輿論，更對人種差別待遇議題提出建言，要求自由開放，去除人種差別思想。¹⁸² 但在 1919 年 2 月的巴黎和會上，日本未能成功提出修正案，廢除人種差別待遇的希望也隨之落空。¹⁸³ 這樣的結果，使日本人在失望之餘，也強化了對西方白色人種的敵意。

¹⁷⁹ B. L. Putnam Weale, *The Conflict of Color: The Threatened Upheaval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1910), pp. 97-99.

¹⁸⁰ T. Lothrop Stoddard, *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 Supremacy* (New York: Scribner's, 1921), p. 12.

¹⁸¹ 但日本似乎忘記了，自身在統治臺灣蕃人時，也運用了與西方白色人種一樣的概念。這讓大隈的東西文明調和說，顯得格外諷刺。本段演說內容及討論見ポール・ゴードン・ロレーン (Paul Gordon Lauren) 著、大蔵雄之助譯，《国家と人種偏見》，頁 127。

¹⁸² 《報知新聞》要求前往巴黎和會的代表「一定要向聯盟的各會員提及此事，並尋求適當的解決之道」；《萬朝報》更提及「吾人所不能忍受的，就是以人種差別為由設立的種種限制」；《東京日日新聞》要求「大膽地向世界提出撤廢人種差別的主張」；《朝日新聞》更進一步的宣示「吾人的和平政策，與我國之固有精神一致，要追求世界人民的福祉，以及世界的自由開放。」〈人種差別〉，《報知新聞》，1918 年 12 月 29 日；〈日本の平和はなんですか〉，《萬朝報》，1918 年 12 月 29 日；〈League May Prove An Organ Of Oppression〉，《東京日日新聞》，1919 年 1 月 31 日；〈Parting World to Peace Delegates〉，《朝日新聞》，1918 年 12 月 11 日。

¹⁸³ 有關巴黎和會過程的相關討論，見ポール・ゴードン・ロレーン (Paul Gordon Lauren) 著、大蔵雄之助譯，《国家と人種偏見》，頁 130-144。

四、 退擁黑色：矛盾的有色人種

無法改變的人種差異，是一種長期壓力，自開國以來就已深深地植入日本人的心中。當然，一方面日本不斷設法解消西方人套上的有色人種枷鎖，企圖仿效西方文明，追上西方列強的發展水平；但人種上的根本差異，也使得日本自始就抱持著與西方的競爭意識。1880 年代國粹主義的抬頭，可說是面臨西方壓力下，轉而強化自身民族認同的思想展現。也因此，世紀之交的日本，對西方的情緒是交錯而複雜的：既想加入西方，卻又不斷與西方劃開距離。隨著西方對有色人種的歧視與敵意越來越大，與西方劃開距離的想法也越來越明確。換言之，在被动地遭西方排斥的同時，日本也主動地遠離西方。演變到後來，便逐步轉化為聯合東方有色人種，與西方白色人種的對立姿態。大正期的南進論，便充分展現出這樣的思想傾向。

日本人聯合有色人種對抗西方的想法，與第一節時曾論及的南方起源說有很大的關係。對南方有色人群的共源想像，在明治末年南進思潮再興之時，遂與西方對抗意識相互結合，成為合理化日本人南方進出的重要依據。包括前述竹越與三郎的《南國記》等大正期南進論作品在內，均高度運用南方起源的說法，鼓吹日本人前往南洋發展。以《南國記》為例，竹越認為「我國人種雖然混雜了諸多要素，但大體而言是馬來人種與蒙古人種的混合。」另外更表示，「我日本人種的起源究竟為何，眾說紛紜議論不絕，但大致上，從南洋來的馬來血液是最多的，這一點是沒有疑慮的。」¹⁸⁴ 為了證明此一說法，竹越也舉《古事記》中記載的竹船形貌，與現今南洋地區海濱使用船隻形貌相同的歷史證據，藉以取信於讀者。此外，竹越還指出日本與爪哇一帶蛇形劍的信仰、將齒染黑的慣習、居處結構等等，均多有相同之處。¹⁸⁵

《南國記》作為當時的暢銷書籍，不難想像，南方起源說也深深影響了一般日本大眾。¹⁸⁶ 當時諸如《獨立評論》、《やまと新聞》等大眾媒體，也均引述、附

¹⁸⁴ 竹越與三郎著、山下普司等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民族誌選集 15 南國記、南洋風土記》（東京：クレス出版，2002），頁 285、353。

¹⁸⁵ 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 353-357。但身為人類學家的鳥居龍藏，批判竹越的武斷說法，認為不能一味認定日本人的祖先為馬來人種。同時，鳥居也指出竹越對人種觀察的諸多謬誤。原初史料見鳥居龍藏，《有史以前の日本》（磯部甲陽堂，1925），頁 622；而竹越對人種觀察之謬誤，邱雅芳、陳芷凡等人已有引述與討論，見邱雅芳，〈南方的光與熱——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的臺灣書寫與南進論述〉，頁 208；陳芷凡，《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臺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頁 274-275。

¹⁸⁶ 《南國記》出版後僅僅五個月就出到四刷，之所以暢銷，除了民眾對南方風土民情的好奇外，

和日本人來自南方的說法。¹⁸⁷ 到後來日本佔領南洋群島時，《實業之日本》的南洋號特刊中有關南進論的文章，諸如新渡戶稻造、井上雅二等人，均再一次地引述南方起源說，成為正當化日本人前往南洋的依據。¹⁸⁸ 人種血緣上的相近，以及對南洋的未開原始想像，也使得南進論者在鼓吹前進南洋時，會將南洋描述成日本人種的故鄉，例如「前往南洋發展，就像回到神武以前的過去一般」¹⁸⁹、「南洋是大和民族的舊故鄉，也是新舞台」¹⁹⁰ 等等。

對當時的日本帝國而言，面對西方白人的壓迫，以及海外移民的受限，「尋找日本的未來」成為刻不容緩的第一要事。而廣大的南方地區，成為日本人想像的明日所在。大正期的南進論者，多半在書寫中展現了極為迫切的心情，強調日本在南洋的發展，相較於西方殖民者甚至中國華僑勢力，都已屬後進。因此，南進論者強調，憑藉日本人與馬來人的血緣關係，日本到南洋發展的條件絕對比西方帝國更有優勢。此種與西方白色人種對抗的心態，昭然若揭。¹⁹¹ 日本著名政治家、倡導對外擴張政策的德富蘇峰即表示：

打破白閥，振興黃種，救治東西方人種、民族上的不平等，並使其恢復均衡，實是我日本帝國的使命，大和民族的天職。我大正青年，應當面對這份責任，以繼往開來之勢，立下誓約。¹⁹²

至此可以了解，大正期南進論的人種概念，成為日本對抗西方白色人種的重要依據。日本人強調與南方有色人種的血緣親近關係，倚靠這「無法改變」的人種差異，宣稱其進入南洋的「天職」合理性，與當地的西方殖民勢力分庭抗禮。此與明治前期一味前進、追求西化、加入白色人種陣營的心態有所不同，在遭遇白色

竹越的生動文字敘述也是一大原因。相關討論見河西晃祐，《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大東亜共栄圏」への歴史的展開》，頁 236；邱雅芳，〈南方的光與熱——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的臺灣書寫與南進論述〉，頁 209-210。

¹⁸⁷ 《独立評論》，1910 年 7 月 10 日；《やまと新聞》，1910 年 6 月 23 日。上述兩篇新聞均收錄在《南國記》的書末評論中。

¹⁸⁸ 新渡戶稻造，〈文明的南進〉，春季增刊南洋號《實業之日本》18：7（1915.3）。

¹⁸⁹ 井上雅二，《南洋》（富山房，1915），頁 17。

¹⁹⁰ 大野恭平、佐藤四郎，《南國》（丸善書店，1915），頁 32。

¹⁹¹ 日本之所以比西方列強更適合統治南洋地區，還包含了殖民手法的成效。竹越於《南國記》中曾表示，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成績，無論是生活水準或是文明的改造程度，都比西方統治下的南洋各殖民地還要成功，這足以印證日本更有能力統治南洋。為因應此說，竹越在本書中不斷比較南洋各地的殖民統治與臺灣的差異，並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多有讚許。見竹越與三郎《南國記》，頁 320。

¹⁹² 德富蘇峰，《大正の青年と帝国の前途》（民友社，1916），頁 374。

人種日益增強的歧視與排擠之後，此時的日本退回東方有色陣營，利用有色人種的身分，與南洋的西方殖民勢力競逐，更成為日後大東亞共榮圈的原型。

仔細檢視日本對南方有色人種的論述與想法，可以很輕易地發現一項矛盾事實：日本在不斷提升自我、貶低南方有色人種文明位階的同時，卻也同時在人種上拉近與他們的親近關係。若南方有色人種是劣等的野蠻族群，那宣稱與其擁有共同血統的日本人，不也是同樣劣等嗎？當時倡導南進論的日本人，也同樣意識到這個矛盾現象。因此，大正期的南進論相關作品在形容這些南方人群時，以「南洋土人」一詞相稱，但在提及南方起源說的部分時，為了減低劣等想像，多半轉而使用「南洋人」一詞，而避開土人的稱呼。¹⁹³ 井上雅二甚至還在《南洋》一書中特別強調，指稱日本人混入南洋人的血，絕對不是侮辱。¹⁹⁴ 像這樣的自我辯解，正說明了這些南進論者有多麼擔心，外國人會將日本人與南洋土人的負面形象相互連結。

另外，為了解決這層邏輯矛盾，竹越在《南國記》中，特別針對日本人與「馬來人」擁有共同祖先，但為何現在日本位居世界大國，但與我同胞同系的馬來人卻處於半奴隸狀態一事提出解釋，即前述的環境決定論：自然環境的嚴苛與否，造就了馬來人不思不勞，而日本人戮力精進的差異。¹⁹⁵ 在一方面強調與南方有色人群的血緣關係時，日本人也不斷地試圖與那些加諸其上的劣等印象劃清界線，從這些南進論者的言論之中，可以清楚地看見這份矛盾。

日本人如此費力的處理與南方有色人群的關係，就是為了在維持文明國的位階優勢之餘，也能同時仰賴人種相近關係，驅逐既存的西方殖民勢力。但若實際進入當時的南洋地區，卻可以發現日本人在當地是非常劣勢的。西方白人占據了殖民政治優勢地位，同為黃種人的中國華僑則佔據了經濟優勢地位，人數少且多半從事中下層工作的日本人，在南洋地區簡直是弱勢族群。¹⁹⁶ 也就是說，在南洋地區以外，日本人不斷強調自身的文明優勢，但進入南洋地區，日本人卻是當地社會的下層族群。原先被日本人視為野蠻、狡猾的中國人，甚至是怠惰、不潔的

¹⁹³ 河西晃祐，《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大東亜共栄圏」への歴史的展開》，頁 241-242。

¹⁹⁴ 井上雅二，《南洋》，頁 17。

¹⁹⁵ 竹越与三郎，《南國記》，頁 358-365。在此須留意，竹越同樣不使用土人一詞，而使用馬來人，因此用引號特別標示之。

¹⁹⁶ 明治時期即有日本人前往南洋，但在當地的工作多半是中下層職業，例如「からゆきさん」（妓女）就是日本女性在當地的重要職業之一，甚至成為穩固日本移民社會的經濟大宗。但南洋的妓女戶在日本國力逐漸上升，開始尋求海外發展的時候，卻成為追求「文明」的維新政府，亟欲剷除的海外「醜業婦」。有關這群海外日本妓女戶的研究與討論，見清水元，《アジア海人の思想と行動》（東京：NTT 出版，1997），頁 94-118。

馬來人，到了當地，卻成為日本人眼中「勤儉、質樸、懂得儲存」的學習對象。¹⁹⁷原先自認是有色人種之中居領導地位的日本人，在南洋地區卻反而處處不如其他有色人群，這點讓日本人再次地感到自卑與不安。因此，如何解決文明位階層級的尷尬翻轉，成為日本人進入南洋時，不斷思考的問題。¹⁹⁸

五、步入荊棘之路

在論述日本針對帝國內部有色人種進行分化、對立的過程之後，本節將討論視角放回日本與世界思潮的互動關係，藉以重申日本不僅是殖民者，也同時身為有色人種的事實。西方白色人種在進入二十世紀後，逐漸強化人種競爭與對立的意識，使得身為有色人種的日本，與自身統轄下的南方有色人群一樣，也受到了人種歧視的衝擊。原先渴望加入白色人種之列，享受文明優勢權利的日本，卻因為不可改變的人種差異，而在國際間再度遭受西方列強的不平等待遇。

原本為了追求與白色人種的平等，日本人盡力劃分與黑色人種的距離，以提升自我文明地位，並透過臺灣的殖民統治，證明自身也有統御有色人種的能力。然而，西方投射過來的歧視眼光，卻使得日本再度回歸有色人群之列，以領頭羊之姿聯合有色人種，企圖抵禦西方白色人種勢力入侵。這樣的傾向，在大正期的南進思潮之中表露無遺。人種血緣的親近概念再次為日本運用，成為合理化自身進出南洋的藉口，但也因此，日本人必須面對先前加諸於有色人種身上的負面想像，也同時攬回自身的尷尬局面。

自開國以來，日本人的集體心態就是矛盾的。既希望學習西方白種人的文明，又對白種人勢力的入侵感到不安；當自身文明逐漸提升，甚至打贏了西方列強，而累積大量自信之時，卻又對自身能力跟人種感到自卑。就是因為這份自信與自卑的交錯糾結，使得大正期日本南進論述再次勃興之時，可以同時看見這兩種情緒的展現，越是強調自身在南洋發展的必然與正當性，就越能看見日本對自身能力跟身分的質疑與忖度。日露戰爭之後，身為一等國的自信，與潛藏其中的不安與自卑，造就了複雜的時代心理，大正期間近乎執拗地宣稱南洋進出的必然性，

¹⁹⁷ 原文見大野恭平、佐藤四郎，《南国》，頁 59-60；鶴見祐輔，《南洋遊記》（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1917），頁 635。日本人在南洋地區的假想敵，除了西方殖民者之外，就是擁有龐大經濟資源的中國華僑。甚至是部分上層社會馬來人，也成為日本人羨慕的對象。

¹⁹⁸ 究竟什麼是符合一等國身分進出南洋的方式呢？當時的討論認為，首要對象就是改正當地移民的「賤業」，另外也要以大資本、大組織的方式進入南洋發展。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當地日本移民身為「一等國民」的自覺意識，因此必須在當地建立日本人學校及日本報社，以培養日本移民的愛國心。相關討論見清水元，〈大正初期における「南進論」の一考察〉，頁 32-37。

用以抵禦歐美列強，正是這種心理防衛機制的啟動。¹⁹⁹ 這樣的機制，將日本帶往膨脹主義及大亞洲主義的傾向，也逐漸將日本導向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

本節試圖呈現這樣的流離過程：日本人欲掙脫人種，卻也操弄人種，最後受制於人種，只能再次回歸人種。在白色與黑色之間的兩難，在自信與自卑之間的掙扎，是世紀之交，身為有色人種的日本，一份進退失據的兩難與悲哀。

本章分析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對南方有色人群的異己想像。第一節探討南方起源說與臺灣蕃人的關係，第二節分析獵首習俗如何隨著理蕃事業的推行，成為蕃人身上不變的負面標籤。第三節以內地觀光為例，分析日本人如何看待這群來訪內地的南方異己，最後一節再次回歸人種概念的討論，再次突顯有色人種日本的矛盾。與第二章相同，本章也提出三項主要關心的討論脈絡，以便作結。

第一，是對臺灣蕃人的實際統治，如何幫助日本人尋求自我定位。在前一章已論及，在還未實際統治臺灣之前，日本就已對廣大南方地區的有色人群，抱持了諸多想像。十九世紀後期以降，確立文明與野蠻的分界，對身處其中的日本至關重要，當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日本首次有機會直接統治這群南方異己時，臺灣蕃人自然就成為日本人重要的野蠻概念投射對象。這群南方異己宛如一面鏡子，日本人必須透過野蠻的他們，映照出自我的文明面貌。1914 年理蕃戰爭告一段落，宣示了日本人和西方列強一樣，有能力控制有色人群，日本人透過治理臺灣蕃人，確立了自身的文明位階。一個定型的野蠻南方異己想像，也隨之誕生。而隨著日本統治範圍的擴張，新一批更遙遠的南方有色異己，也將取代臺灣蕃人，等待著被日本人發現、詮釋並收編。

第二，是日本人加諸在南方異己身上，諸多族群想像的形成過程。無論是第一節所提及的親近想像，或是第二節所闡述的純真無垢與野蠻凶暴形象，都是日本人對南方異己既複雜且糾葛的想像內容。從本章的論述過程中可以得知，這些概念的出現、強化與定型，皆受不同時期殖民統治政策的需要，而被日本人操弄利用。固然如人類學等近代科學知識的建立，可幫助日本人更正確地理解這群南方異己，但重點並不在於知識的正確與否，而在於殖民者的需要與詮釋。這些曖昧模糊、具高度詮釋性的族群知識，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以及戰爭激化文、野之間的對立，使特定的異己形象散佈至一般日本大眾，加深其負面標籤的力度，

¹⁹⁹ 心理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的名詞出處，出自清水元。見清水元，〈大正初期における「南進論」の一考察〉，頁 18。

更使南方異己想像加速定型。

第三，則必須從日本人的有色人種身分出發，進入二十世紀初期，世界性的人種歧視戰場。自十九世紀以來，日本人透過各種方式，提升了自我文明地位，也提升了民族自信心。但這份過速的成功，不僅招來了對自身的不安懷疑，更招致了白色人種的恐懼與排斥。無論如何努力，日本人終究還是不能擺脫有色人種的身分，這對追求西化的日本而言，宛如站在兩大陣營的交界戰線上：一邊是因人種不同而遭排斥的白色陣營，一邊則是先前為了脫離人種，而不停對其排斥的黑色陣營。兩難的日本，進退維谷。因此，若試圖從人種角度，分析當時日本人的集體心態，或許能對後來日本的選擇與發展，多一份理解與寬憫。

進入二十世紀，日本帝國不停地發展茁壯，統治臺灣的經驗，不僅使臺灣蓄人的負面形象藉此定型，也使日本人對自我民族的信心更加提升。時代繼續流動，又將有新的一批南方異己加入日本帝國之列，但此時期的日本，已然與明治時期不同，而是懷抱著一個定型的南方異己想像，以一種更為熟練明確的方式進入、認識南方。這群南方有色人種，透過各種文本形式，持續扮演著日本人的對立面：戲劇《蕃人襲來》中的獵頭野人、歌謠《酋長の娘》中美麗的黑膚少女、漫畫《冒險ダン吉》中的蒙昧土人，甚至是日本作家逃離文明、發掘自我的理想原型，日本人心中永遠的南方異己，在日後依舊展現其源源不絕的活力與能量。²⁰⁰

²⁰⁰ 《生蕃襲來》是五年理蕃時期在內地流行的討伐蕃人演劇，曾在日本各地 22 個城市進行巡迴表演，甚至有真正的生蕃參與劇團演出。《酋長の娘》是一首在昭和時期流傳的歌曲，內容描述住在馬歇爾群島，黑皮膚的酋長之女，在椰子樹下跳舞的情景。《冒險ダン吉》則是島田啓三在 1933 年至 1939 年連載於少年雜誌《少年俱樂部》中的一部連載漫畫，內容描述主人公團吉漂流至熱帶島嶼，憑藉著智慧與勇氣克服困難，最終統治島上野蠻人的故事。詳細史料與論述可見〈討蕃劇の内地興行〉，《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7 月 6 日，第 7 版；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観》，頁 154-155；川村湊，《南洋・樺太の日本文学》，頁 21-26、87-90；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頁 39-41；Mark R. Peattie, *Nany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in Micronesia, 1885-1945*, pp. 338.

第四章 帝國、大眾媒體與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

前兩章反覆論述的異己知識內容，必須能透過各種形式散佈至各地，讓更多人看見、聽見，才可能形塑出日本人的南方異己想像。因此，無論是地域、階層或形式的廣度，大眾媒體特別是新聞的傳遞與散佈，就顯得格外重要。另外，新聞也是近代日本交流各類知識最主要的公共平台，更是許多話語、論述相互混雜碰撞之處，異己想像的題材當然也是其中之一。本章的第一個切入點，就是對日本人建立異己想像最重要的傳播媒介——亦即大眾媒體本身，探討其具備的「傳遞重層」、「話語多元」等公共性。

另外必須注意的就是，近代日本大眾媒體的興起，與帝國的成長相輔相成。由於帝國尚未成熟，政治的動盪紛亂與新聞形式的龐雜相互結合，造就了百花齊放的輿論空間。但對亟欲掌控國家的主政官員而言，帝國的安定與權力的鞏固、強化既然非做不可，勢必要求新聞報社得在帝國權力與媒體公共性之間有所取捨。因此，帝國權力如何箝制新聞媒體，是本章的第二個切入點。

因此，「帝國權力」與「媒體公共性」的相互拉扯，如何分別影響近代日本的新聞媒體，這份衝突又如何呈現在異己想像的主題上，是本章的論述主軸，並以帝國媒體的萌芽、學術知識的產出散播，以及殖民地媒體的建立等三大主題分節討論。最後，則稍微跳離這場競合局面，轉而探討日本人的南方異己論述中，屬於「異己」本身的聲音為何，並藉此提出一些可能的反思。

第一節 帝國之聲

從事日本與東亞媒體、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吉見俊哉，曾在其著作《媒介文化論》中，為現代媒介（media）史下了一個註解，即各種政治鬥爭、感覺變化、異質經驗的交會。¹ 源起於近代歐美國家的大眾媒體，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逐漸進駐日本，更參與了近代日本的國家轉型、文明啟蒙過程。以新聞（報紙）為主的媒體，成為幕末至明治初期各方政治勢力發聲的鬥爭工具。這種「聲音」催化出的輿論力量，更可挪用為政府對內政令宣導、甚至是監控掌管的声音。另一方面，媒體也透過對外戰爭的相關報導，讓日本人民體認到世界各國文明、野蠻的不同面貌，進而形塑了多樣的異己想像，更從中確立了何謂「大和」民族。可以說，新聞媒體及其背後代表的印刷—資本主義，與日本帝國、日本民族的形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² 吉見俊哉的這段話，用來解釋這份關係，實在是再適合也不過了。

本節所要處理的，就是闡述日本媒體、帝國與異己想像三者之間的關係。首先，將會就近代大眾媒體、特別是新聞報紙的發展脈絡作一概述；接著，則敘述日本帝國在「文明啟蒙」與「國權鞏固」兩大發展方向下，如何分別箝制媒體新聞；最後，則結合異己想像的主題，說明媒體與日本帝國如何合作、引導、進而生產出一套異己論述。

一、日本大眾媒體的發展脈絡

近代新聞之所以出現，與 15 世紀末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有很大的關係。活字印刷帶動了印刷工業的發展，使得歐洲各地於 16 世紀開始出現一種刊載大小事的印刷物，稱為小冊子（Pamphlet）。這類傳單的內容包羅萬象，舉凡天災人禍、外交事件、祭典遊行、奇聞軼事、科技新知等等，都是典型主題。³ 不同於歐洲，江戶幕府時代的日本，則是以「瓦版」作為傳遞這類知

¹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譯，《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臺北：群學，2009），頁 19。本書譯自吉見俊哉，《メディア文化論——メディアを学ぶ人のための 15 話》（東京：有斐閣，2004）。此後本章採用此書之中譯，均以蘇版為準，惟書中提及「メディア」一詞時，多半譯為「媒介」，少部分則採用較為普遍的「媒體」，蘇碩斌已在譯者說明中詳述原因（頁 X-XII）。但筆者為求內文敘述統一，將多以「媒體」一詞統稱之。為尊重原譯者，特此說明。

² 在班納迪克·安德森的著作中，已點出了大眾媒體、特別是報紙與十九世紀民族國家形成的關係。見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文化，2012），頁 104-108。

³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譯，《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頁 111。

識的媒介。⁴ 瓦版與小冊子一樣，都是具有現代新聞學先驅意義的大眾媒體。這類新聞多半貼近庶民生活，因此設定的閱讀對象、內容篇幅與呈現形式，也符合一般大眾的口味。

到了 17 世紀，運輸系統的發達與商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帶動了世界各地對通商新聞資訊的需求。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歐洲大都市的商人們，了解金融、商品行情等資訊具有重要價值，對商業新聞的關心程度也急遽增加，促使新聞印刷成為一種獨立的專門職業。幕府末期，最先在居留地發行新聞的外國人，就是一些在日本做生意的商人；此類新聞，往往以船貨清單與進出口商品等商業資訊為主。

除此之外，自 17 世紀開始，歐洲政治的動盪、大小革命事件帶動了新聞報導事業的發展，也同時造成新聞與國家力量的角力。以英國為例，17 世紀中葉的清教徒革命時期，英國內政混亂，報業卻蓬勃發展；到了 17 世紀後期王權復辟，國家對印刷物的控制力則轉強；而 1688 年光榮革命後，新聞業結合英國政黨競爭的運作，再度取得強大的影響力。⁵ 不過，新聞事業對上不只參與國家政治，對下也餵養了一批關心國事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換句話說，新聞業的發達，擴大了公領域的討論空間。

不只在歐洲，日本的新聞業更是緊緊貼合著國家政治體制變動的步調並行。⁶ 步入明治時期，日本各地陸續出現大量的新聞，一時呈現百花齊放之姿。⁷ 但由於明治初期維新內亂，社會動盪不安，政府對新聞報導便格外重視。此時期的新聞往往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各自依附所屬的政黨立場，例如官派新聞《東京日日新聞》的立場，即與其他民權派新聞《橫濱每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朝野新聞》等有所不同。到了明治 10 年代自由民權時期，反政府立場的新聞攻訐時事

⁴ 瓦版是一種單張的木版印刷物，原意是在黏土上雕刻文字、圖畫，再燒製而成的印版，也指在黏土印製、質地粗糙的印刷物，在江戶時代是作為公告急事的用途。舉凡地震、火災、祭典、仇殺等緊急事件的臨時報導，到刊登護符、廣告、八卦等內容，都是瓦版報導的對象。瓦版新聞在 19 世紀的日本各地大量普及。

⁵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譯，《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頁 113-114。

⁶ 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敘述官方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時，曾以明治日本為案例，闡述源自西方的民族主義如何在亞、非地區的日本萌芽發展。安德森指出，除了日本內部較高的族群文化同質性、天皇家族擁有的古老象徵意義，以及西方人入侵引發的民族危機意識之外，在西方已立足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民族主義共同體模型，使日本擁有可以師法的對象。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頁 144-148。

⁷ 有關明治前期在日本各地創辦的新聞，即將近 70 幾種之多。詳細類目及創刊年表可見：宮武外骨編、西田長壽補，〈明治前期新聞創刊年表〉，收錄於明治文化研究會編，《明治文化全集 第十八卷 新聞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頁 605-627。

更為激烈，例如同時期由英國人 Black 創辦的《日新真事誌》，即以倡導言論報導自由為宗旨，不時對日本政治現象及時事做出嚴厲批評；⁸ 福澤諭吉創立的《時事新報》，則標榜著獨立不羈、不為政黨掣肘的新聞精神。⁹ 明治初期以議論國政為職志的「大新聞」，與同時代的菁英知識分子唇齒相依，成為他們參與新時代，在新時代發聲的重要言論舞台。

除了政論取向的大新聞外，明治初期還有另一種庶民本位的「小新聞」。¹⁰ 這類新聞源自於幕末流行的瓦版新聞，對政治批評毫無興趣，而是以口傳詩歌、市井巷談為主要報導內容，有時也會以錦繪新聞的形式，佐以色彩鮮艷的錦繪圖像，加深民眾印象。1874 年 11 月於東京創刊的《讀賣新聞》，以及 1879 年 1 月於大阪創刊的《朝日新聞》，即為此類新聞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小新聞多半具有將新聞事件故事化、娛樂化、消費化的特質；¹¹ 也由於其訴求對象為一般庶民，新聞呈現內容與形式和大新聞均有所不同。¹² 在各類政論新聞相互傾軋之下，小新聞的立場相對顯得不偏不倚，而得以逃離明治政府的言論箝制。

因此，小新聞的發行量開始逐步超越大新聞，後來更以商業新聞為導向。例如大阪的朝日新聞，在創立之初便引進新式的滾輪列印機，並投注了大量資本額，標榜著新聞的企業化。隨著發行量變大，以及識字讀者群的增加，為因應眾多讀者及時代需求，小新聞也開始刊登時事評論的報導。而在自由民權時期受政府壓抑而沉寂的大新聞也開始轉型，此後日本新聞的走向，便呈現大、小新聞合流的「中新聞」姿態，朝向商業化大眾新聞的路線前進，此番變化也宣告大眾社會時代的來臨。¹³

⁸ 《日新真事誌》開創了論說欄，正式開闢了一個專門針砭時事的空間，其餘的報紙也紛紛受到影響，陸續設置。土屋礼子，〈「帝国」日本の新聞学〉，收錄於山本武利等著，《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 4 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29。

⁹ 此即福澤諭吉的獨立新聞論，重點在追求新聞議論的公平性及自由性。詳細敘述見土屋礼子〈「帝国」日本の新聞学〉，收錄於山本武利等著，《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 4 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頁 33-37。

¹⁰ 大、小新聞的說法，最早來自於 1911 年朝倉龜三的《本邦新聞史》。而日本新聞史研究的鼻祖，小野秀雄於 1922 年的《日本新聞發展史》當中，也針對大小新聞的性質做了比較和定位。參見朝倉龜三，《本邦新聞史》（雅俗文庫，1911）；小野秀雄，《日本新聞發達史》（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1922）。

¹¹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譯，《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頁 125。

¹² 舉例來說，大新聞的閱讀對象為知識分子，因此新聞寫作多半都以具備漢文漢語閱讀能力的文學素養為前提；至於小新聞則少用漢字，以符合一般庶民的閱讀能力。從這一點也可發現，明治初期的日本民眾，其識字程度與閱讀能力有重層落差，能閱讀假名的民眾，不一定就代表具備閱讀漢字的能力。

¹³ 有關大、小新聞轉化為中新聞的過程，見西田長壽，《明治時代の新聞と雑誌》，頁 149-151；鈴木健二，《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メディア》，頁 82-87。

循著以上敘述，其實已經可以追溯出新聞在現代媒體發展事業中的兩個脈絡：第一，是在日本進入明治維新後逐步萌芽，以大新聞為主，以政治評論、政府批判、經濟情勢為基礎而發展的新聞事業。這類新聞的重點，在於使政治人與經濟人交換最新政經情報，故講求最新、最正確的消息報導，呈現的形式也以相對高層的書寫文化為主。第二，則是源自江戶幕府時期即存在的傳統，以小新聞為主，以市井巷談、八卦話題、社會娛樂為基礎而發展的新聞事業。這類新聞源自民間的口耳相傳文化，並隨著近代印刷事業的發達而轉變為書寫新聞，強調能貼近庶民生活感覺的報導形式。因此，報導多半不求真實，而是將新聞故事化，娛樂化，讓資訊得以在一般庶民階層中被流傳消費。¹⁴

明治時期的日本新聞業，同時存在這兩大脈絡的新聞，其發行人與閱讀群也各有不同。有關日本明治期新聞的發行人與讀者層，從表 4-1-1 中可看出，相較於《東京日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後改名為報知新聞）等大新聞，《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小新聞的每日發行人數都高於前者，顯示了小新聞的流通量更大，範圍更廣，也更有機會將新聞訊息傳遞給一般大眾。而小新聞之所以擁有較廣的流通量，與人口比例、新聞內容、印刷文體、新聞價錢等等都有關係，這些因素影響了新聞的讀者群。¹⁵ 除此之外，識字能力的高低也影響了民眾對新聞的選擇。表 4-1-2 顯示，漢字較多的大新聞主要讀者均為官紳、豪農階級，而小新聞在庶民、商人階級中則具有較高的人氣，至於無文字、以圖像為主的錦繪新聞，則為不識字的下層民眾提供了另一種訊息傳遞的管道。¹⁶

¹⁴ 兩個脈絡的區分概念，來自於吉見俊哉著、蘇碩斌譯，《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頁 122-125；至於這兩類新聞在明治初期，特別是自由民權時期的蓬勃發展與衰退，則可見井田輝敏，〈民権期ジャーナリスト〉，收錄於田中浩編，《近代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スト》（東京：お茶の水書房，1987），頁 95-115。

¹⁵ 大新聞使用較多漢字，價錢也比小新聞來得高；而小新聞則使用較多かな文字及繪圖，價錢也較低廉。

¹⁶ 山本武利對明治期的新聞讀者層作了很詳盡的分析。讀者群的差異，除了有大、小新聞的差異之外，還有東京府與其他地方的地域性差異、各職業階級類別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在不同時期也有著程度不一的改變。山本武利，《新聞と民衆：日本型新聞の形成過程》（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73）；山本武利，《近代日本の新聞読者層》（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1）。

表 4-1-1 明治前期主要新聞每日平均發行份數

新聞名	東京日日新聞	報知新聞	讀賣新聞	大阪朝日新聞	東京朝日新聞
創刊年月日	M5.2.21	M5.6.10	M7.11.2	M12.1.25	M21.7.10
明治 8 年(1875)	7,430	6,881	8,357		
明治 9 年(1876)	9,780	7,144	15,009		
明治 10 年(1877)	10,951	7,978	17,832		
明治 11 年(1878)	10,915	6,907	21,741		
明治 12 年(1879)	8,231	7,708	20,884	2,586	
明治 13 年(1880)	8,094	8,080	20,822	7,474	
明治 14 年(1881)	8,207	9,580	17,721	11,361	
明治 15 年(1882)	8,492	8,154	17,405	13,802	
明治 16 年(1883)	5,496	6,746	15,911	21,493	
明治 17 年(1884)	5,314	5,692	16,813	24,925	
明治 18 年(1885)	4,132	5,497	15,453	33,192	
明治 19 年(1886)	4,549	6,572	13,232	30,608	
明治 20 年(1887)	10,648	14,963	11,818	33,966	
明治 21 年(1888)	11,243	21,866	13,352	36,029	6,000
明治 22 年(1889)	12,990	19,428	15,357	41,906	9,496
明治 23 年(1890)	12,234	20,568	16,385	49,539	30,000
明治 24 年(1891)				59,497	60,155
明治 25 年(1892)				67,994	71,943
明治 26 年(1893)	16,227	24,508	16,166	67,222	67,393
明治 27 年(1894)	17,114	21,684	17,973	93,758	76,765
明治 28 年(1895)	17,914	20,914	18,897	102,085	66,956
明治 29 年(1896)	18,269	21,230	18,770	90,316	47,642
明治 30 年(1897)	19,088	21,965	19,383	100,942	43,904
明治 31 年(1898)	19,197	23,947	18,547	106,612	42,312
明治 32 年(1899)	18,399	31,929	17,210	113,249	47,894

註：本表灰底之數據為筆者依年間總發行數量，除以基數 300 自行推算得知。

資料來源：土屋礼子，《大眾紙の源流——明治期小新聞の研究》，頁 273-274；山本武利，《近代日本の新聞読者層》，頁 402-407。¹⁷

¹⁷ 大阪朝日新聞及東京朝日新聞的數字，均來自：朝日新聞百年史編修委員会編，《朝日新聞社史資料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這裡要注意的是，由於是自家新聞社所記載之資料，相較於各年度《警視廳事務年表》中記載的朝日新聞發行份數，朝日新聞自行記載的數字皆有膨脹，但整體而言，小新聞的發行份數還是高於大新聞。

表 4-1-2 明治初期的識字階層

識字階層	教育程度	新聞的階層性	社會階層
識字者（かな+漢字）	中等教育以上	大新聞	士族、豪商、地主
準識字者（かな）	初等教育	小新聞	平民（上層）
非識字者（無文字）	無	錦繪新聞	平民（下層）

資料來源：土屋礼子，《大眾紙の源流——明治期小新聞の研究》，頁 47。

前兩章不斷提及的異己想像報導，可想而知，多半會集中出現在能吸引庶民注意的小新聞之中。因為小新聞的報導取向較不受官方政治立場的涉入，報導目的也不以追求真實訊息為優先，使得有關南方異己形象的敘述五花八門，宛如《山海經》一般，得以完整地保存其誇大、獵奇與娛樂性質。另外，更因為小新聞設定的讀者群是廣大的一般庶民，使這些異己想像內容得以更廣泛、更不受限的形式，在日本中下階層流通。因此，小新聞成為日本人異己想像重要的產出基地。

二、日本帝國與大眾媒體

大眾媒體做為西方文明的一環，與近代日本帝國的興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首先，新聞報紙的出現，提供人民一個知識流通的平台，不僅僅是政府「上意下達」的宣傳工具，新聞也成為各階層、各地域人群「下意上達」的重要媒介。¹⁸ 明治以降，各式新聞接連誕生，來自不同身分的知識份子共同參與辦報，更呈現一股與政府相互抵制的輿論力量；而後期商業性大眾新聞的茁壯，除了說明新聞經營型態的改變，更代表大眾社會時代的來臨。因此，透過知識的流通，使得原先四散各地的日本人群得以結合，進而凝聚國民意識，而後日本取得殖民地，更是透過各種媒體形式傳遞訊息，以鞏固日本帝國。在十九世紀後期這個重要時刻，新聞見證、促成了日本帝國的茁壯。

除此之外，作為西方文明代表的新聞，也扮演文明開化的重要角色，即所謂「國之木鐸」，代表國家擔任文明啟蒙的指導者。¹⁹ 這使政府最初對新聞採取保護政策。明治政府最早公布的新聞相關法規，為明治 2 年（1869）的《新聞紙印行條例》。而有關政府對新聞媒體的角色期許，在明治 4 年（1871）的《新聞紙條例》

¹⁸ 「上意下達」與「下意上達」概念的討論，見山本武利，〈草創期のジャーナリスト群像〉，收錄於田中浩編，《近代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スト》，頁 3-19。

¹⁹ 木鐸一詞出自《論語，八佾第三》：「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原意為銅鐘之木舌，為孔子六藝教學之用具，取其振聾起瞶之用，後世則將木鐸引申為指導、教化者之意。明治時期的知識份子，也會以木鐸一詞形容新聞及新聞記者。

才被條文明確化。該年 7 月 19 日，在新聞蓬勃發展之際，明治政府公布了《新聞紙條例》，宣示新聞的功能：

- ◎ 新聞應以開啟人類知識為目的。
- ◎ 若人類知識開啟，便可破除頑固偏狹心態、導向文明開化之域。故應不分內外，紀錄所有事實，並由繁化簡、由遠至近，以增廣讀者見聞，為國家增添裨益。
- ◎ 新聞應警發勸戒人心，並務必記載有益於世的新發明器物。
- ◎ 若為無害之雜談、詼諧記載，可記錄。
- ◎ 文章應平易近人、避免奇字僻文。政府期待，新聞能啟蒙、開化不屬於知識階層的庶民。²⁰

由上可知，新聞自一開始就被官方賦予「文明開化」與「政治社會化推進」的重要任務，成為政府向人民宣傳新知的媒介。²¹ 除了官方之外，明治時期介紹西洋新知的許多重要民間人物例如福澤諭吉，本身也是辦報人。福澤創辦《時事新報》，標榜著「不偏不黨」的獨立新聞精神，一方面要擺脫自由民權時期新聞為政黨服務、言論無法獨立公正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希望新聞以傳遞西方新知為主，不為外界勢力所影響。²² 在明治維新時期，新聞成為西方進步的象徵，也負載了教化群眾的任務，其功能性在傳入日本之初便顯而可見。

大眾媒體見證日本帝國的成長，但更多時候，卻成為帝國對內鞏固國權、對外戰爭擴張的共謀者。²³ 由於明治初期維新內亂，社會動盪不安，因此明治政府對取締反政府言論格外重視，自《新聞紙條例》公布後，反維新政府的新聞媒體越來越多，使得明治政府轉變保護態度，開始對新聞、出版物進行嚴格管制。明治 6 年（1873）10 月 19 日，政府在新公布的《新聞紙發行條目》中，取消了獎勵新聞啟蒙的相關條文，除了改新聞發行為許可制之外，還加強了統制新聞媒體的力度，例如「不許在官者在新聞中針對政治、法律妄加批評」、「針對海外相關報

²⁰ 本段條例為摘錄非全文，引用自柳田泉，《明治初期の文学思想》上卷（春秋社，1965），頁 90；佐佐木隆，《日本の近代 14 メディアと権力》，頁 39-40。

²¹ 井田輝敏著，〈民権期ジャーナリスト〉，收錄於田中浩編，《近代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スト》，頁 99。

²² 內川芳美、新井直之編，《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ズム》（東京：有斐閣，1983），頁 24-26。

²³ 山本武利，〈「帝国」を担いだメディア〉，收錄於山本武利等著，《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 4 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頁 2-22。

導，不得妄加誇大文字」等等。²⁴ 到了明治 8 年（1875），更修訂出新版《新聞紙條例》，對報社印刷、發行者的規範條件更加嚴格，同時還制定了《讒謗律》，任何誹謗政府官吏的新聞人士，均可捕捉入獄或罰金。這兩條法令宛如緊箍咒，不但宣示了政府管控反動媒體的決心，也成為政府壓制自由民權時期各家媒體的武器，許多人士更因大小不一的「筆禍」紛紛入獄，這兩個法令因而博得了「扼殺新聞」的惡名。²⁵

新聞在日本創立之初，即掌握在支配階級手中，作為政府宣傳政令的工具。即便後來在自由民權運動時期，新聞為各自的政黨服務，具有強烈的對立意識與言論闡述空間，但在政府強力的新聞控管政策彈壓之下，這種對立政府的反抗意識便逐漸消弭，轉型成號稱中立的大眾商業新聞。²⁶ 即便如此，這類商業性大眾新聞還是無法做到完全不偏不倚的立場，當帝國對外擴張時，國內輿論往往一致支持政府出兵行動，成為帝國的戰爭宣傳利器。

因此，從文明啟蒙、抑或是國權鞏固的角度來看，新聞媒體都不斷地受到來自上層國家力量的箝制管控。官方宣傳文明啟蒙的重要性，也壓制與自身立場迥異的「反動」新聞媒體。明治新時代的到來，與新聞媒體的出現，固然使民眾「下意上達」的發聲機會提升，但新聞作為社會相互溝通的媒介，其擁有的強大力量，在更多時候卻依然成為替政府「上意下達」、「振聲發聵」的工具。

三、 帝國、大眾媒體與異己論述

前面曾提及，由於異己想像的報導性質較不涉及國家政治立場，因此受到官方箝制的機會不大。但是，當異己想像結合對外戰爭、國家民族發展等議題時，受到帝國權力控制的大眾媒體，便可能配合官方立場，協助主導、操弄一套帝國對外的異己論述。

日本國家民族意識的形成，來自於三大脈絡。首先，從幕末以來以水戶學為主的「尊王攘夷」、「國體護持」思想，是明治時期民族主義的原動力。²⁷ 第二，

²⁴ 佐佐木隆，《日本の近代 14 メディアと権力》，頁 55。

²⁵ 有關自由民權時期的各種筆禍事件，見佐佐木隆《日本の近代 14 メディアと権力》，頁 55-68。

²⁶ 明治 6 年新聞紙條目公布後，政府加強控管新聞，更積極排除幕末以來外國人、自由民權者等人的新聞勢力。即便是標榜商業取向的朝日新聞，也在大正 7 年發生「白虹貫日」大逆事件之後，削弱了原先因米騷動事件而興起的反政府對立意識。山本文雄編著，《日本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史》（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1970），頁 39-41、65-67、109-111。

²⁷ 水戶學是一批由德川幕府的藩屬，編修《大日本史》的水戶藩藩士所發展出來的學問，核心思想為尊王攘夷、國體論、經世實用之學等等。水戶學主張尊重皇室，提升天皇的地位，為幕末尊王攘夷運動、明治維新運動提供了不少思想基礎。鈴木健二，《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メディア》，

近代日本在西方化的過程中，接受許多來自歐洲的文明開化知識，也吸收了國家、國民等概念，為日後「國民國家」的成立提供知識基礎。例如福澤諭吉，就受到歐洲思想的影響，而極力主張獨立論、主權國家論，以及國權論等等，確立日本作為近代國家的條件。²⁸ 第三，在過度歐化的同時，因應外力入侵的危機感所衍伸出的反歐化國粹主義運動，促使知識份子開始追求國權提升，使日本在富國強兵之際，也不斷地形塑國家民族意識。以陸羯南為例，便積極在《日本》新聞連載文章，強力批判崇洋的鹿鳴館外交，並強調東洋日本的特殊性。²⁹ 以上三個日本民族意識的形成脈絡，與新聞媒體相互結合，並向群眾宣傳大和民族的想像概念。同時，在日後也結合了日本周邊的異己想像知識，融合成一套以日本為中心的大亞洲主義想像。

至於媒體如何結合異己想像，並宣傳自我民族概念？對外戰爭報導是很重要的一項途徑。無論是對官方或是民間，戰爭報導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新聞，都擁有更高的關注話題。因此，戰爭新聞也是報社提升發行人，獲取利益的一大機會。³⁰ 當然，發行量的提升，也使描述海外異己的報導獲得更高的可見度。從臺灣出兵開始，對海外異己的描繪，就是一套不斷區分自我與他者、文明與野蠻的過程。而與臺灣出兵相同，日清戰爭更被福澤諭吉直接比喻為一場「文明對野蠻」的戰爭。³¹ 作為戰爭敵人的臺灣原住民與清國士兵，便被日本新聞媒體強化其野蠻象徵，更成為了與文明日本對立的野蠻他者。因此，透過宣傳戰地報導的過程，新聞也不斷為國內民眾區分兩者之間的文明程度差異。而從日清戰爭到日俄戰爭，近代日本對外戰爭的接連勝利，日軍整齊、威猛、強盛的戰地報導，更是鞏固、提升了自我民族優越感，在強化自我的同時，也強化了由官方建構的異己論述。³²

頁 43-46。

²⁸ 有關福澤諭吉的上述思想分析，可見木村時夫，《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史論》（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3）。

²⁹ 陸羯南本身是個新聞人，也充分運用當時自己所屬的《日本》新聞，發表對國家及社會的看法。相關思想敘述見鈴木健二，《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メディア》，頁 62-75。

³⁰ 除了因政府控管，而造成媒體為帝國服務的現象之外，戰爭時民眾需要了解戰地狀況，造成新聞發行人上升，這也使新聞產生巨大收益，這也是使新聞最後修正自身立場，轉為服務帝國的原因。山本武利，〈「帝国」を担いだメディア〉，收錄於山本武利等著，《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 4 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頁 2-6。

³¹ 鈴木健二，《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メディア》，頁 55。

³² 這裡必須補充一點，即便在許多研究中，都指出明治政府管制了新聞報社的海外戰爭報導，但這不代表當時的新聞中，完全沒有出現異質的聲音。一般來說在戰爭初期，政府對海外狀況尚不了解，因此記者所報導的海外新聞，或是拍攝的照片，很可能都是不利於日本國內的消息。例如日清戰爭時日軍攻佔旅順後的虐殺畫面，就已被新聞記者報導刊出。而官方在這些消息報導後，才著手壓制控管新聞。亦即，管制新聞言論的作為，會出現時間延遲的現象。相關敘述

在本章第三節將述及的臺灣理蕃戰爭，也屬於同樣的脈絡。

本節敘述作為帝國之聲的新聞媒體，如何在近代日本帝國形成之際，與其同時萌芽、發展，最後成為帝國控制大眾輿論、形塑國家及民族意識的發聲工具。至於這兩者的共構關係，如何掌控、形塑出一套異己想像論述，以下舉出四項重點為本節做結。首先，隨著國家發展，官方逐漸具有掌控新聞媒體的權力。第二，由於掌握了新聞媒體，官方可以主導對「野蠻」的詮釋權，並形塑特定的異己想像。第三，這些對海外異己的特定野蠻想像，不但影響了國內人民的異己想像，甚至可能成為戰時的宣傳武器。最後，透過戰爭宣傳，異己形象得以進一步強化，不僅促使了官方異己論述的出現，也鞏固了自我民族意識。

第二節 學術脈流

上一節闡述大眾媒體與帝國之間的共構關係，並強調帝國官方擁有掌握新聞媒體的權力，主導異己想像的形塑。而在建立一套官方的異己論述之前，勢必得有學術調查研究的支持。透過人類、動植物、地質、考古等領域的學者們，前往異域進行實地調查，才能進一步產出異己知識。亦即，學術調查是建立異己論述最重要的一項前提。

那麼，學術調查工作所生產的龐大異己知識，又是如何流出，進而形成異己論述呢？其中一項主要的途徑，便是透過學者為官方政府撰寫的調查報告書。以臺灣為例，為了進行海外殖民地統治，政府官員便提供經費，派遣學者前往臺灣進行調查，並透過他們撰寫的調查報告，轉化成日後統治異己的殖民政策。³³ 在這些官方報告、殖民政策中，即參雜了官方的異己想像知識，如理蕃政策便是很明顯的例子。「官方報告→政府官員→殖民政策」這條知識脈流，是建立異己論述的一條重要途徑。

但除了官方這條路線，也不能忽略新聞媒體的力量，特別在幫助形塑民間的異己想像方面，這是另一條重要的知識脈流。在學者進行調查工作之際，除了替官方撰寫報告之外，這些異己知識也同時在媒體新聞刊登。政府官員可從官方報告中獲知完整的調查成果，但民眾就必須從這些零星的報導中獲取異己知識。學

見井上祐子，《日清、日露戦争と写真報道》（東京：吉田弘文館，2012），頁 56-58。

³³ 例如陳偉智，就曾分析日治初期伊能嘉矩對臺灣蕃人的學術調查研究，如何影響了官方政策，以及日後臺灣蕃人知識體系的建立。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術調查的成果，透過大眾媒體散布，使得這些知識得以流向一般大眾，滿足他們對異地異己的好奇需求。³⁴「新聞報導→一般民眾→異己想像」的知識脈流，也是重要的異己知識傳遞途徑。考量到新聞的流通範圍、讀者群的大小與口語宣傳效果，其擁有的影響力甚至不亞於官方報告。

雖說知識脈流的路線被粗分成上述兩條，但流通路線絕非只是由上往下的單線式流通。舉例來說，一般民眾也有可能反過來影響新聞生產異己報導，讀者投書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另外，無論是官方報告或是新聞報導，也都可能同時影響著官員與民眾形塑異己想像，而使知識脈流相互接合。亦即，這兩條脈流路線也非完全互斥，而是可能相互影響的。

接著，本節將論述以民間大眾為主的知識脈流路線，並就「脈道——知識傳遞管道」、「源頭——知識產出者」，以及「岔流——產出與管道之重層」三項進行分析。除了介紹大眾媒體作為民間異己知識傳遞的重要平台，以及學術調查與媒體的關係之外，也將分析學術調查做為一個「重層異質」的知識產出體，如何展現在新聞媒體上，並影響異己論述的建立。

一、脈道：媒體的公共性與知識傳遞

前節曾提及，明治初期的維新政府致力於追求文明開化，因此對新聞媒體啟蒙大眾、潛移默化的力量賦予極高期許。但作為文明宣傳利器的新聞，該如何劃破藩籬、深入民間，喚醒蒙昧群眾的智識呢？政府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兩個現實問題。首先，當時要購買一份新聞報紙，對平民階層來說，是一項極為奢侈的開銷。³⁵在印刷成本無法壓低、民眾收入水準偏低的狀況下，新聞並無法深入民間社會。第二，明治初期的庶民識字率並不高，對於特別像大新聞這類用字較為艱澀、或是報導硬性議題的新聞，民眾缺乏自行閱讀的能力。³⁶因此，為了使人民

³⁴ 在此必須提醒，大眾媒體本身也可分成「學術雜誌」與「一般新聞」兩項。這兩個新聞平台所提供的異己知識質量，及其所面對的閱讀大眾群，是不同的。舉例來說，《東京人類學會雜誌》與《東京朝日新聞》所設定的閱讀對象，便可能出現知識分子與一般庶民的差別。但這並不代表雙方的異己知識是相互隔絕的，兩種新聞平台也可能相互交流，《東京朝日新聞》也可將《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中提及的異己知識，轉錄成自身報導，即便內容質量可能有所落差。

³⁵ 以 1873 年的物價水準為例，當時米一升的價格是 6 錢，而一般粗工的日薪是 30 錢上下。一份《東京日日新聞》的價格為 1 錢 6 厘，配送新聞到各地的郵資是 20 錢，還得額外負擔其他費用。以上數據引用自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時代——國家的設計と知の歷程》（東京：木鐸社，1984），頁 351。

³⁶ 根據 1882 年的《文部省年報》統計，「能自行寫出姓名」的人民，滋賀縣為 32.2%（男子 14.5%），群馬縣為 48.6%（男子 20.8%）。從這些數字可以概略得知關東、關西地方民眾識字率狀況。以上數據引用自山本武利，《新聞と民眾：日本型新聞の形成過程》，頁 45。

順利吸收新聞報導內容，達到文明開化之目的，政府便在各地設置許多「新聞縱覽所」及「新聞解話會」。

（一）從單向傳遞到雙向流通

新聞縱覽所，也被稱作「新聞茶屋」，是一個結合閱讀新聞、喝茶聊天的知識傳遞場所。縱覽所的概念，源自於 18 世紀英國咖啡屋（coffee house），是顧客消費新聞、交換資訊的重要場所，當時在倫敦市區林立的咖啡屋，至少就有 2000 家之多。³⁷ 明治初期為了普及新聞，官方和民間有識之士便出資興建縱覽所，自明治 5 年（1872）在東京淺草設立以來，至明治 17 年（1884）東京一共設了 33 間縱覽所。縱覽所的設立地點，多半是一般庶民聚集的場所，例如寺院、商店街等地，另外也會特別設置在「具有文明開化性質」的場所，諸如學校、車站、公園等地。³⁸ 縱覽所內提供各式新聞供民眾借閱，借閱價格也相對便宜，還提供茶水及女侍服務，因此吸引了許多民眾進駐。

新聞解話會，則是在各地學校及町村辦公處舉辦，半強制的要求地方住民聚集，由該地的神官、僧侶、公務員等識字者擔任講讀人員，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將該地合資購買的新聞向民眾轉述、講解報導內容。³⁹ 不只是一般地域，當時連首都東京也可以看見解話會，由講讀人員露天講解新聞內容。若說縱覽所提供一個價格低廉的資訊公開環境，供民眾自行閱讀吸收知識，那麼新聞解話會則是一種更為公開、更貼近庶民大眾的知識傳遞方式，也更為符合官方期許的「破除頑固偏狹心態、導向文明開化之域」。知識的公開性，與經濟性價值的低廉化，提升了新聞傳遞知識的廣度與效度，不僅達成促進文明開化之效，更奠定了日後民主意識的思想基盤。⁴⁰

縱覽所與解話會的設立，不只對日本大眾媒體的發展影響甚大，更為知識傳遞提供重要的公共空間。原先作為官方宣傳文明開化的場所，卻成為民間交流資訊的開放平台。對知識分子而言，相較於在家自行閱讀新聞吸收知識，公共場合的新聞知識來源其實更來自於其他人的評論，而集體性的消費行為不只使知識份

³⁷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譯，《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頁 114-115。

³⁸ 渡辺賢二編，《広告・ビラ・風刺マンガでまなぶ日本近現代史》（東京：地歴社，2007），頁 32-33。

³⁹ 井田輝敏，〈民権期ジャーナリスト〉，收錄於田中浩編，《近代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スト》，頁 100-101。

⁴⁰ 山室信一，《法制官僚の時代——国家の設計と知の歷程》，頁 371。「經濟性價值」一詞為作者原文翻譯，特此說明。

子受益，更使得閱讀能力不足的一般庶民也能從旁聽到口頭新聞。因此，縱覽所與解話會成為重要的知識產出中心，來自各方的紛雜訊息被不同階級、不同領域的民眾吸收詮釋，知識普及後隨之產生的社會輿論場域，更是日後「市民」階級抬頭的契機。⁴¹ 無論英國的咖啡屋、法國的沙龍或是日本的縱覽所，這些公共空間的出現，均促使了市民意識的形成，更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逐步從官方手中奪得影響力。

（二）從地理平台到媒體平台

另外，新聞媒體擁有的公共性功能，透過公共空間的運作被進一步強化。將知識化做文字、圖像訊息的新聞，本來只是官方傳遞文明知識的管道，但透過縱覽所與解話會的交流，原先作為接收者的一般民眾，得以逐步反轉成知識產出者，甚至將大量知識回饋給新聞報紙，即所謂的社論新聞。本來欲以知識餵養、開化民眾的大眾媒體，反而得仰賴來自公共空間民眾的知識訊息，並將之轉化為新聞報導。亦即，公共空間為新聞媒體與一般大眾提供一個雙向交流的知識平台，使知識不再只是單向的餵養關係。而藉由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的參與，不只是縱覽所、解話會這類有形的公共空間，連新聞本身都得以化作交流知識訊息的公共平台。⁴²

因此，新聞宛如紙上的縱覽所，來自不同立場的各類報導紛雜其中，都等著更多知識份子討論參與，或讓一般庶民吸收散佈。在花了許多篇幅敘述大眾媒體的公共性功能，及探討知識傳遞的管道途徑後，接著就要將討論視角移至這條知識傳遞脈流的源頭，也就是異己知識的產出者——學術調查與大眾媒體的關係。

⁴¹ 德國社會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即注意到以咖啡屋為基礎而形成的公共討論空間。他認為這公共場所具有「以社會地位平等為前提」、「重新檢視以往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以及「將資訊藉由討論轉化為商品」等三項特性，而這些特性促使了市民階級的誕生。哈伯馬斯更指出，18世紀的英國，新聞和市民階級相輔相成，更進一步對文藝、政治提出批判與評論。若就明治10年代自由民權時期與新聞的關係來看，哈伯馬斯的說法在日本也適用。相關概念可見：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臺北：聯經出版，2002）。本書最早於1962年在德國出版，書名為「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其中 Öffentlichkeit 一詞，曾有「公共性」、「公共領域」、「公共論域」、「公共空間」等不同譯法，中譯版譯者曹衛東取其社會層面之意，並譯作公共領域，而本文則採用公共空間一詞。

⁴² 哈伯馬斯的這套概念，預設社會上所有階級的人民均有參與公共空間的能力。但事實上，只有接受過良好教育並握有資產的人，才能進入公共空間，社會的多數中下階層民眾依然被排除在外。由於哈伯馬斯過分注重對資產階級公共空間的研究，而忽略了對平民公共空間的關注，使得這套理論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遭受質疑。

二、源頭：學術調查、知識產出與媒體

對民間大眾來說，新聞媒體是異己知識的重要來源，也是傳遞異己知識的管道平台，而生產這些異己知識的源頭，可以是前往異地赴任、經商、遊歷的官員或商旅，也可以是進行實地調查的人類、動植物、地質、考古等學術研究人員。前者提供異己想像的諸多紛仍面貌，而後者對於形塑體系性異己知識的幫助更大。本段要探討的，即是這些透過各類學者實地勘察後產出的學術知識，如何被新聞轉錄、報導，並呈現背後的異己知識及想像。

（一）調查時程與新聞媒體並行

學者前往海外異地進行學術調查，除了基於本身的研究慾望之外，也同時受到國家力量的驅使。例如日本領有臺灣之際，伊能嘉矩、鳥居龍藏等學者，便接受官方囑託前往臺灣進行調查。而這些學者在每一次調查結束後，都會陸續產出相關的異己知識，並撰文發表至學術雜誌。但這些異己知識不單單只刊載在學術雜誌內，也會成為大眾新聞、特別是日刊新聞的報導。日刊新聞擁有訊息即時性、資訊片段化的特性，使得學者在展開學術調查時，從行前、調查中以及調查結束等階段，任何消息都可能化作一則新聞。下段就以鳥居龍藏在 1897 年 10 月至 12 月、第二次前往臺灣進行學術調查時，《東京朝日新聞》的一連串報導為例，敘述異己知識如何在學術調查的不同時點，分別轉化成異己新聞報導。

此次鳥居龍藏的調查對象，主要是臺灣東南方紅頭嶼的蕃人，調查日程如下敘述。⁴³ 鳥居在 10 月 6 日搭乘「橫濱丸」抵達基隆港後，曾寫了一封信通知東京的坪井正五郎告知概況；12 日至 16 日，鳥居滯留臺北調查圓山貝塚遺址，並於 16 日搭船前往紅頭嶼；10 月 25 日，「打狗丸」順利抵達紅頭嶼後，鳥居將這幾天的紀錄匯成另一封信，交由船隻帶回臺灣轉寄至日本，後來這兩封信的內容及研究敘述，被刊載至《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以及《東京地學協會雜誌》；⁴⁴ 此後兩個月，鳥居均待在紅頭嶼進行調查，並於 12 月底離開。這段期間的研究成果，則刊載於 1898 年年初的《東京地學協會雜誌》。由上所知，有關紅頭嶼蕃人的異己知

⁴³ 鳥居龍藏第二次臺灣調查旅行的詳細日程及路線圖，可參考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首頁附地圖。

⁴⁴ 其中 10 月 25 日的信，分成 2 個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寫給坪井正五郎的信，這部分內容被刊載至《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 13 卷第 141 號；另一部份是專門為《東京地學協會雜誌》撰寫的稿件，刊登在第 9 輯第 107 卷。另原文所記載的時間有些許訛誤，楊南郡也對此做過說明，詳見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頁 248。

識產出時間為 1897 年 10 月底至 12 月中旬，而內地日本要到翌年年初才可能得知。

那麼，內地日本的新聞是如何追蹤、報導鳥居龍藏此次的調查之行呢？首先，在鳥居尚未前往臺灣時，《東京朝日新聞》在 9 月初即介紹人類學者鳥居龍藏將於近日前往臺灣東南部紅頭嶼從事蕃人研究調查。⁴⁵ 另外，也說明此次前往臺灣調查之目的，是為了「不讓帝國新領土之調查研究，為西方人所掌控」，此事攸關「我國學術界的顏面」，政府近年正大力推動調查事業。⁴⁶ 這些行前報導，不只向民眾解釋鳥居為何要前往異地臺灣進行調查，同時也闡述帝國對新領土的關切，以及積極競爭之心態。而 10 月 3 日出發當天，以及鳥居抵達紅頭嶼開始調查後，《東京朝日新聞》也都做了追蹤報導，持續關注此事。⁴⁷

1898 年初，鳥居龍藏的研究成果傳回日本內地後，除了在學術雜誌刊登文章外，《東京朝日新聞》也沒忘了轉載這些異己知識，並將之化作一連好幾天的連載報導。在此可以注意的一點，是新聞如何挑選議題。首先在 1 月 16 日，朝日新聞就以聳動的〈紅頭嶼探險者的慘死〉為題，報導與鳥居龍藏隨行的中島藤吉，在紅頭嶼因用火不慎燒死於屋內的憾事。⁴⁸ 新聞不先報導重要的異己知識，而選擇報導調查中的八卦軼聞，是為了挑起民眾的興趣，也滿足當時日本人對海外異域野蠻危險的想像，即便此事並非由蕃人引起。翌日，朝日新聞便摘錄了鳥居的研究成果中，有關祖先來源口傳、土人對外界的地理概念，以及喜歡銀製硬幣等風俗趣事製成報導。⁴⁹ 其中土人的地理概念與愛好銀幣等兩項，與《東京帝學協會雜誌》刊載的學術文章內容相同，但對一般民眾來說較不感興趣的社名及家屋架構，新聞就沒有選擇轉錄。再隔幾日，朝日新聞刊載了紅頭嶼土人的人種報導，這也呼應前兩章所提及的，當時的日本人對人種概念的敏感，並藉此確立我者與他者的界線。⁵⁰

從鳥居龍藏的調查時程，可以反映出當時的新聞媒體，是亦步亦趨地跟隨著海外異己學術調查，並從學術雜誌中轉錄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學術調查負責產出異己知識，媒體則擔負向大眾傳遞訊息的角色，兩者並行。除此之外，從報導的性質可以看出，學者撰寫的學術成果文章，會經過媒體的節錄、篩選，化作一

⁴⁵ 〈鳥居龍藏氏〉，《東京朝日新聞》，1897 年 9 月 6 日，朝刊，第 3 版。

⁴⁶ 〈台湾の學術的調査事業〉，《東京朝日新聞》，1897 年 9 月 13 日，朝刊，第 2 版。

⁴⁷ 〈電報 德島特發〉，《東京朝日新聞》，1897 年 10 月 3 日，朝刊，第 1 版；〈台湾近事〉，《東京朝日新聞》，1897 年 10 月 29 日，朝刊，第 3 版。

⁴⁸ 〈紅頭嶼探險者の慘死〉，《東京朝日新聞》，1898 年 1 月 16 日，朝刊，第 3 版。

⁴⁹ 〈紅頭嶼談片〉，《東京朝日新聞》，1898 年 1 月 17 日，朝刊，第 7 版。

⁵⁰ 〈紅頭嶼土人の人種〉，《東京朝日新聞》，1898 年 1 月 20 日，朝刊，第 3 版。

般民眾容易接受吸收的報導內容。

（二）學術知識與新聞呈現形式

前面提過，異己知識具備誇大、獵奇、娛樂的性質，不僅報導方式不設防、內容真偽不受限，更因此得以在中下庶民階層廣泛流通。為了吸引一般庶民注意，有關異己知識的新聞選材及呈現形式，都盡量貼近、滿足娛樂大眾的訴求。⁵¹ 以伊能嘉矩對臺灣蕃人的研究為例，當《讀賣新聞》報導伊能嘉矩的調查內容時，即特意挑選蕃人歌謠、結繩等趣味風俗知識。⁵² 在介紹生蕃傳統歌謠時，新聞透過意譯的方式，翻譯泰雅族新婚男女對唱的歌謠，或是將鄒族的獵首歌直譯成日文版本。更有趣的是，報導附錄了一段用蕃語轉譯日本歌謠和俳句的文字，甚至還特地用片假名標註各單字的蕃語拼音，讓讀者體會異文化間的交流：⁵³

忍赴此身，放出一響驚如初夜蟬鳴。

Barisoi a bufu ka、midaheru u hinen a muhoni rahokui。

歛目 身、作響 夜 鳴叫 蟬。

古池井蛙投水之聲。

Mudizaya rudoku a、bairutsuto ra darumu a baraguru a tatokuto。

古老 池、跳入 水 蛙 撲通（水聲）。

這樣的新聞報導，已不僅是單純誇大、獵奇的報導資訊，還是一種基於人類學者的研究成果，以自身文化詮釋、理解蕃人心態的資訊呈現方式。就這樣，五花八門的異己知識，在公開的新聞平台透過多元的報導形式呈現，使普羅大眾透過日常生活的新聞閱讀，逐步累積異己知識，並形成異己想像。

當然，新聞並不會只一味地化繁為簡，或提供八卦趣聞報導而已。即便是一

⁵¹ 當然，這也與本文所引用新聞的取向性質有關。明治時期的《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均為小新聞，因此報導內容也多半偏向娛樂、獵奇性質。另外，新聞也會依照報導性質，分別放入各版主題，例如《讀賣新聞》的第5、6版即以「趣味新聞為主，介紹文藝科學、家庭方面等有趣的報導」。下述伊能嘉矩的研究報導，即刊登在第5版。而上面有關第5、6版的性質敘述，可參見〈刊頭主標〉，《読売新聞》，1907年4月24日，第5版。

⁵² 伊能嘉矩，〈台灣蕃人の結繩〉，《読売新聞》，1907年4月24日，朝刊，第5版；伊能嘉矩，〈台灣蕃人の結繩（承前）〉，《読売新聞》，1907年4月25日，朝刊，第5版。

⁵³ 伊能嘉矩，〈台灣生蕃の俗謡〉，《読売新聞》，1907年5月8日，朝刊，第5版。蕃人獵首時的禱詞原意為「汝等切勿徘徊作祟，速速前赴升天」。

般大眾，對專業知識也有所渴求，對報導也有求真求實的期望。這時，新聞媒體所刊出的異己報導，便試圖以淺顯的方式，報導當時堪稱先進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新聞擁有的即時性，甚至能讓報導超前學術雜誌，提前將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公開。舉例來說，首位對臺灣蕃人提出體系性分類的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其部分研究成果即於 1897 年底在《東京朝日新聞》搶先刊登。

1897 年 12 月 20 日，在一篇介紹〈蕃人的月亮觀〉的報導中提及，12 月 3 日為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兩位學者舉辦的慰勞會席上，伊能提到蕃人對月亮的概念，由於內容新奇有趣，因此新聞便將伊能的談話內容報導出來。⁵⁴ 伊能舉出了四個對月亮有不同想像的臺灣蕃族，包括「北方，普遍被稱作北蕃，其中的泰雅族」、「南方，普遍被稱作南蕃，其中的鄒族」、「更為南方，被漢人稱作傀儡蕃的澤利先族」，以及「居住於西部平原，被稱做熟蕃的平埔族」等四個蕃族。⁵⁵

當然，四個族群對月亮的想像內容都很有趣，也可以吸引讀者注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報導中已經將臺灣蕃人做了初步分類，也已出現日後稱呼這些臺灣蕃人的族群專有名稱，而這些資訊更來自於伊能嘉矩本人。仔細檢視伊能嘉矩對臺灣蕃人的調查時程，1897 年 5 月至 12 月，伊能與粟野兩人接受總督府的指派，進行為期 192 天的全島性蕃情調查。此時的伊能，才剛剛完成對臺灣蕃人的調查工作。⁵⁶ 相較於伊能在 1898 年 4 月 23 日的臺北城、以〈臺灣土蕃進化的程度〉為題對外首次發表調查成果，以及 1898 年 5 月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上刊登〈臺灣各蕃族的分布〉一文、發表影響日後甚大的「臺灣四群八族二十一部」蕃人分類系屬表，朝日新聞這篇報導所提供的異己知識，顯然早已超前其他散佈知識的管道。⁵⁷

當時閱讀這篇報導的民眾應該無法想像，他們所吸收的臺灣蕃人分類概念，居然早於任何專業的學術雜誌，也早於臺灣總督府的官員們。而報導新聞的媒體人，也無法體會這篇看似平常的趣味新聞中順帶提及的蕃族名稱，竟在日後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日刊新聞所特有的即時性，在此顯露無遺。追求最新消息的媒體

⁵⁴ 報導中有提及，這篇報導的內容轉錄自《臺灣新報》，且為 12 日自臺北發出的新聞消息。顯然，《臺灣新報》刊登這篇文章的時間點，還早於《東京朝日新聞》。

⁵⁵ 〈蕃人の月に対する觀念〉，《東京朝日新聞》，1897 年 12 月 20 日，朝刊，第 7 版。

⁵⁶ 有關伊能嘉矩發布全臺蕃人分類體系研究之時程，陳偉智已做了仔細的時序分析。見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頁 89-108。

⁵⁷ 伊能於 1898 年 4 月 23 日的演講紀錄，見〈台湾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台湾新報》，1898 年 4 月 26 日至 29 日。蕃族分類一文則見伊能嘉矩，〈台湾通信（第 22 回）台湾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東京人類学会雜誌》第 14 卷 146 號（1898 年 5 月），頁 301-306。

與大眾，透過專屬的資訊傳遞管道，得以在官方、學術兩個主導異己調查的單位發表異己知識前，就先行提供新知給內地大眾，使新聞成為學術調查異己知識最初的散佈平台。而學術調查所產出的異己知識，在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於內地日本流傳的時間效能與階層廣泛度，均更為巨大且明顯。

另外，這些學者從事異己調查後出版的學術研究書籍，也會刊登新聞廣告，對一般大眾進行宣傳。例如伊能嘉矩集結此次的臺灣蕃人調查工作內容，於 1900 年出版《臺灣蕃人事情》時，此消息即為《東京朝日新聞》所刊登。報導稱這本著作是總督府為了推動蕃人教育事業，委託伊能嘉矩與栗野傳之丞兩人進入蕃地調查，經過一番跋涉後整理成冊的報告書。報導還引了此書的結論，告訴讀者臺灣蕃人並非如世人想像中那般極度低劣，而此書詳細記錄有關蕃人的知識，對於了解蕃人幫助甚大。⁵⁸ 新聞媒體固然必須配合民眾的喜好與知識程度，篩選節錄學術調查的異己知識，但對於嚴謹的學術調查著作，新聞也盡了對民眾宣傳的教化工作，提供給想求取更多異己知識的讀者一些專業書籍資訊。

三、 岔流：學術知識與媒體的異質性

透過大眾媒體的報導，得以將學者在異地調查產出的異己知識迅速散播給內地的一般日本民眾。從學術產出的知識源流，到知識傳遞的新聞脈道，均已作了概略介紹。但不能忽略的一點是，這條異己知識的傳播脈流，並不是單一規律的平緩河道，而是重層異質的湍急岔流。之所以重層異質，可從兩方面進行討論，即「刊載平台性質」的不同，與「學術知識來源」的不同。前者指出，擔負知識傳遞平台的新聞媒體，本身即具有「日刊新聞」、「學術雜誌」等不同形式，所刊載的異己知識多寡、深淺程度也會不同；後者則強調，作為異己知識產出的學術源頭，也會因為不同學者的立場，而生產不同內容性質的異己知識。以下將比較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這兩位在日治初期對臺灣蕃人研究有重大貢獻的學者，並從中闡述學術知識產出與媒體報導的異質性。

（一）刊載平台性質的不同

一位具有專業學術知識的學者，在前往海外異地時，多半都同時擔負了多重身分。而這些身分，會影響他們日後在產出異己知識時，將這些知識分別交由不

⁵⁸ 〈新刊各種〉，《東京朝日新聞》，1900 年 4 月 18 日，朝刊，第 7 版。

同的知識傳遞管道。以伊能嘉矩為例，他之所以會前往臺灣進行調查，是因為接受總督府官方的囑託，因此可將其視為官方掌控蕃人事務的前哨偵查士兵。另外，伊能也同時是東京人類學會的會員，身負調查帝國新領人群的重要使命，進一步拓展日本的人類學，以與西方競爭。這使伊能同時身兼專家學者和官方雇員的身分，前往臺灣從事蕃人調查。當然，也不可忽略伊能自身對異地異域的好奇心態與冒險慾望，驅使他願意不畏跋涉風險深入蕃地。因此，伊能嘉矩至少身負三種不同身分目的，進入異域從事學術調查。

因此，在調查後產出的異己知識，就可能流向不同的知識傳遞管道。首先，伊能嘉矩必須向提供其經費來臺的總督府報告調查成果，因此官方的復命書成為第一條傳遞管道。透過伊能撰寫的復命書，總督府官員得以初步了解蕃人分布地域、族群差異、文化習俗等異己知識，並藉此擬劃日後的理蕃政策。就臺灣整體蕃人蕃地相關政策，以及中央、地方理蕃機構官員的對蕃態度來看，這條知識傳遞管道強烈地主導這群人的異己想像。也正因這群人是直接面對異己、處理異己事務的官員，因此影響他們異己想像的知識傳遞管道，就更為重要了。

除了官方這條路線外，就是本章主要討論的大眾媒體了。而大眾媒體內部，也會有異質的刊載管道。首先，身為人類學家的伊能，必然會將這些知識回饋給東京人類學會，將異己知識投稿至相關學術雜誌上，豐富日本的人類學知識。學術雜誌的專業性質與閱讀群眾的特定身分，使這條脈道所傳遞的異己知識，無論在質或量的程度，都遠遠高過其他管道。因此，若說深入了解異己知識，並建立一套完整的族群面貌以供後世研究，這條知識傳遞脈流是不可或缺的。⁵⁹

最後，就是大眾媒體的另一個重要形式——日刊新聞。日刊新聞要面對的，是來自不同階層、擁有不同閱讀程度的廣大群眾，以及每天都必須發刊的時間壓力，因此新聞不像學術雜誌那般追求完整嚴謹的異己知識，而是追求資訊的時效性及娛樂性。在這條管道刊登的知識，也多半是迅速、趣味的短篇異己報導，或是篩選、摘錄刊登於學術雜誌的文章片段，如前述《東京朝日新聞》所刊載伊能的研究內容。相較於其他大眾媒體的刊登管道，日刊新聞擁有廣泛的流通範圍，龐大的印刷量、以及貼近普羅大眾的報導取向，因此作為傳遞異己知識的脈流之

⁵⁹ 以殖民者身分紀錄被殖民者的異己知識，並透過學術雜誌等管道流傳下來的資訊，往往成為日後這些被殖民者認識自己、甚至是證明自己族群身分的重要根據。不只是臺灣的原住民族，包括大洋洲的南島土人、東南亞的馬來人等等，都在 20 世紀族群意識興起，甚至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之時，回頭應用西方、日本等過往殖民者紀錄「異己」的知識，形塑屬於自我的族群意識。這是後殖民研究中經常討論的議題。

一，其擁有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小覷。

（二）學術知識來源的不同

透過伊能嘉矩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位負責產出異己知識的學者，會透過不同媒體管道傳遞知識訊息給一般大眾。但是，前往異地調查異己的學者，並不僅只伊能嘉矩一位而已。不同的學者，帶著各自不同的身分立場進入異地，調查時程的長短不一，所獲得的異己知識自然也有所不同。在身分立場、調查時程與伊能嘉矩有著極大差異的森丑之助，就是另一位提供臺灣蕃人異己知識的重要學者。以下即透過對森丑之助的介紹，分析學術知識的重層來源，如何造成異己知識內容的異質性，以及這樣的異質內容，如何豐富了異己論述的多元面貌。

森丑之助和伊能嘉矩一樣，都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即前往臺灣從事蕃人調查。但森氏與伊能不同的地方在於，一開始他沒有任何學術身分，也並非受到總督府的囑託才前往臺灣，純粹是依個人對異地異己的興趣而渡臺。⁶⁰ 森丑之助是到了臺灣之後，才在每一次的田野調查過程中逐步累積學術經驗，並在日後成為重要的蕃界事務專家。而在 1905 年，真正獲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有用植物調查科」囑託的官職前，森氏一直都是以無業遊民的身分遊走全臺蕃界。⁶¹ 偏離學術核心，以及非正統官方代表的特色，導致森丑之助對蕃人蕃地的態度與立場，相對地更加貼近臺灣當地、甚至是異己族群的想法。

另外，森丑之助也與其他短暫來臺從事調查即離開的學者們不同。自 1895 年 9 月來臺後，他只返回日本兩次，一次是在 1913 年 6 月，臺灣蕃務本署裁撤後決心辭職渡日，但隨即於隔年 8 月受總督府之邀再次返臺；另一次則是於 1926 年 5 月，為了《臺灣蕃族志》一書訪日，並在同年 6 月失意的返回臺灣途中結束其短暫的一生。⁶² 長年身處蕃地的經驗，使森丑之助對臺灣蕃人的異己知識及想像與其他調查學者有很大的不同。而地理位置的侷限，使森氏除了幾篇投稿至持續關注異己知識的《東京人類學會雜誌》學術雜誌外，大量知識則多半透過臺灣當地

⁶⁰ 由於日治初期的臺灣仍時時爆發抗日事件，因此總督府特別頒布「渡航內地人取締規則」，除了少數奉命來臺調查的學者，或是自動請纓透過軍職而來的人士，禁止內地的一般日本人隨意移入。森丑之助即是透過陸軍通譯的身分，才得以順利渡臺。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 31-32。

⁶¹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 45。

⁶² 有關森丑之助的大事年表，參見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 601-638。

的新聞媒體，亦即《臺灣時報》、《臺灣日日新報》等新聞報導刊出。⁶³

由於身分與地域的差異，伊能嘉矩及森丑之助兩人遂有不同的蕃界調查經驗，產出的異己知識也截然不同。相較於伊能嘉矩所提供的整體性異己知識，在學術及官方圈邊緣遊走的森丑之助，宛如知識脈流中時有岔出、時又復歸主流的支流，為異己論述提供了多元的另類想像。舉例來說，1900年，時年30歲再次來到臺灣進行為期9個月學術調查的鳥居龍藏，帶著23歲還是年輕隨員的森丑之助進入阿里山鄒族蕃社，冒險「採集」了10個蕃人頭顱。此事引發了不小的風波，後來其中8顆頭顱還給了蕃人，剩下2顆則被鳥居偷偷帶回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標本室收藏。「採集」頭顱這件事對鳥居龍藏來說，似乎是一件無可厚非的小事，但對道德意識濃厚的森丑之助來說，卻讓他忐忑了8年，才敢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一篇「偷竊」觸體懺悔錄。⁶⁴

在〈偷竊觸體懺悔錄〉中，森丑之助開宗明義的表示，「臺灣生蕃獵取人頭不是新聞，我們偷了生蕃所獵獲的人頭才是新聞。」⁶⁵接著森氏便詳細敘述偷竊過程、他基於怎樣的心態決定偷取頭顱、偷竊過程是如何驚險可怖，以及此事被揭發後他如何思考此事。⁶⁶他認為，「鳥居先生和我苦心偷出的觸體，現在已成為大學裡的重要標本。我相信光是提供研究材料這一點，就可以了解對學術界有很大貢獻。」最後，他也希望藉由這篇文章「消除我和鳥居先生身上的罪障。」

從新聞報導的娛樂角度來看，這篇懺悔文的獵奇成分，絕對可以滿足對蕃人

⁶³ 楊南郡曾整理森丑之助的著作目錄，其中投稿至臺灣當地新聞的文章佔了絕大多數，其餘則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中刊出。筆者曾試圖從日本內地的日刊新聞中尋找森氏的文章，但僅僅只有1913年7月5日《東京朝日新聞》的一篇報導，估計為此時森氏剛好身處日本東京的關係。有關森丑之助的詳細著作目錄，見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639-657。

⁶⁴ 鳥居龍藏在事後，並未特別針對發生於鄒族蕃社的這件事進行說明，甚至在同年稍早，經過屏東排灣族力里大社時，兩人也「採集」了一顆頭顱。在那次的「採集」中，森氏在日後刊登於《臺灣時報》的〈生蕃行腳〉連載中，花了大篇幅闡述當時自身的心境轉折，但鳥居卻只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的〈臺灣通信〉投稿文章中以寥寥數語帶過此事。由此看來，兩人對於「採集」頭顱的看法，顯然有很大的差別，對森氏來說，日後甚至得用「偷竊」兩字敘述此事，才能符合他的道德標準。兩人的敘述分別參見：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頁307；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249-251。

⁶⁵ 丙牛生，〈首取懺悔〉，《台灣日日新報》，1908年5月3日，第18版。中譯全文見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偷竊觸體懺悔錄〉，《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280-289。

⁶⁶ 鳥居認為，「若是偷取蕃人首級被發現，就代表我的蕃人研究沒有價值。我會立即中止他的調查研究，挺身奔走，做善後工作，一切由我自己負責，絕不連累官廳。」這段表白不是出自鄒族蕃社偷頭顱事件，而是稍早的排灣族力里大社偷頭顱事件，但已可以說明森氏是如何看待事情被揭發之後，所該負的責任。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251。

有無窮想像的讀者大眾。但除此之外，森氏也藉由此篇報導表達對自身「野蠻」行徑的懺悔心態。而在最後交涉過程，蕃人也並非毫不講理，而是同意兩人將頭顱物歸原主即不再追究，只是鳥居卻又違背約定，偷帶頭顱回國。森氏的敘述中，處處流露他對蕃人的愧疚感，而非一味地將蕃人視為野蠻而不須講理的族群。這樣的異己想像，與其他由官方、學術立場所撰寫的異己知識文章相比，自然是獨樹一格的。

由此可見，森丑之助提供另一種立場的異己知識，顯示了學術知識來源的異質性。諸如此類、偏離研究主軸的多元異己知識，是不太可能出現在官方或是學術雜誌的，多半流傳於一般大眾閱讀的新聞中。亦即，相較於官員或是學術知識份子，一般民眾更有機會獲取多元來源的異己知識，而產生重層異質的異己想像。新聞發揮身為公共平台的角色，成為不同來源異己知識立場彼此碰撞、相融的交會之處。甚至，新聞成為更多來自廣大民間、充滿原生力量的不同異己知識得以公開發表的競逐舞台。⁶⁷ 也透過這樣的開放空間，使多元的異己想像、重層的異己論述岔流成為可能。

本節闡述學術調查與大眾媒體的關係，說明異己知識的產出，與新聞媒體的報導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學術調查產出的異己知識，透過各種方式被新聞截取篩選，進而影響閱讀報導的一般大眾。新聞作為大眾吸收異己知識的公共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一條民間知識脈流。另外，無論是知識產出的學術來源，或是知識傳遞的新聞管道，都是重層而異質的，都共同促成了多元的異己論述。

這樣強調新聞公共性的結論，與上節強調帝國操縱、主導異己論述建立的論點似有衝突，但不妨將之視為兩股同時形塑異己論述的相互制衡力量，在不同的時間點，兩股力量會相互消長。誠如上節以對外戰爭為例，帝國官方即擁有控制戰時媒體輿論的強大權力，戰時建立的異己知識就會趨向單一而兩極化的論述。

⁶⁷ 例如森丑之助曾於1911年6月底至7月初，刊登〈東海岸的蕃族〉的連載文章，介紹臺灣東部蕃族的文化風俗，文中即強調了蕃人長期遭受漢人壓迫，因此形成獵首習俗的說法。但在隔年10月，一位名為「哺乳樹」的化名讀者，則投了一篇名為〈獵首大觀〉的連載文章，直接指明要反駁去年森氏的說法，並提出蕃人起源神話中自古即有獵首相關的事蹟，並非漢人渡臺後才形成。有關「哺乳樹」的身分，筆者未能做一步查證，但可將此文視為回應森氏的另一種多元異己知識立場。亦即，廣大的閱讀群眾，也有回應新聞報導，共同成為異己知識來源，豐富知識脈流的能力。見丙牛生，〈東海岸の蕃族（一）～（九）〉，《台灣日日新報》，1911年6月25日至7月4日，第3版；哺乳樹，〈首狩大觀（一）〉，《台灣日日新報》，1912年10月1日，第7版。

此外，多元的異己論述，並不只靠異質的學術知識產出來源，以及重層的新聞媒體就能形成。隨著日本帝國逐步向外擴展，並取得海外原為異域的殖民地，殖民地的新聞媒體便會跟著出現。新聞媒體的「重層」，並不只是刊載管道與種類的平行式重層，還包括了不同地域的跨界式重層。下節將討論殖民地臺灣的新聞媒體，及其作為帝國海外的「重層」新聞媒體，報導性質及立場與內地日本有何不同。而帝國權力與新聞公共性兩股力量之間的拉扯，在殖民地臺灣的新聞媒體又將呈現何種面貌，也將於下節討論。

第三節 立足異域

1895 年日本領有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後，不只是政府、學者、人民，大眾媒體也亦步亦趨地進入這個遠在南方的熱帶島嶼。總督府在新領地上四處弭平反對勢力，試圖確立其統治權；懷著滿腔調查熱忱的學者深入未知的蕃界山區，紀錄想像中的野蠻人群；遠渡重洋來臺探險、經商或移居的日本人民，設法在人數眾多的臺灣漢人夾縫中謀取新生活；而新聞報社也歷經草創階段的人手、資金不足等諸多困難。無論是誰，大家都得學習在異域立足。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殖民地所展現的地域特性，使新聞的角色與性質變得格外重要。隨著地域差異，原先在內地扮演著文明啟蒙、政令宣傳等角色的新聞，在殖民地臺灣必然會有一些延續或變化。本節將透過地域差異的角度，以殖民地臺灣第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為例，除了分析官方力量如何影響其報導性質，也敘述在臺日本人社群的特殊環境氛圍，如何影響殖民地新聞的發展。

另外，既然出現了地域重層差異，殖民地臺灣新聞就得與內地日本新聞進行比較分析，方能顯現兩者的異同。本節將以異己報導為主軸，特別以五年理蕃戰爭時期（1910-1914）為例，藉由比對兩地的新聞報導，以突顯這段對臺灣理蕃事業至關重要的時期，異己報導之特殊性為何。

一、《臺灣日日新報》的成立概況

在日本開始統治臺灣的明治二十年代，正好是新聞百花齊放、眾聲喧囂的時期，1894 年日清戰爭至 1905 年日俄戰爭的十年「戰間期」，戰地新聞的需求，更使此時期的新聞事業蓬勃發展。新聞發行量增加，加上帝國新領的殖民地，使許多原本在內地從事新聞工作的人躍躍欲試，臺灣的新聞媒體即是在此種潮流中開

始發展。⁶⁸ 亦即，隨著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到來，近代臺灣的新聞媒體事業，是一種外力刺激的他律性發展。⁶⁹ 因此，討論日治時期臺灣新聞業的發展，也必須留意同時期內地日本的新聞業發展狀況。

內地新聞人的設點慾望，加上帝國政府需要一個在臺灣宣傳殖民思想與統治命令的媒介工具，首任總督樺山資紀便授權原任大阪府警務部部長的山下秀實擔任社長，《郵便報知新聞》前記者田川大吉郎擔任主筆，率先於 1896 年 6 月 17 日創立《臺灣新報》，社址位於臺北北門街（今博愛街）一丁目，這也是臺灣第一份近代化的新聞。⁷⁰ 原為不定期出刊的《臺灣新報》，更在同年 10 月 1 日改成每日出刊，成為日刊新聞。⁷¹

1897 年 5 月 8 日，第二份成立的日刊新聞《臺灣日報》由日人川村實隆在臺北創刊，更任用日本知名作家內藤湖南擔任主筆；兩家新聞報社除了商業上的競爭，更為了總督府補助及派系問題相互攻訐。⁷² 除此之外，雙方更會在報上針對統治問題展開筆戰，例如 1897 年 10 月有名的高野孟矩事件，《臺灣日報》刊文批判總督府統治失當，但《臺灣新報》卻指責對手不應汙蔑總督府施政方針。⁷³ 兩家報社的爭戰，直到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出面干涉，協助日人守屋善兵衛出資買下兩報，於 1898 年 5 月合併成立《臺灣日日新報》，才平息了這場紛爭。

《臺灣日日新報》由前總督府官房祕書課長木下新三郎擔任主筆，並接受兩

⁶⁸ 山本武利，《近代日本の新聞読者層》，頁 180-181。

⁶⁹ 當然，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臺灣已出現劉銘傳時期發行的《邸抄》，以及英籍傳教士巴克禮以羅馬字拼音印製的閩南語《臺灣府城教會報》，但真正開始具備大量印刷、即時性及無限制閱報者身分的近代化新聞報紙，還是要到日治時期才出現。有關日治時期以前臺灣新聞事業的發展敘述，見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10-14；徐郁縈，〈日治前期臺灣漢文印刷報業研究（1895-1912）——以《臺灣日日新報》為觀察重點〉（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24-28。至於他律性的說法，見李承機，〈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的分裂〉，收錄於若林正史、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2004），頁 202。

⁷⁰ 由於這一天正值日軍佔據臺灣一周年，即「臺灣首政紀念日」，發行新聞報紙對日本政府而言極具意義，美國領事也獲知臺灣刊行新聞，並將此消息登上美國當地報紙。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2005），頁 130。

⁷¹ 徐郁縈，〈日治前期臺灣漢文印刷報業研究（1895-1912）——以《臺灣日日新報》為觀察重點〉，頁 58。

⁷² 《臺灣新報》社長山下與首任樺山總督同為薩摩系，而《臺灣日報》社長川村則與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同為長州系，內地日本的藩閥派系衝突進而延燒到殖民地臺灣的新聞界。再加上總督府提供的補助出現差別待遇的情形，使得兩家報社員工即便在路上相遇也會大打出手。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頁 88。

⁷³ 鍾淑敏，〈館藏《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頁 140。在這件衝突中弔詭的是，與乃木總督同派系的《臺灣日報》，卻在高野事件中批判乃木的統治，而對手《臺灣新報》卻站在總督府的立場為其說話。這牽涉到兩派之間微妙的糾葛關係，李承機曾指出這點。見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24-26。

家報社的人員器材。在組織成立的同一天，總督府即頒布府令第 21 號，規定臺灣總督府發布的《府報》將以《臺灣日日新報》的附錄方式發行，總督府也將補助報社刊載費，此舉等於明示總督府與臺灣日日新報社的合作關係。⁷⁴ 有了官方的支持，《臺灣日日新報》便開始整頓內部、延攬記者，以及革新技術。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日日新報》挾帶著豐厚的資本以及官方支持，迅速在臺北以外的地區設立分局，擴大在臺發行市場，如 1901 年在臺中設立《臺中每日新聞》（1907 年更名為《臺灣新聞》），1903 年則買收臺南的在地新聞《臺南新報》，至此臺灣北、中、南三地「御用三大報」已將日刊新聞的市場寡占。⁷⁵

除此之外，《臺灣日日新報》也試圖擴大不同族群的市場。⁷⁶ 原先《臺灣日日新報》以 6 版日文、2 版漢文的方式發行新聞，後來在 1905 年 7 月獨立發行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企圖吸引人數眾多的臺灣人讀者購買、閱讀新聞。⁷⁷ 從發行地域與發行階層的擴大，可看出《臺灣日日新報》作為總督府官方御用新聞的優勢力量，及其經營殖民地新聞市場的積極態度。

二、《臺灣日日新報》的御用性質

從上面的敘述不難看出，《臺灣日日新報》從成立到發展過程，皆受到總督府的強力介入支持。該報之所以被稱做「官方御用報」，來自下列兩項理由：「資金挹注」——該報每年從總督府領取高額補助金，以及「殖民教化」——作為附錄《府報》和《臺北州報》之載體。⁷⁸

在資金挹注的部分如前所示，《臺灣日日新報》創立之初，便和先前的《臺灣

⁷⁴ 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頁 89。

⁷⁵ 石原幸作，《臺灣日日新報三十年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8），頁 19；洪桂己，《臺灣報業史的研究》，頁 39-40。

⁷⁶ 李承機從內地大眾新聞同業競爭的角度，說明《臺灣日日新報》必須擴大原先只鎖定在臺日人的銷售客源，因為這些人也會自內地購買《朝日新聞》等大報。為了與其競爭，向臺灣人拓展新聞銷售客源是絕對必要的。對內地新聞的競爭反應，也展現在較內地新聞低廉的售價方面。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殖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53。

⁷⁷ 會獨立發行漢文版的臺灣日日新報，除了商業上的利益考量，還因為原先日文版的新聞，常常提供針砭殖民政府的思想與觀念，為免影響臺灣漢人的民族意識，因此有獨立設置漢文版的必要性。而 1911 年 11 月停止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是因同年報社發生人員貪污的營運危機，以及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擔心臺籍人士受新聞影響而萌生反動之心，所以報社決定停刊。徐郁縈，〈日治前期臺灣漢文印刷報業研究（1895-1912）——以《臺灣日日新報》為觀察重點〉，頁 66-71。

⁷⁸ 本概念來自李承機，〈殖民地新聞としての台湾日日新報論——「御用性」と「資本主義性」のはざま〉，《殖民地文化研究》第 2 號（殖民地文化研究會，2003），頁 170-171。另外李敏忠也將這套概念加以論述，見李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衛生論述（1898-1906）為主〉，頁 4-6。

新報》一樣，由總督府每年補助 4 萬 8 千圓；另外，總督府還頒布府令公布式，額外增加每年 1 萬 8 千圓的補助。⁷⁹ 如此高額的補助金，也成為影響新聞報導的無形桎梏。而後，總督府更透過諸如「愛國婦人會」的名義投資、控制報社。⁸⁰ 在 1936 年發行的《臺灣新聞總覽》一書中，就有一段針對「御用新聞紙」的批判：

讀者為了拿到州報與府報，一定要購讀該報，因此該報不只可以得到府報、州報等的印刷費，還能增加報紙的銷售量。從事府報、州報印刷發行的報社，可說受到特殊的利益與保護。在這樣的關係下，受到如此保護的報紙絕對不能寫出對官廳不利的記事，甚至一味地報導對官廳有利的記事。⁸¹

如此看來，總督府權力的確透過資金挹注方式，強勢干涉了殖民地新聞報導的公共自由，在殖民教化部分就更不言可喻了。無論是透過附錄的《府報》、《州報》公布各式硬性法令，或是原先在內地日本新聞即大力推行的文明啟蒙相關軟性報導，都可看出新聞協助官方統治、啟迪人民，而這點在殖民地臺灣更為強烈。1908 年 5 月，在《臺灣日日新報》滿三千號之際，一位擔任《福州閩報》館主的人前島真就特地投書，肯定《臺灣日日新報》對治臺庶政的貢獻：

在此過渡時代，即有日報之創始，蓋為祈本島統治政策上，至大必要建設之事業也。回顧過去十年，臺灣總督府則銳意圖治，改善制度，整理財政，獎勵產業普及教育，其他設備交通機關，及勉力於物質上諸般之進步發達。今也方達其目的，收殆無遺憾之效果，至使內外環視者，賞讚我植民政策之成功。是雖不外乎總督府當局者之敏活運用其智能和手腕，所得之結果，抑亦不可無賴乎日報之為本島統治上之機關。⁸²

⁷⁹ 〈府令二一號臺灣日日新報ヲ以テ公布式トス、臺灣新報廢刊屆、臺灣日報廢刊ニ付公布式免除願、臺灣日日新報社公布式命令、臺灣日日新報ヲ以テ公布式ト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8 年 4 月 29 日公布。

⁸⁰ 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曾提出此說，但石原幸作在《臺灣日日新報三十年史》一書中，並沒有明確指明愛國婦人會與總督府的關係。徐郁縈在其研究中，曾引用竹中信子書寫日本女人在臺灣的記憶，說明當時竹中女士曾對愛國婦人會的資金流向含糊不清感到疑惑，其中可能隱含了政治目的。見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頁 90；徐郁縈，〈日治前期臺灣漢文印刷報業研究（1895-1912）——以《臺灣日日新報》為觀察重點〉，頁 90-91；竹中信子，《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明治篇 1895-1911）》（臺北：時報出版，2007），頁 160-164。

⁸¹ 豐田英雄編，《昭和十一年版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新聞批判篇，第 4 頁。

⁸²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5 月 3 日，第 8 版。

透過直接的資金挹注與府報刊載，總督府得以壓抑不利於自身之報導，並協助報社推動殖民教化工程，此與明治維新政府多有雷同之處。不僅如此，日治初期的臺灣吸引了不少日本的新聞人來臺創辦報社，更有原先就在日本發行的內地新聞引進臺灣，一時間殖民地的新聞輿論茂盛得宛如異地繁花，與內地日本如出一轍。但在推動殖民高壓統治、主導單一言論的總督府眼中看來，這些民間新聞即成了當局亟欲斬花除根的有害毒株。殖民官方與民間新聞的對立，促使了 1900 年 1 月《臺灣新聞紙條例》的誕生。

1898 年 8 月，總督府官員將還在草案階段的《臺灣新聞紙條例》送交評議會時，曾概述了提案理由：

有關本島報紙之管理，尚未有任何規定。如今施政漸漸步上軌道，同時，自我國內地渡海來臺者益增，民間言論範圍日趨複雜。當此之時，基於憲法之精神，係表達言論的報紙訂下適當的管理法，就治安維護上而言，誠屬緊要之事。是即需要制定本法之理由。⁸³

由此可知，總督府意識到民間言論的複雜，因此為了統治需要，必須控管新聞言論；且總督府基於殖民立場，其所訂定的新聞管控條例內容，較同時期的內地日本法令來得嚴格。⁸⁴ 舉例來說，內地日本的新聞紙條例已於 1887 年將發行手續改為報備制，但殖民地臺灣卻仍採取較為嚴格的許可制，意謂總督府有權在發行新聞前取消許可。另外，在新聞每日印刷發刊前，殖民地臺灣的新聞必須交付給官方先行檢閱，但內地日本只要在發行同時交付官方即可。除此之外，總督府對新聞言論的箝制，還展現在管控內容的禁止刊載事項，以及違反時的更正義務、罰金，甚至停止發行等事項上。

⁸³ 〈律令第三號臺灣新聞紙條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00 年 1 月 24 日公布。譯文採用徐國章之中譯，見徐國章，〈臺灣日治時期最初的新聞統制法——臺灣新聞紙條例〉，收錄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5。

⁸⁴ 在訂立過程時，即出現總督府與內務大臣針對條例草案內容的折衝狀況。總督府要求較嚴格的發行許可條件，但內務大臣卻認為稍嫌失當，這也使得臺灣新聞紙條例共費時一年半才得以通過並發布。談判折衷過程見徐國章，〈臺灣日治時期最初的新聞統制法——臺灣新聞紙條例〉，頁 4-8。

表 4-3-1 殖民地臺灣與內地日本的新聞取締法令比較

		發行創刊	發行禁止 處分權	納本檢查 制度	外地輸入 限制	保證金 繳還條件
內地	1897 年 改正《新聞紙條例》	報備制	司法處分	發行同時	無	較嚴格
臺灣	1900 年 《臺灣新聞紙條例》	許可制	行政處分 (臺灣總督)	發行前	輸入島內 時須事前 檢閱	有保證金 制度

資料來源：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表 1-1，頁 30。本表為其簡化版。

如此一來，從成立報社前、印刷新聞，以至於發行新聞後，總督府都能運用《臺灣新聞紙條例》傾軋與官方立場相左的民間新聞。另外，還可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御用紙平台與對手進行筆戰。例如 1900 年由臺北律師會創立的《臺灣民報》，就曾指責《臺灣日日新報》是「官方的奴隸，僅著眼於腐敗的補助金，而出賣貴重的言論自由，甚至可說是言論社會的蛆蟲。」⁸⁵ 在同一時間，《臺灣日日新報》則不甘示弱地刊登了一系列報導，除了質疑言論自由與言論者應負的責任，更影射民間新聞「假借正義、誣讟民聲，將會危害世道人身、荼毒天下國家。」⁸⁶ 此時，《臺灣新聞紙條例》的禁止發行許可權，就成為官方打壓民間新聞時，最具「合法性」(legitimacy)的工具。⁸⁷ 兩方的針鋒相對，再次顯示官方統治立場與民間言論自由的對立。⁸⁸ 而民間新聞就在官方法令的強力排擠下逐漸停刊，在 1909 年 7 月《全臺日報》宣布停刊後，《臺灣日日新報》及其他同一體系下之新聞，就成為臺灣島上唯一存在的日刊新聞。

至此可以看出，《臺灣日日新報》的確具有強烈的官方立場。無論是資金或法令，總督府皆設法扶植御用新聞，藉以打壓在臺日本人創立的民間新聞。在官方的不斷箝制下，最終於 1910 年代逐步消弭，殖民地臺灣的多元言論空間也跟著沉寂。⁸⁹ 直至 1920 年代，新一批臺灣漢人知識分子再次創辦新聞雜誌，才得以復甦。

⁸⁵ 〈御用紙に与ふ〉，《台灣民報》第 107 號，1901 年 1 月 29 日，第 1 版。

⁸⁶ 〈言論の自由と言論者の責任〉，《台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1 月 14 日，第 1 版；〈正義とか民声とか〉，《台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 月 27 日，第 3 版。

⁸⁷ 在《臺灣日日新報》上也曾出現這類報導，例如〈社会の制裁力〉，《台灣日日新報》，1901 年 2 月 22 日，第 1 版；〈新聞紙條例の運用に就て〉，《台灣日日新報》，1901 年 5 月 30 日，第 1 版。

⁸⁸ 有關這兩家新聞的詳細筆戰內容討論，見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43-45。

⁸⁹ 有關《臺灣日日新報》的官方性質，鍾淑敏曾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臺灣日日新報》的編輯並

其箝制言論自由的走向，與內地日本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殖民地臺灣的新聞，擁有更加嚴格的法令限制，也使御用新聞得以展現更明確的官方立場。

三、《臺灣日日新報》的讀者社群

1900 年，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紀錄在臺日本人的數量為 3 萬 7 千餘人，推估的全島人口數約有 284 萬餘人，日本人僅占了 1.3%。如此稀少的人口比例，即使到了 1915 年，也只上升至 3.8%。⁹⁰ 日本開始統治臺灣的前幾年，面對一個他者人數眾多、又動亂頻頻的南方異域，這些風塵僕僕渡海來臺的日本人，首先就得面對近乎被淹沒的恐懼與不安感。

會選擇在日治初期便動身來臺的日本人，多半是為了獵官的行政人員，或是從事商業、專職技能的商人資本家與技術工作者。這些為數不多的日本人，多半群聚在臺北城或其他城市內，形成一個以官吏為首、商人和資本家為主體的都市型日本人移居社會。⁹¹ 而都市型的移民社會與內地日本的地方農村型社會不同，無論是官員或是商人，都擁有一定程度的閱讀能力，對殖民地臺灣的情報知識需求也勢必更為強烈。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在統治隔年隨即設立《臺灣日日新報》，似乎也是為了滿足在臺日本人社會的實際需求。

另外，根據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在 1915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已習得日語的臺灣人人口數約為 5 萬 4 千餘人，約僅占不到 3% 的臺灣人口總數。⁹² 由此可以推斷，在 1915 年之前，擁有閱讀《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報導能力的臺灣人，應該更為稀少，這也說明《臺灣日日新報》前期所設定的閱讀對象，基本上是以在臺日本人為主。另外，從《臺灣日日新報》的發行人數成長數推移也可得知，在 1920 年以前的成長趨勢，與在臺日本人人口增加數的成長趨勢呈現一致。⁹³ 這表示日治初期《臺灣日日新報》逐年上昇的訂閱量，很大部分是歸因於在臺日人

不是都一成不變的維持官方利益，有時也會站在平民的立場。宋健行紀錄，〈《臺灣日日新報》110 週年紀念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164 期（2008），頁 23-24。

⁹⁰ 詳細全島及在臺日本人的口數目，參見李承機の整理，至於人口比例數則為筆者自行推算得知。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表 1，頁 16。

⁹¹ 舉例來說，前述 1900 年約 3 萬 7 千餘名的日本人，就有近 2 萬 1 千餘人居住在臺北城周邊。在臺日本人社會因而呈現了高度的都市性。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四統計書》（東京：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2），頁 55。

⁹² 李承機，〈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の分裂〉，頁 208。

⁹³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17。在 1920 年以後，新聞的成長指數就超過了在臺日本人的成長指數，這顯示訂閱新聞的讀者，不再只來自於在臺日本人，也開始包含越來越多擁有日文閱讀能力的臺灣人。

人口數的成長所致。這使得日治初期的《臺灣日日新報》呈現了鮮明的社群性，堪稱是一份專屬於在臺日本人的新聞。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理解，《臺灣日日新報》的存在對一個身處異域、人數稀少的小社群來說，有多麼的重要。透過新聞的發行，在臺日本人可以獲得統治初期全島的各類報導，包括動亂消息、島內知識、商業情報等等，也可初步了解總督府即將如何統治、處理臺灣事務。日文新聞的存在，可以幫助撫平日本人心理上的不安感。同時，為了聯繫為數不多的日本人，日文新聞也成為重要的團結象徵。每天閱讀日文新聞，就像不停地確立自己是日本人（或是殖民者）的身分一般，新聞成為維繫日本人族群意識的絲繩，也是將各類消息傳遞給島內其他日本人的社群網絡。換言之，新聞的出現，幫助在臺日本人能順利地在這座島嶼順利落腳。探討《臺灣日日新報》做為總督府御用新聞的同時，也必須從閱讀群眾的角度，分析其對在臺日本人社群而言，所具備之重要象徵地位。

在分別就官方「御用性質」、民間「讀者社群」兩大角度分析殖民地新聞《臺灣日日新報》的特色之後，接著就要討論在這樣的特色之下，殖民地新聞的異己報導將會如何呈現。

四、《臺灣日日新報》的異己報導

對在臺日本人而言，領臺之初的異己，除了在各地引發大小動亂的臺灣漢人，就是心中長期以來對臺灣的刻板異己印象：蟄居於山區、行蹤不定的野蠻蕃人。對新來乍到、人數稀少的日本人來說，為了身家安全，勢必得對這群異己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初期的異己報導，多半以介紹蕃人蕃界相關知識為主，這樣的現象在 1898 年 5 月《臺灣日日新報》開始發行後，仍是如此。吸收異己知識，不僅是為了滿足獵奇心態，更是一種基於生存安全的需求。而領臺初期學術專家的異己調查報導，就成為在臺日本人重要的知識來源。

另外，正因缺乏對蕃人的相關知識，此時期的異己報導，除了數量眾多外，還出現某種程度的多元性。例如，相較於伊能嘉矩、鳥居龍藏等主流學者，森丑之助的文章便常常刊登在殖民地新聞上。⁹⁴ 因為地域限制，使得森氏這類較偏向蕃人立場的異己報導文章，更容易為在臺日本人所閱讀、進而吸收，也使殖民地

⁹⁴ 根據楊南郡的整理，以及筆者搜尋內地新聞的結果，森丑之助的報導來源，多半來自殖民地臺灣的新聞媒體，例如《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等等。不同的學術知識產出者，選擇刊載的新聞媒體地域不同，受影響的閱讀對象自然也會有所差異。

新聞的異己報導更有機會展現多元性。但當統治逐漸穩固，控制範圍逐步往山區擴展後，隨著武力討伐的五年理蕃戰爭時期來臨，對蕃人蕃地事務的相關論述報導，也逐漸趨向單一化。

在 1910 年 4 月，日軍開始推進隘勇線後，異己報導與戰爭報導便相互結合。持續掌握戰爭狀況與蕃界動向，成為在臺日本人普遍關注的議題。因此，《臺灣日日新報》幾乎每天都會報導戰地消息，在 1910 年至 1915 年的討伐期間，共出現高達 3 千 3 百多筆的蕃界相關報導。⁹⁵ 但討伐初期的不順，以及不斷上升的死傷人數，使輿論開始出現質疑討伐的聲音，特別是來自內地新聞的質疑。站在總督府立場的《臺灣日日新報》即強力指責這類批評言論：

總督府本次的討蕃大行動，除了動用警察力量之外還出動了軍隊，對此內地新聞出現一些輕躁之臆測與蜚語，指責總督府的計畫。例如，「此等大舉壓迫兇蕃的龐大計畫將會失敗；總督府輕率的偵查工作，讓警察隊陷入死地無法脫身，因此才需要出動軍隊；從來精悍無比的警察隊，如今士氣耗衰、威嚴墜地，將成為文武官衝突的禍源；軍隊是在國家危急之時才能出動的力量，攻打於野獸無異的生蕃，實無必要，不能為了表面討伐的小功勞，而寬宥此等大失態之舉動。」這都是一些不了解生蕃、不了解臺灣駐紮軍隊的妄論藝語。這不只汙衊了警察，還是一種對軍隊的污辱。⁹⁶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對總督府大規模的討伐行動，內地輿論持否定態度。為了取得群眾、特別是在臺日本人的信心與支持，《臺灣日日新報》一一駁斥上述質疑，並說服大眾支持總督府討伐行動。首先，報導解釋生蕃對其居住土地的觀念，並藉此將此次討伐行動提升至國對國等級的戰爭：

生蕃所佔據的土地，是彼等祖先用鮮血奪取，用鮮血捍衛的貴重領土，與我國領土一般，即便是寸尺之地都不能讓與他人。若他人侵犯我國之領土，是為國寇，而面對國寇，我等必將竭盡全力守衛國土與之作戰，是謂愾敵之心。因此生蕃不願沐浴皇恩成為我國之民，並竭盡全力抵抗侵犯祖傳領

⁹⁵ 其中與「討蕃」相關的報導佔了 2930 筆，而與「理蕃」相關的報導則約 387 筆。這顯示五年理蕃時期的報導重點已在「討伐」層面，而非先前議論方針時的「治理」層面。藉此也可看出，此時期的異己報導，必須結合戰爭角度共同分析，而非僅止於異己想像的角度。

⁹⁶ 〈理蕃と討蕃〉，《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

土的國敵。世人多將彼等類比為土匪，認為討剿容易便視此事於度外，甚至將這群彼等視為飛禽走獸之流，這實在是愚妄至極。⁹⁷

藉由強調生蕃的頑抗，以及宛如國家間的領土之戰，報導將出動軍隊的行為合理化，並駁斥質疑出動軍隊的輿論。而針對如此龐大的討伐行為，基於人道立場，輿論也常出現總督府方過於暴虐的批評。因此，新聞時常為官方宣傳理蕃方針，強調討伐的必要性與階段性。例如同一則報導中就強調，「理蕃，是以理統治蕃人，而討蕃則是討伐蕃人。理蕃是永久的，而討伐則是一時的。」⁹⁸ 除此之外，《臺灣日日新報》還會轉錄外國對總督府理蕃的正面報導，例如這則 1911 年 2 月，來自香港《Daily News》標題〈公正的理蕃政策〉的報導：

「日本當局的方針是剿滅宛如害蟲一般的生蕃」這樣的流言，造成輿論對當局者極大的譴責與非難聲浪。但當行動逐漸推行這十五年來，根據生蕃人口調查報告的數字顯示，生蕃人口並未出現大量增減，這讓吾等感到欣喜。數字證明當局者目的並不是要剿滅生蕃，而是要用文明感化生蕃。……日本當局者與軍隊，對臺灣生蕃的處理方針與其他國家相同，皆採用寬仁、人道的處置方式，吾等感到欣喜。⁹⁹

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總督府官方得以宣傳其正面的理蕃形象，並反駁其他攻擊官方理蕃方針的輿論。特別在五年理蕃戰爭時期，《臺灣日日新報》除了戰地狀況消息，大多數都是讚許總督府理蕃討伐成果的報導。戰爭時期殖民地新聞的輿論受到官方嚴格控管，在臺日本人除了少數訂閱內地新聞的讀者之外，很難吸收異於官方、甚至是反對官方角度的觀點。¹⁰⁰

至於此時期的異己報導如何影響在臺日本人社群，則可從討蕃隊慰問活動的

⁹⁷ 〈理蕃と討蕃〉，《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

⁹⁸ 〈理蕃と討蕃〉，《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

⁹⁹ 〈公明なる理蕃政策〉，《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25 日，第 4 版。

¹⁰⁰ 當然，《臺灣日日新報》並不是完全沒有其他觀點的報導，例如 1913 年元旦，就出現一則署名「落水禪」的讀者投書，反思總督府理蕃方針。作者自稱以「白晝點燈」為題，是用來比喻自己的建議堪稱「無用」，但還是決定投書。內容大致上分享了自身對蕃人事務的感想，並批評當今的理蕃政策只重討伐，卻沒有完善的日後拓殖計畫，還是放任在地事務。作者最後建議，應該要建立武裝拓殖會社，賦予商業會社在山區高度的權力，並嚴格懲處蕃人。雖說是提供其他觀點，但基本上這則報導並非抵觸官方立場，只是覺得官方態度不夠強硬，或許這是此則報導得以被刊登出來的原因。落水禪，〈白晝点灯〉，《台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 月 1 日，第 37 版。

熱烈程度中窺得一斑。討伐行動開始後，新聞每天都會追蹤各地行軍進度以及戰事狀況，而死傷的軍隊人數也不斷攀升，報導中也一再強調戰地戰事的慘烈，以及死傷士兵的勇敢，這些敘述都不斷地挑起民眾情緒。因此，為了慰勞前線士兵，各地的慰問金募款活動非常熱烈，連內地民眾及國外的僑居同胞都群起響應。¹⁰¹

《臺灣日日新報》就以大篇幅版面，報導全國各地串連響應募款的盛況：

在臺灣居住的民眾親切地護送出征士兵，迎接傷病患者，抱持了極為深切的同情之念。各地人士與團體或捐贈金錢，或舉辦慈善義演，而內地的愛國婦人會與軍人後援會有志之士，也表達了深切的同情。……此次生蕃討伐事業，雖然只發生在臺灣的一角，但絕不只是地方性事業，而是要擴大帝國版圖、宣揚人道光輝。知悉此等事業的我等同胞，勢必不會躊躇不前，而會傾注滿腔之熱情。而狀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內地，又豈會不知道此等狀況，果然此次東京、大阪等大新聞社廣泛發起了義金募款，以慰勞討蕃隊的勞苦，並救助其遺族，……我等與內地東京大阪的同業者，共同發起此等義舉，喚醒同胞的俠義之心。¹⁰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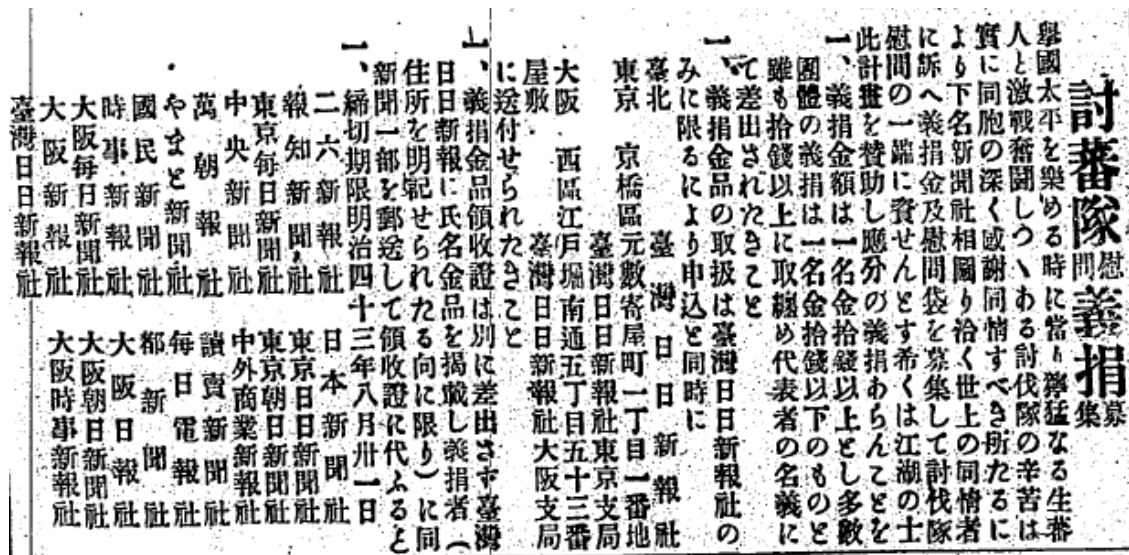


圖 4-3-1 各報社義捐地址與注意事項

圖片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7 月 22 日，第 2 版。

¹⁰¹ 〈討蕃隊慰問活動〉，《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7 月 8 日，第 5 版；〈内地よりの慰問狀〉，《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7 月 8 日，第 5 版；〈在外本邦人の同情〉，《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7 月 31 日，第 7 版。

¹⁰² 〈全国民の同情〉，《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7 月 21 日，第 1 版。

透過一連串戰地報導，在臺日本人得以凝聚集體意識，藉由募集義捐的活動慰勞前線的討蕃隊，甚至促成內地民眾的響應，擴大了集體意識的涵蓋範圍。此時群眾對蕃界的異己想像，也就定型為「兇猛生蕃」與「辛勞士兵」的文野兩極對立。不只是戰地報導，在臺日本人也透過其他多元報導形式，投遞自身的異己想像，例如替軍隊在出征前卜卦，祝賀其凱旋歸來，或是以討蕃隊為題作詩，讚揚討蕃隊的勇猛，都可發現這類對立想像的存在。¹⁰³ 而來自戰地人員的感謝投稿，更加深了軍民之間「共禦外敵」的友好團結想像。¹⁰⁴ 此外，在討伐後期開始出現類似〈討蕃從軍記〉的報導連載，以及愛國婦人會在全臺各地舉辦的「討蕃活動寫真」巡迴展覽，更從娛樂角度滿足廣大群眾對蕃人討伐過程的獵奇心態。¹⁰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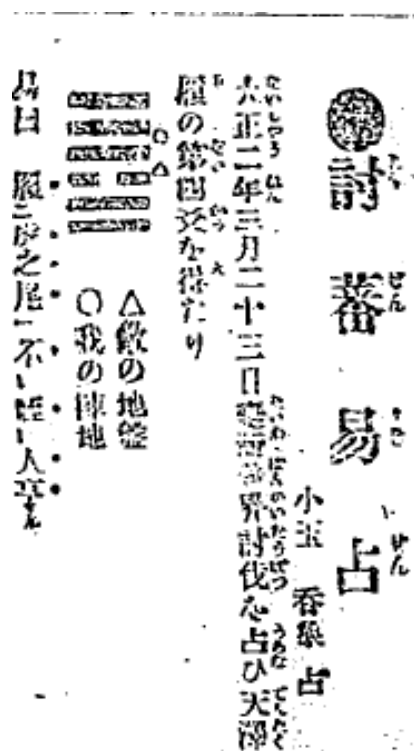


圖 4-3-2 討蕃易占

資料來源：《台湾日日新報》，1913 年 7 月 26 日，第 7 版。

¹⁰³ 〈討蕃易占〉，《台湾日日新報》，1913 年 7 月 26 日，第 7 版；〈討蕃隊（課題）〉，《台湾日日新報》，1910 年 7 月 19 日，第 1 版。

¹⁰⁴ 〈十把一束〉，《台湾日日新報》，1913 年 7 月 6 日，第 7 版。該名隘勇線員投書表示，每年討伐隊所獲得的義捐金，連在地其他應援隊與隘勇隊都能雨露均霑，是以身為前線人員之一，必定會晝夜不分的巡守，就像討伐隊員不畏勞苦一般。

¹⁰⁵ 〈討蕃從軍記（一）〉，《台湾日日新報》，1914 年 5 月 17 日，第 2 版；〈淡水戲館討蕃活動写真〉，《台湾日日新報》，1914 年 10 月 22 日，第 3 版。



圖 4-3-3 討蕃軍畫報

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12 年 10 月 24 日，第 3 版。

至於同時期內地的蕃界戰事報導，礙於資訊相對缺乏，刊登數量就比不上《臺灣日日新報》。例如在五年理蕃戰爭時期，《讀賣新聞》一共出現 50 則討蕃相關的報導，而《東京朝日新聞》則有 311 則。雖然數量不比殖民地新聞，但內地新聞仍會定期追蹤蕃界戰爭狀況，並刊登論說文章，向民眾宣傳為何總督府要討伐蕃人。¹⁰⁶ 另外，內地新聞也會刊載戰地畫報與圖像，加深讀者對戰地的想像。到了討伐後期，有關討蕃隊員的死傷狀況、立碑追念、撫卹行賞的新聞，更成為內地新聞追蹤報導的重點項目。至於在報導的立場與性質上，則與《臺灣日日新報》相差無幾，都站在官方立場。也就是說，無論是日清、日俄等海外戰爭，抑或是內部的理蕃戰爭，日本帝國基本上呈現輿論一致的現象，無論是內地或是殖民地新聞，都支持戰爭行為，也都同時形塑民間支持軍隊的團結形象。¹⁰⁷

¹⁰⁶ 〈討蕃隊苦戰〉，《東京朝日新聞》，1910 年 6 月 13 日，朝刊，第 2 版；〈慘澹なる理蕃の実況〉，《読売新聞》，1912 年 2 月 12 日，朝刊，第 3 版；〈何の為の討伐〉，《東京朝日新聞》，朝刊，第 2 版。

¹⁰⁷ 1915 年 4 月，當理蕃事業被認為告一段落，要開始推動教化蕃人的撫育政策之際，《東京朝日新聞》刊登一則訪問臺灣第二守備隊司令大島少將的報導，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島於該則報導中表示，理蕃戰爭根本還沒結束，生蕃的反抗之心還是非常堅定。但弔詭的是，在刊出此則報導後幾日，《東京日日新聞》就發出更正聲明，說明該報導「與事實不符」，因而取消。大島少將的說法顯然較符合實際狀況，但這與官方「已然平定」的說法顯然相悖。此則更正新聞，正好反映出上述兩種立場的相對，以及《東京朝日新聞》最後選擇了哪一方的立場。〈討蕃事業未し〉，《東京朝日新聞》，1915 年 4 月 7 日，朝刊，第 4 版；〈取消〉，《東京朝日新聞》，1915 年 4 月 18 日，朝刊，第 4 版。

本節敘述殖民地新聞《臺灣日日新報》的成立概況，並從官方御用與在地社群的角度，分別探討殖民地新聞的特殊性質，及其如何影響蕃人蕃地的異己報導內容。即便官方擁有極大的影響力，但日治初期的新聞仍然出現了一些重層異己論述。不過，隨著理蕃政策轉趨強硬，進入五年理蕃時期的蕃界報導，就全然走向戰爭統制新聞的單一立場，而殖民地與內地的新聞更因此趨於一致。這樣的結果，符合第一節所述「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概念，戰爭爆發與相關新聞的報導，皆反映、或可說強化了這樣的對立關係。

無論從帝國與大眾媒體的糾葛，或是從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來看，明治末期的五年理蕃戰爭，都堪稱是個至關重要的時期。戰爭不僅強化官方主導新聞輿論的力量，更持續深化文野對立的異己想像。而新聞媒體原先擁有的公共性，就像日本人心中文野之間的那段模糊地帶一般，在戰爭時期或被壓抑、或逐漸消弭，而各自走向單一化、兩極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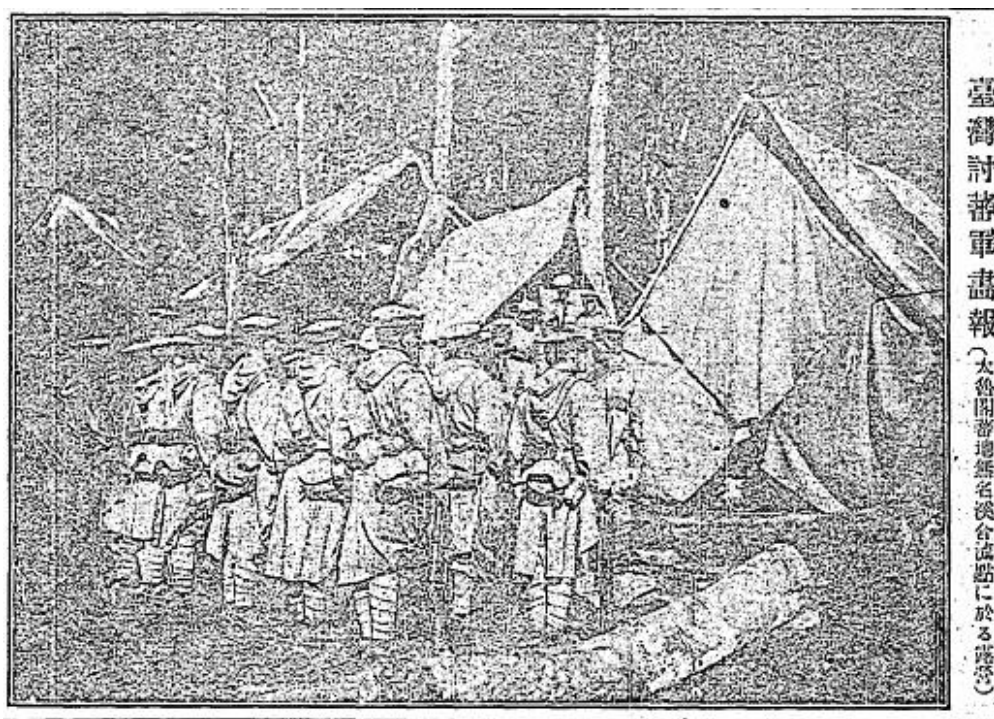


圖 4-3-4 臺灣討蕃軍畫報

資料來源：《東京朝日新聞》，1914 年 7 月 21 日，朝刊，第 3 版。



圖 4-3-5 臺灣討蕃彙報

資料來源：《東京朝日新聞》，1914 年 7 月 26 日，朝刊，第 3 版。

第四節 他聲喧嘩

截至目前為止，本文所探討的主要對象，皆以日本人為主體。在邁向近代國家的路途中，日本人燃起一把前進南方的慾望之火，對著一群黝黑之民射出文明差別的種族視線；日本人在投身南方異域時，從未知探索、獵奇巡狩到征服馴化，進而透過大眾媒體的報導，散佈各式各樣的異己想像內容；本文一再地試圖去呈現，在這樣一個混亂紛雜的時代，當面對相異於我者的南方人群時，「日本人」的聲音為何。而當各方聲音匯集形聚，蔚然成流之時，一個屬於日本人的、完整的南方異己論述即從中逐步形塑而成。

但是，日本人的南方異己論述，絕對不會只有日本人的聲音。每一次日本人進入廣大海洋中的叢爾小島，或溽熱潮濕的熱帶密林時，接觸的每一個南島部落、每一位南方原住民，都可能留下屬於他們自己的聲音。而這些聲音被日本人紀錄、轉述，更帶回日本內地流傳複製，最後匯入所謂的日本人南方異己論述當中。這些來自於異己本身的「異己」知識與話語，因此豐富了日本人的異己論述，更大大增加了異己論述重層差異的可能。

本節即從日本人眼中的他者——南方原住民的角度，試圖分析日本人的異己論述，如何因為摻入了原住民的聲音，而產生重層差異。特別是，當這些原住民和近代以降的日本人一樣，面對來自外部的文明與種族差異衝擊時，卻往往產生與日本人截然不同的反應，並為日本人所悉數擷取，成為南方異己論述中極為特別的一部份。而這樣的眾聲紛仍，更可能鬆動原本僵化的文明位階與種族優劣觀，進而跳脫出時代的侷限。

一、 符合期待：想像中的他者之聲

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來自南方他者的聲音呢？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就是將當地原住民面對文化衝擊時，好奇、驚訝的反應舉止盡數呈現。而這類文化衝擊，多半都是在面對代表「文明」、或代表「日本」我者的事物時，基於不了解而產生的困惑驚嚇情緒。例如，1890年12月《讀賣新聞》在刊登一連串田口卯吉的南洋遊歷見聞記時，就記載田口氏一行人把日本的傳統食物梅干拿給南島原住民吃，結果當地人卻被梅干的刺鼻酸味嗆得滿臉盡是難色，報導特別記載了這件被認為是有趣的小插曲。¹⁰⁸

¹⁰⁸ 〈南洋原住民の食物〉，《読売新聞》，1890年12月16日，朝刊，第2版。

這是一個明顯的文化衝突例子。對日本人而言，梅干不僅是一種日常食物，更代表了濃厚的家鄉味，對離家萬里的日本船員來說，這是消解鄉愁最棒的美味佳餚。但對不熟悉日本文化的南島原住民來說，梅干刺鼻酸澀的味道卻讓他們面有難色，這看在熟悉梅干酸味的日本人眼裡，成為一種非常有趣的反應。

無法接受梅干味道的南島原住民，當然是一種「非我族類」的最佳展現，而會將這類文化衝突看作一種「趣事」，其實也反映了日本人心中的文化位階差異。不只是吃梅干，當日本人用近代西方醫術醫好當地人苦惱已久的痼疾，以及展現種種象徵文明的事物時，這些野蠻人群展現的諸般「驚訝」、「崇拜」、「有趣」反應，都再次反映了文明上層人眼中，位處文明下層人群的無知愚昧。¹⁰⁹ 正因我者已有足夠智識掌握文明利器，而他者卻仍無知，才會「驚訝」、「崇拜」，才更突顯這件事的「有趣」。覺得「有趣」，其實正是一種嘲笑他者的心態。

另外，除了將異己的文化衝擊反應當成一種趣聞，另一種符合日本人期待的異己反應，就是順服與馴化。在統治臺灣初期，日本新聞在報導官員或學者造訪臺灣原住民部落時，格外喜好描寫原住民順服天皇的舉止：

臺灣臺東縣下的卑南社、馬蘭社兩社，先前設立了生蕃學校，並於天長節舉行授業式。……卑南社共四十五名，馬蘭社共五十六名學生，年紀多約十歲至十五歲上下，超過十五歲的僅十數名。……授業式當日，來賓一同進入校園，在老師的號令下，成列的學生向觀眾行最敬禮，並高唱「君之代」，其容貌之優秀，音調之柔美，與一般日本學生幾無差異。……在教師的帶領下，學生齊聲大喊天皇陛下萬歲。這些生蕃人的思想單純，將日本天皇陛下想像成是擁有龐大勢力的大頭目。¹¹⁰

臣服天皇，並高聲頌唱國歌的行為，被日本當局視為是臣服國家最重要的表現。透過這群「與日本學生幾無差異」的原住民學生行為舉止，內地的日本民眾得以想像遙遠的殖民地臺灣，有一些尊崇天皇陛下的原住民部落，裡面的學童跟自己的小孩一樣，都會唱國歌，共同敬愛著日本天皇。即便原住民對天皇的理解方式，與日本國民的想像有些差異，但學生們的文明舉止，都顯示了教化力量的偉大。

¹⁰⁹ 〈医学に素人の日本人が、グアムとヤップ島で原住民の病を治す〉，《読売新聞》，1890年12月15日，朝刊，第3版。

¹¹⁰ 〈台東庁下の生蕃学校〉，《読売新聞》，1897年11月21日，朝刊，第3版。

而這份教化功勞與順服象徵，都是朝向日本人的。藉由描述南方原住民順服行為，日本人得以提升自身的文明位階。這也是為何新聞報導會挑選這些過程記錄，並仔細敘述出來的原因。

無論是有趣的反應，或是順服的舉止，在日本人描繪南方原住民的記載當中皆處處可見。當然，這些行為絕對無法代表全體的南方原住民，有些敘述的可信度甚至也不高，但重點在於，日本人「需要」南方異己從事這些行為，藉以符合大眾對南方異己的期待，更讓日本人得以提升自我文明地位。也因此，這些來自南方異己的反應與聲音，都被塑造成迎合、貼近主流期待的樣貌，進而融於異己論述當中，強化既存的文明位階與種族優劣觀概念。

二、 不符期待：想像外的脫序之聲

然而，這些南方原住民並非全然如日本人所想像那般，甘於做個愚昧而順從的他者。原住民常常基於自身的文化傳統，在無意間對日本人及其背後的十九世紀西方文明價值觀提出不同異議，成為這些文明優勢者眼中「脫序」的野蠻人。但也因為這份野蠻的能動性，使他們無視於既存的文明位階框架，有時甚至可以帶領深陷其中的日本人脫離種族優劣觀的箝制。

位於南洋的原住民，擁有許多與日本人心中所謂的「文明」大異其趣的文化習俗，以下田口卯吉的這段「豔遇」，就生動地描繪出這段文化衝突：

田口卯吉氏抵達帛琉島後，過了兩三日，駕駛細田氏為了貿易，必須謁見島王，因此一行人前往一個叫 Airai 村的地方。抵達該村時已是黃昏，因此打算借俱樂部留宿一晚，有男女二人出來，同意田口氏一行留宿。據說此地有極端兇惡的土人，會劫殺旅客並且食人肉，俱樂部門前也有配槍帶劍的兵士。

正當田口等人臥躺在床上準備休息時，突然聽見一片漆黑的屋內傳來細碎的聲音，有人進入田口氏的被褥中。此時田口氏心裡想，必定是兇猛的土人前來襲擊自己，因此打算起身逃跑，但土人早已跨在田口氏身上，制住田口氏的右手以及項頸。田口氏嚇得大叫「細田先生快來救我」，細田氏聽到馬上坐起，大呼「來者何人，竟敢擒住田口社長」，並拿起火柴打算點火。但奇怪的是，摩擦了幾次卻總是點不著，後來好不容易點起了火，才發現田口氏身上的是袒著大乳的女人，原來是俱樂部裡面的女侍欲招待旅客。

細田氏將這件事告訴了田口氏，田口氏每次想起來都會覺得很丟臉。¹¹¹

對田口來說，原先以為的性命之憂，卻只是帛琉島住民招待旅客的慣例習俗，又礙於此事牽涉到性愛，讓田口是窘得難以開口。而在南島的性體驗傳回國內，就成了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趣聞，日後描述南島遊歷事件的旅人在碰到類似事件時，都會舉出田口的此次有趣經驗，以加深讀者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文化衝突當中，受驚嚇的不是「野蠻」的原住民，反而是代表「文明」的田口氏一行人。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如此開放的性關係根本堪稱是「淫亂」，也因此日後描述南島原住民的習俗時，都會特地強調原住民的淫亂開放，以及此種賣淫行為是多麼地野蠻。¹¹² 但對當地原住民來說，這樣的習俗是為了換取往來貿易船隻的昂貴物品，其中有一定的經濟交換關係，也涉及當地人的性別觀念與人觀，並非只是西方人眼中的淫亂。¹¹³

因此，遭遇文化衝突而感到驚愕的，已不是上段中的當地原住民，反而是外來的、所謂的「文明他者」日本人。一向被文明力量壓抑、只能被改變的在地野蠻文化，反而在此次事件產生了一種自我動能，主動反噬了日本人，並讓日本人將這股衝擊力帶回國內。就在這些奇聞軼事轉化成日本新聞，在國內大肆流傳的同時，其中蘊含的南島在地原住民價值觀，也持續地撞擊內地日本人既存的傳統價值，即便是以一種消極的「野蠻」姿態呈現。¹¹⁴

除了舊有習俗對日本人的衝擊，這些南方原住民在面對眼前高高聳立的文明之牆時，常常會提出一些看似無知，實則意涵頗深的言語。這些有意抑或無心的隻字片語，在事發的當下很可能匆匆流逝，或只被當成是另一件趣聞軼事而已，

¹¹¹ 〈南洋に於ける田口氏の艷福〉，《読売新聞》，1890年12月14日，朝刊，第3版。

¹¹² 例如新聞報導其他旅人的所見所聞，就會特別強調帛琉島有將敵方女性擄為奴隸，送至俱樂部充當女侍的習俗，甚至大肆渲染該島土人毫無男女倫理關係，可以跟外國水兵私相媾合，賣淫之風頗盛。有賀文八，〈南洋叢話（六）〉，《読売新聞》，1892年11月8日，朝刊，第1版。

¹¹³ 大洋洲地區的原住民有一套獨特的性別及經濟交換觀念，人類學家諸如 Goodale、Strathern（性別）與 Mauss、Weiner（禮物交換）等人均以當地民族誌為例，檢討西方中心式的性別二元對立及資本貨幣經濟概念。詳細內容可見王梅霞，〈「性別」如何作為一套文化表徵：試論性別人類學的幾個發展方向〉，《考古人類學刊》第64期（2005），頁30-58；牟斯（M. Mauss）著，汪珍宜、何翠萍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臺北：遠流出版，1989），頁11-29；A. Weiner 著、張帆如譯，〈不可異化的財富〉，收錄於童元昭編，《群島之洋：人類學的大洋洲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頁115-148。

¹¹⁴ 既然名為消極的「野蠻」，就代表這樣的習俗不太可能改變日本人的既有價值，而僅是一種有待淘汰的陋習，甚至還更強化了南方「野蠻」的意象。但之所以舉出此例，是為了強調在地習俗也有主動影響其他文化的能力，而不是眼睜睜的看著其他優勢文明力量改變自己。讓日本人感到「驚愕」、「羞愧」，就是一種衝擊他者文化的強勢展現。

但卻可能成為日後扭轉既有文明框架的關鍵銘言。1897 年 8 月，日本首次舉辦臺灣原住民內地觀光之旅，當一行人抵達當時日本最豪華的一流國際型大飯店「帝國飯店」時，這群臺灣原住民遇見了西方人：

回程在走廊遇見了一對西洋男女，婦人冷冷地向男子叨唸，批評著蕃人的粗野。此時岱木宓嚇看著婦人，突然停止不前。緒方通事問他在看什麼，岱木宓嚇指著婦人的細蜂腰問：「那個樣子生得出健壯的嬰兒嗎？」我等被他獨具慧眼的言詞嚇著，而其他蕃人也跟著嘲笑婦人，婦人感到羞恥，便快步逃離。¹¹⁵

岱木宓嚇是泰雅族大嵙崁前山群總頭目的養孫子，此次代表族人前往日本參觀，他的一番言語著實讓在場的日本人嚇了一大跳，而這個小插曲也被隨行的官員紀錄，並轉錄至內地新聞。或許當時的所有人都無法體會，但這番言論卻是那麼巧妙地扭轉了「文明 v.s. 野蠻」二元對立的僵化關係。更重要的是，這還是出自於臺灣原住民的一段話。

質疑來自於「文明」國家、被視為是「美觀」的細蜂腰，這句話成為一把巨鎚，一舉打破既存的文明位階，特別是以白人為至上的文明價值。已然追求西化的日本，或許早已喪失質疑西方文明的反思力量，但這群來自南方的野蠻原住民，相較於已然馴化的日本人，反而擁有更高的能動性，得以跳脫位階迷思，並重塑價值。在他們的觀念中，擁有健壯的嬰兒才是至關重要之事，而為了追求美觀、特別是為了迎合上層階級男性的品味，這群箝制自我身軀的白人女性，在原住民眼中看來，根本一點也不值得羨慕。在一旁感到驚愕的日本人，可能無法解釋為何要「追求細蜂腰」的價值觀，也無法否定原住民要求「生得出健壯嬰兒」的價值觀。兩種重層且平等的價值觀擺在面前，彷彿為當時正走向西方價值、逐步自我箝制的日本人開出了另一條積極活路。

這個經典例子被流傳下來，在日後的學術研究中成為日本學者的引用案例。在提及臺灣原住民的文明觀時，人類學家再次引用了這個例子，藉以強調原住民也有屬於其自身的一套文明觀，並告誡國人切勿將之視為智識低劣，而怠慢輕視

¹¹⁵ 藤根吉春編，《蕃人觀光日誌》抄本，頁 40。岱木宓嚇為蕃名翻譯，引用自傅琪貽〈誘導「嚮往文明」之旅：1897 年臺灣「蕃人內地觀光」〉一文。

他們。¹¹⁶ 這代表日本人不是只將原住民當作是毫無智識，沒有自我想法的野蠻人，而是承認他們擁有一套獨特的文明觀，進而肯定其存在的價值。

即便是消極的文化衝擊趣聞，抑或是積極的不同文明觀之呈現，都再次展現了南方異己並不只是一群蒙昧無知的「野蠻」代言人。這些南方原住民擁有無窮的能動性，得以鬆動、甚至衝破當時逐步箝制東亞各地的西方文明位階與種族優劣觀念，而展現出另一條跳脫迷思的途徑。若以事後諸葛的眼光來看，當時的日本人並未從中看出端倪，在日後依舊陷入了痛苦的迷思之中，但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降，反思自我文明、進而擁抱原始社會的思潮逐步興盛，許多日本文學家、藝術家皆透過不同作品，展現了多元文化的豐富與可能性。在這其中許多的啟發與靈感，更來自於這些南方原住民所帶給他們的衝擊。而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斷地擴大、深化南方異己論述。

是以，這些來自於南方他者的聲音，對日本人南方異己論述之形塑，是不可或缺的。而在近代日本逐步發展的路途中，在前進南方接觸人群的旅程中，四處蒐集紀錄的他者之聲，雖看似人微言輕，卻蘊含了無窮的反動力量，並透過不同的傳播形式，持續影響著深陷框架的日本人。

本章分析近代日本帝國與大眾媒體相互影響下，日本人的南方有色人群想像。第一節分析日本帝國權力如何箝制新聞媒體，第二節則以異己知識的產出來源、傳播途徑及呈現形式，論述新聞媒體的公共性，第三節探討殖民地臺灣新聞媒體的發展，第四節則探討來自南方異己本身的聲音。延續前兩章的處理方式，以下將列出三項在本章主要關心討論的脈絡，以便作結。

首先第一項，當然就是帝國權力的膨脹。無論是內地日本或是殖民地臺灣，帝國官方一直不斷地透過法令管制、資金援助、輿論攻擊等各種形式，限縮大眾媒體的公共性，而殖民地新聞的御用性質又更為明顯。而在異己想像的散佈與形塑上，從明治開國以來到五年理蕃時期的結束，透過理蕃事業在內的幾次的對「外」戰爭，不但導致帝國權力逐漸鞏固，異己論述更是逐漸趨向「文明 v.s. 野蠻」的二元對立姿態。發展到後來，無論是新聞的公共性，或是異己想像的重層多元，都受到帝國權力的壓迫與控管，而逐步走向單一化與兩極化。戰爭的發生，加速了帝國權力的膨脹，更是帝國收編媒體與論述的一種途徑。

¹¹⁶ 〈台灣土蕃の文明觀〉，《東京人類学会雜誌》第 23 卷 265 號（1908.4），頁 266-268。

但即便如此，在近代日本大眾媒體的發展過程中，依舊展現了多元自由的公共輿論空間。無論是異己知識的學術來源、知識傳遞的重層脈道，抑或是新聞呈現形式的多樣化，均在不同程度上偏離、甚至是對立於帝國官方的立場。近代日本的新聞事業在萌芽之初，就不僅只是文明開化的傳播工具，許多時候還帶著鮮明的批判政府色彩，具有很深的反動意識，開放的媒體平台讓不同民眾均能參與其中。也正是因為這份新聞媒體的公共自由，才得以承載本就龐大繁複的異己論述，並透過各種形式散佈給一般日本大眾。因此，要全面分析近代日本人的異己想像內容，就不能只從官方報告紀錄中去了解，還必須深入不同的新聞媒體搜尋，才能網羅各種大小不一、精奇詭妙的異己想像，這是大眾媒體的可貴之處，也是本研究之所以採用新聞媒體為主要分析史料的原因。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參雜在日本人的南方異己論述之中，那些來自南方異己本身的聲音。這些南方人群的思想、習俗與話語，不只是為日本大眾提供無窮的娛樂與想像來源，還具備了更為積極的意義。若僅將這些異己的聲音視為是一種「野蠻」的體現，那麼就算有再多的異己發聲，都只會再一次地淪為兩極化的文野對立。但若仔細審視這些話語的內涵，卻能發現這些喧嘩聲響，其實不斷以一種隱微卻充滿能動性的方式，持續刺激、衝擊著日本人既有的文明位階與種族觀念。來自南方異己的喧囂，儘管看來仍是野性勃勃的一片黝黑，但藏於其中的幽微之光，卻可能成為照亮文明開化迷霧、帶領日本人衝破種族優劣藩籬的關鍵。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探討近代日本人對南方有色人群的異己想像。透過在南洋、臺灣等南方地域的異己接觸、統治經驗，日本人在二十世紀初期形塑了一套南方異己論述，確立了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並藉此提升自我文明位階。以下先回顧各章節的主要重點，在標舉出各章關心的重要議題後，則進行整體脈絡性的論述，以闡明本論文之研究重點與發現。

第二章分析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人對南方有色人群的異己想像。第一節分析明治開國前後，近代西方的種族概念如何影響日本人，同時闡述受人種優劣觀影響下，介於黑白之間日本人的矛盾心態；第二、第三節則分別闡述兩個不同時期的海外進出事件與風潮，臺灣出兵事件成為日本人想像南方異己的原型，而明治二十年代的南進風潮則以一種浪漫化的形式，形塑日本人的南洋想像；最後一節則著重分析加諸於南方異己身上的負面族群想像內容，並試圖解構其背後的族群貌相過程。

第三章分析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對南方有色人群的異己想像。第一節探討南方起源說如何影響日本人想像、利用臺灣蕃人，以及這種親近概念的曖昧模糊與論述彈性。第二節分析形塑臺灣蕃人野蠻形象最重要的獵首習俗，是如何隨著理蕃事業的推行，逐漸被日本人定位為蕃人族群不變的負面標籤。第三節以內地觀光作為族群接觸的途徑，分析日本人如何看待這群來訪內地的南方有色人群，並透過新聞報導，將族群形象散佈給日本民眾，增進日本的文明自信。最後一節再次回歸人種概念的討論，分析身為有色人種的日本，如何面對白人的歧視與壓迫，並著重突顯帝國內部的優勢日本，及世界人種位階處於劣勢的日本，兩者之間的矛盾。

第四章分析近代日本帝國與大眾媒體相互影響下，日本人的南方有色人群想像。第一節分析日本帝國與大眾媒體的興起過程，以及帝國權力如何逐步箝制新聞事業的發展。第二節以產出異己知識的學術調查為分析重點，說明異己知識無論在產出來源、傳播途徑及呈現形式上，均呼應新聞媒體的公共性，而呈現出多元重層的面貌。第三節則著重闡述殖民地臺灣新聞媒體的發展，除了強調殖民地新聞的特殊性，也再次體現官方掌控輿論的過程，並於理蕃戰爭時期取得高度的統制化。第四節則探討來自南方異己本身的聲音，並企圖突顯這些聲音背後的能動性。

在章節安排上，本論文分別以第二、三兩章闡述十九世紀後期、二十世紀初期兩個時段的南方異己論述發展過程。另外，為了專心分析帝國與大眾媒體的共構關係，同時呼應本論文主要使用的核心史料「新聞」，本論文以第四章處理之。因此，在歷史演變的時間軸上，縱向切割的第二、三兩章自然反映其特殊的時代性，而橫向切割的第四章則是要彰顯新聞媒體之性質。

第二章所討論的十九世紀後期，對日本而言是個新舊相互交集、混亂而生氣蓬勃的時代。由於對外開放，原先模糊而未知的南洋地區，也首次被提出、明確化輪廓，承受著日本人海外進出的雄飛慾望，地域上的南洋更與人種上的南方野蠻人群相互連結，成為一個有待進一步探索、詮釋的「野蠻」標的。從臺灣出兵事件開始、到小笠原群島、南洋群島，以及十九世紀末首次領有海外殖民地臺灣，都是這份探索慾望的實際展現，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仍舊方興未艾。

臺灣在這條南進想像的脈絡當中，佔了至為重要的位置。無論是日本首次對南方海外出兵的地域，首次實際接觸、更被新聞記載的南方異己人群，或者是日本第一個南方殖民地，臺灣的重要性都不言可喻。而透過本章的論述，也可提醒研究者在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史時，必須注意殖民統治前日本人對南方地域的想像慾望。不只是臺灣出兵的單一事件，明治二十年代日本人對南洋的南進潮，在各南方地域所產生的諸般野蠻異己想像，都與殖民統治後的臺灣蕃人、蕃地一脈相承。以日本人的角度處理臺灣史，必須注意與廣大南方地域的連結。

此外，在第二章的另一個重點，就是日本人逐步萌芽的種族概念。在明治開國前後，無論是來自於白色人種的壓力，或是對黑色人種的蔑視，日本人逐漸從中體認出自身族群的曖昧性：既身為劣等的有色人種，卻又希望與西方白人同享文明優勢位階。基於種族觀與優勝劣敗的概念，害怕被淘汰的不安，促使了日本人必須自我提升。因此，對南方有色人群的負面想像，成為提升自信心的重要途徑。透過不斷區分南方他者，及為其貼上負面族群標籤的種族貌相過程，日本人得以脫離有色人種身分的箝制，並與西方站在相同的文明高度，一起貶低這群劣等的南方有色人群。此時期不斷形塑的南方人群異己想像，對日本人而言不僅僅是理解、詮釋他者的過程，更是一股提升自我族群位階的重要力量。

而這樣的提升過程，則因實際統治臺灣而有更深一層的推進。第三章步入二十世紀初期，對日本人而言，這是個逐步累積民族自信的時代，也是南方異己論述成型的時代。接續前一章所論述的種族心態，殖民臺灣，使日本人擁有直接統治南方異己的機會，臺灣蕃人遂成為投射這份心態之重要施展標的。

第三章的前兩節，分別論述臺灣蕃人對日本人而言，幾項獨特的異己想像內容。首先是基於同為有色人種的族群溯源想像，而產生的南方起源說。近代日本人對南洋諸島的異己人群有著共祖同種的想像，在統治臺灣蕃人的例子中，共源想像合理化日本人的統治，更被統治者拿來做為操弄族群的工具，在統治初期形塑出日蕃聯合抵抗漢人的想像；但到了五年理蕃戰爭時期，這份共源想像卻被另一種日漢聯合的論述打壓。由此可見，同為有色人種的日本，發展出與西方殖民帝國截然不同的統治手法，而臺灣與南洋地區則成為日本人共祖同種想像的投射地域。

至於另一項重要的想像內容「獵首」習俗，則隨著時間演變，從原先日蕃共有的傳統習俗，轉化成蕃人獨特的野蠻族群標籤。透過新聞媒體不斷複述、再製，獵首成為野蠻人群特有的習俗，更在文野對立的框架下，成為臺灣蕃人彰顯其野蠻意象之首要象徵，也是文明日本不得不革除的劣等習俗。到五年理蕃戰爭時期，日蕃二元對立的形勢被確立、強化，並透過理蕃戰爭的成功，證明日本人擁有馴服南方人群的能力，日本也成功的晉升為文明國度。因此，日本人從統治臺灣的經驗中，獲得提升自我族群位階的機會，而內地觀光的舉辦，更是日本人向南方異己及本國人民展現文明力量的重要途徑，除了使南方他者臣服，更為了提升作者的自信心。對南方人群的異己論述，也在 1920 年代初步成型，並轉化為歌曲、戲劇、漫畫等不同形式，透過大眾媒體持續複製、傳誦這份刻板的野蠻想像。

然而，臺灣的成功經驗，依舊無法扭轉日本在世界人種位階上的矛盾地位。隨著二十世紀初期種族對立的激化，日本在臺灣，以及對中國、俄國的戰爭勝利，反而加深了西方白人對有色人種日本的排斥與恐懼感，更激發了各地的排日運動。追求文明提升的日本人，仍然無法從白人的種族歧視眼神之中逃脫。一次大戰後，挾帶著失望與不甘，日本人走向聯合有色人種抵抗白人的道路，為二十世紀的下一場世界性戰爭埋下衝突因子。將世界性的種族衝突現象納入本論文，是希望能解構傳統臺灣史研究中，日本人身為優勢殖民者的刻板印象，並以人種角度重新檢視這個早熟而矛盾的日本，如何於再製帝國內部文野二元對立的同時，也深受這份對立概念的外部排擠。

跳脫前面兩章對種族觀與異己想像的論述，第四章著重於大眾媒體的性質分析，而近代日本新聞業的發展，與帝國的成立相輔相成，因此全章的論述重點，即為帝國權力與媒體公共性兩股力道的競合關係。

日本的新聞媒體自發展之初，即不斷受到帝國權力的掌控。無論是以資金挹注，或是用法令整肅異己，帝國官方均運用其權力掌控新聞輿論。從殖民地臺灣的新聞業發展狀況，以及五年理蕃戰爭時期報導輿論的單一化，都可看出官方主導、著力的痕跡。以南方人群想像報導為例，在異己論述的形塑過程中，帝國更透過新聞報導不斷向民眾傳達其意志。但即便如此，大眾媒體的公共性，仍舊發揮了一定力量，將眾聲紛仍的異己知識，透過不同的管道途徑與報導形式，散布至一般大眾身上。

從異己報導的例子中可看出，在帝國權力逐步介入的趨勢下，新聞媒體平台仍維持著公共性，並呈現多元重層的異己知識。或者可以說，異己知識的形塑與新聞媒體的性質，兩者皆具備了高度的多元性，帝國權力唯有不斷地統整異己論述、管控不同聲音輿論，才能順利收編、利用兩者，以達成帝國統治及文明提升之目的。正因如此，在 1920 年代，一個主流、定型且二元對立的南方異己想像初步建立之際，也同時迸發多元觀點的異己想像，日本人開始反思自我文明，並重新進入野蠻、頌揚原始社會。兩種看似矛盾的異己論述，其實是可以並存的，更再一次呼應了南方異己論述的重層及多元性。

本論文的研究顯示，帝國種族心態、南方異己論述與大眾新聞媒體三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三者造就了近代日本人獨特的南方異己想像內容，並透過實際人群接觸及統治經驗，確立出日本人的文明位階與異己論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日本，歷經了一次重要的種族觀念衝擊，也形塑了一套獨特的種族心態。在掙扎、困惑、執拗、不安間擺盪的日本，也帶著這份心態，持續不斷地朝向未知的南方前進。

參考文獻

一、史料

(一) 報紙、雜誌與檔案

《やまと新聞》
《中央新聞》
《台灣民報》
《台灣新報》
《東京日日新聞》
《東京朝日新聞》
《獨立評論》
《朝野新聞》
《郵便報知新聞》
《萬朝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時報》
《横浜毎日新聞》
《読売新聞》
《人類学雑誌》
《太陽》「南進乎北進乎」臨時増刊號（1913.11）
《日本人》
《日本主義》
《東京人類学会雑誌》
《東京經濟雑誌》
《蕃情研究会誌》
《実業之日本》春季増刊南洋號（1915.3）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寺沢一、和田敏明、黒田秀俊編

1979 《北方未公開古文書集成》第一卷。東京：叢文社。

竹越與三郎著、山下普司等編

2002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民族誌選集 15 南国記、南洋風土記》。東京：クレス出版。

朝日新聞百年史編修委員會編

1995 《朝日新聞社史 資料編》。東京：朝日新聞社。

臺北州警務部編

1924 《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下編（1）》。臺北：臺北州警務部編印。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

1902 《臺灣總督府第四統計書》。東京：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89[1918] 《理蕃誌稿》第一卷。東京：青史社。

1989[1921] 《理蕃誌稿》第二卷。東京：青史社。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

1997[1918] 《理蕃誌稿》第一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陳金田譯

1997[1921] 《理蕃誌稿》第二卷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7[1932] 《理蕃誌稿》第三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二）時人著作

三宅米吉

1886 《日本史學提要：氣候・人種・古物》。普及舍。

大野恭平、佐藤四郎

1915 《南国》。丸善書店。

大路會編

1930 《大路水野遵先生》。臺北：大路會事務所。

小野秀雄

1922 《日本新聞發達史》。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

井上雅二

1915 《南洋》。富山房。

內田嘉吉

1914 《國民海外發展策》。拓殖新報社。

石原幸作

1928 《臺灣日日新報三十年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竹越与三郎

1905 《台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

1910 《南国記》。東京：二西社。

志賀重昂

1887 《南洋時事》。東京：丸善商社。

村井靜馬編輯、鮮齋永濯畫

1876a 《明治太平記》8編下卷。東京：東京書林延壽堂。

1876b 《明治太平記》9編下卷。東京：東京書林延壽堂。

信夫清三郎

1941 《後藤新平：科學的政治家の生涯》。東京：博文館。

高山樗牛

1905 《樗牛全集》第3卷。東京：博文館。

高橋義雄

1884 《日本人種改良論》。東京：石川半次郎出版。

鳥居龍藏

1925 《有史以前の日本》。磯部甲陽堂。

朝倉龜三

1911 《本邦新聞史》。雅俗文庫。

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著，土屋喬雄、玉城肇譯

1955[1912] 《ペルリ提督 日本遠征記（四）》。東京：岩波文庫。

鼎軒田口卯吉全集刊行會編

1927 《鼎軒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東京：吉田弘文館。

森島中良

1913[1787] 〈紅毛雜話〉，收錄於早川純三郎編輯，《文明源流叢書》第1卷。
東京：國書刊行會。

鈴木經勲

1980[1892] 《南洋探検実記》。東京：平凡社。

福島九成

1986[1873] 〈清国台湾事情の儀〉，收錄於牧原憲夫編，《明治建白書集成》
第3卷。東京：筑摩書房。

徳富蘇峰

1916 《大正の青年と帝国の前途》。民友社。

稻垣滿次郎

1891 《東方策》。活世界社，哲學書院。

豐田英雄編

1936 《昭和十一年版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

藤根吉春編

1897 《蕃人觀光日誌》抄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鶴見祐輔

1917 《南洋遊記》。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

Nitobe, Inazo

1912 *The Japanese Nation: Its Land, Its People, and Its Lif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Stoddard, T. Lothrop

1921 *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 Supremacy*. New York: Scribner's.

Taylor, George

- 1889 “Formosa: Characteristic Traits of the Island and Its Aboriginal Inhabitant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ew Monthly Series*, 11(4): pp. 224-239.

Weale, B. L. Putnam

- 1910 *The Conflict of Color: The Threatened Upheaval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二、研究論著

（一）中、日文論文

千住一

- 2003 〈軍政期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観光団の実態とその展開：占領開始から民政部設置まで〉，《太平洋学会誌》92：17-24。
- 2004 〈「観光」へのまなざし——日本統治下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観光団をめぐって〉，收錄於遠藤英樹、堀野正人編，《「観光のまなざし」の転回——越境する観光学》，頁131-146。東京：春風社。
- 2005 〈日本統治下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観光団の成立〉，《歴史評論》661：52-68。
- 2013 〈南洋群島における内地観光団をめぐる「内的心情」〉，《日本植民地研究》25：40-53。

土屋礼子

- 2005 〈明治七年台湾出兵の報道について——『東京日日新聞』を中心に〉，收錄於明治維新史學會編，《明治維新史研究8 明治維新と文化》，頁211-235。東京：吉田弘文館。
- 2006 〈「帝国」日本の新聞学〉，收錄於山本武利等著，《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4 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頁23-64。東京：岩波書店。

小松和彦

- 2001 〈横渡南洋の壯士，森小弁〉，收錄於篠原徹編，《近代日本の他者像と自画像》，頁195-223。東京：柏書房。

山本武利

- 2006 〈「帝国」を担いだメディア〉，收錄於山本武利等著，《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4 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頁1-22。東京：岩波書店。
- 1987 〈草創期のジャーナリスト群像〉，收錄於田中浩編，《近代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スト》，頁3-19。東京：御茶ノ水書房。

山路勝彦

- 2007 〈「野蛮人」の表象、あるいは植民地主義の起源：明治7年の台湾出兵をめぐる諸問題〉，《台湾原住民研究》11：142-166。

中山昭彦

- 2000 《裸体画、裸体、日本人—明治期〈裸体画論争〉第一幕—》，收錄於金子明雄等人編著，《ディスクリールの帝国——明治30年代の文化研究》，頁16-55。東京：新曜社。

中村敬

- 2000 〈船橋洋一、志賀直哉、そして森有禮：西洋の大言語と皇国言語の狭間で〉，《成城文芸》170：1-32。

丹尾安典

- 1994 〈"極東ギリシア"の裸体像〉，收錄於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編，《人の〈かたち〉人の〈からだ〉 東アジア美術の視座》，頁344-359。東京：平凡社。

井田輝敏

- 1987 〈民権期ジャーナリスト〉，收錄於田中浩編，《近代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スト》，頁95-115。東京：お茶の水書房。

今泉裕美子

- 1990 〈日本の軍政期南洋群島統治（1914-1922）〉，《国際関係学研究》17別冊：1-19。
1993 〈南洋群島委任統治政策の形成〉，收錄於大江志乃夫編，《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4》，頁51-81。東京：岩波書店。

王梅霞

- 2005 〈「性別」如何作為一套文化表徵：試論性別人類學的幾個發展方向〉，《考古人類學刊》64：30-58。

王學新、龍仕騰

- 2001 〈「殺番賞」之研究——以竹苗地區為例〉，收錄於林金田主編，《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41-288。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平戸幹夫

- 1979 〈怠惰なマレー人の虚像と実像〉，《海外事情》27(3)：38-46。

弘末雅士

- 1999 〈近代植民地主義と「食人」——北スマトラを舞台に〉，收錄於栗本英世、井野瀬久美恵編，《植民地経験：人類学と歴史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頁289-304。京都：人文書院。

田中梓都美

- 2011 〈牡丹社事件を契機とする日本人の台湾認識の変化〉，《史泉》114：15-29。

伊凡諾幹

- 1998 〈近代教育與'tayal【msbtunux】初探——殖民主義、近代化與民族的動態〉，收於莊萬壽、林修澈、鄭瑞明、陳獻明編輯，《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53-175。臺北：臺灣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等發行。

朱惠足

- 2007 〈做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臺灣之間〉，《文化研究》5：49-86

吳文星

- 1997 〈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收錄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頁 11-2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吳坤季

- 2009 〈帝國符碼與殖民策略——《臺灣日日新報》圖像內容分析〉。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昱慧

- 2009 〈《南國再見，南國》影片介紹〉。文章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665&&my_pro=5&&ime=&&fdsn=348](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665&&my_pro=5&&time=&&fdsn=348)。

宋健行紀錄

- 2008 〈《臺灣日日新報》110 週年紀念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164：1-28。

我部政明

- 1982 〈日本のミクロネシア占領と南進(一)〉，《法學研究》55(7)：876-895。

李承機

- 2003 〈殖民地新聞としての台湾日日新報論——「御用性」と「資本主義性」のはざま〉，《殖民地文化研究》2：169-181。
- 2004a 〈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的分裂〉，收錄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頁 201-240。臺北：播種者文化。
- 2004b 〈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李敏忠

- 2003 〈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衛生論述（1898-1906）為主〉。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湘雲

- 2009 〈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岡部三智雄

- 2010 《日本治臺前來臺日人之研究（1874-189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岩井忠熊
- 1960 〈志賀重昂論（上）〉，《立命館文学》186：1309-1330。
- 河西晃祐
- 1998 〈南洋協會と大正期「南進」の展開〉，《紀尾井史学》18：39-53。
- 林呈蓉
- 1997 〈近代初期日本の移殖民論與移殖民活動〉，《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7：259-287。
- 邱雅芳
- 2008a 〈南方的光與熱——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的臺灣書寫與南進論述〉，《臺灣文學研究學報》6：193-223。
 - 2008b 〈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徐郁縈
- 2008 〈日治前期臺灣漢文印刷報業研究（1895-1912）——以《臺灣日日新報》為觀察重點〉。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國章
- 2001 〈臺灣日治時期最初的新聞統制法——臺灣新聞紙條例〉，收錄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27。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神谷忠孝
- 1991 〈南洋神話の形成〉，收錄於矢野暢編，《東南アジアと日本》，頁49-63。東京：弘文堂。
- 高致華
- 2002 〈日本人の観点から見た鄭成功のイメージ〉，《中日文化》21：245-258。
- 張隆志
- 2002 〈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於國史館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頁1235-1259。臺北：國史館。
 - 2006 〈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臺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收於梅家玲主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頁233-259。臺北：麥田出版。
- 清水元
- 1983 〈大正初期における「南進論」の一考察--そのアジア主義的変容をめぐって〉，《アジア研究》30(1)：1-53。
 - 1991 〈明治中期の「南進論」と「環太平洋」構想の原型(I)：志賀重昂『南洋時事』をめぐって〉，《アジア経済》32(9)：2-20。

陳文添

- 2013 〈深堀大尉探險遇難事件〉，《臺灣文獻》44：35-46。

陳芷凡

- 2010 〈跨界交會與文化"番"譯：海洋視域下臺灣原住民記述研究（1858-191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偉智

- 1998 〈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 〈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析〉，《臺灣史研究》16(4)：1-35。

傅琪貽

- 2008 〈論近代日本的「國家認同」：以臺灣「高砂族」的認同為例〉，收於黃自進主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政治社會特徵》，頁71-108。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中心。
2010 〈誘導「嚮往文明」之旅：1897年臺灣「蕃人內地觀光」〉，《文化越界》1(3)：47-74。

富山一郎著、陳幸均譯

- 2007 〈殖民主義與熱帶科學：「島民」差異的學術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121-143。

楊智景

- 2008 〈日本領有期の台湾表象考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植民地表象〉。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2012 〈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原住民書寫〉，《原住民族文獻》5：26-31。

賴秀峰

- 1973 〈日據時代臺灣雜誌事業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淑敏

- 1994 〈館藏『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推廣組編，《慶祝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週年暨改隸中央二十週年紀念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頁137-155。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簡于鈞

- 2012 〈重訪接觸帶：從西方旅人視野再見十九世紀臺灣（1860-188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顏杏如

- 2009 〈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

藍佩嘉

- 2013 〈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文章網址：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08/26/lanpeichia/>。

（二）中、日文專書

エメ・アンベール（Aimé Humbert）著、高橋邦太郎譯

- 1970 《新異国叢書 15 アンベール幕末日本図絵（下）》。東京：雄松堂書店。

ポール・ゴードン・ロレーン（Paul Gordon Lauren）著、大蔵雄之助譯

- 1995 《国家と人種偏見》。東京：TBSブリタニカ。

マーク・ピーティアー（Mark R. Peattie）著、浅野豊美訳

- 1996 《植民地：帝国 50 年の興亡》。東京：読売新聞社。

下中弘編

- 1992 《日本史大事典》第 1 卷。東京：平凡社。

千葉市美術館編

- 2008 《文明開化の錦絵新聞——東京日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全作品》。東京：図書刊行会。

土屋礼子

- 2002 《大衆紙の源流：明治期小新聞の研究》。京都：世界思想社。

土屋喬雄監修、荒木昌保編

- 1976 《新聞が語る明治史（第一分冊・明治元年—明治二十五年）》。東京：原書房。

大久保利謙編

- 1972 《森有禮全集》第 3 卷。東京：宣文堂書店。

大久保利謙、田畑忍監修

- 1990 《加藤弘之文書》。京都：同朋舎。

小木新造、熊倉功夫、上野千鶴子編

- 1990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23 風俗・性》。東京：岩波書店。

小熊英二

- 1995 《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 1998 《「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

小熊英二著、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經典研讀會黃阿有等譯

- 2011 《日本人的國境界——從沖縄、愛奴、臺灣、朝鮮的殖民地統治到回歸運動》。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臺灣文化研究中心。

山本文雄

- 1970 《日本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史》。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

山本武利

1973 《新聞と民衆：日本型新聞の形成過程》。東京：紀伊國屋書店。

1981 《近代日本の新聞読者層》。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山本武利編

2006 《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4巻 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
東京：岩波書店。

山室信一

1984 《法制官僚の時代——国家の設計と知の歷程》。東京：木鐸社。

山路勝彦

2004 《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
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2011 《日本の人類学——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学術調査の歴史》。日
本：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

山路勝彦、田中雅一編著

2002 《植民地主義と人類学》。日本：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

川村湊

1994 《南洋・樺太の日本文学》。東京：筑摩書房。

中村勝

2003 《台湾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清朝・日帝初期統治政策の研究》。
東京：緑蔭書房。

2006 《「愛国」と「他者」：台湾高地先住民の歴史人類学Ⅱ》。東京：ヨベ
ル。

井上祐子

2012 《日清、日露戦争と写真報道》。東京：吉田弘文館。

井上清

1955 《条約改正：明治の民族問題》。東京：岩波新書。

今西一

1998 《近代日本の差別と性文化——文明開化と民衆世界》。東京：雄山閣。

内川芳美、新井直之編

1983 《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ズム》。東京：有斐閣。

日本宮内廳編

1967 《明治天皇紀 第一》。東京：吉川弘文館。

木村時夫

1973 《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史論》。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王天濱

2002 《臺灣新聞傳播史》。臺北：亞太圖書。

王甫昌

2003 《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臺北：允晨文化。

田中浩編

1987 《近代日本のジャーナリスト》。東京：お茶の水書房。

矢野暢

1975 《「南進」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

1979 《日本の南洋史観》。東京：中央公論社。

2009 《「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東京：千倉書房。

矢野暢編

1991 《東南アジアと日本》。東京：弘文堂，1991。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

1996 《臺灣踏查日記（上）：伊能嘉矩的臺灣田野探勘》。臺北：遠流出版。

吉見俊哉

2004 《メディア文化論——メディアを学ぶ人のための15話》。東京：有斐閣。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譯

2009 《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15講》。臺北：群學。

池田次郎、大野晉編

1973 《論集 日本文化の起源 日本人種論・言語学》第5卷。東京：平凡社。

池田清

2002 《日本の海軍》上卷。東京：学研M文庫。

竹中信子

2007 《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明治篇 1895-1911）》。臺北：時報出版。

西田長壽

1966 《明治時代の新聞と雑誌》。東京：至文堂。

牟斯（M. Mauss）著，汪珍宜、何翠萍譯

1989 《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臺北：遠流出版。

佐佐木隆

1999 《日本の近代14 メディアと権力》。東京：中央公論。

志賀富士男、山崎安治、猪瀬直樹編

1979 《日本風景論解題》。東京：飯塚書房。

坂野徹

2005 《帝国日本と人類学：1884-1952年》。東京：勁草書房。

坂野潤治

1977 《明治・思想の実像》。東京：創文社。

杉浦正

- 1996 《岸田吟香——資料から見たその一生》。東京：汲古書院。
見田宗介
- 1978 《近代日本の心情の歴史》。東京：講談社。
阮斐娜（Faye Yuan Kleeman）著、吳佩珍譯
- 2010 《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臺北：麥田出版。
松本三之介編、志賀重昂等著
- 1980 《明治文学全集 37 政教社文学集》。東京：筑摩書房。
松田京子
- 2003 《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田弘文館。
林呈蓉
- 2006 《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博揚文化。
河西晃祐
- 2012 《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大東亜共栄圏」への歴史的展開》。東京：
法政大学出版。
牧原憲夫編
- 1986 《明治建白書集成》第3卷。東京：筑摩書房。
明治文化研究會編
- 1992 《明治文化全集 第十八卷 新聞篇》。東京：日本評論社。
南博著、邱淑雯譯
- 2003 《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臺北：立緒文化。
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等譯
- 2002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臺北：聯經出版。
柯能（Victor G. Kiernan）著、陳正國譯
- 2001 《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臺北：麥田出版。
柳田泉
- 1965 《明治初期の文学思想》上卷。春秋社。
洪桂己
- 1968 《臺灣報業史的研究》。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淺野豐美編
- 2007 《南洋群島と帝国・国際秩序》。東京：慈学社。
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編
- 1999 《西郷都督と樺山總督》。臺北：成文出版社。
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
- 2004 《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
宮武外骨、西田長壽編
- 1985 《明治新聞雜誌関係者略伝》。東京：三陽社。
栗本英世、井野瀬久美恵編
- 1999 《植民地経験：人類学と歴史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京都：人文書院。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
2012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文化。
- 荊子馨（Leo T. S. Ching）著、鄭力軒譯
2006 《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
- 清水元
1997 《アジア海人の思想と行動》。東京：NTT 出版。
- 陳柔縉
2005 《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
- 陳 萱
2013 《明治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像の形成—新聞メディアによる 1874 年「台湾事件」の表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
1996 《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出版。
- 童元昭編
2009 《群島之洋：人類學的大洋洲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曾村保信
1977 《近代史研究——中国と日本》。東京：小峯書店。
-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
2000 《生蕃行脚：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
- 費德廉（Douglas L. Fix）著、羅效德譯
2006 《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
- 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原著、陳正三譯著
2008 《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臺北：臺灣書房。
- 楊南郡譯註
2002 《臺灣百年花火：清末日初臺灣探險踏查實錄》。臺北：玉山社。
- 鈴木健二
1997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メディア》。東京：岩波書店。
- 鄭政誠
2006 《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臺北：博揚文化。
- 駒込武
1996 《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
- 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志宏等譯
1999 《東方主義》。臺北：立緒文化。
- 藤井志津枝
1998 《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臺北：文英堂。

（三）西文專書、論文

Du Bois, W. E. B., as cited in United Nations, Centre Against Apartheid

1971 *International Tribute to William E. B. Du Boi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Dulles, Foster R.

1965 *Yankees and Samurai. America's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Japan: 1791-1900*. New York: Harper & Row.

Teng, Emma Jinhua

2004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Eskildsen, Robert

1998 "Telling Diffiencies: The Imaginary of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2 "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2): 388-418.

Goodman, Grant K.

1962 "A Translation of Otsuki Gentaku's Ransetsu Benwaku(蘭說弁惑)." *Occasional Papers on Japan* 3, pp.71-99.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ine, William,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by Frederic Trautmann

1990 *With Perry to Japan: A Memoir by William Hein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uffman, James L.

2003 *A Yankee in Meiji Japan: The Crusading Journalist Edward H. Hous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Hulme, Peter

1986 *Colonial Encounters: 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 1492-1797*. New York: Routledge.

Lauren, Paul G.

1988 *Power and Prejudice: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Lebar, Frank M.

1972-75 *Ethnic Groups of Insular Southwest Asia, 2 vols*. New Haven, Conn.

Lestringant, Frank

1997 *Cannibals: The Discovery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Cannibal from Columbus to Jules Verne, trans., Rosemary Mor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upp, Gary P.
 1995 “Images of Black People in Late Mediaeval and Early Modern Japan: Race Theory and Colour Consciousness, 1543-1900.” *Japan Forum* 7(1):1-13.
- Miyoshi, Masao
 1979 *As We Saw Them: The First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1860)*.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beyesekere, Gananath
 2007 *Cannibal Talk: The Man-Eating Myth and Human Sacrifice in the South Se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attie, Mark R.
 1988 *Nany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in Micronesia, 1885-194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Pyle, Kenneth B.
 1969 *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 Pro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ssell, John G.
 2008 “The Other Other: The black presence in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In M. Weiner edited, *Japan’s Minorities: The Illusion of Homogeneity, 2nd Edition*, pp.84-115. London: T&F Book.
- Smith, Anthony D.
 1984 “National Identity and Myths of Ethnic Descent.”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7: 95-130.
- Syed Hussein Alatas
 1977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London: Frank Cass & Co..
- Tierney, Robert T.
 2010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orgovnick, Marianna
 1990 *Gone Primitive: Savage Intellects, Modern L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liams, Arens
 1979 *The Man-Eating Myth: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phag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Eric
 1980 *Capitalism and Slavery*. New York: Perigee Books.